

目 录

- 日寇怎样统治伪蒙…………… 李守信 (1)
- 吴鹤龄和“蒙古各盟旗
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的活动…………… 张绍庭 (23)
- 我是怎样从“马贼”当上汉奸的…………… 李守信 (35)
-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守信 (67)
- 王英一生的罪恶活动…………… 韩祥符 (102)
-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德穆楚克栋鲁普 (143)
-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德穆楚克栋鲁普 (195)
- 所谓“凌陞通苏”事件的真相…………… 正珠尔札布 (230)
- 尼冠洲之死…………… 哈斯瓦齐尔 (236)
- 百灵庙抗日战役前后…………… 靳书科 (244)
- 抗战时傅作义部队从绥远撤退及在太原
的溃败…………… 韩伯琴 (269)

日寇怎样统治伪蒙

李守信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蒙，完全是采取了他们奴役压榨朝鲜、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并抄袭了中国历代王朝、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派笼络怀柔边疆少数民族所使用过的手段，随着国际局势和侵华战局的变化，针对伪蒙内部的各种矛盾，运用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把蒙奸和汉奸全玩弄在掌心，使蒙、汉人民不敢起来反抗。伪蒙政权这个历史怪胎，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正式诞生，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随着日本投降在张家口土崩瓦解，一共存在了九年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经过两度改组，头绪相当纷乱，特别是由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草原迁移进城市以后，内幕更为错综复杂。为了提供近代史研究者理解伪蒙历史，还是首先介绍日寇怎样统治伪蒙。兹就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兼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的经历见闻，举出事例说明此种真实情况。

(一)

“九一八事变”后，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其姨父补英达赖的策划下，公开跑到南京，补则密赴大连，和蒋介石

石与日本“关东军”同时进行政治勾搭。在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情况下，把身价提高了。加之西藏的班禅喇嘛，在这前后替他由东向西联络内蒙各盟旗的王公，他便有了统一内蒙，想当“蒙古皇帝”的野心。一九三六年，他跟蒋介石表面决裂，在嘉卜寺（今化德县）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时，即以成吉思汗诞生的那年做为纪元。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德王的伪政府和我的伪军，由察北进犯绥东，所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默许帮助他建立一个相同于伪满那样的国家。德王和溥仪不同，他不敢搬用君主立宪的帝制形式，而是让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充伪政府的正副主席，他任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

日寇公开立满洲国，对于蒙古是“分而治之”，绝不许德王把蒙古统一起来。“九一八事变”初期，他们为了利用东蒙，曾组织过伪“蒙古自治军”，但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成立以后，即把东四省境内的盟旗划入伪满，以兴安岭这个山脉命名而不以民族命名，分成伪“兴安”东西南北四个省，“蒙古自治军”也改称为伪满的“兴安军”。德王因此在我进驻多伦时，他跑到伪“兴安”西省，和伪“兴安军”总司令巴特玛拉布坦（扎赉特旗王爷）等好多人，瞒过日本“关东军”举行过一次民族团结的“歃血同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跟傅作义、门炳岳和刘汝明的军队，在商都和张北作战期间，由于嘉卜寺被袭，德王没敢到察北前线而逃往多伦，巴特玛拉布坦为了践盟，从伪满前来多伦，对他加以保护，东条英机的军队攻陷张家口，他才被陶克陶坐上飞机找回，到张北重新跟我合在一起。

张家口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沦陷，大同于九月中旬、归绥和包头于十月十四日及十六日相继沦陷，从此日寇将平绥路西段打通。德王和我率领的“蒙古军”等一枪未放，跟在日本军队的后边，由察北进入归绥和包头。长城内外至外蒙边境这一地带，既是日本人打出来的天下，当然日本人要进行统治，决不肯叫外人去做主子。所以在伪“蒙古军”由察北向西出动期间，日本占领军和特务机关并没有和德王商量，就把宣化、大同两地区，于九月四日扶植张家口的商务会会长于品卿为主席，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十月十五日又扶植大同的前清拔贡夏恭为主席，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到了十月二十七日，才将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乌兰察布盟大部与土默特旗这个范围，在归绥给德王成立了一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标榜内蒙古自治是名，而图谋内蒙古独立是实。但日寇却把伪蒙视为和“察南”、“晋北”以及汉奸殷汝耕的“冀东”相同的政权，由梦想的国家降为特殊地区，使他大失所望，其他的蒙奸也大感不快。

伪蒙在“军政府”时代，受“关东军”操纵；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在张家口一地就出现了三个上级衙门。先是日本的张家口特务机关和“驻蒙军”军部；接着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而组织起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外在张家口日本侨民居留地，还有一个受东京直接“嘱托”、现役少将级军官为首脑的管理及监督伪蒙政权的机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日本虽然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随着

撤消，但具体统治它们的是日本“驻蒙军”军部和特务机关。这种状况一直到日本投降没有变动，只是名称上改换了几次。特务机关先改称为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以后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始终挂着牌子。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前，它就管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移到张家口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留在归绥，从小仓特务机关长开始，便兼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最高顾问，当然兼管设立在归绥的“巴彦塔拉盟”盟公署。

伪蒙在“军政府”时期，伪正、副主席和总裁之下，只有军事、民政、财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有了政务院和参议府。在政务院总裁之下，设立了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并将伪政府所在地的归绥，按蒙古语音改称“厚和浩特”，且定为“首府”。这就是德王硬要把他的伪政权铺排成一个国家的样子。“联合自治政府”迁到张家口之后，在纪年和“首府”之外，又挂出了“黄（代表汉族）、蓝（代表蒙族）、白（代表回族）、赤（代表日本大和民族）”的四色“国旗”，同时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添了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署。政务院底下除了原先的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又增加了民政、司法和交通三部，以及牧业总局、権运清查总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附属机关，并且把“察南”和“晋北”两个伪府，改组为属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两个政厅；一九四三年，将这两个“政厅”改为“宣化省”与“大同省”。于是伪蒙政权最后形成了一个辖有五盟两省四市和面积五十万平方公里与人口五百五十万的“国家”局面。

日寇虽然允许德王如上述那样折腾，但是对于伪蒙并不按国家来看待，除了把伪蒙简称为“蒙疆”，在伪府政务院之下却不许设立外交部；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后来改称为公使馆，而没有改称为大使馆；伪蒙驻东京、长春和北平的执行外交联络的人员，也称为驻日代表部代表，驻满代表部代表和驻平办事处处长。德王两次访日时，日本天皇裕仁并没把他看成一个国家的元首，像对溥仪那样接待。德王访满的时候，溥仪也未亲往郊迎，只是赐以便宴，而未举行国宴。最给蒙古民族丢人的，是德王见了溥仪，还行了三跪九叩首的跪拜礼。我因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设在归绥，到张家口是暂来暂往，不知汪逆精卫访问德王，和褚民谊与苏体仁代表伪南京“国民政府”与伪北平政权访问伪蒙时，德王如何欢迎招待，但伪满驻伪蒙的代表李宜顺，和伪蒙驻日代表部代表特克希布彦（王宗洛），在张家口官场的宴会上，都被恭称为“大使”，这不过是为了听来舒服，叫着过瘾罢了。

从日寇不承认伪蒙是国家来观察，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协助蒙古民族复兴”，完全是骗人的谎话，而假借蒙古的旗号，做他们的政治招牌，利用蒙古败类，当作他们侵略的工具，而搜刮蒙古人民的物资，充实他们战争的资源，才是日寇的真正目的。德王起初对此还不甘屈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家口成立起“蒙疆联合委员会”，日寇曾叫他担任这个机构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委员长，他坚不就职，以示抗拒。推迟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答应担任了这个傀儡。头一次访问日本是在“联盟自治政府”时代，他以为伪蒙不能建国，是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驻蒙军”军部捣的鬼，

不是日本政府的本意，他主要是为告“御状”而到东京。不料“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警告给德王担任翻译的伪府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即德吉来）不准对新闻记者说出“建国”两个字眼，否则要砍吉尔嘎朗的脑袋。德王见了天皇裕仁和陆相坂垣征四郎，提到“建国”问题，都叫他回去和驻蒙的联络部与军部研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很扫兴地从东京回到归绥。一九三九年九月，改组为“联合自治政府”时，先是德王叫东蒙的几个知识分子舞文弄墨，反对“蒙疆”的“疆”字。援古证今，想把伪蒙变成日本体系里边的一个邦，在“邦”字上大做文章。但均没有得到东京的批准。以后他便赖在归绥不走，不去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的新印。日本“驻蒙军”曾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两次从张家口前来劝驾，并命令我在归绥就近“逼宫”。我虽没有逼他，但“驻蒙军”给他来了一个申斥性电报，表示他如果不去就职，便要另选旁人，他还是乖乖地到了张家口。

尽管德王以元首自居，吴鹤龄也摆着国务总理的架子，在一九四〇年汪精卫“还都”以前，日寇为了敷衍汪逆，指定华北的王克敏、华中的梁鸿志和“蒙疆”德王，出席坂垣操纵下的“青岛会议”，显出日本人要把伪蒙变成汪精卫领导下的“蒙政会”，德王恐怕降低身份，叫我以伪蒙疆政府副主席的资格前去出席。最可笑的是一九四三年初，日寇在进兵广西以前，唯恐华北的伪军在后方捣乱，冈村宁次（日寇侵华指挥官）以召开联防会议为名，把我和汗奸庞炳勋、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等伪军头脑，都召集在北平软禁了半个多月。在接到“驻蒙军”转来冈村的通知时，德王还曾

去电问明允许我坐首席以后，才叫我前去参加。但汪精卫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时，德王受日寇指使，不得不派伪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卓世海)和伪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当该会委员，他和我及吴鹤龄的名字，虽然没有和汗奸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梁鸿志等并列在一起，可是伪蒙疆政府和伪北平政权与伪维新政府，都被人们视为汪伪国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伪蒙是日本的孙子辈，没有取得和伪满、汪伪政府同等地位，顶高是等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那样的傀儡政权。

(二)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松井为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伪府的政务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和军事最高顾问高场损藏，均受松井直接指挥。其时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为酒井隆中将，而领导“联盟”、“察南”和“晋北”三个伪政权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又是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同时在我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部里边，还有一个次于最高顾问高场的，并且很跋扈的盘井顾问。因为这几个主要统治伪蒙的日本人名字里边，都有一个“井”字，加之自从进城以后，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不禁使伪蒙群魔产生了“我们吊在井里”的感慨。

在察北的时候，由于他们一方面想利用我们，一方面又怕我们不可靠，所以表面上对我们相当客气，并且处处迎合迁就；可是到了归绥以后，本来是日本出兵打下的地方，而我们去坐享其成，众人自知礼屈，不由得低声下气起来。另

外，国民党的军队在日军进攻之下，都是节节败退，到了一九三八年春，连上海和南京也相继放弃，多数人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日本人虽然嘴上没说，但是眉目间却表现出“你们占了便宜，还不感恩图报”以及“你们想跑就跑吧，看你们往那里跑”的那种神气，于是大小顾问都板起主人的面孔，他们咄咄逼人的气焰，使伪蒙群魔初次尝到当蒙奸和汉奸的苦头。

“我们掉在井里”的悲叹，和一九四二年我跟德王访问伪满时，听到那里的几个大臣对我发出的“我们被装在坛子里边”的哀鸣一样，都足以说明日寇对蒙奸和汉奸特别压制，并且跟“国统区”特别是“解放区”的人隔离，所以如同掉在井里和装在坛子里边一样，不知抗战的真实情况。关于压制方面，日寇统治伪蒙主要是由张家口的“驻蒙军”军部发号施令，“驻蒙军”相当于伪满的“关东军”。当一九三七年八月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以后，就在张家口成立。它不仅指挥“蒙疆”境内的日军和伪军，还有操纵“蒙古军政府”的政治参谋，对“蒙疆”的三个伪政府实行军事管制。从张家口沦陷到张家口解放，“驻蒙军”司令官更换了莲沼、冈都、柑柏、崎田、神协和根本博等好几个人，但其政治参谋很少调动，先是竹下义晴少将，以后一直是大椿熊雄大佐。竹下虽然脱离了“驻蒙军”军部，但晋级为中将，继酒井隆之后，升为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和大椿熊雄，都是日本的“中国通”（竹下曾任过“关东军”的参谋和山海关与上海的特务机关长；大椿熊雄未来伪蒙以前，在哈尔滨的日本领事馆工作多年）。这两人对蒙奸的印象很不好，公开和“察南政厅”的汉奸们说：“蒙古已被汉人同

化的快亡了”，并说：“蒙古人的反心很大，不如你们和晋北康日”。所以“驻蒙军”军部，老是打发他们向德王施加压力。

日寇的“驻蒙军”军部，是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的顶头上司，经费和师长以上的人事，全由“驻蒙军”军部关发和决定。“蒙古军”每年的经费预算，听说为八百万“蒙疆银行”钞票，伪蒙政府按“国防开支”解交给“驻蒙军”军部，军部转发给我的顾问部掌握。除了每月给我发两千元薪俸（内中扣去津贴最高顾问四百元和参谋长四百元，我实落一千二百元），每年给我两万元“机密费”外，我只是专刻了一个图章，交给日本人随便盖用，其他情形我从不过问。我的军需处长崔景岚，也仅知管发总司令部人员和各师的数字，此外他更不敢打听。所以归绥的许多“株式会社”和“料理店”（卖小吃喝的商店）里的日本人，也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拿钱，顾问们请客宴会的酒资和其他费用如嫖妓的“床头金”，亦由伪蒙政府压榨蒙汉人民的血汗来开销。我的官兵过着稍高于国民党部队的生活。至于重要人事更动，在没有发表以前，军部还叫我的最高顾问徵询我的意见，这不过是走一走过场而已，非到剪除我的羽翼时，我老是唯唯诺诺地表示服从。

由于日寇对伪蒙统治非常严密，无关“蒙古军”的事，我因避嫌疑而忌讳打听，所以不知道“驻蒙军”军部和“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究竟是谁隶属于谁。兴亚院的联络长官，最早是酒井隆中将，以后是竹下义晴中将，最后是岩崎氏男少将。酒井隆初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改组为兴亚院联络部后，即任联络长官。到了岩崎氏男任长官时，

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所以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都是特务机关的化身，能指挥动历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这个机关不仅管理伪蒙的军政事务，也进行有关甘宁青新四民的特务工作。设立在包头的、由蒋辉若领导的“西北保商督办公署”，就是听命于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的一个特务组织。我因薪俸不够应付伪蒙的政治环境，到达归绥以后，又象我在热河赤峰和开鲁驻防时一样，利用职权贩运起大烟土和私货，是经王英的表弟郭胜三介绍，认识了北平“中央金店”的经理高雅杰给我搞的。此人由包制军衣发家致富，和“东北军”与“西北军”系统的将领都有联络，曾给宋哲元在北平办过小型兵工厂，与马鸿逵交处莫逆，马称他为“高二皇上”，以后和马汉三（军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也搭上关系，成了军统特务。抗战初期，高在全国各地共有十一处买卖，西安、银川和甘肃的玉门均有分号和支店。他因周转不灵，曾向酒井隆借钱，酒井隆给金井章二下了一个条子，从“蒙疆银行”贷给他四十万元巨款，做为让他跟马鸿逵“拉线”的交换条件。

张家口的特务机关由兴亚院联络部改为公使馆，归绥的特务机关始终没有取消。在“七七事变”前，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为羽山喜郎，日本占领以后的第一任特务机关长是松井，第二任是桑原，第三任是小仓；“蒙古军”的最高顾问，到了归绥以后，第一任是高场，第二任是三毛一，第三任便由小仓兼任。小仓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便成了归绥的最高统治者，他在这一期间，还把白凤翔的“热河先遣军”收编为“东亚同盟军”。因为德王不买他

的账，我们第一次访日时，坂垣送了我两匹洋马，应许给德王发五百枝日造“三八式”步枪，装备德王的卫队，枪枝由东京发到归绥，他霸住不给，到底也没把德王的卫队用日式武器装备起来，一直是使用着我在多伦时给凑的旧枪。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把日、蒙、汉籍特务，分布在各个角落收集情报，并根据特务们调查了解到的线索，派直属的“日本宪兵队”扣捕抗日反蒙的爱国人士与青年学生。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就是被归绥特务机关破获。“蒙古军”总司令部也有一个由三五十人组成的“蒙古军宪兵队”。这个宪兵队不是我的特务组织，而是“日本宪兵队”的帮凶。日本宪兵班长，可以指挥“蒙古军”的中校宪兵队长。我在归绥驻防时，由师长陈景春以子弹向天主堂的中国神甫白祥换到一部法国短波无线电收音机，可以收听重庆“中央社”，延安“新华社”和莫斯科放送的华语广播，以及哈尔滨的地下电台“劳动人民声音”。结果被归绥特务机关知道，日本宪兵还不好意思到我杨家巷的家中查看，却指示蒙古宪兵，于黑夜闯进我的卧室，我大发雷霆，把他们骂走。“蒙古军”的宪兵队长席子纯，为此好几个月躲着不敢见我。后来他托人向我央告，说是日本宪兵队叫他派人执行这一任务，只好惹得我生气。

我在伪蒙时期，实际处在日本特务的监视网里。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假装朝鲜人的日本人，他和我的翻译郝贵堂与贴身伺候我的勤务兵唐成良，都是特务机关介绍来的。唐成良是热河隆化县的一个乡下孩子，伺候过松室孝良，跟松室把日本话学会，由小仓派到我跟前当差。后来郝贵堂和唐成良都被我收买为亲信。小仓为了能进一步探听到我内宅的

动态，又打发来一个名叫哲户的日本老头子，当我的家奴和院公，跟我的卫士们在门房中吃饭睡觉。我的家中经常有十几个卫士守卫，“蒙古军”的宪兵，所以能够闯进我的卧室，便是哲户从大门外领到里边的。德王也是如此，他在张家口下堡的公馆中，不知是“驻蒙军”军部，还是“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也给打发去一个名叫山内的日本老头子。此人装聋做哑，据说能懂得蒙古语言，想叫德王对他不加提防。至于我和德王到了外边，旅馆附近密布日本宪兵“保护”，出门乘坐日本司机驾驶的专车，所以只敢跟商人公开的来往，其他人都是想法子秘密进行接触。

(三)

德王在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期，担任伪府的总裁，并兼“蒙古军”总司令和第二军的军长，同时让吴鹤龄和乌古廷郎舅二人，担任伪政府的议长与伪军的参谋长，这不仅我不同意，日本人更怕他军政大权全揽，把伪蒙整个抓了起来。所以进入归绥以后，在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即叫德王专门负责政治，由副主席兼任政务院长，把总司令让给我担任，同时给了吴鹤龄一个参议府的议长。德王对于我任“蒙古军”总司令，心里很不痛快，听说他为此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酒井隆提出质问，酒井反问他为什么在傅作义、门炳岳和刘汝明收复察北期间，他临阵脱逃，由嘉卜寺跑到多伦呢？这样一问，德王没有话说，但是让我担任伪总司令，他却怀恨在心。一九三八年冬天，日寇把宝贵庭于一九三六年夏天从热河征来的六千多蒙古兵都遣送回伪满，一九四〇

年三月，在傅作义军“五原战役”以后，又把我的嫡系三个汉族师，从“蒙古军”拨出改为三个警备队，他以为是剪除我的羽翼，不知这是削弱整个伪蒙的力量，因而他不表示态度，我由于孤掌难鸣，只好让日寇将我的筋完全抽去，结果“蒙古军”成了一个空壳。

德王和我貌合神离，两个人不能和衷共济，这就更便利了被日寇各个击破。德王对汉人和接受了汉族文化影响的蒙古人，都存有成见和偏见，他原先想跟汉人隔离，在草原上建立一个纯粹蒙古人的封建独立王国，进入归绥以后，也不欢迎汉奸参加伪蒙政权。无奈日本人正如当年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那样，把伪满的汉奸按“色目人”使用。由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比“蒙古军政府”组织扩大，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想把“满系”汉奸调来担任伪府的重要职务。“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就是由伪满调来的一个任过次长的汉奸。德王为了拆倒我“蒙古军”的梁柱，先是叫我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兼任伪包头市的市长；刘因担任文职，被迫把兵权交出。我让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带领我最精锐的第一师。在二次改组成“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德王把刘继广升为最高检查厅长，将我的第二师师长尹宝山聘为政务院的委员，又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部长。金井章二不知底细，曾提出“军人搞不了政治”，德王说：“他们很有功劳，可以慢慢学习”，用此抵制“满系”汉奸插入。德王并拿官爵收买我的部下，从此在伪府里边，也象在伪军中那样，分成亲日、亲德和亲李三个派系，互不团结。特别是丁其昌出任了伪治安部部长，把我的三个汉族师变成了警备队，就更名正言顺，我只好“哑巴吃黄连”苦

在心里，即使能说出话，也是有口难辩。在遣散热河蒙古兵时，日本人说是由西边的五个盟来给补充，可是“驻蒙军”军部紧接着给各盟成立了一个防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受各盟的特务机关指挥，盟长兼了师长以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听话，德王向锡盟要兵时，伪锡盟盟长松津旺楚克，便以“如果你非征不可，我就把喇嘛给你送来”的语言顶撞。最后德王和我，一个成了空头主席，一个成了光杆司令，都失去一声喊到底的权力。

伪蒙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替日本帝国主义榨压征敛的机关。八年以来，给“驻蒙军”军部提供了无数的战略物资。详细数字，日本人对外保密，中国人谁也摸不清楚。各种物资大都是由日本的“株式会社”，先和伪蒙政府订立经济协定，然后直接和各县的县长，特别是各旗的王公再立合同，进行低价收购或不等价交换。例如日本进兵印度支那以后，士兵受南方的瘴气影响死的很多，驻在大同的厚官师团开到广西，也因瘴气，死了一千多人；他们研究结果，认为马肉是大热的东西，可以防御瘴气的侵袭，于是在张北县建立了一个近现代化的屠宰场，把成群的马赶到里边，出来全成了马肉罐头。这种战略物资，就是由日本直接向各旗的扎萨克或总管收购，几乎把锡盟和察哈尔部的马匹搜罗殆尽，伪蒙政府却从中捞不到任何油水。王公旗官从此对日本人发生了好感，认为张家口的伪政府成了束缚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以致产生了以松津旺楚克为代表的王公和吴鹤龄之间的重大矛盾。日本人向满洲移民不久，还计划向乌珠穆沁一带移民，以防备苏联和外蒙。为此企图在草原上购买牧场或农场，甚至还想叫王公把职爵卖掉，由日本人主宰一切，把王公制度彻底

推翻，将蒙古地区变成名符其实的殖民地。这些都是瞒过德王，由特务机关和王公偷偷勾搭进行的。后来由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才作罢论。

德王心目中的蒙古独立王国，是要把东蒙、西蒙和青海、新疆蒙古都包括在内，可是日本人只许他向西发展，不让他跟锡盟和察哈尔以东的王公发生联系。德王手下的东蒙人，如陶克陶、金永昌和吉尔嘎朗之流，都是“关东军”多年的“嘱托”特务，并且均是在百灵庙“蒙政会”和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参加或派过来的，“蒙古军”的几个东蒙师长如包海明和璦门达赖等，也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归绥到张家口，东蒙参加伪蒙政府军队的，大都是热河卓索图盟喀喇沁和东土默特旗的人，他们是因吴鹤龄、乌古廷和我的关系而来的。吴鹤龄曾任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乌古廷出身于东北讲武堂，他们全是自动投靠德王，故德王对他们比对陶克陶等较为信任倚重。于是他们把亲信故旧从喀喇沁旗弄来，加入伪蒙军政机关，形成一股很大的中层势力。一九四四年年底与一九四五年初夏，日本人所以把吴，乌郎舅两人先后撤换，就是怕他们在伪蒙兴风作浪。东蒙除了卓盟的喀喇沁旗而外，以哲盟科尔沁各旗的文化较高，那里的知识分子，多被日本人收罗到伪满的“兴安省”和“兴安军”。德王和我访问伪满时，东蒙的蒙奸受日本特务监视，不敢跟我们亲近。日本人领我们到王爷庙（乌兰浩特）参观，在一次蒙古人的联欢会上，我因伪蒙的中层和基层，遍布日本人培养出的“满系”汉奸，特别是翻译和警官，他们尽干坏事，而察绥老乡分不出热河和辽宁口音，对我的伪军官兵也仇视到极点。我在会上提出要求东蒙派人支援西

蒙，巴特玛拉布坦等首脑，对着日本人都不敢吭声，不表示可否，恐怕说出来惹祸。

日本人除了隔离东蒙和西蒙，并且隔离德王和我以及我跟我的官兵。尽管德王和我同床异梦，但日本人怕我们合到一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伪蒙政府二次改组，因吴鹤龄被弄到东京，让我兼任参议府议长，“晋北”的夏恭死了以后，又叫我兼任了副主席，可是“蒙古军”的总司令部，直至日本投降，并没有跟着伪府由归绥迁到张家口。这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便不能表演双簧。因为德王在小事上常“跌死皮”（耍赖），到了紧要关头便不象我敢耍光棍，日本人知道我在必要时肯挺身而出维护德王，怕将我们弄到一起，就不容易随便摆布。此外，日本人怕我跟官兵接近，经常阻止我到前方打仗。一九四〇年春天，派出“蒙古军”的三个蒙古师，到五原协助王英企图建立的伪“绥西政权”，叫乌古廷去指挥。队伍开过去以后，才让我前去视察，看防务布置得如何，并给士兵们讲话打气。在三月二十日傅作义反攻五原那天，以欢送三毛一最高顾问转勤为名，突然派飞机从五原把我接回归绥，其目的，也是为了隔绝我和我的部队联系。不过，这也好，否则，那次我也要象王英和乌古廷一样，几乎被傅作义活捉。

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方看到德国的侵略军，被苏联击退，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太平洋的战场，也是美军占了上风，知道他们的好景已经不长，一、恐怕“蒙古军”和我藕断丝连的三个警备队，驻在绥远边境惹事；二、恐怕放在归绥很“不方便”，这才把我调到张家口，加以软禁。所以日本投降后，我把伪军的主力扔到归绥，受傅作义收编，我个人没

本钱了，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到关外重新召集胡匪，投入反革命的内战旋涡。

(四)

当汉奸一定会身败名裂，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如果没有一点油水可沾和一些权势可图，谁也不肯干这种傻事。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政治目的，很会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收买和雇佣替他们充当侵略和统治老百姓的凶恶爪牙，所以有时显得比中国的封建军阀大方。如伪蒙的军政官员，薪俸都比伺候军阀时为高，以后物资受了统制，亦能得到足以养活家口的配给用品；并且放任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伪蒙境内曾经流行过“宁嫁警察，不嫁土客”（鸦片烟商人或贩子）的民谣。汉奸们贪婪嚣张到了极点，才用严刑惩处，以平民愤，使老百姓产生“日本人好，汉奸们不好”的错觉。特别是伪蒙境内广种鸦片，向全国各地倾销，造成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城市金融十分活跃，“蒙疆银行”的伪钞比华北的伪钞值钱；同时让所有的投敌官员都染上毒品嗜好，因烟瘾作祟，不能到解放区或“国统区”过抗战的艰苦生活。在日寇投降前的一、二年，他们的人也开始腐化起来，经济统制露出不少空隙，于是走私盛行，只要胆子大和朋友多，弄钱相当容易。除了劳动人民叫苦连天，青年学生和正人君子都不满现状，凡是担任伪职的人，多利用职权做起投机生意，把伪蒙视为“冒险家的乐园”，过着暴发户的荒淫腐化生活。一时北平许多胡同里边，新用油漆刷的街门，差不多都是伪蒙县长、局长和烟土

贩子们买下的新居。这是日寇侵占内蒙期间，整个的羸靡情况，也是蒙奸、汉奸依附敌寇以后，不愿投到祖国的原因之一。

日寇对于德王和我，一方面固然压制封锁，腐蚀离间，一方面也进行笼络和怀柔，随时也给我们些糖吃，灌很甜很稠的米汤。德王和我，是日本人花了很长时间与花了一定本钱制造出来的两个招牌，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肯轻易抛弃不用。德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手段高超，为了抓牢德王这个招牌，表面上虚伪的“尊敬”他，应付他，好象德王就是“蒙疆政府”的主人一样，而德王也乘机撒娇耍赖地常跟日本主子耍态度、闹脾气。金井章二走后的大桥忠一，曾向伪宣化省长刘继广的日本参事官说：“我是德主席的顾问，蒙疆的家由他来当，我们只是从旁协助，你对刘省长也要这样”。德王听见，更飘飘然了。张家口“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归绥的特务机关，也给我面子。前述高雅杰向“蒙疆银行”贷了四十万巨款，就是托我跟酒井隆洽谈成功的。后来高并没有替他们连络马鸿逵，因为“蒙疆”伪钞贬值，他把十万元囤积物资甩出，才偿还了这笔债务。我的最高顾问兼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对我，也和金井、高桥对待德王一样，对我也似彬彬有礼，就连人事更调和队伍调动，事前还让我签字。

“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人就通过班禅拉拢德王，曾托汉奸张海鹏在洮南给过班禅五千枝步枪，让班禅给德王收买内蒙及青海的王公；德王还在西苏尼特旗，给班禅修了一座很讲究的行馆，格局和“金銮殿”一样。据说德王准备统

一内蒙以后，要在那里“登基”做蒙古皇帝。日本人虽然把伪蒙视为自治区域，并没有允许他建立国家，但在归绥组成“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后，张家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允许到条件成熟之后，要给蒙古建国，为此还派陶克陶跑到冀东和汉奸殷汝耕举行谈判，缔结过将秦皇岛做为未来“蒙古国”出海港口的秘密协定，表示要从“察南”的延庆修一条直达港口的公路。德王对此很感兴趣，送过殷逆汝耕四百匹马。日本人给德王许的愿很大，不只是纵愿他坐内蒙的小朝廷，还给他布置过坐内外蒙的大皇帝。我们第一次访日时，先在张家口集合，我到了下堡德王的公馆，看到由外蒙逃来的迪鲁瓦活佛喇嘛，蹲到德的会客室里一直不走，似有要事和德商量。第二天迪鲁瓦悄悄向我透露：因为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死后无人承继，日本人想叫德王的三儿子顶替。拨了十五万元活动费，先给了迪鲁瓦七万元，叫他由北平的英国公使馆汇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并叫他亲自前去拉萨活动。达赖承认以后，再续汇那八万元。迪鲁瓦征得德王同意之后，即去北平汇款，并搭海轮由印度转赴西藏。迪鲁瓦从此一去不返，不知下文如何。日本人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以后，除了让总务部的日籍参议中岛万藏教德王学习天皇怎样迈八字步，并给德王做过一套天皇和溥仪那样的“龙衣”。德王把此套衣服很珍贵地保存于西苏尼特旗王府，日本投降时，被苏联军队抄走带到乌兰巴托。给德王做“龙衣”的同时，小仓特务机关长在归绥叫来一个日本裁缝，也给我做了一身日本陆军大臣那样的礼服，让我对外严守秘密。可能给吴鹤龄也做了内阁首相的“蟒袍”。所有这些，不外是叫我们死心塌地地认贼作父，为“大东亚

共荣圈”卖力。

日寇在伪蒙除了以种植鸦片敛钱，并且允许各地成立“俱乐部”，收取巨额赌税，使青年都沉沦在赌场里，不关心政治。伪蒙赌税的收入比皮毛税收入还多。我从他们内部得到一个数字比例，说是某一年全“蒙疆”收了二十四亿元皮毛税，而“俱乐部”的赌税却收入了三十多亿元，这还不算“俱乐部”养活着好多大吃二喝的地痞流氓。在我的伪军中，一直包庇着二、三百贼性不改的蒙古“马鞑子”（蒙古土匪）和热河汉族的胡匪，他们平日不下连队，在街面上狂嫖滥赌。这些人都由我的胡宝山“团长”率领，他们没了钱花，什么乱子都敢闯，使我对他们很伤脑筋。胡宝山从察北进犯绥远时，路过武川的三眼井教堂，一下子就抢了外国神甫三十万元款子，到了归绥没几天，便挥霍殆尽。于是日本特务机关根据调查研究，索性让“蒙古军”附属的散兵游勇，经营了各地的“俱乐部”。以后伪蒙的好多“俱乐部”，无形中成了替我安置“闲员”的处所。归绥的“俱乐部”，起初由胡宝山包办，我恐怕他在这个大城市中给我滋事惹祸，叫日本人调他到宝昌县包了那里的“俱乐部”，归绥的“俱乐部”便由我的结拜朋友，给汤玉麟当过副官长和旅长的李芳亭包了起来。日本人也不是白养活这些“闲员”。他们为了在华北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曾把胡宝山的一个名叫宝中山的连长，从“俱乐部”中调出，纠合了二、三百蒙汉“浪人”（流氓），开到山东协助日军作战，全被当地的八路军解决，一个也没有回来。

日寇对德王还有一个“碗大汤宽”的事例，就是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时，蒋介石给他送来一部七十五瓦的

电台，由一个姓彭的台长经营。不知是日本人为了表示对德王特别信任，还是想利用这部电台诱降蒋介石，竟然允许德王将此台设在西苏尼特，继续和蒋介石通报。一九四〇年，德王通过“军统”华北区长马汉三，跟蒋介石连络的另一部电台，在归绥被日本宪兵队查获。前“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吉（那时任太原特务机关长），便以“大电台我都允许，小电台算个什么”，替德王在“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跟前做了圆场，这是日寇故示宽大。因为日寇既然不能把德王一脚踢开，就不如捉住把柄也不处理，这样就可使德王更加驯服。这是日本人的权术，使你感到对不起人家，自己就把自己管束得谨言慎行，不敢节外生枝。

在马汉三的电台未暴露以前，德王常跟日本人耍“硬骨头”。例如有一年，归绥特务机关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电台的报务员陈寿山与葛孟库，从新城扣往旧城日本宪兵队传讯，深夜还没有放回。德在伪府大嚷特闹，说是“为什么不通过我，随便捕人？得马上给我放回来”。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说：“现在关了城门，明天再放。”德说：“城门是日本人关住的，日本人咋叫不开？我现在就要下旧城问宪兵队要人，看谁敢阻拦我这个主席！”日本人没有办法，当夜就把陈、葛两人放回。自从马汉三的电台被破获以后，德王便没了此种勇气，连我也被堵住了嘴，在有关这些事上，无法向日本人求情。所以当我的两个卸职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因抗日反蒙嫌疑被扣，我只好给特务花钱，买通日本人把他们保出。而包头商务会会长董五三等和归绥一百二十多个教员被扣以后，商界和文化界都想托我营救，我也想借此交朋友和收买人心，但爱莫能助，听任日寇把他们杀害。

日本在投降以前，就做了他们军队和侨民安全撤出大陆的准备。在伪蒙方面，是把德王的智囊吴鹤龄和我的军师乌古廷先后撤职，最后将我由归绥调到张家口加以软禁。为了把德王和我稳住，还使了不少的花招。在调我到张家口以前，即将“蒙古军”编为警备队的三个汉人师归还建制，并且说是要把伪蒙的警察编为十二个师或十六个旅，都叫我去指挥。为此日本人领上我和德王，参观过他们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小型兵工厂，表示以此为基础，给“蒙古军”扩建为大型兵工厂。恐怕缓不济急，除了由沈阳兵工厂给拨付武器，伪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还给了我十一万两烟土，叫我到包头先换成皮毛药材，然后再往上海的一家兵工厂换取枪械。我因消息灵通，知道希特勒已经完蛋，日本就要投降，这些都是他们的圈套。德王却信以为实，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始终未和我商量过应该怎样应付未来的时局。直到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传来，两个人都束手无策，只好跟着日本集中起来的两万五千多军民，坐上平绥路的闷葫芦车，灰溜溜地滚出张家口。

（刘映元记录）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吴鹤龄和“蒙古各盟旗代表 联合驻京办事处”的活动

张绍庭

（一）在北平成立蒙古代表团

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都到了北京，北京改为北平。在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任秘书的吴鹤龄，为了寻求新的政治出路，乃集合在北平的蒙古人士在猪市大街五十五号那王府（哲盟前那逊阿尔毕济呼的旧府，为希尔巴敦鲁布等借住）开会，研究今后活动办法。当即决定为了迎合国民党所标榜的“国内各民族自决自治”的号召，提出保存盟旗旧有的基本组织，实行内蒙古地方自治的要求，于是成立蒙古代表团，并推汪自洋、赵化民、苏兆民、希鸿图（希尔巴敦鲁布）、赵福海（补英达赖）、张绍庭（恩和阿木尔）、吴鹤龄等为代表，即开始进行活动。

第一步先到碧云寺去见蒋介石，由蒋的秘书长邵力子代见。代表团递上手摺，并表示欢迎胜利北上之意而后辞出。代表团约好次日继续共同活动，届时吴鹤龄等乘车去接补英达赖，但久候不见他出来（因补英达赖素有鸦片嗜好，不能早起），大家为争取时间，不便专候他一人，忙着去接别

人。因此，补英达赖恼羞成怒，再不与吴鹤龄有任何共同行动了。补英达赖原为察哈尔盟人，与锡盟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有密切关系。德王非常信任他，对他言听计从。由于补英达赖对吴鹤龄的不满，引起了德王从此也和吴鹤龄发生摩擦。有很长时间不合作。

当代表团又去见李宗仁、白崇禧时，适遇蒋介石走进门来，即由白崇禧介绍说：“这是蒙古代表团，他们来欢迎国民革命军胜利并陈述蒙古地方情况”。蒋只说：“好！好！”而出。

南京政府委任白云梯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委派李丹山、于兰斋为接收北洋政府蒙藏院的接收委员，他们到北平后住在蒙藏院旧址内。李、于二人都是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和吴鹤龄都是近同乡，并有亲故关系。但吴鹤龄往访两次，未见，于是便以蒙古代表团名义函约他们在猪市大街五十五号开会，以表示欢迎。不意接到回信，竟有这样的话：

“这次我们来接收蒙藏院，就是和你们这些王公走狗们来算老账。”接着他们又唆使警察局派人来猪市大街五十五号调查代表团的成员及动向。蒙古代表团为了转被动为主动，亲到警察局请求了解，并说明是为蒙古地方制度问题来向政府报告，要求政府合理解决，现正在和当局联系中，并无不法轨外行动。警察局负责人回答说：“我们过去不了解代表团的情况，今既说明，我们以后要保护，请代表们安心回去。吴鹤龄和白云梯间对立是由此开始的。

这两位接收委员又主使散发传单，攻击代表团，报纸上亦不断刊登不利于代表团的新闻。蒙古代表团为了对抗，亦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展开笔战。有个《多闻通讯》社大力支

援蒙古代表团，它的社长几乎每天到代表团采访消息。

蒙古代表团事先已致函各盟旗公署，请派代表来北平，以便共同商榷蒙古自治及盟旗制度问题。不久，各盟旗所派代表，陆续到北平。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派来拉希策楞等，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派来僧格仁沁等、卓索图盟派来戴国儒和戴清廉为代表。每次代表团开会时，推昭盟代表赵化民为主席。

为了公开活动，代表团曾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招待北平军政各界及新闻记者，当时，北平市市长何其巩亦曾亲自出席。在招待会上首先由代表团赵化民致开会辞，继由代表吴鹤龄报告蒙古代表团成立之目的。指出：现在省、县与蒙旗之关系不和，要求今后蒙古地方自治，保存盟旗故有之基本组织，并请各界随时协助和指导等。来宾中也有些人在会上讲了话。

（二）蒙古代表团去南京活动

当时，适逢南京政府所派接收大员张继来北平，住在北海团城上。蒙古代表团前往会见，张指定他的秘书贡沛诚联系，贡不断和蒙古代表团研究蒙古地方问题。同时内政部长钮永建也来到北平，吴鹤龄等又去见钮。钮听到蒙古代表的要求，认为事关重大，应当到南京去解决。乃由贡沛诚起草，以张继的名义电南京当局，介绍蒙古代表团前往，并备包车送到南京。蒙古代表团遂以吴鹤龄为首，偕同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卓索图盟代表前往南京。代表团秘书陈效藩等多人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新闻记者、南京政府参事克兴

额等。到南京后，政府派人招待，住大华饭店，每日公出备有专用汽车，颇受款待。

白云梯在南京看到蒙古代表团到达，受到招待，感觉有些不安，恐代表团的活动对他的政治地位有所不利，于是声言：“蒙古代表团是王公走狗少数人的投机活动，是吴鹤龄搞的把戏。”他在报纸上不断攻击，并请政府停止对蒙古代表团的招待。白云梯的这些宣传，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反而更增加了代表团及吴鹤龄的社会声望。

是年初冬，蒙古各盟旗陆续派代表到北平。哲盟代表有玛尼巴达拉（玛鸣周）、包维新、包日新、陈广扬等；昭盟代表有吴云鹏，卓盟喀喇沁中旗代表有齐之彦，土默特旗代表有任殿邦等。他们在北平聚会后，受到南京政府所派驻北平办事处的招待，给他们备了南下的包车。他们一行十数人作为蒙古代表团的第二批人员到了南京。由于第二批代表的到达，更充实了驻京代表团的力量。

蒙古驻京代表团到京以来，长期受到招待，觉得有一个常设机构更好，于是便请准经费，在太平路大华饭店隔壁挂牌成立了“蒙古代表团驻京办事处”。从此就有了一个常设机关。

（三）吴鹤龄包办蒙藏委员会的蒙事处

一九二九年一月，南京政府委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阎锡山由海道乘轮北上之际，吴鹤龄乘机同阎锡山同舟北上返平。一路上吴与阎攀谈，颇得阎的信赖，阎随委派吴为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所有蒙事处人员皆准由吴一手包

办。因此吴鹤龄再到南京后，即开始组织蒙藏委员会蒙事处，推荐陈赓扬为蒙事处第一科科长；戴清廉为第二科科长，巴文峻为第三科科长。委派云鹏、包日新、宝道新为科员，并委金老超、萧绍何为办事员。又推荐陈效藩为秘书、海会川为编译员。以后又推荐郭雅亭、吉致祥（吉尔嘎朗）、恩和阿木尔等为专门委员。由此吴鹤龄借蒙古代表团为阶梯，登上政治舞台。他一手打着蒙古地方代表团的旗号，一手举起国民党的高级官吏的招牌，就大肆活动起来了。吴每日昼间在蒙藏委员会办公，夜晚七至九时在代表团办事处工作。每月出刊定期蒙文公报，分发给各盟旗单位，作为工作报告。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蒙古驻南京代表团推吴鹤龄去沈阳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当时张学良在东北虽易帜（张学良投归蒋介石后，改挂国民党政府的国旗），但行政上尚未统一。东北与东盟各蒙旗有密切关系，蒙古驻京代表团认为有和他联系的必要。吴鹤龄与张见面后，即陈述盟旗与省、县之关系，在地方上存在双重政权，过去不断发生纠纷，今后当如何改进，方能免生事端。长谈约两小时之久。张对左右曾说：“我今天听到蒙古地方问题，愿多谈一谈。过去与蒙古王公见面，他们一言不发，只是唯唯诺诺，使人感到苦闷。今日得以畅谈蒙古地方问题，实感畅快。”吴鹤龄还去访常住沈阳的达尔汗王那木济勒色楞（他是哲里木盟盟长，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会面谈话时，达尔汗王只说两句话“吃烟，喝茶！”此外不谈任何问题，更不参加意见。吴鹤龄又会见了东北盟旗处处长袁庆恩，并访问了王维宙、袁金铠等东北社会名流。

一九二九年夏季，蒙古代表团的吴鹤龄、戴清廉、陈赓

扬、吴云鹏、恩和阿木尔、包维翰及陈效藩等一行人，去太原会见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代表团到太原后住楼儿底第二招待所，向阎锡山报告了蒙古盟旗现状，并请阎早到南京主持蒙藏委员会，以便早日决定蒙古地方一切主要问题。阎在官署举行一次宴会，招待蒙古代表团，席间详细询问东北蒙古一切生活习惯和政治情况等。

（四）南京召开的蒙古会议

一九二九年秋季，南京政府改任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阎锡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内，对蒙古代表团所要求的蒙古地方制度，未作出任何决定。马福祥上台，对现有蒙旗组织，只是默认有关省的旗县并存状况。因为东北各盟旗是在张学良统治的东三省及热河省范围内，如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及呼伦贝尔等盟旗。西部蒙旗地区又在阎锡山统治的察绥境内，计有察哈尔盟十二旗、锡林郭勒盟十旗、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旗及土默特特别旗。南京政府既无力控制有关各省，更无施行“民族自治”的诚意。蒙古代表团所要求之蒙古自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经蒙古驻京代表团一再请求督促，南京政府才决定在京召集蒙古会议，广泛征求有关盟旗、省县各方面意见。当时指定各旗派代表二人，即官方代表一人（可称是王公代表），群众代表一人（可称是平民代表），有关省政府派代表一人，南京政府各有关部门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共商蒙古地方制度及其他事宜。东北各盟旗均派代表参加会议。计哲盟代表有科左前旗博彦满都，杜尔伯特旗乌尔图那苏图，郭尔罗斯旗

苏宝麟，科左后旗崇阿，科右中旗洛明阿，科右前旗乌尔图那逊，科左中旗那德木德，扎赉特旗朝克布彦，库伦旗那达木得；呼盟各旗代表有春德、彭楚克和布特哈斯代表数人，卓盟各旗代表有李芳、陈效良、陈效藩、郭文田、吴鹤龄、戴清廉、恩和阿木尔；昭盟各旗代表有吴云鹏等十数人，青海代表有祁宝善、官保加普、阿福寿、何永信等，省代表有李芳春，东北蒙旗处处长袁庆恩，科长王宗洛也参加了会议。共计七十多人。惟西部蒙旗地区各盟旗均未参加。因当时阎锡山和南京政府有矛盾，察、绥两省有关各盟旗因省方阻碍，未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在这个会上，哲盟代表博彦满都提出了蒙古自治方案，主张废除内蒙古的王公封建奴隶制度；行政区划，应设立内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直辖中央，不受各省、县的管理、限制；内蒙古自治委员会下设盟，盟下设旗。

这一方案提出之后，当时蒙古王公代表和东北四省代表立即反对，在会上引起了多次争吵。哲盟王公代表乌尔图那苏图贝子骂博彦满都：“好！你这小子！我们王公与你势不两立。”东北首席代表袁庆恩也威胁博说：“好，博代表！我们回东北再说。”最后还是由主持会议的马福祥、孔祥熙出面，说明：这个提案多数人反对，因而否决了。

过去吴鹤龄以蒙古驻南京代表团名义长期活动无效，感到单调；今在蒙古大会中，听到新的蒙古地方代表的呼声，认为能唤起参加大会的各部门人员的特别注意，感到兴奋。于是在开会期间，他更大肆活动起来。代表每日昼间开会，夜间内部开准备会。在会议中最大的难关，就是蒙古代表与省方代表的意见总不能一致。因蒙古地方利害关键就是盟旗，

省县的双重制度；欲强化盟旗地方政权，即削弱有关省县地位；若省县欲保持现有权利，即有损于蒙古盟旗应有的独立政治之范围。所以省方代表发言和蒙古盟旗代表对立，蒙古代表发言就要刺激有关省方代表。南京代表对许多问题无法解决。会议期间，小会推给大会讨论，大会再推给政府研究。这样互相推拖，所以蒙古代表提出的地方自治方案及其他重要问题，结果都是：“交有关部门考虑或研究后施行。”其实是不了了之。开了一个时期的蒙古会议，就如此告终。

由于这次会议，更使蒙古代表认识到，国民党所高唱的蒙古自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参加蒙古会议的代表，会后去杭州游览西湖古迹，一部分代表留南京，作为驻京代表。以后不断有各旗代表，陆续来南京参加驻京代表团，如青海代表祁宝善等，额济纳旗代表苏宝丰，准格尔旗代表奇子俊，呼伦贝尔代表春德，察哈尔盟旗代表尼玛鄂斯尔、哈斯瓦齐尔，以及新疆和阿拉善各地代表，往来不绝，长期住在南京蒙古代表驻京办事处，继续活动。

（五）德王和吴鹤龄的摩擦

一九三一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看到蒙古驻京代表团在南京甚为活跃，但他又不愿同吴鹤龄合作，于是联系锡盟郭王（郭尔卓尔扎布）同到北平，又约乌盟代表吉雅图（于伯勒），伊盟代表僧格，土默特旗代表巴彦及青年陈绍武（此人为德王的谋士），同去南京，大肆宣传，要接收蒙古驻京代表团办事处，企图和吴鹤龄对抗。吴鹤龄认为：蒙古驻京代表团的组

织，是由各盟旗直接派来代表联合成立的办事处，如果有某代表为其原派盟旗不信任时，当然可由该盟旗直接调换，惟甲盟无权调换乙盟代表。至于吴鹤龄自己，只有卓盟有权调换他，锡盟无权干涉。代表团驻京办事处，对锡盟派来的代表参加办事处是欢迎的，但少数代表来接收代表团办事处，是不允许的。因为代表团驻京办事处，只有多数代表能掌握，而少数代表不能左右全体代表团。

随德王同来的代表到浦口车站时，早有吴鹤龄派招待人员渡江迎接。其中乌盟代表吉雅图是乌盟盟长云王的义子，但他是卓盟喀喇沁右旗人，是吴鹤龄的近同乡，同吴的关系比与锡盟德王较近，故在德王到京之前一日先行到京，直接去代表团办事处。其他如伊盟代表僧格被吴鹤龄派人接去，土默特旗代表巴彦见车站上有人来接，在他犹疑之际，也被接到驻京办事处。惟锡盟代表及德王随行人员住南京中央饭店。德王感到接收代表团办事处的队伍，方到南京就乱了阵，乃极力派人连夜动员他们归队。次日晨果有土默特旗代表从办事处不辞而别，迁到中央饭店。

当时德王和吴鹤龄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德王队伍摇旗呐喊，要接收驻京代表团办事处；吴鹤龄为了进一步掌握办事处，拟定每盟增派代表二人，每特别旗增派代表一人。所有代表，必须有地方所属盟长或旗长证明文件，申请蒙藏委员会批准。蒙藏委员会同意了吴的意见，并另增添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由代表互选之，定名为“蒙古各盟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接着，蒙藏委员会派蒙事处长楚明善监选，结果卓盟代表吴鹤龄被选为正主任，哲盟代表陈赓扬、青海盟旗代表祁宝善为副主任，由此重新建立了“蒙古各盟旗代

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德王接收驻京代表办事处的活动，不久也就毫无声息了。

锡盟代表始终未到驻京办事处，德王及锡盟代表一行人员在南京逗留一时，也即离京。临行时，在浦口车站适遇章嘉呼图克图同车北上。德王看到章嘉进站时，当众急忙趋向章嘉呼图克图，匍匐行跪拜大礼。当时在场许多蒙古人，看到德王对章嘉的崇拜行为，感到哭笑不得。有人写打油诗一首曰：“封建活佛气味投，迎前扑地忙叩首，浦口站上怪现象，奈何当场出了丑”。

（六）班禅调解，吴、德合流

一九三三年，德王在百灵庙搞蒙古自治运动，蒙古青年闻风相继汇集百灵庙。蒙古驻京代表团也推副主任陈赓扬、吉雅图、恩和阿木尔到百灵庙，表示共同行动。当时南京政府派黄绍竑到现地视察，随行者有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黄绍竑的私人女秘书谭惕吾及卫队若干人。黄在百灵庙看到蒙古各地人员投奔者络绎不绝。黄绍竑当即召集各阶层人员谈话，听取各方对蒙古自治运动的意见。黄绍竑在百灵庙住了一个星期，即回南京复命。

当黄绍竑在百灵庙时，吴鹤龄亦赶到参加活动。吴、德自南京冲突后，今日才得见面。当时班禅适在百灵庙，专为他俩的合流，进行说服：“不要以个人一时之争，意气用事，应以大事为前提。”又说：“你们都是蒙古的杰出人物，今日为同一目的而活动，即当携手共同前进。我很愿意看到你们今后为共同利益，努力合作到底，这是我内心的祝愿，希

能采纳。”由此德王、吴鹤龄开始合流。

黄绍竑离百灵庙后，蒙古地方又派出请愿代表追随到京。计有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和蒙古驻南京代表一同前往，请求批准“自治”的方案。因此蒙古驻京代表又增加了新的力量，声势更为壮大。他们常到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请愿，散发书面请愿文件。当时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他看到蒙古请愿代表团多人在会场外，立待批准。乃使人密告吴鹤龄：“请代表们先回去吧！保证明日中央会议通过关于蒙古地方自治方案，但在议决前，万勿透露消息。”吴鹤龄即同请愿代表回办事处，并将此意转达各代表。又恐人多透露消息，经人提议：“我们何不借此机会作一短途旅行。”遂决定所有代表立时去镇江游览。即日到了镇江，转往焦山、金山寺游览。午后，又到扬州“小西湖”。跑了一天返回时，已是万家灯火，宿于镇江旅馆中。次日下午返南京。晚间看到南京政府批准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已在报上发表。此后，各临时来南京代表，纷返原地筹备自治。驻南京代表仅为请求蒙政会经费继续活动。

（七）组织代表队参加全运会

中国过去历届运动会，无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吴鹤龄等人为了扩大影响，促进蒙古自治运动，巩固自己政治地位，当六届全运会于上海举行时，以蒙古驻京代表团名义发起，联合新疆、西康、青海代表，到蒙藏委员会及教育部要求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几经往返活动，才得批准，并准补助

参加全运会的活动费一部，由发起单位自筹一部。办事处派恩和阿木尔为总领队，开始筹备。嗣即以在南京政治学校学习的蒙古学员为基础，成立了代表队。如学员薛兴儒（以后为国民党热河蒙旗党部主任特派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荣照（以后为蒋政府立法委员），都是当时蒙古代表队选手。南京蒙古选手只参加篮球及短跑等项目。总领队为选手们制作服装及运动衣，并作蓝色队旗一面，上书“蒙古代表队”是四尺宽、六尺长的一面绸制大旗。由于百灵庙蒙政会筹备会所派摔跤队尚未及时赶到，先将在南京蒙古选手数人派去上海参加比赛。开幕时，蒙古代表队撑着大旗，列队前行。当新疆、青海、西康及蒙古各队张起队旗入场时，受到全场热烈欢迎。因为这几个单位都是首次参加全运会的。旋接南京来电，告知摔跤队于中午十二时半到沪，蒙古总领队忙到车站迎接，然后又急返会场照顾蒙队选手短跑赛。次日蒙古摔跤队到场，先由本队自己举行表演赛。队员八名，个个身材魁伟高大，膂力过人，身披皮制甲衣，长靴宽裙，人多喝彩。观众争看摔跤表演。第三日同国内各地选手竞赛，先由表演赛时所列名次第八名开始比赛。每战一次，轮换一人，越战越强，每战必胜，即北平有名之选手“宝三”亦被摔倒。终于在数万观众热烈欢呼和掌声中胜利结束。

一九三五年日军侵至察哈尔省边界，察境蒙政会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本。吴鹤龄在察盟日特枪杀尼冠洲事件中被德王暗救，因感救命之恩，即参加了德王伪政权。从此，吴鹤龄正式与德王同流合污了。驻南京办事处的恩和阿木尔等也到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伪政权任职。其他驻京代表陆续星散。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我是怎样从“马贼”·当上汉奸的

李守信

（一）“九一八”事变以前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沙俄，乘机侵夺了我东北三省不少权利，并派遣特务潜伏于内蒙东部各旗，派遣所谓“中国通”的日本人训练蒙、汉间谍，对内、外蒙古开展了特务活动。民国初年，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机会，授意逊清遗老组织“宗社党”，进一步勾结一些蒙古实力派，做为它实现“满蒙政策”的工具。

内蒙古东部区胡匪猖狂，蒙古牧民中，也有人成了强悍的马贼。哲盟科尔沁部与卓盟的喀喇沁部，以贡桑诺尔布为代表的王公，倾向日本，聘请日本人办警校，训练警察，派送青年到日本留学。这样在内蒙东部区，不仅有敢于兴风作浪的马贼，也有日本豢养的亲日派的知识分子，所以东部区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也表现得突出。

热河境内除巴布札布由马贼变成受日本利用的“宗社党”骨干而外，其他王公旗官和活佛、大喇嘛等，也前后和日本间谍、特务取得了秘密联系。如大巴林旗的王爷就经林

● 马贼——旧中国时东北地区的蒙族胡匪。

西“东升泉”烧锅（酒房）经理、汉奸曾纪纲的介绍，于民国初年以六十万两银子，把林西黑山头的大面积荒地卖给日本人，并把一个日本大夫小桥留到林西，利用“东升泉”地址，改建为医院，小桥以看病做掩护进行特务工作。另外阿鲁科尔沁旗爱根庙的活佛萨布楞，也跟日本早有勾搭，在佛殿中藏有大批日本武器，联络胡匪、马贼，伺机起事。这个活佛于一九二二年秋天，就试探过我，可见热河沦陷前十几年，就已经有人把我看成第二个巴布札布。

一九二二年，我领着一帮汉族的胡匪和蒙古马贼，创立起“信”字号拉“杆子”（当土匪），在热河北部各县当胡匪四年。这年年初因巴布札布余党所率的“蒙匪”进犯开鲁，我被热河游击马队收编为一个骑兵连，奉命开赴开鲁前线作战，春天收复开鲁县城，打败“蒙匪”。夏天队伍到建平驻防，我从连长升为营长。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热河的地方部队群起驱逐奉军。我那个营在赤峰高粱杆子店，解决了汲金纯部的一团炮兵，夺获了八门新式德国野炮。当时“直系”的热河都统米振标调热河游击马队防守开鲁，我营在开鲁爱根庙驻防，故和萨布楞活佛认识。爱根庙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和成群的牲畜，萨布楞活佛让我的营部扎在他的庙仓里，每天请我吃饭。后来提出要和我换贴，我便和他同包种庙地的三个大地主，摆斋案磕了头。我的骑兵营，由胡宝山（蒙名鄂莫格图）给我带领蒙古士兵。胡宝山跟随巴布札布多年，和萨布楞活佛认识比我在前，爱根庙私藏日本武器之事，他早有所闻，便借口爱根庙私藏日本枪枝之事，敲诈萨布楞活佛。萨布楞给了他快马十一匹和大元宝七个。胡把快马卖掉和元宝花完，又找萨布楞要钱，萨布楞看见胡宝山贪

得无厌，想叫我设法制止，便对我泄露了一些他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事。

萨布楞活佛承认，日本确实给阿鲁科尔沁旗偷运来五百枝步枪和十万发子弹，因为王爷胆小怕事，而在爱根庙里存放。并说日本人还给他一张联络执照，拿上它可以在南满铁路免费坐车，吃饭也由车上招待。他把执照从小皮匣中取出来让我看，原来是一张大正天皇和皇后的像片。萨布楞说：“你如果想成大事，为蒙古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我愿把枪交给你使用。打出旗号以后，连日本的大炮也能给你弄来。我是个出家人，带不了队伍，你是巴将军（指巴布札布）死后咱们蒙古人最有出息的人。我因为看你对张将军（指热河游击马队统领张连同）忠心耿耿，早想对你说而又不敢，现在此事既然被胡宝山挑明，希望给咱们蒙古人帮忙。你如大干，别说爱根庙的枪马，整个阿鲁科尔沁旗都能帮助你成立军队。”我对萨布楞回答道：“咱们既磕头为弟兄，就要同甘苦，共患难。藏枪的事只胡宝山知道，我可以替你对付他。假定上边发觉，只要你坚不承认，我负责保护你。至于你叫我去当巴布札布的蒙匪头子，我坚决不干，因为拉了四年‘杆子’，已经披上永远脱不掉的贼皮，再去当‘蒙匪’更要被人骂我祖宗三代。”萨布楞活佛听见我提出“蒙匪”字样，便没再往下谈他与日本人勾结的其他情况。

我虽当过胡匪，但自一九二二年被张连同收编以后，即认为自己已经改邪归正。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义，当兵后，改为李守信。当官以后被张连同视为“爱将”，他又送了我一个“子忠”的表号。当营长还不到半年，由于拉了四年“杆子”，以淌来之物结交朋友，热河游击马队的十七个营当

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都跟我碰过头。在士兵中也用钱收买下不少人。

张连同起初包庇我为匪，以后又培养当官，我对他有“知遇之恩”，当时我只希望能当到像张连同那样一个马队统领，就心满意足，以后再像许多行伍出身的军官那样逐步向上爬，因此，我没有上萨布楞活佛的钓杆。“九一八”事变后，爱根庙的武器弹药，被日寇组织的“内蒙古自治军”（以下简称自治军）运走。

据巴布札布三儿子正珠尔札布说：“萨布楞活佛和阿鲁科尔沁旗的王爷代表阳仓札布，曾于一九三二年春天，到郑家屯日本“满铁公所”和甘珠尔札布、正珠尔札布兄弟，以及通辽莫力庙的小活佛阿王图丹巴等，出席过筹组“自治军会议”。甘珠尔札布被任为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莫力庙小活佛被任为第四军司令。萨布楞活佛临终时叫我去，我为了避嫌没有去，可能与此事有很大关系。由此说明日本特务间谍早就对我暗送秋波了。

（二）热河沦陷以前

我投靠日寇，同我顶头上司崔兴武有关。崔兴武生于一八八五年，比我大七岁。他先给清朝的马政大臣调教马，后来参加毅军升为帮带。一九二二年我收复开鲁时，他还在张连同的营长孙凤阁、孙寿卿那里住闲。由于他擅长马术，张连同爱养名马，由孙等介绍给张，渐得张的宠信。不久张连同任崔为营长。一九二四年二次直奉战争后，张连同任东北边防军骑兵独立第九旅旅长，崔升为团长。一九二五年崔兴武

贿通杨宇霆接任旅长，我任团长，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带的独立第九旅改称东北骑兵第十七旅，孙凤阁为二十七团团团长，我为三十四团团团长，孙寿卿为四十一团团团长。崔兴武和二孙磕头拜把，部队中称他们为“三桃园”，始终把我当外人，打仗老叫我的部队去牺牲。我为了保全地位，处处容忍，表面上对他很忠诚、服从。

我从家里背着一枝套筒步枪跑出来闯荡江湖，不到八年时间，闹上一个骑兵团长。因为在赤峰、经棚和开鲁驻防，和买卖人来往日久，也学会经商谋利，我做走私和投机倒把生意，比崔兴武赚得钱还多。他把钱花在娶姨太太、买田产、开烧锅等方面，我将钱尽应酬了朋友和收买官兵。我的朋友中除少数蒙古王公、旗官和活佛、大喇嘛外，多数是汉族中的官僚、地主、商人和胡匪头子。我的兵是汉人居多，把胡宝山带的那些蒙古兵，当成别动队来使用。我和崔兴武的参谋长陈宝泉，副官长刘继广，步兵团长尹宝山，营长丁其昌等所谓“三桃园”圈外的军官，结成一个集团，他们对我都有好评。朋友们都认为我和他们是利害一致的汉人。

一九三〇年，辽宁科尔沁部的嘎达梅林组织牧民反对王公，巴布扎布所带的“蒙匪”，流窜到热河北部。汤玉麟令崔兴武旅出动防堵，崔派我和孙凤阁两个团前去进剿。孙凤阁呆到鲁北县装病不动，我则穷追痛击，把它歼灭，连嘎达梅林也是我亲自开枪把他击毙于老哈河中。所以在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以前，不只崔兴武旅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听我的话，热河北部七八县的绅商地主，也认为我是他们的保护人。以后我就凭借这个声势，做为投日的主要资本。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开鲁县驻防。一九三二年秋

季，日本人由通辽派伪“自治军”向开鲁进攻，热河北部有一年多处于无战事状态中。在这期间，上有蒋介石下至汤玉麟，都没有抗日的决心。崔兴武为了能在开鲁苟延残喘，跟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取得妥协，开鲁、通辽公路线继续通车，我也决定看一看局势，保存实力。

开鲁和通辽相距一百八十华里，“九一八”后不几天，通辽局势紧张。一九三一年冬天，有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学生腾续文、×××和达斡尔族留日学生德古来等以及东蒙一些知识分子，在日军的帮助下，企图占据通辽。不久日本关东军进占了通辽，设立了特务机关。攻通辽的蒙古兵，组织了“自治军”，由东科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任第一军司令，东科中旗韩色旺任第二军司令，热河土默特左旗巴布扎布的次子甘珠尔扎布任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热河库伦旗的鲍殿卿（那钦双和尔）等为联队长，由关东军发给三千枝步枪和六十万发子弹，派松井清助、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等为顾问，积极准备进犯热河。

通辽失守以后，崔兴武在投降和抗战两条道路中间徘徊。一方面通过开鲁商务会会长、汉奸蒋金安（旅顺人，领日本人的本钱在开鲁开设甘草收购公司）和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久进行敷衍，一方面调我那一个团到开鲁东面九十华里的道德营子布防，摆出抵抗的架势，但通辽和开鲁中间，汽车照常通行。崔兴武指示我，不叫在道德营子检查和盘问商旅。我到道德营子不久，因伪“自治军”中尽是胡宝山的熟人，他们瞒着我派人把胡宝山叫到通辽，想让胡说服我，同他们一起去投日。我对胡说：“他们号称四个军，连四千人都不够，军司令尽是王爷、佛爷和少爷，根本没带兵

打过仗。巴布扎布当年曾有一万多人，尚且落了一个失败，他们这些乌合之众，连我也对付不了。民国以后，蒙古人就是跟上这些王八兔子们死了许许多多，凭他们这些料，怎能把蒙古民族复兴起来！你如果还不安分守己，小心跟上他们卖了脑袋。”隔了几个月，汤玉麟驻热河的军队去辽宁省收复白城子，我即把胡宝山打发到那里作战，恐怕把他留在道德营子，给我生事惹祸。

有一天，崔兴武叫我回开鲁，我到了崔的公馆，看见客厅中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蒙古人，由参谋长陈宝泉陪着，不知谈论什么。这时，崔兴武把二十七团团长孙凤阁，四十一团团团长刘继广和我叫到他的卧室中说：“通辽自治军的松井顾问和第一师师长鲍殿卿，想认识一下你们三位团长，为了维护开鲁的局面，你们可以和他们见见面。”崔把我们领到客厅，经过介绍，除了松井和鲍殿卿外，另一个日本人是在开鲁当过兽医的仓林，这次来是代表通辽日本特务机关并给松井担任翻译（因为崔兴武不叫我在道德营子检查汽车，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开鲁）。崔在公馆举行完宴会，松井和鲍殿卿要求先访问我的团部，到了团部松井问我说：“你们旅长打算怎么做？你打算怎么做？你们肯不肯和我们携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说：“我们旅长得请示汤主席，我听我们旅长的。”他一看我不表示态度，便把鲍殿卿留下，就和仓林回到蒋金安的甘草公司。鲍殿卿跟我谈了整宿，讲了一套复兴蒙古民族的陈辞滥调，最后谈到正题，想叫我把部队带去担任他们的第五军司令。我说：“我是蒙古人，对于蒙古民族复兴很乐意，可是叫我当日本人的自治军，我坚决不干。至于实行民族自治，应当取得老汤同意。你们后台

老板，决定不了给我第五军司令，咱们不妨交个朋友，今后彼此帮忙，只要你们名正言顺，我一定和你们合作。”第二天我把他们说的话完全报告了崔兴武。崔说：“你应付的很好。”

崔兴武在东北军里，可以说两头都探不上：张学良不认他是黑山县同乡，把他的部队视为游杂部队；汤玉麟主张“热人治热”，也不将他当成嫡系。他在一九二五年归奉军后，没有给他补充过一枪一炮。有一次他向汤玉麟要求子弹，只拨给五百发。“九一八”事变后，崔以抗战为名扩充队伍，我一下子就给他招集起五千名胡匪、马贼以及热河与科尔沁部的民团小队，其中有胡宝山给纠合的二千多蒙古人。崔把名册呈报给汤玉麟，想望发给饷项服装，汤因限制崔兴武发展，派三十六师副官长李芳亭接过这部分人，编为一个暂编旅，归崔兴武指挥。李芳亭出身于朝阳的胡匪，和我同乡而又结拜，我很同意由他替我带领着这部分人。崔却怀恨在心，准备待机报复，遂在以后参加了张学良和冯占海的倒汤活动。此次松井前来谈判，崔也是把责任往老汤身上推，好捉住汤玉麟通敌的把柄，给自己通敌做辩解。松井不敢亲往承德，崔叫我派一连人保护仓林前去试探。由于朱庆澜组织起“辽吉黑热四省抗敌后援会”，派何清明（何绍南）和王野人等来热河鼓动抗战，仓林和汤没有谈出结果，便匆匆返回通辽⁹⁹。由于形势所迫，汤玉麟不仅拒绝了仓林的诱降，并且为了表示抗战，命令崔兴武指挥李芳亭及通辽的一个商团（司令蒋某），于一九三二年夏初，由开鲁出动收复辽宁的洮南和白城子。崔不愿意，以警戒通辽的伪“自治军”为借口，叫李芳亭和那个商团去，我怕李芳亭掌握不住

蒙古士兵，便打发胡宝山带了二百多人前去协助。李芳亭带着这五、六千人，在洮南被张海鹏的伪军挡住，退到鲁北。这时刘桂堂率领八千多胡匪，也打着抗日的旗号由围场、林东和天山窜到那里。李芳亭不仅没打到白城子，并且在鲁北被刘桂堂解决了大半，胡宝山还被刘桂堂扣捕，李芳亭和商团的蒋司令领着两千多人退回开鲁。

“自治军”四个军，于秋天集结在通辽的舍伯图，企图绕道德营子，由曹家营子经哈拉毛都迂回占领开鲁县城。崔兴武看见李芳亭退到哈拉毛都以后，日本飞机即来开鲁进行低空侦察，虽然通辽的汽车仍然通行开鲁，但知道战事已经不可避免，遂决定占领舍伯图，威胁通辽以保全开鲁。这次崔又让我担任主攻，刘继广团接防道德营子。崔把孙凤阁团和卫队营开出开鲁东门，说是由他率领朝南迂回舍伯图。我信以为真，便把队伍带往哈拉毛都，让李芳亭和“蒋司令”的人担任左右两翼，即向曹家营子推进。这时“自治军”已由舍伯图出动把曹家营子占领，松井顾问指挥着伪“自治军”四个军，前来夺取哈拉毛都，大白天和我们在老哈河两岸遭遇，隔河展开战斗。那时我只有一门六五迫击炮，由连长霍清泉瞄准，我亲自往里装炮弹，头一炮就落到松井所乘的车跟前，第二炮即把松井所坐的马车打翻，伪军纷纷后退。这时左前方发现有五百多骑兵冲来，企图由河北抄李芳亭的后路，我一看不是蒙古人，像久经作战的胡匪，所以令右翼“蒋司令”率队过河捕捉俘虏，我去迎击这股骑兵。当我把这股敌人赶跑，“蒋司令”已将从马车上跳下来的松井顾问打死，俘虏住松井的一个蒙古勤务兵和鲍殿卿的参谋长，还有两门迫击炮。李芳亭气的拔出手枪，要当场枪杀“蒋司

令”，怪他把一只“肥羊”杀死。经我拦住，让他们配合我一齐攻打曹家营子。“自治军”看见松井被杀，便落荒四散。躲在曹家营子抽鸦片烟的伪军参谋长甘珠尔扎布，发现进村的骑兵不是他们的人，即跨马逃走。

这天我们在曹家营子宿营，胡宝山被他的亲家白玉山从刘桂堂那里接出，也跑来曹家营子，还给我招来二百多蒙古马贼。我把松井的尸体运到开鲁街上展览。松井的勤务兵和鲍殿卿的参谋长，我打发胡宝山送他们到舍伯图，劝告“自治军”不要替日本人卖命。胡宝山回来时给我带来了“自治军”第二军司令韩色旺的一封信，附有他的生辰年月，除了感谢送回俘虏并要跟我结拜，以后我们就成了没见过面的换帖弟兄。第二天拂晓，我把李芳亭和“蒋司令”两部留在曹家营子，自己单独去攻舍伯图，中午占领舍伯图。后半天“自治军”由通辽派出援军进行反攻，但骑兵不敢下马爬城，经我用迫击炮猛烈射击，即纷纷溃退。

我在曹家营子听说刘继广那个团根本没离开道德营子，崔兴武在我去攻打舍伯图时，将开鲁城防交给步兵团，自己带上孙凤阁和卫队营去通辽抢了“自治军”第四军伪司令阿旺图丹巴小佛爷的莫力庙，发了一大笔横财。我把松井顾问的尸体送到开鲁，崔兴武却送去出售给通辽日本机关。我退回曹家营子，因为人多驻扎不下，便叫李芳亭和“蒋司令”的人仍开回哈拉毛都，由我的那一个团警戒敌人。“蒋司令”从通辽退出带着不少银钱，崔兴武便派孙凤阁去哈拉毛都把蒋的人包围交械，并把蒋打死。崔兴武这样干，据说是被田中致收买，给松井顾问复仇。崔和孙因抢完莫力庙和解决完蒋后，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大吵一场，孙辞职不干，崔兴武

遂让尹宝山接了孙凤阁的二十七团团长。

崔兴武认开鲁通敌的商务会蒋会长为朋友，将通辽抗日的“蒋司令”当成仇敌；我在舍伯图打仗，他在莫力庙发财。因此，我几乎也跟他决裂。^③我在曹家营子由于伪军不敢从舍伯图南犯，便回开鲁去料理私事，先去旅部见崔。他板起面孔质问我为什么从舍伯图退下？我说：“你是中国人，尚且亲近田中玖，我是蒙古人，怎能不倾向‘自治军’”。他一听话中有刺，又问我：“你究竟要怎么样？”我说：“我要去当他们的第五军司令，官兵一个也不带，枪马全给留下，咱们好离好散。”这时他又改了一副面孔说：“子忠！我全凭你保我，你一走我就完了，我不过问一问你，咱们都是真心抗日，我和田中玖联络，还不是为了维持开鲁的局面，希望咱们彼此都不要误解。”接着扯了一些闲话，留我吃饭才叫我回家。我盘算了整宿，还是觉得他虽然不仁，我不能不义，他越表现得混帐，我越容易出头露面，因而决定还是跟他跟到底，以全我“忠臣不事二主”之心。所以不久“自治军”从舍伯图绕道开鲁东南四十里，占领了小卓王的卓里克图王府，还是我带队伍从曹家营子过去，给崔兴武把开鲁外圈的这一军事据点夺回。

我攻击卓王府时，从二十七团和四十一团抽出两个营，由胡宝山那个营担任爬城，死伤了四五十人，二十七团的许合义营长，也在王府的城外阵亡。我于黄昏时把王府占领，入夜伪军进行反攻，我把二千多人都诱入王府，包围在四周沙岗上所占领的阵地中间，围了一天一夜。胡宝山代表我去和韩色旺谈判，决定给他开退路，他们自动撤离，保证再不反攻，只是摆出一种胶着对峙状态。伪“自治军”没有撤

远，只撤至王府四周的沙岗外，白天双方朝天打枪，夜间派人互相联络。我们子弹很缺，韩色旺打发人送我一万多发子弹。这样在卓王府附近“表演”了不到十天。因为冯占海带着好多义勇军从黑龙江退到开鲁县境，他们奉令撤回通辽，我也受命防守哈拉毛都。崔兴武调李芳亭的部队，接了卓王府的防务。

（三）东北义勇军退到开鲁以后

冯占海和邓文等在黑龙江抗战失败，一九三二年八月退入热河，开到哈拉毛都北面，崔兴武将我的一团人调到哈拉毛都堵防。崔在开鲁对我说：“冯占海的人纪律非常不好，沿途脱老百姓的皮棉衣裳，现在还没有整体过来，还容易对付，要是服装补充齐全，开鲁就会危险，你去把他们赶到通辽或别的地方，总之，不叫他们驻在开鲁境内。我知道你很有办法，不知你以为如何？”我说：“他的纪律好坏是一码事，在江桥抗战，全国都知，我们没有打他们的理由。”崔说：“扰乱地方谁负责！”我说：“他们只是吃些粮食，开鲁有的是粮，养活三五百不成问题，”崔说：“你能负责任吗？”我说：“给我责任，我就敢负。”崔兴武是受地方士绅，特别是商务会长蒋金安的包围，提出驱逐冯占海的主张，因为我不去打，他又不敢去，才决定派我代表他前去欢迎。

我到了召东村，见了冯占海、邓文、檀自新和李海青等，我说：“我是三十四团团团长李守信，我代表旅长欢迎你们前去开鲁，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他谈。现在开鲁和哈拉毛都非常复杂，为了不发生意外，你们部队现在就驻扎在

这一地区，官兵可以徒手进城和进哈拉毛都购买东西。”冯等非常骄傲，我再没有说客套话，便回哈拉毛都严加警戒。崔兴武在开鲁四门设了“卡子”，当冯等初到开鲁时，除了少数马弁，连卫队也被挡住。冯占海进了开鲁不久，朱庆澜的抗敌后援会派何清明和王野人即到开鲁慰劳义勇军，并给蒋介石作特务工作，还带来一部电台，后来才知道电台是戴笠给拨的。何清明和崔兴武的参谋长陈宝泉是保定军校同学，和陈住在一起，每天被崔请去吃饭，王野人到处活动，后来给李芳亭担任了参谋长。他们尽和冯占海和崔兴武来往，跟我很少接触，也许何清明以为我和陈宝泉结拜，陈可以左右我，而又见我崔兴武很“服从”。所以不需要在我身上下工夫。他们来到开鲁以后，是负两三重使命：一方面给朱庆澜执行鼓动抗战；一方面给蒋介石进行布置“曲线救国”活动；另一方面也给张学良做东北军的团结工作。由于他们本身的使命非常复杂，加之义勇军进入开鲁，蒋金安受田中丞指示，从中挑拨离间，结果把个开鲁城弄得复杂起来。

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张学良那时因为指挥不动汤玉麟，有心让冯占海接任热河省主席。抗敌后援会的何清明和王野人说他们能代向蒋介石请求批准，以拉拢冯占海。冯占海向崔兴武表示，他可以向张学良请求，把十七旅扩编为军，何清明也和崔兴武说，张学良不给编，国民党中央也能给编，因此把崔兴武弄得想入非非。除了把何清明视为和蒋介石联络的线头，并派他的侄儿崔玉昆到北平和张学良进行联络。张学良居然交给崔玉昆一本电报密码，让崔直接和他通报。李芳亭受汤玉麟的密示：把军队扔在城外越跑越少，他和谢国臣就近监视冯、崔的行动，成天和他们在—起打

脾。蒋金安为了给日本通辽特务机关收集情报，更和他们整天周旋，把开鲁城闹得乌烟瘴气。先是崔兴武和冯占海结拜为异姓兄弟，姨太太们也认了干姐妹，冯答应他出任热河省主席以后，把石香亭十九旅和赵国增的保安旅都拨给他指挥。以后李芳亭和谢国臣破坏冯、崔联合倒汤，挑拨冯占海从开鲁驱崔，何清明也愿意把崔兴武干掉，好使陈宝泉掌握十七旅。他们曾秘密地开过好几次小会，因为怕我替崔报仇而不敢下手。开鲁县长于寿山是由地方士绅出任县长的，老奸巨滑，在局外旁观得非常清楚，唯恐地方多事，商民受糜乱，对崔兴武说：“无论抗日投敌，倒汤防冯，以及指挥石香亭和赵国增，都必须取得李守信支持。”因此，热河沦陷以前，崔兴武竟把我当成他的家奴，还想让我改姓成崔，并演了一出收我为义子的趣剧。

那年秋末，开鲁城里流行时疫，我在哈拉毛都接到崔的一个电话，叫我赶快回开鲁。我冒雨先回家看了一眼，一个五岁的男孩子，染疫而死，老婆也在病床上呻吟，我料理一下后，才去崔兴武的公馆。他因为等我等得很着急，满脸不高兴，屋里只有参谋长陈宝泉和抗敌后援会的何清明。崔和我说：“子忠！我想叫你改一个姓，好让大伙捧你，我以后就不管事了。”我说：“现在开鲁快要沦陷，你怎能不管事而推卸责任！我祖祖辈辈姓李，子子孙孙还要姓李。”崔见我对他顶撞，再没说第二句话，拿着烟枪抽不下去，坐起来干瞪眼。我说：“我的娘儿们现在快要咽气，我得回去看她。”说完就走。第二天我去找陈宝泉。问他：“崔兴武究竟叫我姓啥？”陈冷笑的说：“热河的大军头，都是父子相继，如常德胜把军队交给他侄儿常万里，刘山胜把军队交给

他侄儿刘汉杰，旅长想把你改成崔守信，使别人不敢欺侮他。我和绍南（何清明的字）认为对你这样也很好，可以把他的摊子接过来。”我说：“蘆山（陈宝泉的字）！咱们是磕头弟兄，原来你也认不得我，姓李的没门没窗，是拿枪杆子打出来的团长，现在就能接他的摊子，只是对不住世人。谁叫我命不好，跟了这样混账的长官，既然跟了他，就要跟到底，绝不能中途背叛。我因为往日去接张将军（张连同），曾带着二百人敢进承德府（时在一九二五年春天谭庆林替宋哲元代理热河都统期间），谅有我李守信在开鲁，谁也不敢端他崔兴武的锅。你告诉旅长，让他放心好啦。”原来这里边还有把戏，是陈宝泉经何清明挑拨，他想取崔而代之。现在见我对崔的态度如此，便野心收敛，把我说的话都转告了崔兴武。以此以后，崔开始跟我商议起大事来了。

崔兴武先和我商议联冯倒汤，他说：“子忠！我要作这件事，你看怎样？”我说：“冯、汤都是奉军的嫡系，咱们参加进去很不合适，日后人家两个一见面，便会把你出卖。”他说：“冯占海跟我磕头，不至于如此。”没隔三天驻省办事处处长，李树声从承德来电，说是冯的参谋长到了承德，汤玉麟质问冯占海在开鲁酝酿倒他的事，冯的参谋长把一切都推到崔的身上。隔了十几天，崔兴武又和我商议。张学良为要汤玉麟坚守热河，联络崔兴武于必要时实行兵谏。但必须北平方面届时拍来“尺码合适”的电报暗号，才可以行事。崔看见冯占海的义勇军从开鲁开走，想叫我去朝阳解决汤玉书的骑兵，（玉书是汤玉麟的兄弟）以雪汤平日排挤压制他的仇恨。他说：“子忠，这次你可以干了！”我说：“少帅绝不肯因为开鲁和朝阳内讧，把热河的两个门

户都敞开，让日本人乘虚而入，一定说是‘尺码不合适’。他叫何清明的电台转去电报，回电果没出我所料。

因为蒋金安把冯、崔联合倒汤的事密报了日本特务机关，所以日本飞机来开鲁只侦察不投弹，可是倒汤没有成为事实，敌机便每天都来轰炸，冯占海在的时候，炸弹都落在义勇军阵地，冯的副官长和卫士等三十余人曾炸在一个地窖里。冯占海走后，专炸何清明那个电台小院，连李芳亭和谢国臣住的地方也都炸了，但不炸十七旅的营盘和崔兴武的公馆，为何炸得如此准确？我判断这一定是蒋金安在捣鬼。一天早晨，崔兴武带着姨太太到城外防空，我从前方回来，他叫我也一同前去。他对我说：“抗敌后援会的慰劳品和子弹给义勇军的比给十七旅的多。”又恨这批东西都叫冯占海带走，大骂冯占海不够朋友。

我自从和“自治军”打完仗以后，很注意通辽方面的敌情和国内的抗战形势。除了让“东普汽车公司”经理王子玉供给我情报外，并叫驻省办事处处长给我留意报纸上的各种消息。因为我还托他们在通辽和承德间作买卖，所以每天差不多都有书信和电报来往。根据李树声的来信，知道全国一致主张抗日，蒋介石被迫把他的中央军开到北方，特别是张学良要坚决保卫热河和河北，已经令东北军沿着长城各口布防。据此情况，我对崔兴武说：“只要抗日就有人援助，十九路军在上海得了好几百万慰劳金。别人投降咱们抗，越发会吃香。开鲁的局面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应当好好计划一下，敌人来了咱们该怎么办！开鲁失了咱们到哪里去？”他说：“我舍不下热河的财产，又不敢当汉奸，咱们走一步说一步。”我说：“中央给你编一个军，咱们就把这个牌子挑

起来抗日，热河完了以后，中国地方很大，刘黑七（刘桂棠）和孙老殿（孙殿英）能离开山东、河南到热河抗日，咱们也能离开热河去河南、山东抗日。”他说：“何清明说是朱庆澜给蒋委员长都去了电报，但没有见答复，批准以后，可能叫我指挥石香亭和赵国增。石香亭好说，赵国增一定反对，我以先叫你改姓，就是为了使赵国增和你关系深厚，朝着你的面情而能服从我。”我说：“军队得自己往大扩充，不能拣现成的，番号也得自己争取，不能专靠上边给编制。咱们有的是人，我从前顾虑官兵不肯离开热河，只要给他们各升几级，不怕带不出去。刘黑七和孙老殿是先表示抗日才编了军。中央恐怕咱们领上人投口，也得给咱们一个像样的番号。”我可以说是把话跟崔兴武说尽，但是谈了半天，看见他仍犹豫不决，不置可否。我说：“如果没有事，我得赶快回前线去。”他说：“你到前方也好，我在后方维持。”我离开他以后，通辽、开鲁间汽车仍旧通行，可是道德营子和哈拉毛都的空气，却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

（四）我初和日本人“洽谈”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占领山海关，开始威胁热河，日本兵因为秋天派“自治军”进犯开鲁没有成功，从阴历腊月初起，就不断直接扰袭。两翼还是“自治军”。他们来时只是小坦克车朝我们开炮，飞机轰炸扫射，步兵和骑兵不跟我们接触，旨在恐吓崔兴武，叫他把开鲁让出，崔当然不敢在热河首先投敌，这时李芳亭已经带着五、六百人到承德去找汤玉麟。崔令我和刘继广在哈拉毛都和道德营子进行抵抗。我在

哈拉毛都附近布防，只是飞机在头上扰得非常讨厌，他们天黑退出，天亮又来，我恐怕遭到夜袭，晚上也得防守，弄得官兵无法睡觉。为了使士兵白天能够休息，我挑选出二百多优秀射手，分开好几组专打敌人的飞机，敌人便不敢低飞，我的士兵可以轮班休息。阴历腊月二十八日（或者二十九日）有一架敌机被我们用步枪击落，机上有四个日本人，两挺机关枪，与两部电台。飞机受伤不太严重，日本人被我们骑兵活捉。我用电话报告给崔兴武，他叫把俘虏和电台、机枪送到道德营子，交给刘继广看押和保管。我一听这里边有文章。他问飞机如何？我说已经跌毁，因而打完电话后，我就令士兵把飞机烧毁。

因为前方仍然吃紧，我不能回家度春节。一月二十九日（阴历正月初四）崔兴武叫我回去，我见了他，问有什么事？他说：“日本人想让咱们把飞机上两人给送去，打算派你去通辽跟他们谈判。”我说：“为什么要派我去？”他说：“你能行。”我说：“你打算怎么办？”“跟他们诓些子弹。”我说：“我去很有危险，因为日本人知道我把‘自治军’打跑，不过为了子弹我敢去，别的我可不谈。”我回家考虑到日本的人质押在道德营子，对我不会为难，另外，东北军没给十七旅补给过弹药，经过几次作战，每个士兵只剩下三两排子弹，应把子弹诓到手再说。所以我敢前去。

一月三十日黎明，我穿上长袍马褂，内藏两只勃朗宁手枪，到了崔兴武的公馆。崔的门口已经停着一部通辽日本特务机关的小卧车。客厅中坐着开鲁商务会长蒋金安和日本人仓林。崔兴武叫他的旅部参谋王新民（已换便衣）和蒋、仓坐七汽车先出城，他和我徒步走进大街，我就走就和他谈：

“我死以后，拜托旅长把我家眷送回朝阳老家。”他拍了我肩膀一下说：“子忠，你放心，绝无危险。”我问：“为什么蒋金安也去？”他说：“蒋代表商务会，作这次谈判的保人。”我们说着走出东门，等我上了汽车，他才骑马回去。汽车开得很快，午饭前，我们就到田中玖的特务机关，有两个中国翻译刘辑五和胡柄初出来欢迎，刘对我说：“咱们是老朋友，我去过好几次开鲁，在开鲁银行的宴会上和李团长还碰过杯，请你来到我们这里，不要客气。”经他一说，我觉得很面熟，只是那时穿着商人的绸缎便衣，现在换成日本黄呢军装。我们在院子里闲扯的时候，田中玖从客厅出来向我握手，让进客厅后，首先问我：“飞机上的人现在如何？”我说：“四个人剩下三个人，那一个人因为夺卫兵的枪，被我打死。”他说：“没有什么，咱们先吃饭。”饭后我向他提出子弹的事。他说：“这个我主不了，得请示关东军司令部，你敢不敢跟我到新京（长春）走一趟？”我说：“通辽既然敢来，新京怎么不敢去！叫我到日本国见天皇，我也不怕！”他说：“那很好，今天我给关东军去电报，明早给你回信。”

“自治军”驻扎通辽，我恐怕遭到甘珠尔札布和莫力庙小佛爷的毒手，便向田中玖说：“我随便上街有无危险？”他说：“没关系，我负责保护你。”我说：“不是怕你们日本人，因为崔旅长抢了莫力庙，我打过舍伯图，恐怕自治军不谅解。”他说：“自治军是特务机关指挥，你放心好啦。”并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玩？”我说：“到班子里去玩姑娘。”他笑了一笑，叫两个翻译领上我们坐汽车去逛班子。到了妓院，我问翻译：“山东有个王子玉他是通辽跑开鲁的

东鲁汽车公司经理，你们认识不认识？”他们说：“那是我们的同乡，和我们很好，团长既然问，一定是你朋友，那就叫他来。”不一会，王子玉被汽车接来，看见我大吃一惊。我走时只带着五六百块钱，他听见我说带的钱不多，忙叫妓院派人到公司送来五千元。蒋金安和两个翻译打牌，我和王子玉谈话，他说：“崔派蒋金安跟你来，不是为了诓子弹，恐怕还接洽投降的事。崔当汉奸要你出名，你可要小心。”我说：“我知道，绝对上不了他的当。”

第二天一早，田中玖把我接到特务机关，领我和蒋金安、王新民、仓林和翻译胡柄初十点多乘火车前往长春。开车时又上来一个喀喇沁旗留日的蒙古人金永昌，田中玖向我介绍，说：“金是关东军司令部“嘱托”（特务）前来欢迎你。”到了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派车来接我们去见关东军司令菱刈大将和小矶国昭参谋长。菱刈大将伸出大姆指对我说：“你是一个很勇敢的蒙古人，我佩服你李守信团长，希望你和我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说：“我是代表我们旅长来接洽送还俘虏，其余都不敢当。”菱刈说：“你为什么不把带来？”我说：“因为没有谈出条件。”菱刈改口说：“你来顶好，咱们就先谈这件事。”这时小矶插嘴道：“凭你们旅长，我们不相信他，你是蒙古人，我们才朝着你谈。”我说：“我的身份和地位不够，我得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小矶说：“最好先把人带来再谈，看你们有无诚意。”我说：“我们旅长临走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得回去请示他。”小矶说：“人带不来不好谈。”我说：“有开鲁的商务会长做担保。”小矶说：“我们只凭信你，而你又不敢负责，所以必须先答应我们的条件，然后才能提你们的条件。”我看谈不下

去，便起身告辞，菱刈把我送到门口，对小矶、田中玖说：“你们替我好好招待李团长，我因事忙不能出席欢迎他的宴会。”

小矶中将把我送到旅馆，我向他说：“我回去请示？还是把我留下做抵押？”小矶大笑说：“你们都回去，飞机上那几个人送来送不来没什么，我们日本人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已经牺牲了好多人，不在乎这三个人。”小矶走后，我问蒋金安和王新民：“你们留在这里怎样？”蒋、王都说：“我们在这里等你的信。”王新民起初害怕日本人把我和他扣住不放。现在看见日本人极力拉拢我，知道不会遇到危险。想乘此机会，到锦州探亲。我为急于诓到子弹，又恐崔兴武变卦，有意把王留下，田中玖说：“他们留下也可以，我发给护照在满州国旅行，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晚上小矶约了二十多个中佐以上的军官，就在旅馆为我们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我在致辞中说：“我是代表我们旅长来到这里，因为既没有办过外交，恐怕完不成任务，非常抱歉，我愿把贵方的意见回去报告给旅长，今后咱们直接来交涉。欢迎我实在不敢当。”宴会散后，小矶又嘱咐我：“你回去把人给带来，子弹不成问题。你可以和金永昌好好谈一谈你们蒙古的问题。”金永昌和我都被安排在一间房里，他谈的和前几个月鲍殿卿说的相同，不外是和日本人携手，复兴蒙古民族，以及让我和“自治军合作”，等等。我听的不耐烦，叫他领我逛班子，到了越香春旅馆，金永昌给我介绍了夏子明，说他是刘桂棠军长的副军长。夏也是胡匪出身，我跟他一见如故。他说：“现在连蒋介石也是脚踏两只船，咱们更要东风大随东风，西风大随西风，不能死抱住一股弦子弹。天下大乱，咱们弟兄们才能出头露面。不然的话，谁能看起咱

们，他们利用咱们，咱们也利用他们，马占山先投日后抗日，现在谁不承认人家是英雄，你不要错过机会，甩开崔兴武自己挑吧。”他的话很合我的心意，我和他就在越香春磕头结拜。

二月三日我跟田中玖、仓林、金永昌返回通辽，田中玖派仓林陪着我回到开鲁，向崔兴武报告初次谈判的结果，路过莫力庙时，小佛爷派出三、四十个人拦车，因车开得很快，子弹没打着。我见了崔兴武，他见我沒有退回子弹，很生气。他说：“他们非先要人不可，我非先要子弹不可。”我说：“我已把王新民留在那里，你给与不给，我得再去走一趟，不要叫日本人看不起咱们。”崔坐起来把大烟一放，并说：“给吧！你带去。”好像是给我办事似的。我到了道德营子给通辽去电话，派来一部大卡车，连人带武器和电台全装上。一到通辽田中玖就说：“你受惊了吧！没有遇到危险真万幸，我已告小佛爷，如再给李团长为难，关东军不答应，你不要怕。”这时我感到，崔兴武对我冷酷无情，还不如田中玖对我“热情”、“关怀”。还认为日本将领风度大方，不像中国将领气度窄狭。因此，我还产生过：“与其替崔兴武联络日本人背黑锅，不如自己干脆挑起来干”的念头。

第二次到长春，仍是由田中玖和金永昌陪我前往，小矶参谋长见我把人、武器、电台全给送来，非常高兴。他说：“关东军送你二十二万发子弹，十五支热河造手提机枪，二十五支韩林春步枪，到奉天兵工厂去提取。另外送你三万元天津字中交票①，这完全是朝着你来。”我说：“朝我朝崔旅长，我都不敢接受，我得仍回开鲁去请示，看他要不要。”小矶

①天津字中交票——中国交通银行天津支行发行的钞票。

说：“那也好，你再辛苦一趟。”我在长春又住了一天，回来的时候，看见铁路西侧军运特别紧张，各个站口都集中着好多农民的马车。到了通辽，王子玉告诉我：“日本人已决定三路进攻热河，这里也征集马车，有一个茂木旅团开到，你们要赶快做准备。”我回开鲁，首先把此情况报告崔兴武，然后问他子弹和武器钞票要不要。他说：“你被日本人吓住了吧？”我说：“笑话！只要有子弹我就不怕。”崔说：“咱们或打或退，你先把子弹弄回来。”我给田中玖去了电话，说崔愿意接受，叫他转告留在长春的王新民前去洽领。随即雇了二十辆马车，派一排人保护。为了使田中玖不怀疑，我也跟去通辽。

（五）崔兴武把我甩在开鲁城

我到通辽和长春完全是为了诓子弹，至于开鲁不战而退，是崔兴武瞒过我和田中玖直接谈判的结果。从我将俘虏送到长春后，日本人即把十七旅当作降军看待。我带着马车进出通辽、开鲁，日伪军并不阻止。田中玖并且允许我住到“东鲁汽车公司”，有事来找我洽谈。我在通辽看见日本的汽车和骑兵向西开拔，即打电话给崔兴武，请他预作准备。他说：“知道了。”我正愁留在通辽回不去开鲁，田中玖打发人将我叫去。说是：“茂木旅团已经出发，恐怕和你们发生误会，你得先回去和崔旅长维持那里的秩序，并准备欢迎皇军入城。”我不敢再问其他，支吾了一声，坐车就走。这时天已昏黑，外边下着大雪，汽车开出通辽，见莫力庙根附近火

光一片，日本队伍在那里停下。二十日天亮，我绕道到道德营子。见了刘继广，即给崔兴武打电话，问他是打是退？他说：“不用打啦！退吧。”我叫刘继广将马备好，等子弹来到以后再退。等了半天，先是两架飞机盘旋了一阵，飞向开鲁，以后看日军四、五十辆汽车开来，却不见子弹踪影。我叫刘继广部撤退，我坐车回开鲁。

二月二十日，崔兴武抓车三百辆，搬运他的东西，往林西撤退，我团也从哈拉毛都往林西扎兰营子集中，扔下二百多家眷不管。开鲁县长于寿山也跑了。“东鲁汽车公司”的车和抗敌后援会的电台，一齐撤退。地方绅士推蒋金安代理县长。我进城的时候，崔的卫队营也开出西门外，只有何清明和崔及其副官陆景堂三个人在公馆中等我。我进崔公馆，崔说：“你在开鲁替我应付，叫日本人管照家眷。子弹运来就到爱根庙，到那里再议。我那部道济汽车无汽油不能开动，日本人来了给弄些汽油，开到爱根庙。”说完跳上车，把我甩下就走了。我回家吃过饭，心想去找队伍，但舍不得子弹。半夜跑回几个押运兵，说子弹在半道上被日本军抢去了。

天大亮以后，又跑回一个押运兵，他说子弹仍由我们押着，只是走在日本兵的后边。因为子弹车和日本兵并排行走，日本兵要无聊，用手摸我的弟兄们脸上的雪，我的弟兄们认为侮辱，对他们开了枪，把几个胆小的弟兄吓的先跑回开鲁，经日本军官制止，他们才没有还手，经翻译解释，误会已经消除了。接着刘继广从扎兰营子派人找我说：“三个团退到那里，大家等你出来以后，才往西开。崔旅长去了爱根庙。”刘继广问怎么办？我叫刘团长等子弹车到来以后再

说。我返回开鲁县城，和蒋金安出去欢迎日本人。日本兵进入开鲁，官兵都在大街上支开行军锅吃饭，商务会准备两桌席，摆到我的家中招待茂木旅团长。茂木旅团长不去，反而在商务会用葡萄酒和罐头招待我们。茂木首先介绍一个小柳匀少佐，说：“这是开鲁的日本占领军司令。”并向我说：“皇军明天向赤峰挺进，你得给弄四百辆车，运输给养。”我说：“我洽领子弹，不负这一责任。”他说：“就向你耍。”我说：“我就没有。”两个人弄僵，他叫小柳匀派十个日本兵把我押到崔兴武公馆。不过还允许我城外的兵进出崔公馆跟我联络。

我被押不久，运子弹的排长向我报告，说是子弹车已经进城。我说：“赶快送往扎兰营子，请刘团长按三股半分给各团和卫队营。”不久刘团长又打发人来向我说：“队伍都由扎兰营子返回，已经接到子弹，问我究竟怎么办？”我说：“听我的信。”由于跟前没有翻译，我们谈话非常自由。二十二日拂晓，茂木旅团开走，巴特玛拉布坦的“自治军”改称“兴安军”，一千七百多人，和张海鹏部伪军王永清旅一千五百多人，开进开鲁。王永清对我说：“田中玖从通辽出来，追茂木旅团，去接赤峰的特务机关长。小柳匀把看守我的日本兵中午撤走，让我去找崔兴武。小柳匀放我时说：“你去吧！”我说：“不走啦。”小柳匀问：“为什么？”我说：“下这么大的雪，我追不上部队。”

我跟小柳匀要了五十筒汽油，乘崔兴武的道济汽车开到开鲁县政府，张海鹏部旅长王永清和开鲁绅商头面人物，都来看我。王永清说：“听说你受了委曲，挨了押。”我说：“崔旅长把我甩下，叫日本人把我押了一天一夜，将我弄得

人不人鬼不鬼，这份汉奸当的真丢人现眼。我的兵因为日本人摸了他的脸，还敢向日本人开枪，现在小柳勾只剩下二百骑兵，我还这么装蒜，真没脸见各位朋友。”我越说越气，开鲁的地方绅商看见我声色俱厉，扑通扑通跪下。他们说：

“李团长，开鲁的百姓遭难不遭难全在您！”我也跪下，向他们说：“大家请起来，我到开鲁外边去干，绝不连累百姓。”王永清将我搀起，拉我到旅部说：“我刚才有点莽撞，惹你发牢骚，把那些人吓成那个样子。我在通辽见田中玖时，他对你印象很好，今天他已去了赤峰，你要趁机扩充些军队，到那一天，咱们叫日本鬼子一个也跑不了。宣统皇帝已任命我们师长为热河省长。我的队伍明天就朝南开，咱们以后多联系。”我经他一说，火气压下大半，便和他告别，坐上大汽车开出西门。

西门外集结的二千多人，都纷纷提出要进城巷战，我讲话说：“城里还有咱们二百多家眷，大家不要意气用事，只要真心抗日，以后有的是机会，咱们还是去找旅长。”队伍经我说服，便向爱根庙开拔，二更到达。我问崔兴武：“子弹已经话来，你是降呀？打呀？”他说：“当然是打，我带两团先退林东，你的团在这掩护。”三日我在爱根庙呆了一天，二十四日退往天山，三团人又集结在一起。二十五日我们连夜出动，崔叫我们去打刘桂堂的军队。我说：“咱们从开鲁不战而退，没给汤主席去报告，刘桂堂究竟是敌是友，现在还没判断明白，你奉谁的命令去打，咱们弹药话来颇不容易。”他说：“不要讲这，我叫你打就打。”我说：“我不接受这个命令，你得给我讲明白。”两人瞪了半天眼，他给陈宝泉下命令道：“他不给打，你指挥那两个团打。”说

完就去林东。”陈宝泉问我：“怎么办呀？两个团听你不听我。”我说：“遇上这样的长官，该如何哩？他叫打就打吧！”于是两军在天山城东开火了。

刘桂堂曾在鲁北解决过我的胡宝山营，官兵退出开鲁的那股怨气，都发泄到刘桂堂部队的身上。他们七、八千人前来占领天山，却被我们两千多人抗住。从二十五日夜一直打到二十七日黄昏，他们没有突破我们的防线。刘桂堂的部队冲锋老是用密集队形，被打死六百多人。二十七日晚崔兴武跑来说：“不要打了，一齐朝林东撤退。”我问他：“这又是为了什么？”崔说：“刘桂堂态度不明，咱们也态度不明。跟刘打，对中国和日本都不好交待。”才给我说了一些实话。但他怎样和日本勾结，又怎样和国民党联络，始终没有对我透露过。刘继广和尹宝山两团于二十七日晚开走，我在后掩护，刘桂堂不敢追击。我于三月三日在林东。尹宝山出城接我，说是崔把刘继广带走，叫我也往林西撤，让他在后边堵刘桂堂。尹又说：“崔不知搞什么鬼，你先走，我不给他抵挡。”我因尹团在后，于三月五日到了林西东门外，尹团也在这天搬到林西城东北二十里地方。

（六）我在林西投降日寇

汤玉麟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不战而放弃承德，三月五日夜，崔兴武在林西把队伍交给我掌握。由于崔兴武的各种政治活动一直瞒着我，我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判断。何清明早向他表示，向蒋介石和张学良给他要一个军的番号，但只是一句空话。他和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拉得很近，所以叫

我在开鲁欢迎敌人。退出开鲁才由张学良正式发表崔为五十九军军长，令指挥十九旅和赵国增保安旅。赵不接受指挥，石秀亭带着两团人于二月底由锥子山开到林西，没敢住米撮标的那座大营盘，准备让崔在那里设立军部。崔到天山叫打刘桂堂，便是接了军长以后的表现。可是三月五日承德沦陷的消息传到林西，开鲁的敌人经爱根庙到了林西东南，刘桂堂部南追尹宝山团也到了林西东北，何清明叫崔在林北指挥两个旅进行抵抗。他听到汤玉麟出走，孙殿英于二月二十三日退出赤峰，不敢把投降的道路堵死。何清明一看无法挽救，就和于寿山带着电台，乘“东鲁汽车公司”的汽车，绕道张家口去了北平。崔兴武还是不敢出面充当汉奸，叫我代理旅长维持林西局面，他自己跑到林西城外的二龙台川观望形势。

三月五日下午我到了林西，听说石香亭的十九旅在城里驻防，旅部和刘继广的二十七团在东门外，我也让队伍在城东寻找村庄宿营。我进城一打听，崔兴武驻在大营盘，他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叫我先回家休息。我刚睡下不久，又打发人叫我前去。他说：“我要走二十天，到北平去见少帅。昨天上午承德就丢了，老汤正往西退，看咱们今后如何办，所以叫你代理旅长。”我说：“你去北平接洽抗日，我很拥护，只是日本人怎么应付？赤峰丢了，小柳匀的部队已向这里前进。”他说：“你又被吓住了。我走以后你设法应付。”我追问他：“究竟如何应付？”他不吭声。我又问：“抗呀？降呀？”后来被我问的没了办法，才说：“咱们俩唱双簧，你给田中玖去电报， he 现在是赤峰特务机关长，说我得了感冒病，让你代理。如问起打刘桂堂事，说是出于误会，这

样就可以缓冲，只是二十天。”他说完连家也没回，就自己开上卧车带着随从副官陆景堂，慌忙出了林西城。刘继广来人报告，说是：小柳匀和“兴安军”已经到了林西东南三十里的黑山头。接着尹宝山的人也来报告，刘桂堂的人到了林西东北二十多里的二十家子一带。崔兴武出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林西全城，不少人便到大营盘找我。我把卫队营在大营盘四围警戒起来，并把代理旅长的事，通知给城外的三个团。

三月五日夜，我到电报局给田中玖打电话，说：“旅长到乡下养病，让我代理职务，林西交给我维持，打刘桂堂系出于误会。”田中玖说：“叫崔旅长好好养病，打刘桂堂没有关系，你先来个详细电报，我好指示你今后的行动。”我叫陈玉泉拟了个稿子，说了一派鬼话，不大一会就复来电报，叫我准备欢迎小柳匀入城。石香亭派人来找我，说：“你们旅长走了，把一切都托付你，我们这部分人怎么办呀？”我说：“他在林西住了好几天，你们商议过没有？”石说：“我在锥子山接到少帅的电报，叫我归他指挥，所以我把人带到林西，表示拥护他出任军长。”我说：“我今天才来，不知这些事。”石说：“这是什么人，不和部下说实在话，现在又扔下林西不管，叫我该服从谁？”停了一阵，石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维持林西秩序。”石说：“我走你打不打？”我说：“你们不抢林西就不打。”石说：“我要从白岔川仍回锥子山，你能不能请日本飞机不追上轰炸？”我说：“这个话可以传达，你安心往出撤。”石香亭走后，我即给田中玖去电报关照。他们撤出林西，安全回到锥子山。以后他们退到狼尾巴山一带被孙殿英解决。林西商务会葛会长来

见我，我叫他代理县长。不久城外派人来报告，小柳匀的部队到了东门外距城八里地的地方。

这一夜林西城里乱成一团，城外也不平静。东北方面的刘桂堂部，因井得泉叛变和刘打了多半夜。天明归降了我们的刘继广团。小柳匀听见刘桂堂的人和我们合在一起，不敢进入林西。三月六日天明，石香亭的十九旅完全撤出，在城外驻扎的我部也不敢开进城里，怕被日伪军包围。小柳匀在东门外等我出去欢迎，我看见把八门山炮卸下，不知意图如何？于是互相观望到下午，“兴安军”的伪司令给来信说是他们有顾虑，我才带着一个勤务兵出去见了小柳匀。他说：

“队伍还没有来齐，咱们明早一同进城。”七日上午八点多钟日伪军始开入林西。

我把日伪军都让进大营盘里，我们的队伍仍在城外。一星期后伪满的“兴安军”调回关东，小柳匀的炮兵和骑兵开到赤峰，我才把三个团开入城内。我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求得在崔兴武离开的二十天内，不出问题，当小柳匀开拔时，故献殷勤，建议他的部队从乌丹城的霸陵桥过河去赤峰。可是小柳匀心怀鬼胎，不敢从这条路上走，结果把汽车都陷入河中，小柳匀走后两三天，田中玖派汽车把我接到赤峰，向我很抱歉地说：“你们蒙古人心好，小柳匀认识不到这点，他不听你的话，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炮从河中捞出，你若是派出一团人进行包围，小柳匀岂不是完了。我找你来就是代表关东军对你表示感谢和信任。并给一万七千块机密费，望你维持好林西的秩序。今后对你一定要重用，你回林西听消息好了。”我问：“什么叫机密费？”他说：“就是给你的钱，你想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我们不管。”我便拿这钱

买了八千双夹鞋，发给士兵。

三月末，崔兴武露了头，他回林西住在热河兴业银行经理陆香波那里，打发人把我叫去说：“我不干啦，把队伍交给你。”我问他：“你不是去北平见少帅吗？”他说：“少帅下了野，东北完了，整个中国也快完蛋了，所以我要到长春去住家。”我说：“你把队伍交给我，叫我如何办理？”他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是不干了，我今年已经四十九岁，奔波了一辈子，弄了这点财产，颇不容易，再活十几年，就要死，所以我要到满洲国当顺民。”我说：“有国才有家，有权才有钱。当了亡国奴，手里又没有兵，我看你的财产保不住，望你三思而后行，我跟你要跟到底，这二十天是你叫我代理，你如果怀疑我，我可以离开部队。”他说：

“于忠！不要说这话，你对我很忠心，只是我不想干了。”我说：“我不能接，你既坚决不干，也得把蕴山（陈宝泉的字）和润斋（刘继广的字）他们叫来商议，让他们去接。你不干，我也不干。”他再不朝理我。陆香波坐在一旁，也不插嘴，我便赶快回到旅部找陈宝泉、刘继广商议挽留他。

我把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部召集在旅部开会，说明崔旅长决定不干，叫他们前去挽留。尹宝山首先向我说：“他不干、叫你干，这不就得了。”刘继广接着说：“你怎么做？我们跟着你怎么做。”没等陈宝泉发言，胡宝山便说：“他不干拉倒！我们是朝你李守信而来，不是跟崔兴武，叫他去他的，咱们干。”别的营长也一致表示拥护我，不同意挽留崔。正在乱吵的时候，陆香波打发人来说：“团长用不着去了，崔旅长已经坐上赤峰日本特务机关的汽车离开林西上赤峰去了。”陈宝泉说：“既是这样，你就干吧。”我说：“咱

们如何办呢？”他说：“现在还没有盖棺论定，只要咱们不遗臭万年就行。”

不久，热河完全沦陷，长城抗战也告失败，日本人已到北平附近的通州，于是我最后决定走崔兴武给打通的道路，在林西正式投敌。不久，田中玖发表我为“热河游击师司令。”这个伪军下辖三个支队，每支队三个团。因为田中玖允许给我补充山炮，司令部还附设一个炮兵大队。我的鸡鸣狗盗的朋友，都闻风而来，部队人数由崔兴武时两千多人，剧增至八千多人。田中玖令把蒙汉官兵分开编制，我叫刘继广和尹宝山任第一、二支队司令，胡宝山任第三支队司令，丁其昌为炮兵大队大队长。第一支队的团长是朱恩武、陈景春和井得泉。第二支队的团长是朱子文、邢德胜和门树槐。第一、二支队共有汉族官兵六千三百多人，第三支队蒙古官兵一千七百多人。我开赴察北时，第三支队在经棚和林西一带留守，到了多伦，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来投我，我派乌协助胡宝山整训第三支队，结果被乌古廷带上参加了伪满的“兴安军”，只胡宝山带少数人到多伦找我。我的司令部仍由陈宝泉任参谋长。田中玖派浅田、佐藤和义田等三个日本人为顾问，浅田并兼林西的特务机关长。从此以后，我就在日寇的驱使下，作了危害祖国、出卖人民的汉奸。

（刘映元记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守信

（一）从多伦逼走刘桂堂

一九三三年夏初，日寇完全占领热河后，派往多伦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计有刘桂堂部七八千人，张海鹏部一千七八百人和我部六千五百人，共一万六千多人。张海鹏部来自辽宁，已编为伪满的正规军，张本人出任了伪热河省长，关东军对该部比较信任。我部来自热河北部，正式投敌还不到两月，除了我是蒙古人这一点而外，其他都待“考验”。刘桂堂部来源于山东的流寇，在热河沦陷以前被北平军分会收编，这年三月由鲁北（热河省的县名）经天山、林东、林西退到围场一带才投敌，所以关东军对该部最不相信。张海鹏有好几旅骑兵，由其长子张子明和王永清、傅景峰、索华岑等分别带领，开到多伦的一千七八百人，是王永清旅。因此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令王永清监视刘桂堂和我，并令林西特务机关长浅田兼我的伪“游击师”顾问，他转告我，注意刘桂堂。这就是日寇对伪军分别对待，相互牵制的做法。除刘桂堂部没有派遣顾问和教官外，我和张海鹏部都有日本人紧紧跟着。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逐步侵犯华北。从侵犯察北开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

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日寇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刘桂堂的山东流寇进行捣乱，使察省主席宋哲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带抗战，怕刘桂堂不听话，又把我带的那帮热河胡匪调了过去，以威胁二十九军的后方。当宋哲元离开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时，日本人又把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开到多伦，一方面提防刘桂堂和我这两部份新投敌的伪军，一方面阻止汤玉麟反攻热河和冯玉祥由张家口出击。等到我把刘桂堂从多伦赶跑，张海鹏部王永清旅调到沽源以东，在察哈尔北部便由我唱独角傀儡戏。

刘桂堂部于三月五日夜晚，在林西东北的二十家子内江打了一整夜，翌晨他的井得泉团长投归了崔兴武的刘继广团，他本人率领主力撤至围场以北，曾盘踞了一个多月，派副军长夏子明前往承德接洽投敌成功。由于宋哲元把二十九军大部带到河北，察北一带没有驻军，多伦于四月下旬被刘占领，队伍完全驻在街内。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后来才到，因不能进街故驻在庙上的东西两仓。我是三月五日在林西代理崔兴武交给我的旅长职务。七日将日本的小柳匀部队和伪满的“兴安军”欢迎入城，二十五日崔兴武把兵权交我，四月初，赤峰特务机关机关长田中玖发表我担任“游击师”司令伪职，把队伍整顿了二十多天，即向多伦开拔，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初旬到达多伦。由于多伦的街市被刘桂堂占领，多伦的庙仓被王永清驻扎，我只好得多伦城东二十里的善丹河沿岸驻扎。

多伦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庙宇，后来才在庙南二里的

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故多伦又称为喇嘛庙。刘桂堂与我有天山作战（被我毙伤一千余人）及收编并得泉的仇恨，对于张海鹏部王永清旅也严加戒备，把多伦街封锁起来，使我和王永清两部，都不能向商务会征要给养。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一万多队伍，但喇嘛的粮食有限，仅能勉强养活王永清一旅骑兵，我在白沙黄草的善丹河边，必须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粮食。好在由林西开拔时多准备了半个多月的米面，所以初来到多伦的十几天内没有断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我当胡匪时就跟他磕头结拜，热河沦陷时他在开鲁和我见过一面，到了多伦我们便联合起来对付刘桂堂。这时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本浪人仓林，也跟我从林西跑到多伦，他和我部的浅田顾问，看见我的官兵给养困难，恐怕发生变化，遂把此种情况，报告了承德的特务机关松室孝良。松室于五月二十六日由承德飞到多伦，想调和我与刘桂堂之间的矛盾，用电话把我从善丹河叫往庙仓，想使我俩言归于好，套在一根缰绳上供他驱使。

松室孝良在庙仓南的天然飞机场下了飞机，住在东仓的一个大喇嘛的院子里，叫我和刘桂堂在那里见面。他说：“你们再不要敌对了，我来给你们调解。”我说：“刘桂堂反复无常，毫不讲信义，他要在这里当场打死我，我的队伍岂不是垮了。”正说话之间，听见外边报告刘桂堂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带着我的随从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刘桂堂进门以前，先跑进四个卫士，各扛着一挺机关枪，枪口朝着正房放倒，爬下作预备射击的姿势，然后他才跟着一个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里边。松室打发人叫我过去，我没有

答应，以后刘的副官过来请我，见我和我的副官都打着手枪，一看我有准备，扭头便走。不大一会外边的人跑进来说，王永清的人将重机枪架在四周，刘便匆匆辞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庙仓。他从正房出来，我爬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个短粗的胖子，脸上长满发黑的横肉，怪不得人们叫他刘黑七。松室把刘桂堂送走，回来对我说：“真不是东西，我太冒失了。”并说：“你的困难我完全知道，我给关东军去电报，要求给你解决。”当天，他飞回承德。

我在林西投敌以后，队伍由崔兴武时的不到两千人，很快就发展成八千多人，田中玖叫我把汉族官兵六千五百人编为两个支队，蒙古官兵一千七百人编为一个支队。从林西往多伦开拔时，日寇不仅没有补充械弹和关发饷项，并且把那个蒙古人组成的支队，留在林西和经棚驻防。田中玖对我说，是怕到多伦把队伍输光，留下这一千七百蒙古人做为我的另一笔赌注，所以叫我兼任伪“经、林留守司令”。

我知道天下没有便宜的事情，当汉奸也得有一定的表现，才能逐步得到主子的信任。日本军阀的武器和金钱并不随便给人，对他们有利可图才肯破费。那时我既然披上贼皮，总得摸捞到一些实惠。

松室孝良走后，因为再过两天便是端午节，王永清留下我跟他在一起过节。他又拿出二百块银币，向喇嘛买了一些大米和牛羊。我打发随从副官把大米牛羊送给我驻善丹的队伍，并叫刘继广和尹宝山于过节期间要更加戒备。就在端午节这天拂晓，刘桂堂派出二千多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营垒，结果被我军打得狼狈而退。我在仓上瞭得清清楚楚，丢盔擐甲的回来一千多人，被打死三百多人，伤兵约有五百多人，

抬到中午才停止。这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永清恐怕刘桂堂反正夺取庙仓，决定把东仓腾出，让我部当天到里边驻扎，他和我的日本顾问，也同意两部份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后，好联合从多伦街上驱逐刘桂堂。我部便完全进驻到庙仓，刘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枪，到天黑以后才停止射击。

五月二十九日，刘桂堂派他的副军长夏子明跟我见面。夏还带着一个姓黄的参谋长，他们说此次事件是刘桂堂部一个在天山县被我打伤的师长，瞒过刘袭击的，希望我不要误会。夏子明曾与我磕头为结拜兄弟，所以我对他们说：“刘黑七打我，你这个把兄弟也不给捎个信，并且是你这位参谋长运筹帷幄给定的计。”弄得他们两个面红耳赤，只说：“我们那里知道。”我说：“我这次进多伦，是你们昨天拂晓去善丹河把我请来的。”夏子明看见我的态度很强硬，向我说：“你容许我们五天时间，等我们把开拔准备完成，将多伦街腾清后让给你。”我说：“只要你们讲信用，一礼拜以后也行，咱们不服气离开多伦打，不要在街上祸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多伦商务会派来代表欢迎我们进街，说是刘桂堂的人已经连夜向张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回电叫我完全占领多伦，让王永清当天开回热河。听说刘桂堂从那天开始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于五月三十日，留尹宝山支队驻守寺庙的东西两仓，带刘继广支队进街，将司令部设在街内，委热河阜新的一个老秀才蒋正清为伪多伦县长。不久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到

多伦，还带过来五百多蒙古骑兵，他说汤部在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从赤峰退过去的孙殿英解决了大半，孙已领着人进驻到关里沙城一带，汤带着残部困居在独石口外，已到了日暮穷途的境地，所以他来投我。乌古廷（原名乌臻泰，字遐庭，投日后，改为乌古廷）是喀喇沁右旗的蒙古贵族，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因乌出身于军事学校，又是我的磕头兄弟，以为他可以作我的左右手，于是把他打发到林西，代理我的伪“经林留守司令”，去整训胡宝山的第三支队，我恐怕胡宝山在那里给我生事惹祸。不料这乌古廷竟想拆我的台，叫他四弟乌臻瑞，向第三支队的官兵宣传，说我是朝阳七区的汉人，是一个“假蒙古”，这个部队应当由“真蒙古”带领。胡宝山和团长达理扎布（敖汉旗人）等把这话告了我，我这时正忙于营救松室孝良，并且我是依靠汉人捧我，蒙古的小头子们既然排挤我，他们有真本事，就交给他们带领好了，所以对此事没有注意。

松室孝良在调解刘桂堂和我的矛盾失败后，第二次又来多伦，听说给我带来六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军饷，不料飞机在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后被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将他和飞机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飞机失事是我把乌古廷派到林西以后发生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即派连长张国治带了四十多个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带寻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张连长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松室。我企图以此向日本人献媚。后来伪热河省长张海鹏比我许的愿大，用大量金钱将此部胡匪收编，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囑顾问浅田向他说，我也曾派人前去营救，从此松室对我的印象更好，开始给我发军饷。不过没有

给我补充武器，只是派来一个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二十多个日本人，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没有配备炮。吉鸿昌率部由张家口北进时，我就是凭这点力量，认贼做父，在多伦对抗“抗日同盟军”。

（二）和“抗日同盟军”作战经过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冯、蒋火拼，收渔人之利，除了派飞机在长城内外侦察“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并没有派出正规部队向察北六县发动进攻。在六月中旬张家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多伦西南各县，只由张砺生指挥的曹凯和白风山等部民团驻守，所以多伦到张北之间，可以说阻力不大。

我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素无来往，但我刘继广支队的团长陈景春（名陈生，字景春）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军队，并和“抗日同盟军”姚景川（字云章）是亲戚，所以他们派姚景川来找陈景春，企图瓦解我的部队。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他的财产都在沦陷区，不敢跟上姚景川轻举妄动。当“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以前，我曾和参谋长陈宝泉瞒过日本人，召集两个支队长和团长们秘密开会，我说：“谁是真投敌？谁是真抗日？只有盖棺才能论定。我们已跟日本人拉上线，现在八字没见一撇，绝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参谋长陈宝泉暗中和何清明有联系，一贯主张所谓“曲线救国”，所以同意我的

主张。

我叫尹宝山支队防守庙仓，在西边西仓的小孤山上构筑工事，让日本人“特设队”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放在上面，以保护小孤山下的飞机场。我带着刘继广支队防守街市，并控制南边的沙岗地带，把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做为机动部队。日本人听说“抗日同盟军”号称两万之众，前来夺取多伦，浅田等都吓得失去了主张，完全听我调度。七月初旬，日寇由飞机给我运来子弹六万发。“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时，大约来了一万多人，七月七日夜发动攻击时，我一听没有炮声，机关枪声也很疏落，更有了坚守的把握。多伦虽无城墙，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据守，庙仓本身就是堡垒，没有大炮很难打开，街和庙中间以及其周围是开阔地带，“抗日同盟军”很不容易隐蔽。初攻击时，来势相当猛烈，争夺街南的沙岗，打伤了我的团长郭焕章。但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又由于他们的攻打不能协同一致，虽然进入南和街的周围，未能集中力量进街或者占庙。

多伦被围以后，日本飞机在八日白天来过一次，来时正值“抗日同盟军”的五百多骑兵企图夺取庙仓两边的那个小孤山，飞机扔了四颗炸弹，把这部分骑兵和步兵赶跑，除了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在召庙和街市中间以及飞机场周围，用机关枪向“抗日同盟军”扫射外，我的兵都没打枪。日本飞机降落时，被“抗日同盟军”的步枪子弹射入油槽，把接济我的六万发子弹和一些慰问品卸下，修理了半个钟头，才起飞回到承德。这次以后，因大雨连续四五昼夜不停，日本顾问浅田急的老打电报，但飞机找不见多伦的目标，无法接济。“抗日同盟军”因后方运不上给养，加之连攻数夜没有奏

数，士气逐渐低落，尽找地方避雨，战争遂成了胶着状态。我在坚守多伦期间，日夜不眠，我知道我个人的命运全看能否守住多伦来决定，所以老到最吃紧地方亲自指挥。因此“抗日同盟军”虽然把多伦装在口袋里，造成三面包围，但无法往里渗透。由于这时全国都注视“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冯玉祥一听攻不进去，便叫姚景川出面跟我谈判，想让我把多伦腾出。我的团长陈景春大概是七月十日那天到司令部来见我，他说：“姚景川前几天跑来拉我，我没有理他，因为怕你多心，也未向你报告，今天他到了我的团部，想跟你直接谈判，可否让他和你见面。”我说：“咱们在多伦如同闷在鼓里，不知道国内外形势，可以让他来跟我谈谈，以便了解一些外边情况。”

姚景川劝我弃暗投明，我说：“咱们日久见人心，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他又说苏联已经决定援助冯玉祥一百万枝步枪，不久即可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给运来。我心里说：“这是给冯玉祥，冯到手以后不一定就给我李守信。”后来他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全国各方面的爱国人士拥护，如果连多伦也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振奋人心，这就是你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以后必然重用你。”他并说：“咱们是热河同乡，我知道你两头为难，说实在的话，同盟军已经没力量打开多伦，冯先生派我来，是想向你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能力，你不成问题会和我们合作在一起，冯先生要是没有办法，我负责把多伦归还给你。”我因为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满对得起日本人的六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我不能把这条路线切断，现在正到了两面都能讨好的时候。

于是我问姚景川：“你们打算借多长时间？”他说：“借两三个月。”我说：“两三个月时间过长，一个月我能应付日本人，到期你们没有办法，那我就要进行反攻，咱们一言为定，都要对得起朋友。”我叫姚景川转告给“抗日同盟军”，在最近一两天以内：要虚张声势地猛烈攻击，等我把日本人吓唬住，退却命令出于他们口中，我再通知“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的日期和时间。

我的兵都是胡匪和民团出身，他们都暗藏着不少的“保命子弹”，轻易不肯外露。八日飞机走后给每人发了十几粒，到九日白天都背着空子弹袋子，日本人看见着了慌。仓林曾悄悄问过我：“子弹没了该如何办？”我说：“没子弹拚刺刀。”因而他们用十万火急的电报，向承德特务机关要求接济，可是大雨滂沱，飞机不能来。我即去找浅田顾问，我说：“关东军给我的二十万发子弹，已在天山和善丹河两次打刘桂堂消耗殆尽，飞机运六万发，每兵平均发了不到十粒，八日夜晩和九日夜晩，已经打的差不多了，我已剩下赤手空拳，你得给我想办法。”日本人一样怕死，浅田便把此种情况又用急电报告到承德，并且为了急于逃跑，把战况描绘的特别猛烈。松室孝良怕把我这六千多经得起“考验”的伪军，被“抗日同盟军”拉走或者吃掉，三十多个日本人跟着丧命，从热河再派出伪军，远水救不了近渴，在十一日夜晩决定叫我们向锥子山（即围场县）撤退。十二日拂晓，“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

因为事前双方约好，我出多伦的时候，还表演了一番突围战斗，“抗日同盟军”亦派人追击了十几里。我便在善丹河停了下来，做出掩护退却的各种姿态，其实我八九天没有

得到休息，在善丹河的公积淖尔附近睡了大觉。多伦距锥子山二百八十里，走了六天，日本人认为我退的井然有序。七月二十日左右，松室孝良派汽车把我由锥子山接到承德，派日本医生把我的痢疾治好，共耽误了七天，临走给我补充了二十万发子弹，五百支步枪和九万元军饷，叫我赶快回去反攻多伦。我因往来承德又磨蹭了四天，距离八月十一日的限期还有十天，承德的电报直催我开拔，我以准备没有齐全推诿。到了八月四五日，看了看推不过去。便把队伍从锥子山开出，当天走了七十里停下。日本人发现我迟疑不前，第二天便派来两架飞机在我的队伍周围扔开炸弹，我知道这是对我提出警告，只好加快行军速度，于八日到达距离多伦七十里的峪道口。浅田顾问叫我在九日拂晓攻城，我说对敌情还没有侦察明白，在峪道口住了一天，十日傍晚才到了善丹河沿岸。

这时蒋介石调派军队在平绥路东段加紧威胁“抗日同盟军”，并令宋哲元回察哈尔劝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多伦街、庙两处只有张凌云的两千多步兵和几百察北民团防守。十日夜晚，张凌云派出代表三人到公积淖尔见我，痛哭流涕地请我不要夺回多伦。我说：“我不前进，日本人给我扔炸弹，现在你们借用多伦的一个月的期限已到，冯先生并没有办法，回去告诉张旅长，我明天上午十二点钟非进多伦街不可，今晚明晨你们很可以胜清，我保证不追击。”我对三个代表各送了一匹马，把他们打发回多伦。第二天，张凌云未曾开走，反而派出骑兵向我军警戒，我决定采用“跟上敌人马尾巴进城”的胡匪战术，把队伍兜成一个大圈，一齐上马，由善丹河向多伦直冲，使“抗日同盟军”无法招架。尹宝山不

同意我的办法，按兵不动，我带着刘继广的那个支队，跟在“抗日同盟军”的骑兵后边一拥而冲进多伦街上，因为张凌云的步兵看见自己的骑兵退下，不能开枪射击，等到把自己的骑兵让过，我的兵便跟了上来，以致步兵都措手不及，纷纷退出多伦向南奔跑。尹宝山掌握不住部队，他的所部也朝街上冲过，被我指给去占领庙仓，那里有二三百民团，见尹支队上去，均落荒而走。日本人对这套胡匪战术，感到非常惊奇，其实我离多伦以前就把几个做小买卖的，收买成我的义务谍报，他们早跑来告给我张凌云进入多伦以后的各种情况。

我进了大街，看见刘继广堵住一个商号的大门洞，墙上爬满了我们的兵，刘说：“这是张凌云的旅部，张和旅部的人全被咱们包围在里边，你看如何处理。”我说：“放走！叫他们带上武器，找苜蓿地隐藏，等到日本飞机走过后再行动。你向张凌云致意，我因避嫌疑不能和他见面，他需要什么东西，你给他准备好。”我怕日本人发觉，派人通知他们暂不要进街，说是敌人还未肃清，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便在城外架起电台告捷。不大功夫承德方面就派来一架飞机，我们把对空联络符号摆出，飞机朝南侦察了一阵，没有发现“抗日同盟军”便返回承德。等到张凌云的人退净，日本人才进了大街。张凌云走时非常狼狈，连乘马都被我的兵给牵走，刘继广给弄了些烧饼并雇了一头毛驴，将他打发回张家口。

在我让出多伦期间，内部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乌古廷听见我退到锥子山，以为我完蛋了，便把我留在经棚和林西一带的第三支队，归附了伪满的“兴安军”。伪蒙疆的大小

头子们，一开始和我共事，就把我当成外派，他们离不开我而又随时想拆我的台和夺我的权。日本人和蒋介石还好对付，就是伪蒙疆的一帮人难斗，使我伤透了脑筋。

（三）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

我二次占领多伦以后，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一九三三年九月间，将我的部队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我为司令官，两个支队改称为师，由以前的支队长刘继广和尹宝山担任师长。拨来野炮八门和山炮两门，充实了丁其昌的炮兵大队。另外还成立起一个通信队和一个宪兵队。这时浅田专任多伦的特务机关长，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把他的一个朋友退役大佐下永，介绍给我担任顾问，底下的小顾问和教官，增加到二十多人，“特设队”除了那三辆装甲汽车，还添了三十多辆运输卡车。轻重机枪也不断给我补充起来，一共有二百多挺，战斗力较前增加许多。同时察哈尔镶黄旗的营长高乐明山，带五百多骑兵投我。不久胡宝山从林西乌古廷部队中，也给我策动回来七百多人，加上另外扩充的人，我的人数增加到八九千。

队伍编制就绪以后，我即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谢委。这次是由西苏尼特旗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宓浦领我飞到长春见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矾。宓浦说一口北京话，给我任翻译。小矾给我戴高帽子，誉我为“蒙古的英雄”，希望我为“民族复兴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近和松室孝良接洽，已经电告他大力支持你的部队。”我为了表示衷心拥护“满蒙政策”，就便提起乌古廷在林西带的那

一千七百多蒙古骑兵，我说：“听说兴安军收编了他们，就让乌古廷带了去吧，都是在关东军领导下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而效忠嘛。”小矾说：“多伦如果占不住，你把人打光，还得用这部分人扩充，得给你留下。”我说：“我一个人分不开两头，最好让乌古廷带领。”他说：“你的心很好，关东军自有办法。”从由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穴浦领我前去以及从小矾和我谈的话看来，日本人一方面培养我为汉奸，一方面还培养我为蒙奸，因此我以后由侵犯察北的罪魁变成“蒙疆”小朝廷的“兵马元帅”。

从一九三三年八月重占多伦，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前，国内报纸上称我为“李逆”，我心情特别苦恼。从一九三三年冬天开始到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学会吸食鸦片，娶了一个小姨太太，更加腐化堕落了。这时多伦成立起日本的“善邻协会”，由中岛万藏负责，街上开设了好几家日本料理馆（妓院兼卖小吃的商店），从承德弄来十几个日本姑娘。特务机关的人和我的那些大小顾问教官，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浅田管不了下永，把拨给我的大部份经费和一部份军饷，都挥霍在花天酒地上面。我终日陪着日本鬼子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可是我的士兵却吃不上洋面大米，除了两套单棉军服外连衬衣都没有，兵血全叫他们喝了，但我不敢过问，虽松室孝良曾几次问过我有无困难，我只能说是一切很好。我的参谋长陈宝泉思想搞不通很苦闷，有一次在郊外打雁，心不在焉地将猎枪装火药过多，猎枪炸掉左手上三个手指。

我和德王携手以前，也有不少小的政治活动，曾在一九三四年春天，到承德给张海鹏拜过寿。张海鹏因为我在一九二

二年到库伦旗清剿“蒙匪”时给他递过门生帖子，他的旅长王永清和傅景峰又都跟我结拜，张想把我拉到伪满，所以对李树声（李是崔兴武的驻省办事处长，也兼任我的驻承德的办事处长）按我的代表来看待，对李曾不只一次表示过这种意图。我去承德给他拜寿时，张的大儿子张子明任旅长，称我为“世兄”。宴会时把松室孝良和我都让到主席的正面。过完寿我去辞行，张又留下我吃饭，他说：“多伦占不住，回热河来，我老了，把兵交给你和子明，你们弟兄两个好好地干。”我这时的队伍，比张海鹏的四五个旅还要人强马壮，争名夺利的资本怎能轻易让人。

因为我把多伦占住，日寇为了统治察哈尔的十二旗群，为下一步占领绥东做借口，早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关东军便派金永昌和于兰泽两个蒙古留日学生，由长春来多伦酝酿成立伪“察哈尔盟”。他们来到多伦，住在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先编造了一本察哈尔人物调查资料，呈给关东军司令部审核，据说只有饑黄旗总管卓世海（即卓都巴扎布）够上担任伪盟长的资格。卓世海这时参加了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并且在张家口有好多财产，不敢回来担任此一伪职，别的人也都不敢出头，所以后来决定让我兼任这个傀儡盟长。我对蒙古事不感兴趣，要抓枪杆子，坚不担任，临时遂由多伦特务机关在金永昌和于兰泽这两个蒙奸协助下，代行了伪盟公署的职权，向察北各旗群征发皮毛牲畜和粮食，并选拔四十多个少年儿童，编为一队童子军，附属在我的伪军里边，由日本教官实施军国民的奴化教育和训练。金永昌和于兰泽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天，伪“察哈尔盟”正式成立以前，都断断续续地住在多伦，除

了做其他特务工作外，专门进行这件分裂活动。

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陶克陶和韩风林跟关东军拉的关系，迟至一九三四年冬天，我才发现这一秘密。有一天多伦机场上降落下一架从百灵庙来的日本飞机，上边坐着两个蒙古人和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和一个蒙古人住到特务机关，另一个蒙古人叫陶克陶到我这里找金永昌，经过介绍他们都是关东军司令部“嘱托”（特务），因为金住在我的司令部，陶也一同住下。陶克陶对我说，他们是到百灵庙去见德王，因为德王回了苏尼特旗，关东军不叫他们到苏尼特旗去，并且那个印度人急于回国，所以路过多伦休息一夜。据我现在判断，那时德王还不敢公开和日寇勾结，他的身边有蒋介石给派过去的特务，如蒙政会的保安处长兼保安大队长韩风林，就是给关东军和蒋介石都做特务工作。在多伦停下，利用两地特务机关的电台，和德王联络。

陶克陶因为没有见上德王，感到非常扫兴，不过一谈起蒙古问题，却洋洋得意起来，表示他比金永昌和于兰泽在关东军方面还要吃得开，想叫我买他的账，他好右手抓德王，左手抓我。我向他表示：“我是一个蒙古人，对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愿意自报奋勇。”并且恭维他：“你必定有更大的贡献。”他说：“那自然啦。”我问他：“蒙古民族真能复兴吗？”他问我：“你看怎样？”我说：“现在我对满蒙政策怀疑，究竟是满洲复兴蒙古，还是蒙古复兴满洲，我没有见过德王，如果见到他以后，请他好好想一想。”我知道陶克陶和金永昌都是关东军的大特务，便拿满洲来指日本，因为这是我对蒙古问题的一贯看法，不过很后悔对他们两个人说出，于是扯起为什么把伪“蒙古自治军”改编为伪满“兴

安军”以及乌古廷把我的人编归伪满“兴安军”的闲话。可是陶克陶经我一问，却吐露出他的一部份真实思想，他说：“你们如果对关东军有所怀疑，咱们还有外蒙这一条路，我要是再见了德王，就以此向他打气。”这时金永昌正躺在炕上抽鸦片，猛然坐起来说：“陶克陶你说这话叫关东军听见，有没有危险。”陶克陶脸色大变，和金永昌说：“我跟子忠（我的字）随便闲扯，现在关东军毫无疑问支持我们，万一关东军不理我们以后，就得走这条路。”陶克陶因为失言，没再对我和金永昌谈其它事情，假装乘坐飞机疲劳，就蒙头睡了觉。我也躺下闭住眼睛思想心事，只金永昌抽足鸦片才睡。第二天上午，陶克陶便带着那个印度人和另一个蒙古人回了长春。后来金永昌把陶克陶的话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经我向田中玖代陶克陶解释，才没有深究。

我和陶克陶与金永昌，在这天晚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根据乌古廷把我的队伍带到伪满，德王在百灵庙走着两条路线，陶克陶还有投奔外蒙的意图以及金永昌警告陶克陶等等，使我越发认识到内蒙的这些王公、贵族和接受了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很滑头滑脑，在政治上乱拉关系，并且互相排斥猜忌，所以从此以后，我对他们更加提防，尽量避免卷入。那时在关东军卵翼底下，已经清楚地看出有三个蒙古组织，一是百灵庙的蒙政会，一是伪满的兴安军，另一个便是我的伪察东警备军。伪兴安军和我有矛盾，蒙政会也会错打我的主意，我决定了以后要紧靠关东军，牢牢抓住自己的队伍，少和人谈论政治，少与蒙古的上层接触。不久，金永昌告给我韩风林在北平遇害，更使我感到脚踏两隻船的危险和骑墙派的可怕。关于韩风林的死，据我以后了解，蒋介石

石曾于一九三四年责问德王勾结日本，德王可能把一切都推在韩风林身上，所以韩风林回北平探家时，由军统特务刘建华（曾任伪厚和市警察局长，因和马汉三联络暴露，从呼和浩特跑到准噶尔旗，担任了马占山部慕新亚骑五师的副师长），半夜叫门架走，据说按军统叛徒制裁杀害。这话是伪“蒙古军”成立以后我的师长韩风楼对我说的（韩风楼是韩风林的哥哥）。

德王在百灵庙外受傅作义的威胁，内部分成东西两派，还有白海风和朱实夫等，主张抗日派，使他感到自己孤单和蒙政会的环境复杂，早就想到了我的这部分武装力量，但没有关系深厚的人给他联络。继韩风林给他担任保安队长的宝贵廷，拉扯起来算是我的一个内弟。他听到德王老念叨我，便说：“李守信是我的姐夫。”德王遂派他为代表，来和我联络。宝贵廷原从土默特右旗出来先给我当文书上士，当时我是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二团赵国增部的营长，我把他介绍到团部，赵国增又将他保送至“东北讲武堂”深造，和乌古廷同期同学。毕业后回到热河，汤玉麟正利用蒙古人，所以他们连一天兵都没有带过，便成了陆军少校，担任参谋和副官一类的角色。热河沦陷和汤玉麟失败后，宝贵廷跑到北平住闲，生活没有办法，听见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便跑到百灵庙投效德王。韩风林死后，他因代理队长爬在德王身边。

宝贵廷在韩风林死后疑神疑鬼，没敢从百灵庙经草地前来多伦，而是由归绥，经平绥路和北宁路，进入伪满境内，由通辽绕到林西，先住到乌古廷那里。他从百灵庙出发以前，德王通过日本人，给我寄到多伦特务机关一封介绍宝贵廷的信。这时多伦的特务机关长由浅田换成了浅海，有一天浅海

突然问我：“宝音德力格尔是谁？”我忘了宝贵廷的蒙古名字，我说：“认不得。”浅海便没有叫我看德王的来信，也没有再说什么，使我非常纳闷。半个月以后，乌古廷从林西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宝音德力格尔已经到了我这里，他要到你那里去。”我问：“谁叫宝音德力格尔？”他说：“就是宝贵廷。”我又问他：“宝见我干啥？”乌说：“他给德王当代表，可否我代表你跟他接谈，叫他不要去多伦，恐怕引起日本人误会。”这时乌古廷在伪满“兴安军”里，因为一半人被胡宝山拉走，伪满对他已不重视，呆在林西并不得意，很想巴结德王。我一听乌古廷的口气，知道他有自己的打算，便对他说：“此事日本人早就知道了，我得请示特务机关。”我到特务机关向浅海说：“宝音德力格尔汉名宝贵廷，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德王的代表，已由百灵庙来到林西，是不是让他到多伦来。”浅海说：“叫他来吧！”我给乌古廷又去电话，说是：“特务机关叫他来多伦。”乌古廷雇了四个兵把宝贵廷保护到多伦。

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都不把我当蒙古人来看待，连宝贵廷也认为我是老粗，不懂政治。他走进德王的门墙，很看不起我这个姐夫，所以对于德王的内幕跟我只字不提。我问他：“你为什么绕道而来？”他说：“直接走路上有危险。”我又问他：“德王为什么要联络我？”他说：“德王力量单薄，恐怕傅作义打他，希望你联合起来，复兴咱们的民族。”后来我刺探他：“德王是否已经和关东军勾结？为什么把信寄到多伦特务机关？是德王自己想联络我？还是关东军叫德王这么办？”宝贵廷说不知道。我一看这个小政客の鬼崇样子，便不再跟他深谈，只对他表示：“你回去告

给德王，我很佩服他，至于两人今后如何合作，我得听关东军的命令。”我因处处小心，说完话即领上宝贵廷去见浅海机关长，浅海要留我们吃饭，我托故回了司令部，他被留在特务机关，深夜才回我家中休息。不知他耍了些什么手段，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第二天即由于兰泽领上飞往长春，后来飞回苏尼特，从那里回了百灵庙。

德王到了这年冬天，才在多伦飞机场上和我初次见面。因为这时百灵庙蒙政会快要分裂，由于德王以云王名义免去西公旗石王的扎萨克职，引起绥远乌伊两盟王公的反对，傅作义策划成立察绥两个蒙政会，于是德王的反心日益暴露。他是到长春见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回苏尼特路过多伦降落，停飞机半小时，匆匆和我会谈。我虽然不愿当汉奸的崽子，但是和德王还没有共过事，心里以为他是个不平凡的王公，所以带着参谋长和两个师长，并令副参谋长刘正中率领着二百兵组成仪仗队，到飞机场表示隆重欢迎。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海，“善邻协会”会长中岛和我的顾问下永，以及来到多伦的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兴浦，也到了机场。德王乘坐一架四引擎飞机，里边除了司机还有五个带校级肩章的日本人，他拖着长辫子，在军号中走下飞机和日本人握手寒暄后，跟我开始了简短的谈话，因为我的顾问下永跟在我身后四五步地方偷听，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

他首先问我“你的军队有多少人？”我不愿告给他真实数目，只对他说“有五六千人，没有好武器。”他又问我“有多少蒙古人？”我说：“留在林西有一千七，带到多伦是少数，并且不是草地的蒙古人。”他希望我给他成立一团蒙古骑兵，做为他的警卫和建军的基干，他要派一个国民党军校

毕业的蒙古学生前来训练这个部队。并且叫我越快越好，他等着急用，因为百灵庙没多少兵，怕傅作义前去袭击。他还问我“百灵庙吃紧时，你从多伦支援几天可到？”我说：“急行军三天可到。”他喜形于色地说：“这可好了，我有了底了。”又说：“关东军给我拨下五十万交通票，我已汇到天津。”我说：“我不需要钱，你还有什么事？”他说：“见到你以后，我放了心，我们今后要加强联络，这里有电台，我那里也有电台。”我说：“电台是日本人的，咱们要直接联络。”他说：“对的很，只是如何联络？”我说：“你用‘传箭’（蒙古王公有了紧急事，拿上令箭和公文叫牧民日夜传送），我用快骑。”因为飞机上的日本人催着叫他赶快走，我们的初次会见，就如此结束。

德王飞走以后，我和日本人一齐回到特务机关，浅海问我德王和我谈了一些什么话，我把前半段告给他，至于我和德王直接联络的事，当然不对他说。这天多伦特务机关为我和德王会见举行了宴会，日本人都因我和德王联合在一起而祝酒。可见德王路过多伦会我是关东军的指示，我对此很感不安，恐怕在中间插进一个蒙古上司。

我答应给德王成立一团骑士，舍不得贴本，耍了一个手段，再让胡宝山从乌古廷那里往出拉兵，于是从林西跑来枪马齐全的六百多人，给德王凑了一个警卫团。乌古廷因部队跑的所剩无几，最后被伪满的“兴安军”踢出，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不得不离开林西到嘉卜寺投靠德王。德王派南京军校毕业的喀喇沁左旗人乌云飞，悄悄地从百灵庙来到多伦，训练了一个时期，带往嘉卜寺，后来由蒙政会的代理保安队长宝贵廷充任了这个警卫团的团长。我给德王成立起一团

人，不但一文钱未给，而且自从见面以后，迄未按照我告给他的办法直接和我联络过。他以为我已经成了他的仆从，有事可以发号施令，根本用不着和我商量，使我很后悔。从此我对德王看成一个志大眼小的人，决定不依附他，未来的前途和出路，还得指望自己的枪杆子去打。

（四）占领察北六县经过

一九三三年八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察哈尔北部，又恢复了七月间“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以前的那种状态。一九三五年，情况有所转变，先是一月间日寇派飞机轰炸赤城、龙关。二月间中日双方在大滩开会，决定二十九军的部队撤至长城底下驻防。在张家口外，也发生了年前的“第一次张北事件”和六月间的“第二次张北事件”，结果由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和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订立了中日双方驻军以长城为界的协定。因为我的伪军还没奉令南犯，二十九军对此不曾履行，这是由于“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已把东北军于学忠部从河北逼走，想叫宋哲元暂时维持冀察两省局面，故在察北方面不好意思过于压迫二十九军。

我于一九三三年四月投敌，到一九三五年，和日本人相处了二年多，渐渐习惯了当汉奸的那种生活。后来，看到北平的何应钦向日本人屈膝，宋哲元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便产生了“老子是挂牌的娼妓，你们是半开门的婊子，咱们谁也不要笑话谁，都是些孬种”的想法。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冬天和德王在多伦机场上会了一面，拿上“复兴民族”的大幌

子，更给我的投敌做了遮羞布。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的时候，我野心大增，想把察北完全占领以后，下一步去夺张家口，幻想如同我的汉奸老师张海鹏那样，过一过伪察哈尔省长的老瘾。

察北的战事于十二月开始，在十一月间就作了准备，我看见子弹不断由承德运来，便和人们说：“快打仗了。”因为多伦特务机关和我的日本顾问，只是在出发的时候给我下达命令，事前并不跟我商量，我也不敢打听，所以只好揣测。最初我认为是进驻百灵庙，因而我给官兵们买了好多毛鞋，把多伦街上的毛鞋完全买光。由于日本顾问掌握着经费，我是卖了自己从热河带出的十几辆马车和一百多头骆驼的钱给官兵买的毛鞋。还有三百多兵出发以后因无毛鞋而把腿冻肿，都由前方抬回多伦，被特务机关长浅海看见。浅海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派田中隆吉参谋前来查办。经过调查，下永贪污了好几十万，进入张北以前即把他撤换，以后经费由我掌握，到了张北我开始有了钱。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有警察和民团维持秩序。十二月中旬某日，多伦特务机关向我发布了南犯的命令，宝昌因为没有防守的价值，我们未到以前，当地警察民团即弃城逃走。根据便衣侦察，沽源城内有白风山所带的三四百民团据守，我为了夸功，谎报日本人说是二十九军的一旅骑兵。独石口外最大的商镇平定堡，内有天主教堂，察北的地主富户都逃到那里，上边飘扬着比利时国旗，日本人怕引起国际纠纷，禁止我们打动该地，所以决定只攻沽源县城。由宝昌出发时，下永顾问除了把八门野炮留下，保护二十多个日本人和四十多个蒙古童子

军，并且叫我也不要上前线，指定参谋长陈宝泉，指挥刘继广和尹宝山带着两门山炮，掩护骑兵去攻城。我撤过下永顾问，和参谋长、师长及副参谋长刘正中说：“下永支配我，小顾问支配你们，你们要听他们，有时也不要听他们，攻城时先用山炮打开豁口，骑兵再往里冲，把敌人轰跑以后，即不要追击。”参谋长陈宝泉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愁苦，我怕他们路上寒冷，给了他们一打子威士忌酒，陈宝泉当时拿过一瓶就喝了大半，我把那半瓶酒抢过，他才勉强上了马，去追赶队伍。

防守沽源的白风山，在察北与曹凯齐名，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很热爱祖国，他把三门紧闭，将沙袋堆在土城墙上固守。沽源离宝昌九十里路，我的六千多骑兵，当天就到达城外，里边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惧。我军于第二天拂晓发动攻击，陈宝泉没按我的指示指挥队伍，而是将沽源四面包围，两门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里的县政府乱打，结果把所带的七十发炮弹打的剩下两发，也没有将城攻开。刘继广的兵在城墙底下喊话，叫里边缴枪投降，白风山的人当然不听这一套，我的兵一露头就被打。从多伦派来两架飞机助战，白的人亦不动摇。飞机在城内扔完炸弹，在城北扔下一个通信筒，松井顾问派兵把通信筒拣起，坐上卧车开到北门外边，到刘继广的指挥所进行研究，陈宝泉本来在西门外掌握部队，见有人拣起通信筒开上汽车到达北门外，他也骑着马跑到刘继广那里。刘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北门有一箭之地，刘站在房檐底下，陈和松井竟在汽车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风山防守北门的民团发现，朝着他们放了一排枪，子弹从陈宝泉的脑部穿过将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刘继广用

火力压制住北门，才和松井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后半晌运回宝昌。

我一见参谋长阵亡，当时就发了毛，将八门野炮全装上汽车，下永顾问没敢阻拦，两个钟头就开到沽源城外。因为天已昏黑，我叫把八门野炮摆在城北，决定翌日拂晓攻城，下令不许放走一个民团。夜里又想，不能在沽源充好汉，还是少杀中国人为妙，因此又叫刘继广放开东门，好让白凤山撤走，能把沽源占领，就算交代了日本人的公事。第二天攻击时，八门野炮集中只打一点，各发了两炮，就将北城墙轰开，隙见白凤山的骑兵从东门跑出，才叫我的兵冲入。他们捉住十几个没有跑脱的民团，主张都弄到宝昌给参谋长祭灵，我不忍完全杀害，又怕日本人知道我故意放脱白凤山，只把一个俘虏弄到宝昌，被二十多个日本人在陈宝泉的灵棚前用刺刀活活戳死。我占领沽源以后，康保、尚义和商都，都没有遇到抵抗，尹宝山部就开入。尹宝山并把一团人开进绥东陶林县城。

陶林是绥远主席傅作义的地盘，因为兵力不够分配，集中队伍去防守集宁，才临时把陶林放弃。我不愿意两面作战，腹背受敌，认为占领察北是履行秦德纯和土肥原的协定，占领绥东五县还找不到借口。宋哲元已经和日本人勾搭，他弃守察北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傅作义抗日，我进犯绥东一定要惹麻烦。我通知尹宝山，叫他千万不要继续前进，建议下永顾问要趁势占领张北。大概是关东军叫我们看一看能否在绥东立足，让我和下永由沽源飞陶林视察。我们上午飞到陶林，午饭后，我趁出去解手时向那进入陶林的团长使了一个眼色，在厕所中和他说：“傅军一来，你就往出撤。”我

们回去和下永没有抽完一支烟，突然又来了一架飞机，叫我们两人赶快坐上，说到多伦有要紧事情研究。回到多伦特务机关，里边坐着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他问我：“李司令官！你对战局有何看法？关东军相信你，并且特别尊重你的意见。”我说：“现在先要占领张北，把察北攻下再图绥东。”他说：“这很对，我们也是这样打算。”当天浅海叫我把队伍都抽回来去占领张北。

我占领张北的时候，没有遭到二十九军的抵抗，他们事先就撤回张家口，连张北和张家口中间的大坝上，也没有布置队伍，所以我的骑兵一直冲到大境门外。我进张北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白天，第二天是一九三六年的元旦。田中玖是元月初旬到的张北。

张北距张家口一百二十里，中间有一道大坝，从张北往南走五十里上了梁顶，再往南七十里全是下坡。我在这个梁顶布置了一团人，警戒张家口的二十九军，并派便衣侦察其他情况。因为田中玖是我最初接触的日本人，我看成知己朋友。所以用不着等我要求，他便向关东军司令部替我说了好话。占领张北没有多久，便对我的部队真给装备起来，一次拨来一万二千枝“韩林春”式步枪，三十多门野炮，三十多门重迫击炮，三十多挺重机关枪，一百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日造的“拐把子轻机枪”四五十挺。

当这批武器在二月间由沈阳运来以前，田中玖曾开上自己的卧车去了大坝梁顶上好几次，他把汽车停下，张家口也开出一辆小卧车，我的兵以为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的，不敢制止，不敢盘问，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我接到类似这样的几次报告，感到里边有重大秘密，便托在张家

口经商的一个朋友王子玉替我了解从张家口开出的汽车里边坐着谁。原来，王开设着一个“东鲁汽车公司”，往来通辽和林西搞运输。我占领多伦后，“东鲁”的汽车也跟到那里，我占领张北后，又在张北和张家口之间开行。王是山东人，二十九军里有他的熟朋友。调查结果，知道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的秘书杜运宇和田中玖会谈，其他情况没有打听出来。杜也是山东人，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个日本老婆，由于他很早就当了汉奸，所以张家口沦陷时曾代理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他一直担任司法部长。

由于刘汝明和日寇暗中勾结，关东军拨给我的武器，不是由沈阳经承德用汽车运来张北，而是用火车运到张家口，我派日本人驾驶的汽车接运。“七七事变”以前的弹药服装，都是如此的运法。所以给我拨的一万二千枝步枪被刘汝明留下两千枝，运到张北的三十门野炮，也给刘汝明运回张家口八门。这时我的八千多人，一律都换上新枪，子弹堆满仓库，大概拨来两千万发。我叫尹宝山师驻在商都向绥东警戒，刘继广师布置在外围，保护张北县城。“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各重要城市都有了日本特务机关，张家口是由领事馆代替特务机关，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是羽山少佐，张家口的领事和归绥的羽山，均受张北的田中玖指挥。田中玖有时对我也吐露一些真情实况，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就叫我准备进犯绥东。他说：“德王已被溥作义从绥远撵出，对于察哈尔长城以南的地方，咱们暂不打动，但是对于绥东则必须占领，这样你们复兴蒙古就有了地盘。日本军队还不能出面参加，需要德王和你以及王英与冀东方面共同出兵，他

们都没力量，进攻绥东以你为主力，关东军所以装备你就是为此，你要做出贡献。”

田中玖和我说了这话不久，有一天上午七八点，突然叫我跟上他和羽山少佐坐飞机到归绥上空侦察。这时傅作义以建筑环城马路为名，在归绥旧城构筑了国防工事，我们飞到旧城上空，飞机盘旋很低，我都能用肉眼看见碉堡，田中玖和羽山少佐均拿出照像机把底下的一切都拍入镜头。飞机飞到西河沿时，见一个女人在院子里挥动日本国旗，羽山笑着和我说：“这是我的老婆。”我们侦察完毕，往武川飞的时候，飞机发生了故障，便在归绥北面红山口以东的小尖山前面的平滩上落下。附近的老乡有好多人在耕地，谁也不敢过去观看，傅作义因为标榜着“有事不怕事”和“无事不惹事”的对日主张，亦未派出骑兵来盘查。我们都很着急，田中玖和羽山跳了下去，寻找飞机的毛病，叫我坐在机仓中不要露面。好在飞机是丢了一个螺丝，修了半个多钟头，即继续发动，飞向张北县。

（五）乌珠穆沁会议以前

我于一九三五年底进入张北后，到翌年四月二十四日“乌珠穆沁会议”决定将我的队伍改编为伪“蒙古军”前这一阶段，由于我把察北完全控制，日本人又给了那么多的武器，比在多伦多时，渐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宋哲元想拉我过去，曾托我的团长陈景春向我试探，我怕宋哲元把陈拉走，占领张北后，即由刘继广部将他拨归尹宝山指挥，调到商都南壕堑驻防。因为宁得罪远亲，不得罪近邻，听见宋

哲元在北平给他母亲过寿，我主动叫陈景春代表我前去祝寿，送了一架我亲手在围场打住的十五两重的梅花鹿茸，宋赠了我一块价值四百元的怀表。后来宋哲元说他子弹困难，我叫陈景春送到柴沟堡车站三十万发，宋以为我倾向于他，故最后托陈景春对我劝降。

陈景春对我说：“宋主席对你非常钦佩，特地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咱们和他们合作在一起抗日，故来向你报告。”陈景春比我年长，我说：“大哥！咱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二十九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陈说：“我头脑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我说：“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日本人跟前还不如我吃香，咱们要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陈景春问我：“难道咱们不抗日吗？”我说：“我叫你送给他子弹难道是他杀中国人吗？”我并说：“现在日本人正给咱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程度和适当时机，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已经联合，这完全是扯淡，他们把我按汉人看待，我也以汉人自居。”我还说：“咱们现在是带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能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住以后，再反正也不迟。有这一万枪枝人马，谁也欢迎咱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陈景春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以后便不跟我谈论此事。

继宋哲元之后，傅作义也派代表来跟我接洽。因为察北沦陷和冀察两省特殊化以后，张家口成了一个策动侵犯绥东的地方，故傅把绥远省政府的交际处长刘云峰调到张家口担任办事处处长。这个人很能钻营，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东鲁汽

车公司”的经理王子玉拉上关系。一天刘继广叫我到他的公馆中去吃饭，说是顺便谈一件要紧事情。我到了以后，看见王子玉和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也在刘继广那里。刘继广向我说：“这是子玉的朋友，绥远傅主席的代表刘云峰处长。”刘指着地上堆的成箱整篓的糕点水果对我说：“傅先生知道李司令官在察北非常艰苦，特派我来代表他向您问候。”寒暄过后谈到正题，我一听是傅作义闻听我和刘汝明弄了日本人很多武器，他因受阎锡山压制克扣，也想诓骗一些武器弹药，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故打发刘云峰来向我“问道儿”。我说：“羽山不是在归绥吗，你们可以和他直接去谈。”刘说：“羽山是少佐不如田中玖大佐在关东军说话有力量。”我说：“你想和田中玖接谈，恕我不能给当介绍人，要找其他关系拉线，谈的时候应该张大口，数目越多越好，傅主席为了爱国走这条路，我对他很表同情。”刘云峰只见过我一次，我叫王子玉在张家口买了一些回敬傅作义的礼物。

由于我刚愎自用，除了主要依靠汉人给我扛着八九千枝枪，在政治上可以说非常孤立，故只好认贼作父。德王因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两个蒙政会的组织大纲，指定绥境蒙政会设于伊盟的伊金霍洛，察境蒙政会设于锡盟的嘉卜寺。并且因傅作义支持西公旗的石王，派兵占了乌拉山里边的梅力更庙，将倾向德王的依喜达克登尔大喇嘛击毙，给他很大的难堪。他因蒙政会分裂，不能在绥远立足，曾在我占领张北不久，在苏尼特举行一次所谓“滂江会议”。因为德王本人和其左右，从我和他开始合作以后，许多大事都对我回避，老瞒着我去搞，所以这次会议既没有让我前去参加，也未告给我开会的内容。据我判断不外是更进

一步投靠日本，撕破脸充当汉奸，企图坐伪蒙的傀儡儿皇帝。为了首先对傅作义进行报复，把已策划组织的伪“察哈尔盟”变成事实，好为进犯绥东做借口。他在召开“乌珠穆沁会议”以前，突然坐汽车跑到了张北。

在一九三四年金永昌和于兰泽到多伦策划组织伪“察哈尔盟”时，卓世海未敢担任伪盟长，现在他在百灵庙已经呆不下去，张家口的统治者宋哲元和刘汝明，也和他成了一丘之貉。当我占领张北不久，卓就主动派人向我联系，说是想回家看看，试探我是否对他支持。由于我不是察哈尔人，他回来和我利害不冲突，故叫他放心回来。他于二月间到了张北，住在熟惯的商号里边，没有回镶黄旗，一直要等到德王到来。我不愿意替德王领导的这一帮蒙古人卖命，对于他们演的丑剧，只作旁观者。卓世海和我没谈别的，我也不对他打听一切，我们维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

蒋介石为了叫德王悬崖勒马，服从他的察绥分治主张，除了以救济察北和锡盟的雪灾为名，给察境蒙政会拨了八万元赈款，并派白云梯由南京来苏尼特劝止。因为伪“察哈尔盟”一旦成立，绥东五县就会发生问题。继派吴鹤龄和尼冠洲前来张北，阻止卓世海就任伪职。吴是喀喇沁人，尼是察哈尔人，白是跟着德王由苏尼特来到张北，吴和尼两人相随着由张家口来到张北，等到德王来到以后，他们两人才露了面。随德王来到张北的，除了白云梯，还有东苏尼特旗的郭王，布里亚特的迪鲁瓦喇嘛和蒙政会的包悦卿。德王住在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那里，他没有过来看我，也没叫我去看他，和他同住的还有由长春刚从飞机下来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白、包和郭王以及迪鲁瓦，都下榻到我的司令部，

白和包是内蒙的知名人士，郭王是个笃信喇嘛教的人，迪鲁瓦带领的布里亚特人那时正流浪在宝昌一带。

第二天伪“察哈尔盟”就要成立，晚上卓世海带着尼冠洲来见众人，尼的仪表和谈吐相当文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盟的成立，我才知众人这次来张北是专搞此事。尼说出此话，卓世海没有答理，郭王和迪鲁瓦因为听不懂汉话，都闭着眼睛念佛，白云梯和包悦卿亦不表示意见，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打听。客室中沉默了一阵，我叫厨房给开饭，饭后卓世海和尼冠洲辞走，金永昌从特务机关来到，我问：“尼冠洲是何许人？”金说：“他是跑到南京的察哈尔部的一个总管。”来我这里的人都各怀着心事，郭王和迪鲁瓦打座养神，包悦卿不住气的抽鸦片，我见白云梯躺在炕上无聊，便和他闲扯起从外蒙往内蒙运枪的往事，我并且很冒失地问他为什么由左向右转，他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我提起伪“蒙古自治军”的白云航，他说是他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众人叫我也去参加伪“察哈尔盟”的成立典礼。举行典礼的地方，在一个有三间土房的小院里边。这三间土房两明一暗，是特务机关叫我放的刘县长派人把住户撵走，做了未来的伪盟公署。我们走进外间，已经先到了二十多人，打开里间的门一看，德王和两个田中在说话，德王这才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不久卓世海来到，也走进去和他们嘀咕，我知趣的走出那三间土房，众人亦跟着我到院子里边散步。我发现二十多个人里边，有一个长着鹰鼻子的人，跑到墙拐角望着天上的白云沉思，我看见他的像貌长得非常阴险，由不得对他上下打量，金永昌走到我的跟前对我悄悄地说：“这就是吴鹤龄。”不久卓世海出来，叫众人进

去开会，卓站在桌子后边，我们都站在桌子前边，卓宣誓完毕，两个田中和德王都来致词，伪“察哈尔盟”就这样成立，出来时门口已挂上了牌子。

这天德王的气色很不好看，我们送他和田中隆吉到北门外飞机场，坐飞机回苏尼特时，他神经紧张地把我拉过一旁，对我说：“你给吴鹤龄弄五箱汽油，叫他赶快坐上我从苏尼特开来的汽车走，上边有十五个兵保护，越快越好。”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因为机场上的人很多。故未向德王打听，只说了一声“好吧。”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都没有走，我领上他们回司令部去吃午饭。饭还没有摆好，外边的卫士便来报告，说是有一个姓吴的人坐着一辆卡车前来，要五箱子汽油，我叫副官给搬去五箱，因为事情紧急，没有留下他和众人在一起吃饭。我们正吃饭时，西门的卫兵给副官处打来电话，问有一辆汽车要出城，允许不允许出去，副官处向我请示，我说：“不许拦阻。”原来日本的小顾问们给四门下了命令，不准随便放汽车出城，吴鹤龄因西门走不出去，改走北门，北门外是飞机场，汽车来往很多，才跟着好多汽车混出张北县城。

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以及尼冠洲，都于饭后乘商车回张家口，白云梯等都是在我司令部门口上车，尼冠洲因住在卓世海那里，是从街上上的车。我要出城送他们，白云梯等在门口拦住，都很沮丧地说：“你事忙用不着了。”他们这部汽车是包的商车，于下午一点多钟离开张北，到了三点多钟的时候，田中玖叫我和刘继广以及驻在张北的两个团长去特务机关开会。他说：“刚才开出张北的一部汽车，走在离城十八里的地方被胡匪给抢了，还打死一个蒙古人，

你们赶快派队伍去追。”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被打死的是白云梯还是尼冠洲，总是他们因为阻挠伪“察哈尔盟”成立，遭了日本人的毒手。我们从特务机关出来，刘继广和两个团长问我“追到什么程度为止？”我说：“追什么！出去绕一个圈就回来。”队伍开出去不久，我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鸦片烟，盘算今天上下午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田中玖的卧车开到，他亲自从车上扛下一捆日本的“将校呢”，气喘喘地走进我的卧室。他说：“这个给你，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做一套，这是关东军的赏赐，你收下吧。”我知道他是杀了一个蒙古人以警告其他蒙古人，又怕我带的大小汉奸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故拿上“将校呢”安慰我们。他再没提汽车被劫的事，我也装糊涂，扯了一些闲话，他抽了一支烟便辞走。

我对内蒙古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虽然越接触越感觉他们滑头，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又关心起吴鹤龄的安全。便赶快给嘉卜寺的宝贵廷打电话，我知道田中玖的表弟草野谷在德王的警卫团当顾问，我怕吴鹤龄去苏尼特走进嘉卜寺遇害，叫宝贵廷派出人拦阻汽车，让吴鹤龄直赴苏尼特。宝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你们王爷叫我传达的命令。”果不出我所料，我刚吃过晚饭，便被田中玖叫到特务机关闲扯，直扯到三更天才叫我回家。因为嘉卜寺距张北县四百多里，他怕我夜深人静给打电话，那知道我在晚饭以前就通知了宝贵廷。我为此事一夜未曾睡觉，第二天就叫胡宝山给我调查汽车被劫的真相，原来张北的特务机关由我派出一排蒙古兵守卫，据守卫的兵向胡吐露，在伪“察哈尔盟”成立的那天下午，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大杉，从他们排里挑出十个

人，都带上武器上了汽车，外边用帆布盖着开出张北南门，去追赶那辆商车，追到小孤山附近叫商车停下，大杉问：“谁姓尼？卓盟长请你回张北去。”尼冠洲下了商车走到大杉跟前，当即被大杉掏出手枪击毙，让那辆商车继续开往张家口。尼冠洲是否也像韩凤林那样脚踏两只船，我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因为伪“察哈尔盟”的成立，他是最先流了血。

大杉带着十个兵打死尼返回张北，没停留多久，便继续开出西门去追吴鹤龄。吴鹤龄的车开的很快，大杉望见吴鹤龄的车距离嘉卜寺不远，才连夜折回张北。因为时在半夜三更，宝贵廷没有重视这事，根本没打发人拦车，所以吴鹤龄的车开入嘉卜寺。草野谷接到田中玖的电话，看见吴带着十五个苏尼特兵，自己不敢下手，叫宝贵廷下手，弄得宝左右为难，直撵吴鹤龄赶快走。吴因疲劳不堪，又受了惊怕，知道在嘉卜寺相当保险，所以赖在宝贵廷的团部不走，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坐上汽车到了苏尼特。以后吴鹤龄任了伪“蒙疆政府”的政务院长，宝贵廷也升了伪“蒙古军”的师长。吴曾被人们目为伪蒙疆的宰相，但是他肚子里撑不开船，由于宝给他下过逐客令，故对宝始终怀恨在心。对我暗中搭救他也没有表示过谢意，认为我是德王的部下，应该对他进行保护。我就是在日本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和类似吴鹤龄的这一帮人共事，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乌珠穆沁会议”以后，参加了德王在嘉卜寺成立的伪“蒙古军政府”，在我的个人历史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罪恶阶段。

（刘映元整理）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

（内蒙古文史研究馆供稿）

王英一生的罪恶活动

韩祥符

笔者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曾给王英做了十年之久的军需，也是他的一个帮凶。这份材料是本着我自己的回忆及访问和王英有历史关系的伪官员们提供的一些情况写成的。

一九三六年王英在张家口和日寇勾结时，我坚决反对，终因意见不合，与王英不辞而别。“七七事变”后，我参加了国民党反动派抗日阵营。日寇投降后，我曾和他在归绥公教医院（即今呼市医院前身，原为天主教主办，原址在今内蒙古测绘局处）见过一次面。对王英当汉奸时期的材料，系听所谓“大汉义军”参谋长寇子严、旅长杨守程说的。对伪绥西联军经过，系听该部伪军法处长李心泉、警备大队长张子杰和跟随王英三十多年的老护兵张六元说的。

（一）

王英的父亲名叫王同春，别号俊川，奶名进财子，外号“瞎进财”（因为他是一只眼睛），一般称呼“老财主”，原籍为河北省邢台县东石门村人。他在家乡一贯不务正业，行凶打架，二十一岁时，被群众逐出，流亡到五原，先给大

恶霸地主薛成四揽长工，不久就当了大把头。后来竟把薛成四杀死，霸占了薛成四的土地、财产、牲畜，并大肆开荒，由此同蒙族上层人物发生过不少的流血纠纷。一九一一年，王同春在后套开辟了干渠八道，支渠百余，把整个后套荒地变为水田。东西五百里，南北一百五十里的一片肥沃土地，总面积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属于王同春私有。从此恶势更大，地方官吏、土匪无不仰其鼻息。据不完全统计，王同春每年仅收租子杂粮就达五千到六千石，连同自种土地每年收粮将近二万石左右，牛羊骡马遍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和财产等，私养家兵百余名，枪马齐全。在后套不论公私纠纷，王同春说了算，简直成了土皇帝！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聘请王同春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总参议。北洋政府还聘请王同春为水利顾问。王同春同绥远省都统如瀚渠盈、蔡成勋、马福祥和“独立队”的首脑卢占魁都是把兄弟。利用这些关系，屡年向他们买枪购弹，乘机扩充武装，并分售给其他地主、土匪，长期武装霸占河套地区。

王同春有两个老婆，共生了五男二女。大、二、四儿和大女儿，都是中年死亡，王英排行第三，王喆（别号乐愚）排行第五，二女儿王友琴，人称“二老财”。王同春于一九二六年冬，七十二岁时病死在五原县。王英在五原县新旧城中间，为其父修建祠堂一座，塑立泥像，愚弄佃户，当神供奉，竟相沿二十多年之久。

王英别号杰臣，奶名增罗子，一般称呼“三财主”，外号“三没底据”。他十八九岁时，其父托五原县天主教堂外

阔神甫，把他和他的四弟保送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王英弟兄俩在北京，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则是在妓院鬼混，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流氓、地痞，经常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全年上不了三个月课，因此，连个简单信件也不会写。后来弟兄俩染了严重的梅毒，王英经医治好了，其弟竟因此失明自杀。

王英有三个老婆，大老婆姓贾，包头人；二老婆姓赵，满籍人，生男孩一个，名叫王绍祖。三老婆杨柳青人，是包头有名妓女，名叫张筱红，又叫张秀贞。她先后将大、二老婆气死，还打死丫头王桂花（在临河），又把丫头王桂女卖给天津日租界妓院为娼。后来买了个年仅十岁的贫苦家庭女孩子，名叫小翠，给他们当奴隶，经常被毒打虐待。

（二）

一九二〇年，王英仗着父子们霸占后套的特权地位，养着家兵百余名，后套的土匪头子们，绝大部份也和王英有关系。那时候绥远都统正是马福祥，因和王同春是把兄弟，便任王英为五原县保卫团团总。王英当了团总，在后套招兵买马，不久组成三百余人，共编为三个队，由袁占鳌、李三河、杨守程分任队长，枪马齐全，所需人马薪饷、给养、衣服等项，按照地亩摊派，统由地方负担。

一九二二年秋，萨县保卫团团总侯宪章被马福祥杀害，王英的五原团总职务也被免去，但是马福祥为了拉拢王同春，又委王英为绥远省都统署参议，留住归绥，不许回五原。王英秘派任三海前往陕北石湾镇，对陕北土皇帝井岳秀的骑兵第二

营连长王安仁、段友庵等进行煽动。王、段等和王英是同乡，又是哥老会同辈，该营大部官兵是绥远人，也是哥老会的成员，只有营长是西安人，井岳秀委派的。王、段等人，听信任三海的话，将营长击毙，全营跟着任三海窜来包头河西为匪，暗地和王英联系。是年七月间，绥远哥老会龙头杨万桢（外号小乌鸦）和王英共同策动，纠合土匪刘三红等股四百余人，和王安仁等合伙约六百余名，突将包头县城包围。当时驻军系马福祥部董伯声团，还有绥远警备队玉禄，据城坚守，双方激战两昼夜。马福祥唯恐失掉包头，派王英偷偷和杨万桢、刘、王、段等匪首见面，商议和谈。马福祥意见：只要杨万桢离开部队，可任绥远省都统署参议，部队改为绥远省骑兵第二营。杨万桢害怕走侯宪章的下场，提出请外国教师从中担保。马福祥邀请萨县二十四顷地、麦达召、固阳哈教堂神甫三人从中作保，杨才答应。并介绍王英为营长，刘三红、王安仁任副营长，段、任和何华清分任连长，开往包头西中滩一带。包头之围，才告解除。王英当营长后，对这几股土匪确实难以掌握，尤其是王安仁更难应付。他为了分化王安仁，将他二姐的女儿张拉鱼嫁给了王安仁部最有实力的段友庵的弟弟段维三，他利用这种裙带关系，逐渐和段家弟兄亲密起来。不久，王英唆使段维三把王安仁打死，全营兵力统由王、段两家掌握。但是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又秘密派人来包头向段用重金煽惑，并许段为团长。那年冬季，段突然带了三百多名骑兵，脱离了王英，又回到井岳秀师编为骑兵团。刘三红等人知道了王英这种毒辣手段，害怕对他们不利，也率了六、七十人当了土匪。这时骑二营仅留二百余人，但番号还未被撤销。王英对段家弟兄怀恨在心，终于

在一九三二年秘密唆使他的特务营长史文华，带领百余人投奔了段友庵，第二年旧历年三十日晚上，段氏弟兄同全团连长以上的官佐在团部聚赌，史文华突然将段友庵击毙，又将段维三打死，段氏全团都由史文华率领，投降军阀高桂滋部。仅有段友庵叔父段宝山排长，因在外地驻防，未被解除武装，开回榆林。

一九二四年，直奉军阀混战，盘踞包头的马鸿逵，奉令率领宁夏骑、步兵各一团和王英骑兵第二营，由包头开往热河赤峰县，防止张作霖西扰察绥。到达不久，直奉停战，马鸿逵开回绥远，王英的骑二营开往北京，归郑金声整训。因该营官兵绝大部分沾染鸦片嗜好，土匪成性，不守军纪，当即被郑金声用武力收缴了枪枝，全部官兵，给资遣散，将王英介绍给新任绥远都统李鸣钟。李初到绥远，对地方情况，不甚了解，委王英为省府参议。该年冬季，惯匪苏雨生、赵有禄由陕北窜来绥远，通过王英，李鸣钟将苏、赵收编为绥远省保安骑兵第四团，委张万庆为团长，王英为副团长，苏雨生、赵有禄等分任连长，分驻在包头黄河南东大社一带训练。不久苏、赵又哗变，在绥远、察哈尔、陕北、宁夏一带流窜为匪。

苏雨生、赵有禄为匪后，王英仍回绥远省府任参议。一九二五年，冯玉祥西北军缺乏骑兵，拟在绥远扩充，准备西进宁夏、甘肃等地，李鸣钟就派王英去五原、临河收买马匹二千余匹。同年冬，冯军方振武率领部队驻守五原、临河两县，深知王英父子在后套势力大，号召力也强，组织骑兵更容易，当委王英为五原、临河保安骑兵团长，维持地方治安。不久，王英就召集起骑兵三百余名，由方振武补给大小枪百余枝，

分驻五原、临河，一时小股零星土匪也被收编，由李三河、袁占鳌、杨守程、杜子玉等人分任连长。年底王英团已发展到五百余名，枪马齐全。方振武利用地方关系，让他尽量扩充，适应西进需要。王英乘机把些流氓、地痞、哥老会大小头目等坏分子，都吸收进来，成分复杂，纪律太坏，方振武也不加管束，放任自流。这时候王英名为四个连，实际有八百多人，从此野心就更大了！

一九二五年秋，西北边防会办张树声到达五原后，利用王英父子的权威，委王英为“包宁护路司令”，同时就李鸣钟杀害哥老会龙头杨万桢事件，向王同春道歉，希望得到哥老会的谅解。同时张树声为了巩固地方治安，也进一步和哥老会表示接近，又让王英搜罗哥老会人员，组织起“绥远省革命协会”，由王英任会长。王英遂代替了杨万桢龙头宝座，把哥老会大小头子，委为团营、连、排长。不久组织起枪马齐全的二千余人，编成五个旅、十个团。金山为第一旅旅长，李三河为第二旅旅长，杨守程为第三旅旅长，袁占鳌为第四旅旅长，王喆为第五旅旅长。李凤山、杨五在、张忠元、杜子玉、刘治祥、杜银罗、李崇山、金双喜、广林、卢茂林等十人分任团长。另有手枪队一队，队长李姓。护路司令部参谋长是南靖臣，副官处长是陈兰亭，军需处长是王露亭，还有军械、军法、军医、参谋等八处。司令部驻包头西前街（现在的东河区胜利路包头印刷厂），其他各旅、团分驻五原、临河、安北、包头、前旗各地。此时，绥远大小股匪皆被王英收编。哥老会组成的所谓“绥远革命协会”的全权事务，统由他的二姐王友琴掌管，卢耀峰、郅孝周等人协助。这是王英的极盛时期！

(三)

一九二六年冬，冯玉祥到包头后，关于西退宁夏、甘肃等省行军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哥老会武装匪徒沿途截夺枪枝，无法控制。因此，他向王英、王友琴、卢耀峰等人提出，愿参加哥老会。十月间，在包头大文明巷王英家，按照哥老会的规矩，吸收新贵人（初入会称号）冯督办入会。由卢耀峰给予冯玉祥“威字辈心意”（称呼大哥）。这个“心意”，就是哥老会里上八部最低的地位。冯以督办身份参加，比一般入会，较为隆重，冯给了四千元他自印的西北银行票子。从此以后，冯玉祥算与哥老会称为一家人，一时公开截夺枪枝行为，即较少些。王英等匪徒，认为截夺冯军零散官兵的枪枝，比上大青山拣石头还容易，但因既系一家人，公开抢夺不好看，就变了个方式，把哥老会武装匪徒，说成不是哥老会组织里的人，在王英秘密指挥下，继续截夺。冯军撤退完毕后，王英收缴了大小枪枝二千多件，迫击炮、轻重机枪、子弹、手掷弹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这就是冯玉祥参加哥老会的结果。

王英表面上装腔作势，说什么“服从冯督办，愿意跟到大西北开荒，永远当冯督办的部下”等一大堆鬼话，但内心里早已害怕冯玉祥军纪严明，自知他这群土匪不能遵守。同时听到国民二军弓富魁部、方振武一部和其他杂牌军队，因纪律不好，在西山嘴被冯军全部缴械，还杀掉几个抗拒的团营长，所以王英更害怕。他又编造说，哥老会一致要求给杨万桢报仇，乘机扩充实力。这伙土匪式军队，百分之九十

五是绥远人，都不愿意离开家乡。王英因为有这些远近因素，也确难把这群土匪带到西北，因而产生了脱离冯玉祥投靠张作霖的念头。

一九二六年旧历腊月间，也是冯玉祥全军最后离开包头的时候，王英就隐藏在乌拉山，唆使他的各部抢夺冯军枪械，并派他的参谋长南靖臣为代表，潜往集宁向张作霖前线指挥官万福麟接洽投诚，万即给王英以东北第三十一军军长名义，让他追击冯军。王英打起三十一军的旗帜，继续和冯战斗，待冯军全部离开包头后，王英首先进入包头城，欢迎张作霖先头部队马占山、刘震东等，馈送贵重礼品，又拜为把兄弟。马占山、刘震东对王英投降愿意改编等情况，添枝加叶向张作霖报告。这时，王英部占领五原、临河等县，就地驻守，军队番号虽然改变，但原来“包宁护路司令部”所属五旅、十团的旅团长仍然照旧未动，王英的东北三十一军军部住在包头城内。

一九二七年冬。王英向绥远奉系都统汲金纯、住包头旅长马占山、刘震东提出请求，到北平叩见张大元帅。张作霖令刘震东陪同王英到平，还令平绥沿路驻军表示欢迎。汲金纯为了给王英打气，还准备专车一列。王英为了买好张作霖和其他高级官员，特在包头购买大烟、地毯、红花、鹿茸、麝香及各种细皮衣等礼物，价值达一万五千余元。十月间，王英把各项礼物备齐后，特将七十多人的手枪队，作为卫队。这些士兵在归王英前，都曾受过严格军事训练，行动敏捷，每人带手枪、马枪、大刀各一支。火车进站后，立即跳下车来，散开在车的左右，面向外，右手拿刀，两眼巡视各方动静，看起来真像有纪律的军队。王英乘机向奉系吹说，他的部队，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此外，还有参谋、副官、军需、参议和勤杂人员百余名。专车由包直抵北平，沿途受到张作霖军队欢迎。车抵西直门时，早有所谓大元帅府派来汽车二十多辆，有“大帅”、“少帅”等人的代表，率领着军乐队，列队欢迎。第二日，王英亲往张学良少帅府和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军政大员处，在刘震东陪同下，分别拜见，同时把配好的礼物，分别送去，最后到大元帅府（怀仁堂）承启处挂上号，请示接见日期。第四天早晨，张作霖在怀仁堂接见他。他向张作霖作了口头假汇报说：“我完全拥护大元帅进关，我在绥西把冯玉祥赤军打得落花流水，缴了步枪千余枝，子弹、军用品甚多，现集中包头，作为我向大元帅献礼。现在绥西无一个赤军，大元帅如西进宁夏，我愿作先锋。我亲手给我父亲割下顶好的大烟二千两，送给大元帅试用。”张作霖说：“好小子！你还是个孝子。敢来见我，真是个汉子。你差什么东西，找小六子（指张学良）给你补充。你回去后，好好整理部队，我告诉汲金纯帮助你。冯玉祥那些破枪我不要，都给你吧！先给你一万元见面礼，以后有困难，可以找我。”王英赶紧又跌倒叩了一个头，还说：“谢谢大元帅恩情。”第五天，前往东城旧海军部（现人民大学）东北陆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拜见少帅张学良。王英虽不再穿长袍马褂，也用不着再行四头八拜的礼，但仍奴颜婢膝胁肩谄笑。张学良给了他军饷四万元，棉军衣二千套，军毯二千条，子弹五万发，八二迫击炮四门，还有医药、手套等物。王英前后住了二十多天，虽然送礼请客总共花了一万八千元，实际上净赚了二万多元现大洋，还得了棉衣、枪、炮等物。他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行至磴口车站，

前面桥梁突然起火，不能通过，当即通知他住包头骑兵袁占鳌旅，赶来礅口保护（距包头三十里），并另调步兵二个连由团长李凤山乘坐火车赶来，待袁、李到达后，王英才下了车，还怕附近埋有地雷，让骑兵过去，步兵掩护上，行到了桥西，登上来的列车，左右由骑兵飞奔跟车开回包头。对于桥梁起火，传说不一，有人说是冯玉祥留下的旧部干的，还有人说是满泰干的，最后也没查出确实的原因。但王英从此便和满泰有了意见。

王英回到包头不久，就是旧历腊月初，接到张作霖命令，立即要他向河曲、偏关等地进攻阎锡山军。王英由五原、临河各旅中抽调强壮人马一千五百多名，编为六个团，并委旅长杨守程为前敌指挥官，带领着团长李凤山、张忠元、杜子玉、杜银罗、刘致祥、杨五在、直机炮连长华世昌、特务连长史文华、秘书长白映星、参谋长南靖臣、参议金世源、军需韩祥符等人由包头出发。行至萨县东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堡子时，原定进驻堡子宿营，但是外国神甫（皆称二德神甫）闭门拒不许入。这时的王英，向教徒张大元等人说：“二十四顷地，是中国的土地，不是卖给外国人的，也没有租给他们，我是中国军队，他为什么不让进去呢？真是欺负中国人太甚！你告诉二德神甫吧，我不进去了，我马上命令部队攻城。我看看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张大元返回教堂，二德神甫立即召集全教堂武装登城坚守，准备还击。这个时候，包头城防司令满泰正在萨县城里，赶忙来二十四顷地西一个小村，和王英见了面，又通过满泰从中斡旋，二德神甫只让王英带少数人员进堡，其他旅团还是拒绝。王英说：“我不进去了，让炮弹去住吧！”就照着教堂钟楼打了四炮。二德神甫挨了四炮后，马上又着张大元等七、八人来见王英，说

什么传话人没说清楚，这是说合，请王军长、满司令进城来，神甫在门口欢迎等语。满泰乘着下台机会，就拉着王英的手说：“杰臣！咱们到堡子里去吧，见见二德神甫互相解释解释，也就完了。”但是王英坚不进去，弄得七、八个教徒互相观看，满泰也无法张口，三方面都静默起来。王英只管抽他的大烟，一声不响，事情弄僵了。杨守程、李凤山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不好解决，就向王英说：“报告军长，天气快黑了，我们还要赶路呢！”王英说：“好吧！让部队前进吧。”王英东去，满泰西行，七、八个教徒返回二十四顷地。二德神甫第二天匆匆忙忙跑到归绥，向绥远都统汲金纯提出抗议，要求惩办王英。汲金纯为了眼前一时安静，表面上完全答应，实际上根本未究。

王英打完了二十四顷地后，继续东进，按照张作霖指示，攻击山西河曲等县。但要到达河曲，必须经过准格尔旗境，王英和准旗的独裁者大汉台吉那森达赖素有成见，他想乘着这个机会，要把那森达赖痛打一顿。那森达赖也抽调全旗兵力，集中在黄河北岸党三窑子一带布防，不许通过。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王英采取两面手法，一面给那森达赖写信，说明奉张大元帅命令攻取河曲，假道准旗，“秋毫无犯”，希望解决人马给养问题。一面急电张作霖，报告那森达赖奉阎锡山命令，阻止前进，请速指示。张作霖马上复电说：“攻取河曲，限期收到，那森达赖既敢阻止，应以敌人对待，立即进攻，全部消灭。”王英接电后，当天命令各团向那森达赖部队展开攻击，双方在党三窑子一带战斗两天三夜，互有伤亡。那森达赖不支，退过黄河大营盘，继续防范王部渡河。王英于腊月二十九日到达托县河口镇，渡过旧年，于初二日由蒲炭拐

踏冰过河。行至大饭铺村时，突被那森达赖的伏兵袭击，战斗较烈，互有伤亡，约三小时，那森达赖部队向西撤退，王英向河曲十里长滩前进，往陕北府谷县麻地沟镇开去。麻地沟镇与河曲仅隔黄河，王英一面派南靖臣参谋长秘密前往河曲，和阎锡山部师长谭庆林接洽投降，一面又派金参议前往榆林，和土皇帝井岳秀联络，另将各团布置到准格尔旗和府谷县古城一带，防止那森达赖袭击。同时捏造假战况，向张作霖汇报。正在这个时期，那森达赖于正月二十二日突将驻古城王英部包围攻击。王英当时命令各团限三天将那森达赖军队全部消灭，并将杨家湾、沙圪堵、纳林等重要据点占领。他的官兵都知道杨家湾是那森达赖住所，拚着命展开攻击，如期占领。那森达赖放弃杨家湾时，放了一把火，向德盛西退走。王英的兵为了发财，冒着危险将火扑灭，昼夜乱挖乱掘，结果掏出元宝五百个，现洋一万余元，大烟三千余两和绸缎、皮衣等物。王英官兵因分赃还发生过开枪互拼。从此，那森达赖再没向王反攻，王英也没追击。王英因打垮那森达赖，又得到张作霖奖金五千元。

王英驻在麻地沟，一面待南靖臣去河曲接洽投降的结果，一面每天捏造攻打河曲战果向张作霖汇报。南靖臣到达河曲后，向谭庆林转达王英的意见，谭向阎锡山反映后，阎委王英为山西骑兵第四师师长，同时给发了薪饷一万元，赏钱五千元，山炮二门，单服装二千套，关防、印信，还有医药、子弹等军用品，令他急返绥远，攻击汲金纯部。王英亲去河曲和谭庆林等人面商返绥攻击汲金纯的办法。在河曲住了三天，复返麻地沟。同时还向张作霖报告，说些“河曲已被我军占领，又被阎军反攻复失”等鬼话。二月初，王英率领全军返绥远，

仍然打着张作霖的三十一军旗帜，复经准格尔旗东部，渡过黄河，开往托县、归绥边境散驻，采取观望态度，期待局势变化。同时，仍向张作霖、汲金纯等人报告，说什么“攻占河曲后，因一时布置不慎，又因弹药缺乏，伤亡过重，确无力支持，因而返回绥南，整军待命，并请添配炮兵，协助反攻。”王英这套鬼把戏，早被汲金纯识破，但汲假装不知，复电承应一切，并请他到归绥面商。王英接电后，认为不妙，赶急去电说是：“近来感冒甚重，不能前往，拟派参谋长南靖臣前往报告。”汲复电称：“既病不能亲来，已派医生前往诊治，并有大元帅代表高某赴前方慰问，顺便带去慰问费二千元，病如好转，相偕来绥。”王英便假装病状，把紫药水抹在脸部腿部，盖上被子睡在屋里，好像真有病一样。第二天那位代表和医生坐着汽车来了，王英派团长以上的官都去欢迎。王英见了这位代表后，痛哭流涕，口口声声说什么“我在河曲遭到阎锡山军袭击，官兵死伤惨重，几次要求增援，补发子弹，都无影子，后方又受到那森达赖攻击，使我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情况，不得不返回绥南。汲都统不但不补发子弹，反而听信奸人（指满泰）挑拨，制造谣言，真使我伤心。”说话时声泪俱下，同时他向那位代表要求：“请您转达汲都统，请他另派贤能来接我这个军长职务吧！让我休息几天。”王英这样一来，确实把这位代表哄得头晕眼花，真假难辨。王英乘机又送给代表现款五百元，大烟二百两，好马二匹，两个医官各送一百元，大烟一百两。请他们代诉“苦情”。这位代表得到了票子、大烟、好马，欢天喜地回归绥，两位医官要给他注射退热剂，王英害怕汲金纯害他，借口说打针有反应，就连消炎片他都不敢吃。医官们既已得到好处，

管你真病假病，也就随同汽车返回归绥去了。代表走后，王英做贼心虚，既不敢去归绥见汲金纯，又不敢拿出阎锡山旗帜来，住着等待吧，又怕汲金纯攻击，走罢，该到哪里去？终日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只拚命抽大烟。一天突然接到杨守程报告说：“汲金纯由归绥派出骑步炮各一团，步炮乘火车到达察素齐车站下车了，骑兵向我驻地前进。”其实汲金纯真怕王英攻归绥，故意耍这个花招。同时汲金纯在归绥还招集商会、农会地方士绅等多人，把王英投降阎锡山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们，说“我军奉张大元帅命令，立即率队剿除，你们都是地方人，请代转告王英要他马上来归绥见我，我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他将悔之晚矣。”商农会的人，只好照汲的意思联名给王英写了一封信，但是暗地告诉王英千万不要来。同时汲金纯把包头城防司令满泰接往归绥，在事前捏造下一份张作霖的假电报，内容是：“王英叛乱，速剿除，令满泰为绥远护理都统。”汲金纯把都统大印交给满泰，汲本人隐藏在部队内，积极调动军队齐集车站，表面上声讨王英，车头向西，实际上待夜静后，车头东挂，溜之乎也。护理都统满泰，傻头傻脑，抱着大印，在都统府呆了二夜，第三天早晨，才知道汲金纯和所有奉系军政人员，已经逃跑一空。王英接到商农会来信和口头信，吓得连夜率队向包头逃走，二天二夜就跑了三百多里。王英到达了包头以西公庙子，部队分驻各村，原拟返回五原，突然留守包头人员送来一信，说汲金纯部昨晚全数撤走，王英急令各团赶占包头，同时也把山西骑兵第四师旗帜拿出来，进了包头。没有实力的护理都统满泰，在都统府呆了四、五天，附近地方军队如金山，郭春山等股，也闯进归绥，弄得满泰无法制止。最后王

英也带着袁占鳌、杨守程两个旅乘火车赶来归绥。归绥新旧城大乱，街市上行人几乎绝迹，商店闭门，学校停课，土匪们乘机抢劫商民，王英、金山、郭春山等匪首，把汲金纯遗留下的粮食、服装、弹药，搬运一空。王英为护理都统职位，和满泰明争暗斗；他为了抢夺更多东西，派杨守程、袁占鳌两旅，向大同追击汲金纯，并向阎锡山报告。王、满正在你争我夺时，阎锡山给他们来电说：“已派商震为绥远都统，日内前往，希暂时共同维持地方治安。”杨、袁两旅到达大同后，阎锡山的骑兵、步兵由商震、赵承绶率领，也开到了，令杨守程旅开往柴沟堡、天镇，袁占鳌旅开往集宁、丰镇。商震带着步兵赶来归绥，当了都统，满泰、王英又都回到包头。

一九二八年，商震令王英部整编为一个旅、四个团，前旅长金山拨归满泰，杨守程旅拨归骑五师原屏藩，王喆、李三河两旅长免职，只留袁占鳌为骑兵第四师第五旅旅长、李凤山为十七团团长，张忠元为二十三团团长，杨五在为第八团团长，杨猴小（杨耀峰）、李崇山等十二人为连长，另有山炮、卫队各一连，除师部仍驻包头，其他各团分驻临河、陕坝、杨家河一带整训。阎锡山特派马宏林为王英的参谋长，又派三个中校团附，每团一个，明为帮助整训，实则暗中监视。一九二九年秋，阎锡山命令王英全旅集中包头东营盘整训，王英明知是集中起来遇机缴枪，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服从命令，把全旅集合包头。十一月间全部果然缴枪，调王英为山西骑兵副司令，排长以上军官调太原军官教导团学习，士兵一律给资遣散，马匹归己自用。这项命令到达后，王英召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多数不同意缴枪，尤其是二十

三团三连连长杨猴小、卫队连长史文华最坚决。他们说：“宁愿当土匪，也不作缴枪人”。为此开了大小会议十几次，王英也不敢把真实动态向阎锡山反映，迟迟不能解决。最后三个团连长以上军官齐集袁占鳌旅部，进行研究，决定：如师长不愿意走，我们把他抬上，徒步由磴口、南海子过河，在昭君坟集合。这次会议，王英不知道。第二天，山西骑兵司令赵承绶奉阎锡山命令，由大同赶来包头，监视王英缴枪，同时也带来骑兵吕汝骥旅，分驻包头四郊，监视王英部队行动。这些情况王英、袁占鳌等人也都知道，赵承绶在丰业银行召集王英部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各团、连长惟恐发生意外变化，明、暗带着武装护兵前往参加，同时在东门外大营盘周围实行戒备，也准备随时开往河西当土匪。会议后，王英知道全部要拉走，特地跑到袁占鳌旅部，召集连长军官，反复讲解目前情况，他说：“不是我愿意缴枪，而是环境不允许，你们如果一定要拉走，就把我打死，省的阎锡山杀我，你们在外作乱，我不是被杀，就要蹲大狱，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朋友，非把我害的家破人亡，才算甘心吗？”说着话，他站起来说：“来！哪个先把我打死，我早就不想活了。”王英连声喊叫“谁先开枪？”这一下，大家都愣住了。还是袁占鳌站起来说：“师长，我们跟您多少年，不用说把您打死，我们也不能让您掉头或者坐大狱。你看绥远连年灾荒，每天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交了枪这些人难道活活的都饿死吗？”说着放声大哭，其他团连长不约而同都哭了。王英也哭了，会场一片哭声，谁也不说一句话。突然二十三团三连连长杨猴小站起来：“师长不要哭，哭解决不了问题，今天不是让缴枪吗？我愿少交，我是按单子上的枪数交，长

余下的枪我还是带上当土匪呀，师长您去当副司令吧。”杨猴小马上回连部，把军队集合起来，把枪收了，送给王英后，连夜带了二十多名士兵通过马场，过了黄河。其他各团连，于第二日相继全部把枪弹送到王英司令部。袁占鳌等六十多名军官前往太原教导团学习。一九三〇年春，王英跟上赵承绶去河南打蒋介石。同年秋阎锡山失败后，王英偷跑到天津。杨猴小从此就在绥远、察哈尔、宁夏、陕北一带窜扰了六年，最后在陕北横山县落羊沟被打死。

（四）

一九三〇年春，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在河南、山东等地混战，在绥远包头各地的王靖国、赵承绶等部奉阎锡山命令调走，阎恐王英乘虚捣乱，特令他随赵承绶前往河南，名义上是赵的副司令。这时杨猴小、陈秉义、周鸿斌、史文华、康存良等股，在包头黄河南一带活动，通过王英的二姐“二老财”与王英经常有信件联系。王英随同赵承绶到河南后，感到苦闷，但也无可奈何。六月间，他的前团长张忠元由太原前往看他，王英秘密告诉张忠元两件事情：第一件，赶急回包头，告诉杨猴小、康存良、陈秉义等积极活动，尽量扩充，并让他二姐全力支持他们。第二件，先到天津找陈国英（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让他设法给蒋介石打电报，就说：“我准备在前线率部‘反正’，请通知刘峙、顾祝同接应。”王英为了慎重，又加派前军需韩祥符共同前往。张、韩到天津后，在惠中饭店找见陈国英，将王英的意见说明，几天后得蒋复电，大意说：“王英反正，极表欢迎，并

委为中央骑兵第三师师长，已通知前防，希和刘峙等联系。张、韩得讯后，张回包头找杨猴小和王友琴，韩去太原找在太原受训的王英前团长李凤山、旅长袁占鳌、杨守程等人，通知他们回绥远活动。嗣后韩又返河南开封，向王英复命。王英口头委杨猴小为第一旅旅长，让韩返包头，通知杨猴小。这时，杨猴小已被绥远省主席李培基收编为“绥远省保安骑兵团长”。杨猴小自认为了不起，一时得意洋洋。在太原受训的袁占鳌、李凤山、杜子玉、张忠元等先后返回包头，在黄河南一带活动起来。与此同时，陈国英也化装潜返归绥一带，煽动自卫队搞起反阎的活动。杨猴小部因受改编不久，仍驻包头二道河村，袁占鳌等股窜到归绥，和陈国英合并，企图占领归绥。李培基派郭凤山骑兵师前往剿除，这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一经接火自行溃散。陈国英又逃回天津，袁占鳌等股又返黄河南达拉特旗一带骚扰。这时在河南的王英通过他二姐，不断和杨猴小、袁占鳌等人信使往来，同时他二姐代替他执行了师长职权，指挥这些土匪们的行动。九月间，冯玉祥、阎锡山被蒋介石打败后，赵承绶退到石家庄，王英向赵承绶请假回家（天津）。王英同韩祥符等五人，去了天津，从此才和阎系脱离。

王英到天津后，回到法租界天德里住所，他的三姨太太张筱红告诉他说刘震东来找过他数次，并留下住址。王英就马上找到刘震东，把阎、冯军在河南败退情况，向刘介绍，刘又向张学良反映，张电召王英赴沈阳。王英当天晚上去沈阳，就见到张学良，把冯阎两军在河南败退情况，作了口头汇报。接着傅作义也由山东败退下来，刘茂恩也倒了阎、冯的戈，于是张学良通电主张和平，随着把东北军大批开进关

来，占据了天津、北平、保定、张家口等省市。王英也返天津。张学良到北平后，王英又去见了一次，张让王速回绥远，扩展军队，但未给名义，仅给了二千元，作为路费，让他去张家口找察哈尔主席刘翼飞，帮助他回绥远。王英到张家口后，刘让察北保安司令张诚德（外号野猫张地方团队）派队掩护他回绥。张派兵一排，由张北县送至商都，因兵力单薄，再未前进。这时傅作义由山东退到绥远，当了绥远省主席，阎锡山逃至大连。王英这一系列活动，早被傅作义、赵承绶知道，即派骑兵两连在武川东山口地区进行封锁，防止王英西窜。王英自知力量单薄，重返察境，又着韩祥符秘密返回包头，让他二姐速通知杨猴小、袁占鳌、康存良、李凤山、史文华、张忠元、陈秉义等派队接他。“二老财”让他的儿子张子茂去河西通知袁占鳌等，速开商都“迎接老司令”，并让康存良、杨守程等继续留在土默川一带牵制赵承绶的骑兵，她亲自坐着轿车去二道沙河找杨猴小东开迎王。杨猴小名义上虽被收编，但总不放心，现在有“二老财”坐催又有王英召唤，遂于腊月间由二道沙河村突然东开，声称去接王英。赵承绶等人，也拿不出力量把这股土匪剿除干净，或者阻止住王英不能来绥，反而被杨猴小、袁占鳌两部将武川县占领，抢劫一空，还打死赵承绶部的一个团长陈某，缴了大小枪枝百余条。

杨猴小、袁占鳌两股在集宁县北贵红滩、宋家村和王英会合。对重返绥远作了一系列布署和决定：第一，禁止抢劫老百姓财产，严格制止奸淫妇女和请财神（绑票）。第二，先占五原、临河两县，作为根据地。第三，把蒋介石第三师番号拿出来吓唬晋绥军。当即委杨猴小为第一旅旅长，陈秉

义、王占元、吕德明、周鸿斌分任团长。袁占鳌为第二旅旅长，杜子玉、李凤山、康存良、张忠元分任团长。委史文华为特务营长兼执法队长，如有违犯军纪者，先斩后奏。并委南靖臣为参谋长，张诚斋为秘书长，韩祥符为军需处长，杨守程为稽查处长。对各项计划安排后，由集宁取道陶林、武川、归绥北山出口，经过萨县、包头、在西公旗（今乌拉特前旗）集合。杨猴小部在前，袁占鳌部在后，王英领着史文华在中，按照预定路线行动。王英率领着这夥所谓“中央骑兵第三师”，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终于在归绥北脑包村山口闯出。第二天早和傅作义某步兵团在白塔站打了一仗，当天晚上王英为了威胁归绥城内军政机关，有意识地派李凤山团率领百余人，到南茶房一带进行袭击，吓得那些胆小的军政机关人员，一晚上也不敢睡觉，更不敢开出军队来对抗，只有依靠墙头乱打了一阵。其实王英派出李凤山后，当即向西逃跑。第二日天亮后，对方才知道王英不是攻城，而是溜之乎也了。

王英在土默川又和杨守程、杜子玉、康存良等股会合后，到了萨县大岱村，住在田端甫家，召集团长以上人员会议，根据新的情况，又作了新的布置。决定王英同杨猴小旅走河西，袁占鳌旅走黄河北，在西公旗宋家壕集合。到达宋家壕后，对占据五原、临河、安北又作了个计划。由于安北县无驻军，王英同杨猴小先占安北县（也叫大余台）。王英命袁占鳌在占五原之先，在宋家壕住上几天，和包头的郭凤山师长联系，诡称袁与王英意见不合，袁愿归郭收编，并命袁在槐木村等郭凤山，把郭扣起来。

王英在宋家壕把各项事情安排后，率领杨猴小旅由昆独

仓召沟直奔安北县城。该县当时没有山西的军队，仅有些地方团队和警察，哪敢抗拒，只有开门迎接。当时县长郑世卿，警察局长张家骏，自卫团总郭之昌，还有十几位绅商界代表，齐集东门外垂手欢迎，王英拱手称谢，全城男女老幼，站立两旁，观看热闹。王英住在郭之昌家，杨猴小等分驻城内商号和老乡家，市面上卖衣服、手巾、鞋襪、马鞍等大小生意，一时也热闹起来。住了两天，约在腊月二十五日，又离开安北县，直奔南牛惧。

袁占鳌在宋家壕接受了王英的锦囊妙计，把郭凤山骗到槐木村（距五原六十里），郭还摆着上司架子，自认为袁真心投他，当时把在包头准备好的委袁为山西骑兵独立第一旅旅长，杨猴小为第二旅旅长的委任状交给袁，让袁暂住槐木，听候命令。郭凤山随即喊“开车”！准备要走。但没有一个勤务出来答话，郭气冲冲地跑出院来，大声喊叫“勤务兵！勤务兵！你们都死了！”他的勤务兵空手走出来，有声无力地说：“我们的枪早被人家收去，你还骂我们？”郭当下脸色苍白，一声不响，袁占鳌说：“报告师长！我奉王司令命令在这等候师长，请您马上到南牛惧和王司令见面，有什么话可向王司令去说，咱们走吧。”郭凤山被迫同袁占鳌坐着汽车直奔南牛惧，见了王英。王英大骂袁占鳌，向郭凤山说：“请大哥原谅，这是误会，我请您来，是和您商议我这些人怎么办？请您和赵司令、王师长把我的困难情况代为传报，只要能把这群人安置个地方，我本人干不干都没关系。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日，明天就是大年，本来想留大哥多住一天，咱们好好谈谈，但是怕五原军政人员说我对您有不好的行为，您今晚就回五原吧！我在南牛惧等大哥的回信。”郭

凤山只有随口答应：“杰臣！我一定替你办，那么我就走吧。”王英将收缴郭的手枪完全拿出来，交给郭的卫士，把郭凤山送上汽车，郭向五原奔去。在郭凤山未走前，王英就派杨猴小事前到南牛渠北总路口上一个小村子，明为保护，实际上再吓他一次。郭凤山离开南牛渠时，正是深更半夜，好像出笼的鸟一样，惟恐中途再发生意外，正在心慌意乱情况下，突然前面鸣枪两声，阻住去路，大声喊叫：“什么人，赶快下车，见我们旅长！”这一吓，郭凤山魂不附体，只好乖乖地下了汽车，杨猴小跑上前来，还行个举手礼，对郭说：“报告师长，我是杨耀峰，奉我们王司令命令，在此保护师长的安全。北面就没我们的队伍了，请您放心走吧。您委的旅长委任状我已交给王司令了。”郭凤山逃回五原后，赵承绶认为他和王英有勾结，不久就将郭的师长撤掉了。

一九三一年，王英在南牛渠放走郭凤山后，过了春节，即研究如何占领临河县城和陕坝等重要城镇。决定派杨猴小先占陕坝、蛮会等镇，派袁占鳌旅包围临河县城，解决郭凤山师白葆芝团，王英本人进驻临河境内的世成西（陕坝东约六十华里）堡内。正月初二日，各旅即按照指定目标，进行攻击，杨猴小旅于初六日占据了陕坝等镇，复与袁占鳌旅合围临河县城。白葆芝团据城抵抗，双方战斗三昼夜，互有伤亡。临河县东关是个商业居民聚集之处，被袁旅首先占领。城内除军政机关学校外，商号居民甚少。白葆芝团请临河县县长白葆庄、商会会长刘福申、自卫团总李俊峰，出面调解，并提出三个条件：①袁、杨部立即停止攻城，退出东关南十里外。②白部三天内自动撤出临河县城，双方保证不再冲突。③以公路线为分界线，袁、杨两部在公路南十里外，

白葆芝团由公路北十里外向五原撤退，公路中间由李俊峰率领自卫团队，往来巡逻，监视双方。白葆庄等三人亲往世成西和王英见面，王当日命令袁占鳌、杨猴小遵照条件即日执行。白葆芝于一九三一年旧历正月初十日离开临河，退往五原。袁占鳌旅进驻城内，杨猴小旅复返陕坝。王英于十三日由世成西先到陕坝，十五日到临河，从此临河全县即被王英部占据一年零三个月。总计人吃马喂，各种费用，据不完全统计，约在三万多元。

从此王英对蒋介石给的第三师番号，再未对外使用过，而蒋介石也没给过一文钱或其他物资。王英虽派其前参谋长杨蕴甫、赵灵趾去过南京几次，都没结果。但是花费怎么办呢？只好巧立名目，设立税卡，美其名曰“保护费”。每只货船收洋十元，粮船十二元至十五元，盐船十五元至二十元，年余来总共收约一万五千余元。那年秋天，又派袁占鳌率领李凤山团，公开向包办宁夏货物税局局长李少白在三盛公设立的税局和行商数十家，勒索了五千元，并把商人的货物抢劫一空，折合银洋两万元左右。同年春，王英又强迫农民播种大烟，每亩征十两至二十两，总计收回“板子烟”七千余两。另派杜子玉团开往安北县，向各乡农民讹诈回大烟一千五百两，总计那年勒索到王英手的烟土达一万两左右。其他如收租、丈烟、催烟等人从中的诈取，不可数计。王英还派袁占鳌到磴口，把福兴公司的红盐抢到临河、五原一千五百石，向各乡村换了麦子三千石，运往包头销售。对这种土匪行为，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委王英为“义勇军司令”。王英立即通电抗日，好像真有“爱国心”。他这一举动，骗诱了不少青年，加入他的队伍。但是王英只说不做，仍旧盘

踞临河。冬季，他见宁夏兵力不多，又借口东开“抗日”，请支援大皮衣二千件，当时宁夏主席马鸿宾，确实兵力不多，也害怕闹翻了脸宁夏被攻，向各皮行征用二千件，派骆驼送到临河，如数交给王英。此时他既有大烟抽，又有足够的银元挥霍，那里还想移动，更根本没有抗日的思想，只好应付各方环境，得过且过。

不过那年确有冯玉祥的秘密代表，到过临河，说是冯让王到兰州，和雷中田（雷系甘肃省保安司令）合并。青海主席马步芳，也派旅长马禄和雅某（人称雅王爷），请他到青海。绥远主席傅作义，不喜欢他久驻临河，曾来电让他派人到归绥接洽。王英为了应付傅作义，当派李凤山、韩祥符，并邀请五原商会会长唐盘书三人，前往归绥联系。当时傅作义归张学良节制，只好向张请示，对王英部竟作如何安排。张派胡毓坤等人来到归绥，三方面共同研究。为了确实了解王英的真实态度，胡派随他来的王参议，傅派省府任重参议，在王英代表李凤山陪同下，前往临河见王英。王英表面上坚决要求“东开抗日”，实际上还是想去兰州和雷中田会合。最好再在临河呆几年，坐待中日问题变化。胡毓坤对王英东开抗日，表示同意，即向张学良请示。正在胡等待复电时，阎锡山突然由大连乘日本飞机到大同，转往太原。张学良看到局势有变，当将胡毓坤召回北平。同时也给傅作义来电说：“阎既返太原，晋绥军政当由阎主持，关于王英部问题，希另行研究。”因此，商谈问题，暂告中断。表面上虽然互相联系，实质上各自准备。

傅因阎返太原，派袁庆曾先去报告，继而亲去请训，把问题搁置下来。傅返归绥，邀王英亲来面商，并说已令沿途

保护。王英召集团长以上人员，齐集临河商议，王英提出意见三点：①我去归绥凶多吉少，我如死了，部队怎么办？②如果我们东开抗日，谁也不给命令，那就是自由行动，沿途必定受到晋绥军阻击，该如何应付？③根据目前形势，临河是不能再住下去，如果西去找雷中田，或找青海马步芳，又有什么好处？与会人员，一致不同意王英去归绥，主张东开抗日，或当土匪也可。尤其是杨猴小表示得最坚决，他说宁死在日本鬼子手下，也不能让傅杀死。袁占鳌不同意杨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都不抗日，谁让你们抗日？我认为先到兰州或者青海培养力量。现在他们不抗日，将来也有抗日的一天。”杨猴小说：“他们不抗日，他们是害怕死，我不怕死，我非去不可。谁不去抗日，谁不是中国人。况且我们是‘抗日义勇军’，抗日是名正言顺的，我们马上就开。”会议进行到最后，仍定不下来。会后，王英和杨、袁单独商议，但仍各自坚持己见，终不能一致。接着继续开会，王英当将东开抗日和西去兰州或去青海的利害关系，作了分析，他一面说，一面哭。他说：“为了大家的出路，我还是到归绥见傅作义，就是把我杀了，他也得担负起不让我抗日而把我杀掉的罪名。如果自由行动，却不妥当。”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王英马上给傅作义打了个电报，大意说：“我决定前往，当面商议。并令史文华营长迅速准备，相偕同往。王英于三月十日由临河动身，行至五原新公中村，即与驻五原赵承绥骑兵旅长张子心去信。”大意说：“奉傅主席电召赴绥，商议我军问题，希代备汽车一辆。”张回信说：“五原没汽车，你骑马去吧，也不必进五原城来。”王英接信后，反复思考，认为傅作义邀他到绥，又

说已飭沿途保护，张旅长却既不给准备汽车，也不让进城，究竟其中有什么把戏，自难理解。最后史文华说：“张旅长不让你进城，这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归绥吗？你还考虑什么呢？赶快返临河吧。”史文华一席话，提醒了王英，第二天又匆匆返回临河，并一面急电傅作义，说是中途感冒，暂不能赴绥，病愈即去；一面又召集团长以上人员，继续开会，首先和杨猴小、袁占鳌两个人商议，结果杨、袁仍然各自坚持原意。最后决定：让袁占鳌带一百人，跟马步芳代表马禄去青海，其余各团都东开抗日。决定后，命令各部积极准备。傅作义接到王英因病不能来绥电报，知其中有变，电告阎锡山、阎即令傅剿除。不几天，王靖国步兵、赵承绶骑兵，分别向五原方向出动，王英在此情况下，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全部自动离开临河。王英、杨猴小东去，袁占鳌西行。王英、杨猴小绕道乌加河北，通过五原、安北、固阳、武川、陶林、集宁六县到达察哈尔商都境的郭家庄和张学良骑兵团长熊飞联系，说明东开抗日，并且想到北平见张学良。熊飞当天晚上坐着汽车，陪同王英到了张家口，先见察哈尔主席刘翼飞。刘对王英抗日意图，甚表欢迎，但说须请示张学良才能决定。当天晚上，刘即去北平，见到张学良，还没有说话，张学良就把阎锡山一份要将王英解送太原的电报交给刘看，弄得刘有嘴不能说。张当即指示刘翼飞：把王英表面上押起来，实际上给予优待，王英的部队可再回绥远。如果子弹困难，可秘密帮助些。人家谁也不抗日，我们能抗吗？刘返张家口，遵照张的指示办理，先将王英由招待所移住上堡一个老乡院，另派察哈尔公安处队长黄某伴守。并给了杨猴小子子弹万余发，助其重返绥远。冯玉祥组织抗日

同盟军前，刘翼飞又把王英转移到北平西城烟筒胡同二号一个小院，名为便于保护、实系继续监视，如此半年多。

（五）

一九三三年夏，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王英已经自由了。他又想乘机活动，前往张家口接洽。但是冯玉祥回忆起一九二六年西退宁夏时，王英不但不跟上西走，反而投降了张作霖，还沿路捣乱，对王英不满。后经吉鸿昌将军从中解释，冯任命王英为察北游击司令。王活动了半年，虽然仅有数十人跟他，但抗日信心甚大，在吉鸿昌将军直接领导下，还参加过收复多伦的战斗。冯玉祥被蒋介石逼上泰山后，抗日同盟军所有部队，在吉鸿昌、方振武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王英人马虽不多，也算跟上抗日了。吉鸿昌等部行抵喜峰口一带，前有蒋介石和张学良军队阻击，后有日寇追赶，战斗进行了两昼夜，终因伤亡过重，弹尽援绝，确不能继续支持，才停止了抗日。吉鸿昌跑回天津，王英随着也去了天津。从此王英住在天津，经常和些反动的政客军人往来，都是你吹我捧，自称“三齐王”。

当年冬天，王英在生活上感到不够宽裕，被他的三姨太太张筱红逼迫，跑到兰州，弄了个甘肃省政府的参议，月薪一百元。又向熟识的商店赊购了大烟二千两，运往张家口，因行情不好，销路不畅，加上他带来的大烟百分之二十有假，如果出卖，还得赔钱。后来经过会制造料面的归绥人亢宜斋建议，让王英制造料面，烟土才有了销路。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又给了王英个参议，月薪二百元。王英就利用这些

关系，在张家口秘密制造料面。而料面又非运往天津不能销售，因当时稽查正紧，如果买通军、宪、警人员，花费甚大，利润当少，当即由亢宜斋介绍两个日本浪人，一个叫山夏，一个叫大山，担任运送；规定每袋运费十五元，另各给买头等卧铺票一张。王英从此，由小到大，由穷变富，一时车马盈门，宾客满座，张自忠等虽有耳闻，也不追查。张家口烟土商店绝大部分是绥远人，如晋业祥（经理翟耀庭）这个土店，在包头、归绥、张家口、北平、天津、太原等地都有分店。王英和翟家弟兄认识，而翟家也为了扩大烟土销售，全力支援王英制造毒品所需大烟，先取货后给钱。无本尽利，制造毒品一年多。由于通过山夏、大山介绍又和平绥铁路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认识，这就给王英后来当汉奸开辟了门路。

张自忠为了学习古典文学，特聘请前绥远教育厅长李泰芬到张家口讲学，同王英居住一院。张自忠经常来听讲，对王英和傅作义间的误会，愿作调解，王英也同意，同时提出两个条件：（1）取消通缉令，恢复包头、五原、临河土地，财产，并释放旧部；（2）给适当名义和生活费用，居住自由。张给傅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李泰芬去归绥洽办。傅对恢复财产和名义，生活费用等一口承应，对居住自由问题，说是当不了阎锡山的家。终因双方意见不一，没有结果。因此王英对阎、傅更表不满。王对张自忠、李泰芬说：“我犯了什么罪？连个居住自由都没有，这真是耍逼我上梁山。”这句上梁山的话，意味着当汉奸，这也是王英当汉奸的一个借口。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和日寇订立了臭名远扬的何梅协

定，出卖了华北后，日寇在华北各地设立特务机关，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在各地寻找汉奸，充作爪牙。最典型的如冀东殷汝耕，察北李守信，蒙旗德穆楚克栋鲁普等败类，还企图把绥东也特殊化，这就选中了王英。王英在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芬和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共同策动下，把张家口制造毒品的买卖关了门，随同盛岛角芬和羽山喜郎到了天津，和日寇驻天津司令梅津见了面，被委为“大汉义军司令官”，决定让王英在察北积极招收土匪，人马越多越好，不限数目，根据发展情况，补发枪枝，并制定第一步先占百灵庙，然后再占绥东五县，和整个绥远省全境等一系列侵略计划。王英奴颜婢膝，全部接受，返回张家口，首先和杨守诚韩祥符叙述在天津接受梅津提出的组织伪军、占据绥东等事，韩坚决反对，誓不参加。不久韩即领着妻子，秘返绥远，向傅作义把王英接受日寇侵占绥东等罪恶活动详为汇报。此时驻包头王靖国师田树梅旅长，对王英勾结日寇，企图扰乱绥东活动，也有所闻，想找几个和王英有私人关系的人前往劝说，不要和日寇勾结，并许诺将他在包头、五原、临河被没收的土地、财产等一律退还，给予适当名义和生活费用等条件。通过前玉禄部团长荣松亭的介绍，前玉禄部队长耿子云、李秀峰（又名秃卜）、松友三等三人为说客，前往张家口，进行劝说。但是这几位说客，不但没有把王英说服，反而被王英利用，充当了汉奸。王英就把耿子云委为“百灵庙保安大队长”，松友三、李秀峰各任中队长，并给了一部分枪枝、服装等。不久耿子云被日本枪杀。

这时王英的所谓“大汉义军”初步组织起来，把当时的一群汉奸，如孙殿英旧部金宪章，落伍军人安华亭、王子修，察北

土匪石玉山，曹辅臣和绥远土匪杨守程、常志义等，在察北一带招集起的骑、步兵约三千余名，共编为五个旅。金宪章、安华亭、王子修、石玉山、杨守程，分任旅长，曹辅臣、常志义等分任团长，寇子严任参谋长，陈子珍任副官长。王英捏造一套所谓“待机反正”的鬼话，秘密派他的伪参谋长寇子严，由百灵庙绕道张家口，到归绥和傅作义联系。寇和傅系保定同学，寇来归绥时，傅军已将百灵庙收复，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寇子严此行无结果，后来就投奔了邓宝珊。金宪章、安华亭、王子修、石玉山四个伪旅已纷纷反正。惟甘心继续充当汉奸的王英，死不悔改，率领着杨守程、常志义和日寇顾问山夏等逃回张北县，他又灰溜溜地跑回天津，向他干爸爸日本鬼子哭诉，说什么受了金宪章等四人的骗了。日寇还想将来再利用他，暂时未加处分。对退往张家口的杨守程、常志义部，日寇认为行动可疑，勒令全部缴枪，除杨、常二匪只身逃往天津寻王英外，其他大部份伪官兵被编入李守信部，继续当汉奸。

王英自绥东惨败后，居住天津，虽然和日寇继续勾结，梦想东山再起，重犯绥远，但是光杆司令，日寇怎能信任，只有闭门造车，自吹自打，如此约一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隐居天津的王英，又张牙舞爪，有所活动，在日寇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和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等唆使下，从日寇那里弄得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日寇让他返回绥远，招收败类，组织武装，协助日寇维持“地方治安”。王英、杨守程、常志义于一九三八年冬来到包头，大肆宣传日寇“亲华”毒素，收罗败类，企图死灰复燃。当时虽有些坏分子参加，但都是赤手空拳，最后还是

他二姐“二老财”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决定还是找现有力量的旧部，如驻黄河南岸的二十二军高双成部伊东游击支队长陈秉义、邬青云（即邬四儿）、王永清、段宝山，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路副指挥官韩祥符，团长贾克振、冯子明等人为活动对象。陈秉义、邬青云、段宝山部，由他二姐活动。韩祥符、贾克振、冯子明、王永清，由杨守程活动。那年冬天，王英的二姐王友琴着他的儿子张子茂亲往陈秉义、邬青云驻地河西新城、树林召等地联系，陈、邬原是杨猴小旧部，和王英的私人关系较深，当时接洽妥当，愿意投靠王英。杨守程携带礼品和王英的口信，到了黄河南岸张家营村和韩祥符、王永清等联系，韩、王等人坚决反对当汉奸，并向杨守程建议，让王英早日反正，投入抗日阵营。但是无耻的汉奸杨守程说：“老司令这次叫你们过去，是为了保存你们的力量和生命，管他汉奸不汉奸，将来有了力量，归谁也有办法。看你们现在的武器破，子弹少，穿吃都没有，样样都不行，真让日本人消灭，未免有些可惜。现在正是个机会，不然的话……”这一片恬不知耻的汉奸理论，当被韩祥符等人严词拒绝，立即把他驱出河东。陈秉义，邬青云两部被诱动摇，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间叛变投王，陈、邬叛变，常志义也拼凑起二三百人，分驻在包头西麻池、乱水泉、前口，北山湾一带。日寇看见王英有了兵，就给了他一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经李守信介绍）委于振瀛、李殿林分任副总司令，杨守程任参谋长，鞠建周任参谋处长，张子杰任警卫大队长，刘汉章任特务团长，曲步霄、吉纯仁先后任驻包头办事处长，刘庆云、任参天、杜文三人任翻译。第一师师长陈秉义，副师长赵天飞，参谋长金成云。第

一团团团长陈宝山，第二团团团长贺仁杰，每个团四个连，全系骑兵，共有八百余名，百分之七十五有各种步枪手枪；第二师师长邬青云，副师长高理亭，参谋长许安邦。第三团团团长张永胜，第四团团团长杨占山，全是骑兵，有七百人，约百分之七十有各种步枪手枪，第三师师长常志义，副师长兼参谋长柴万善。第五团团团长贾世元，第六团团团长李红升（常志义不久病死，由李红升任师长）。全部骑兵，有七百多人。约百分之七十五有各种步枪手枪。伪绥西自治联军总计有骑、步、炮兵二千七百余名，各种枪支二千余支，迫击炮六门，轻重机枪三十余挺，还有汽车、电台等。

日寇为了加强控制王英，特组织了个绥西联军顾问部，派儿玉尧、白杵长胜、大场茂马、筱崎宝昌等四人为顾问，这几个日寇，常驻包头，虽不住在伪绥西联军总部，但是伪军调动，上报文件、填发护照等往来文件，统被日本顾问掌握，不论在任何文件上，先由顾问总部同意后，然后盖上顾问部章，才算有效。

一九三九年冬，傅作义军由后套出发，曾一度袭击盘踞包头的日寇，并占据包头城一天一夜。日寇为了报复，特由平绥、同蒲两铁路沿线抽调大批日军并纠集李守信伪蒙古第八、九两师和王英的伪绥西联军，及日寇的小岛部队、宪兵队，二万多人，在黑田师团长及水川中将率领下，配备汽车五百多辆，于同年腊月二十五日，由包头、固阳分三路向后套进犯。第一路由包头、磴口、南海子过河，先将沿河一带抗日军队进行所谓扫荡，傅军略事抵抗，即向东胜退去，日寇沿河直犯临河。第二路由包头西中滩（乌拉特前旗）直犯五原。第三路经大余太，绕狼山，出乌不浪沟，直犯陕坝。

每路配备汽车百余辆，骑匪数百名，飞机二、三架，不断进行侦察活动。约在腊月底，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在临河会合，大半个后套日寇伪军垂手而得，傅作义退往黄河南杭锦旗境，日寇追到三盛公，再未西犯。约在阴历次年正月半，日寇除将王英伪绥西联军和李守信伪八、九两师和一部日寇宪兵留守五原外，其他各日伪军全部复返包头。

留驻五原的有日本五原特务机关长桑园中佐和部队负责人水川中将、大桥上校、浅沼次郎等人，计日兵二百多名，都住在平市官钱局（也叫省银行），三个院子。王英伪总司令部驻在日盛盐店，伪绥西联军陈秉义、邬青云、常志义三个师分驻五原西邬家地、新公中、南牛棋、同义隆一带，李守信伪八、九两师分驻五原新旧两城和四郊，该两部由李守信伪参谋长乌古廷率领，乌本人住五原旧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傅作义乘着各渠道解冻时间，既不能船运，又不能涉水的有利条件，向五原反攻，同时把五原通往包头大桥多数破坏，傅作义亲自指挥向五原外围各伪军展开攻击。另外部分傅军也早混入城内，因而一经接触，在一个晚上，陈秉义等溃退五原城东，傅部乘胜跟踪追击，各伪军混乱，互打起来。日寇对陈、邬溃退情况，产生了怀疑，不许他们进入五原，陈、邬各自向东北方向逃去。五原新旧两城交通已被截断，傅部将新城层层包围，集中火力攻击日寇聚集点平市官钱局，和王英住所日盛盐店，双方战斗颇烈，伤亡也重。住五原旧城伪蒙古第八、九师，误认为王英和傅作义有联系，不管特务机关长桑原和川水、大桥、浅沼等人，就仓皇向五原东南方退去。这时正在夜间，联系中断，各自逃生。桑原率领着日寇二百多名，战斗两天两夜，死伤已达半数，弹药

也消耗将尽，虽顽强抵抗，作最后挣扎，也自知只有死路一条。鸡鸣时，王英看见确实不能支持下去，只好瞒过日寇偷走。王英生长在五原，路途熟悉，就由日盛盐店北墙挖开一个小洞，悄悄地爬出去，沿着义和渠东坝头，向北徒步，翻墙越院，逃出包围圈，天亮后才逃到离五原北约二十里陈家圪旦村。相随王英逃出者，仅有他的外甥张子茂、警卫大队长张子杰等五人。伪参谋长杨守程为了掩护王英在义和渠东坝头被击毙。这时包围圈更缩小，日寇死伤更多，桑原、大桥，先后被傅军击毙，仅留下浅沼次郎等五十多人，和王英伪军主要幕僚李根车等一并被俘，五原即告光复。

王英逃到陈家圪旦村，陈秉义带领着骑兵数十人也到，王英放声大哭，骑上马随着陈秉义没命地向西山嘴逃奔。行至桥头时，又被傅作义部旅长安华亭阻住去路。伪蒙古第八、九师因不识水性，企图涉水渡过乌梁素海逃命，但因冰薄踏塌，绝大部份人马，均被淹死。残余匪徒，由伪参谋长乌古廷领着也逃来西山嘴。乌匪见到王英后，大哭说：“如果过不了桥，我们都要死在后套，王司令请您赶快想办法吧。”王英说：“守桥安旅长是我的旧部，我已经给他去了信，请他思念前情，放我们过去，我看问题不大，你不必着急。”安华亭原来在“大汉义军”充当旅长，在绥北反正投傅，他认为参加抗日和当汉奸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应该留点后路，万一抗日失败，还可以再投日本，所以他把守桥部队立即撤离，让王英、乌古廷等大小汉奸两千余名过了西山嘴唯一的去路（全后套各个渠水，完全通过西山嘴桥退到黄河里，在当时解冰时候，除由这座桥通过外，再无别路）。王英过桥后，安华亭还掩耳盗铃，马上把桥自动炸毁。傅作义

知道安华亭有意放走王英，不久就将安撤职。

王英等闯过桥后，当天日寇由包头派来汽车，把王英、乌吉廷二人接回包头，陈秉义、邬青云、常志义等伪军，退往安北南昌一带整理。约半年，王英伪绥西联军全部开往西公旗。

王英自五原惨败后，全部盘踞在西公旗，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再未移动。在他们盘踞时期，强迫农民种大烟，霸占农民水地，包揽民间诉讼走私贩毒，设立税卡，制造料面，欺压人民，无所不为。据不完全统计，最少每年强种大烟一万三千亩到一万五千亩，按照土地质量分三等，上等地每亩征收大烟硬板子十三两，中等十两，下等八两。估计每年征收大烟十三万两或十二万两，在五年内总共收过硬板大烟四十五万两到五十万两。每年在烟苗成长后，王英指派专人分往各乡村，详细丈量登记种烟户的姓名、亩数、水、旱地等级，待收割大烟时，又派专人，挨门逐户按照第一次丈量底册，重新复丈。复丈时，烟户们给复丈人员送上钱、招待好，可能按照原丈量数算，如送的少或招待稍差些，即给增加。这群恶狼在出动前，各种烟村就杀猪、宰羊、磨白面、做豆腐、漏粉条、熬大烟、买纸烟、买烧酒，调厨师、派差役等准备招待。这群恶狼每到一村，最少二、三天，一切费用，按烟亩摊派，一般每亩摊派伪蒙疆票五元，少也得四元。公开行贿送人情在外。否则，烟板子再好再硬，也说里边水分大，质量不好，甚至还说里边掺假，就要七、八折扣除。再加上他们加一的大戥子，来回折扣，应交烟板五十两，最少也得交七十两，才能取消所谓官税。如果一次交不清，再来个第二次催征，就把所收割的大烟全数交清，也不

够所谓“官税欠数”。种烟农民们今年吃了亏，明年还得按今年的亩数，如坚决不种，也要按照种烟征收大烟，或者说你违抗政令，即受惩罚。如此敲诈勒索，强迫搔扰的罪行，长达五年之久。

王英每年把大批烟土集中后，首先让他的料面厂厂长王美，进行挑选和化验，把准备作料面的，另存一处，然后召集各伪师、团、处长和有关经手人员，开一次分配大烟会议。先决定由总数内送给日本顾问每人五百两，翻译每人一百两，再按伪蒙疆规定，每年卖给烟土组合八千两至一万两。除此以外，按照军级分配：如伪师长、副总司令、伪参谋长每人二百两，伪处长、团长每人一百五十两，伪班长每人二十两，士兵每人十两。除分配外，每年剩余最低还有二万五千两到三万两，作为制造料面原料，每天能出料面一百五十两到一百八十两。待积到一定数量后，王英亲自带上，乘坐日本飞机，直送天津、北平销售，年年如此。五年来，王英在北平、天津用这种款项就置买了中西式房院七、八处，其中有一处在北平宣武门外头发胡同甲一号，为最好。听说这个院花了黄金一百条，内有花园、走廊、过亭、大小客厅、暖气等一应俱全。所有陈设都是高贵物品，如玻璃砖桌凳一套，就花了黄金十条（每条重十两）。茶几一套，又是黄金一条。另外还以此种款项，为他的三姨太太张筱红雇佣丫头二个，老妈一个，厨师一个，看大门人一个，武装勤务二个，开汽车的一个，供他一人使用。

王英在前旗盘踞五年，还在白金宝圪旦村设立税卡一所，派秦邦玺为卡长，征收往来货物税，起名为“保护费”。每百斤征收三元。据统计，五年来总共征收税款竟达伪蒙疆

票一亿元。一九四三年，被傅作义部袭击一次，秦邦玺被俘，还有几个汉奸被打死之后，他又派个刘某仍在该村设卡征税，继续勒索往来客商。

一九三九年，郭青云投入伪绥西联军，充当了师长，因在五原受到残酷失败，和经常遭到日本顾问儿玉尧等谩骂和鄙视，也遭到王英的歧视，因此他经常对夥友高理亭流露不满。而高听了郭的怨言，故意劝他再反正，企图取而代之，自己爬上师长地位。高理亭从此就和傅作义的第十八战区第二处军统特务史弘有了联系。史经常派特务傅秉谦潜往郭部策动“反正”。一九三九年冬天，黄河结冰后，高理亭、傅秉谦看出郭青云反正意图尚不坚决，他们一面向郭青云说：

“日本顾问儿玉尧等对你平常散布不满意王司令的话很注意，前几天我们又听到总司令部要召集你我同团长以上的人到公庙（王英伪总部处）开会，名义上是冬防会议，实际上想把咱们一齐杀掉，你要即作准备。我们不去，我劝你也不要去。”一面又秘密向王英、儿玉尧写一封报告说：“最近郭青云和傅作义互有往来信件，计划反正，请速准备，作好防止办法。”王英、儿玉尧认为高理亭是他们的心腹，一面加紧防范，一面借开会名义要把郭青云诱到公庙杀害，并秘许高理亭当师长。不久，王英果然召集郭青云等到公庙开紧急会议。郭青云接到通知后，当然不敢前往，高理亭乘机煽惑说：“如果不去，赶急做好准备工作，以免临时失措，受到损失，同时写个报告，就说你病了，不能前去开会，我们赶快和傅作义联系。”郭即表示同意。王英、儿玉尧接到郭青云报告后，马上派了汽车十数辆向郭青云防地杨占山伪团部开来，侦察情况，郭青云认为日本来包围他，即令杨占山开

枪阻止，日寇也认为邬青云反正行动已成事实，即开炮还击。王英、日本人、邬青云混打了一阵，他们都认为高理亭是自己的心腹人。邬青云就在这样情况下逃过了黄河，算是反正了。

邬青云反正不久，傅作义的第十八战区保安团团长王万抚，又名王拴子，由五原叛变，投降了伪绥西联军王英。王英为了填补空缺，不管王万抚人马多少，就把邬青云伪第二师名义给了王万抚，住在邬青云原所住的乡村，另派许安邦为王万抚师伪参谋长。王万抚只带四百余人，编为四个连，当了汉奸，就让原连长袁根宝、陈望高充当团长，又收罗些败类扩充到七百余。约半年后，袁根宝也投归傅作义，当上原来王万抚的所谓保安团团长。接着陈旺高因受不了日寇的气，认为“傅作义抗日，王英当汉奸，邬青云、袁根宝反正，都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干脆当土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抗日当汉奸还要自由。”遂领了二百多人当了土匪。这时候王万抚的所谓师，仅留下二、三百人，但是第三师的牌子仍然挂着。直至日寇投降。这个祸害绥西五年之久的大汉奸集团，才被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收编为骑兵第一集团军，王英又当上了傅作义的所谓“国军”的集团军总司令。

（六）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傅作义派孙兰峰进占包头，路经西公旗公庙时，将伪绥西自治联军王英部改编为第十二战区骑兵第一集团军，任命王英为总司令，陈秉义、王万抚、李红升（这时候常志义已死）分任师

长，其他各团长还是伪绥西联军那一伙。孙兰峰、王英等先后进入包头，不几天孙兰峰又将汉奸何连顺旅也拨归王英指挥，并令积极东开，抢占地盘。傅作义到归绥，命令王英在包头集中，抢占集宁、丰镇、大同等地。王英到大同后，派王万抚师张永胜团，向已经解放的聚乐堡一带进犯，当被人民解放军迎头痛击，张部官兵几被全歼，残余狼狈回窜大同。这时丰镇、集宁等处也已解放，王英和马占山就被困在大同。傅作义再让王英反攻丰镇、集宁，让马占山部为后援。王英奉命后，由大同折返丰镇城南四成洼村，令陈秉义、何连顺等匪部向丰镇进犯。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歼这群匪军，对他们略加回击，即大部份转移丰镇外围有利地形，一部份转入地道。陈、何两匪军进入丰镇后，自认为“胜利”，一时得意忘形，奸淫妇女，抢劫民财，无所不为。不想人民解放军突然四面八方展开猛攻，陈、何匪部立即慌成一团，东奔西跑，企图逃出。正在混乱中，转入地道的人民解放军也出来了，陈、何匪军受到内外夹攻，溃不成军。当时匪团长贺仁杰以下连排长和士兵被打死打伤共计二百余名，被俘者百余名。陈、何匪首率领残匪拼命逃出包围，回窜四成洼村，向王英哭诉失败原因，丰镇又告解放。马占山的援军行至孤山，已被人民解放军阻击，听到陈、何两部败退消息，夹着尾巴又逃回大同。王英困居四成洼已被包围，眼看全歼，急得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此时陈秉义、何连顺、王万抚等，先后逃来，各诉受到解放军痛击，谁也不敢再提“反攻”二字。王英听完后，吓得魂不附体，一声不响，只是痛哭流涕，说什么“我现在真没主意了，傅作义他不来打头阵，让我先送命，事到如今，只有一死罢了。”陈秉义主张降

回归绥，王英说：“闯归绥倒是可以，但四、五百里路，到处都有解放军，怎么能回去呢？还是回大同比较近些。”陈秉义、何连顺、王万抚异口同声说：“天底下是空的，解放军再多也站不成长城，当了半辈子土匪，还怕打仗吗？”遂决定回绥远。王英无可奈何，只好跟上走。这伙匪徒如丧家之犬，没命的向归绥逃窜，但是沿途又受到人民解放军堵击、尾追，溃不成军。所谓三师一旅之众，待到达旗下营后，损失已达半数。王英喘了口气，赶忙爬上火车逃回归绥，住入公教医院。陈秉义等暂驻旗下营一带。王英见人就就说：“我在军队上干了四十多年，大小战争不知见过多少次，从来没见过解放军这种战术和勇敢敏捷，步兵比骑兵还跑的快，几天以来，打得我不用说抽大烟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唉！这一次几乎要了老命，我是不干了。再干就要送老命。”王英真吓得病了三个多月。在公教医院时，有时在睡梦中还是说：“快些跑！快些跑！”王英的病好转后，所谓第一集团军又改编为十二战区骑兵十四纵队，王英任纵队长，陈秉义任副纵队长。陈宝山、李红升、王万抚等分任团长，全部仅有一千余名。王英认为傅作义想把他挤掉，乘机请长假。初期，傅伴不同意，后来准许他休假三月，回天津看家。王英即乘美国飞机，飞往天津，一去不返。这个汉奸匪徒摊子，才让陈秉义接收。一九四九年三月，该十四纵队又改编为骑兵十一旅，陈秉义任旅长，白风藻任副旅长，李兴久任参谋长，贾世元等分任团长，全部开往固阳县。一九四九年绥远和平解放。才把这个祸害绥远、宁夏、陕北、察哈尔、晋北等地三十多年的坏根子，彻底拔除。

一九四六年秋，王英回到北平，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九

经常和些特务头子如史弘等，勾结在一起，不久又取得了蒋介石北平行营高参头衔。他又在平津两地活动，企图和人民为敌到底。待傅作义在北平组成所谓华北总司令部后，王英又向蒋介石写了一封所谓“反共救国军”建议书。此书正合蒋介石口胃，蒋即委王英为平绥路“剿共军总司令”。王英在特务策动下，继续和些反动到底、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勾结进行破坏北平和平解放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北平解放后，王英仍然暗地活动，经人民政府数次劝告，终不悔改，因此于一九五〇年被捕，虽经政府耐心启发和帮助，王英丝毫没有认罪的表现，结果于一九五一年一月间，在北京天桥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这个祸害绥远四十多年的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大汉奸王英真是死有余辜！

（一九六五年元月）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

亲赴长春与关东军勾结

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蒙疆政权的正式开始。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并且蒋介石杀了我的得力干部韩风林，令我非常不满，又加在西公旗事件和特税问题上，我与绥远当局的斗争也着着失败，使我更为气愤。因此，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我就和日本方面暗行拉拢，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扩充实力，以达成建立“蒙古国”的妄想。到了一九三五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这时我由百灵庙返锡盟苏尼特右旗，日本关东军特来电报邀我前往伪满新京（即长春）商谈要事，我即偕同迪力瓦、陶克陶和驻在我旗（苏尼特右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中岛万藏等乘飞机前往，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西尾参谋长。旋即和坂垣副参谋长、田中隆吉参谋等商谈，结果商定：日本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五十万元和五千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

我由长春返旗后，就和宋浦商量，关于搞“独立局面”，成立统一机构问题。宋浦建议说：“现在日、蒙既经合作，统一机构，必须从速建立，我看最好是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因为这样做是承认已成事实，易于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当时我认为这事有和蒙政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云王）研究的必要，就带了十万元前往百灵庙交到蒙政会上，作为扩编保安队之用，并向云王报告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云王说：“既然这样做了，就应本着‘怕就不做，做就不怕’的精神继续进行，但必须慎重从事，力求稳妥为宜”。接着我又说：“现在亟需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一个办法是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一个办法是强化蒙政会，你看那一个办法好？”云王说：“在你盟（锡盟）那边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联络上较为方便，在百灵庙这边强化蒙政会，做为统一指挥机构，不大方便。”意思是怕傅作义反对。

我由百灵庙返旗后，适田中隆吉来和我商谈这一问题，我提出要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强调这是我和云王商洽所得出的意见。田中隆吉主张成立“蒙古军政府”，强调这个名称响亮，包括政治和军事，可以指挥行政和部队。讨论结果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他就急于要走，说是主持进攻察东之事。我就着手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日寇策划进攻察东经过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

军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进犯察东的借口，故意挑起了张北事件。扮演张北事件的主要角色的本信亲说：“张北事件是多伦特务机关故意制造的，根据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一九三五年夏，我和日本商人三名，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政府的护照，强要进城，守城士兵阻挡，不令通行，因而发生口角，被守城卫兵把我等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得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本人的侮辱，提出强硬的交涉。”经中、日双方进行谈判的结果，在缔结协定条款中规定宋哲元的正规军从张北、宝昌、康保、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以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地带。日本关东军就乘此机会，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促使李守信率队于一九三五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保安队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加强兵力进攻，并有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助威，投弹轰炸，当地保安队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六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进驻张北县城。此时需要建立行政机构，统辖所属旗县，当由我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并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白云梯、吴鹤龄之来

这时国民党中委白云梯落选，政场失意，潜住天津，想

来蒙地活动。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特派中岛万藏乘坐飞机，前往天津把白云梯接到我旗，意在拉他下水，以资号召。吴鹤龄也因活动国民党中委未成，欲来蒙地活动，但吴鹤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好脚踏两只船，特去面见参谋总长朱培德说：“听说德王已和日本拉上关系，蒙政会那边情况可能有变动，我想去一趟，劝说他不要胡闹，别上日本人的当。”朱培德当时将他这一套活动转达了蒋介石，蒋即召见吴鹤龄说：“你要去蒙地走一趟是可以的，但务要随机应变，能够设法制止日本西进更好，如不能制止时，能够设法使其缓向西进就行。只要你能作到这一点，就算完成了你此行的使命，也算你的一项功劳。”

（这段话是吴鹤龄在日本投降后，才告知我的。）于是吴鹤龄便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委尼玛鄂特索尔（尼冠洲）衔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离京北上。他们到达北平时，我正在百灵庙，曾接到吴鹤龄要来的电报，我复电欢迎他速来，就返归我旗。

陶克陶特向我报告说：“曾说吴鹤龄来，要从中破坏蒙、日合作，日本方面决定要处置他。”我听到陶克陶报告后，就去特务机关找穴浦说：“我听说你们有处置吴鹤龄的计划，千万不可这样作，因为吴鹤龄是我叫他来的，希望他帮助我们工作，你们要处置他，对于以后蒙古人，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影响不好。”穴浦答复我说：“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决不处置他。如果蒋介石的蓝衣社派人把他杀了，可与我们无关。”我觉得穴浦的话仍有杀害吴鹤龄之意，遂将此事告知迪力瓦，希望他出些主意。迪力瓦很郑重地提醒我说：“吴鹤龄曾与你意见不和，发生过冲突，如果这次被日本人所杀，外界可能怀疑是你所

为，你就有口难辩，怎也洗刷不清了。务要从速电知吴鹤龄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张北，你好便从中保护。”^e我很以迪力瓦之言为是，即给吴鹤龄去电报，约定务于二月一日正午十二时即“察盟公署”举行典礼时到达张北，万勿有误。迪力瓦旋又向我叮咛嘱咐说：“你仅约定时间在张北与吴鹤龄见面，以便从中保护，我认为还不够周密，应该派可靠的人率同卫队前去保护，接他来王府才妥当。”我遂又派李秀山率同卫队乘坐大汽车一辆，前往张北保护吴鹤龄，并接他来我旗。我即偕同达密林苏龙，乘坐飞机到达张北，这时尼冠洲已先期到达，^f吴鹤龄果也如约前来。见面之后，我很想把日本人方面预谋杀他的消息告知他，但这时李守信、卓特巴扎普和田中政日本人等都来和我周旋，我又去李守信的部队中送去劳军费一万元，紧接着又参加了“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总未得到机会和吴鹤龄个别密谈。举行典礼后，我又催促吴鹤龄速赴我旗，吴还强调说：“你知道我是一向素食的人，虽然带有厨子来，还得整理一下用具，忙什么要走呢？”我很着急地触动他的衣襟说：“现在你要听我的，我叫你走，你就快走，万勿延误！”尼冠洲在旁也劝吴鹤龄说：“德王爷很诚意地劝你走，你就走吧，不要固执啦。”谈至此，我即赴飞机场乘飞机返旗。

吴鹤龄也在李秀山率队保护下，偕同张绍庭、于宝恒等乘坐汽车起程，到达城门时，因未持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拦车不准通行。吴鹤龄当即派员到“察盟公署”托请尼冠洲取到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始验证放行。车开出张北几个小时，天又傍晚，快到化德时，见后边有汽车灯亮，似在追赶，因吴鹤龄所乘汽车，速度较快，后边汽车灯亮不久就看

不见了，当晚宿于化德。

这时鲍贵廷正率一团士兵驻守化德，他的日本顾问烟草谷，接到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扣留吴鹤龄的密令，即催促鲍贵廷执行。宝贵廷婉言拒绝说：“吴鹤龄不是到别处去，而是到德王府去，德王并派有卫队保护，我不能下手扣捕，如果非要扣捕他不行，可以迳向德王交涉。”烟草谷见宝贵廷不执行，急得直跺脚说：“这是特务机关长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要受到处分，非执行不可。”宝贵廷说：“我如执行这个命令，无法向德王交代。并且吴鹤龄跑不了，要抓他很容易，何必急于在此地扣捕。”烟草谷见宝贵廷坚不执行，虽然十分着急，但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才伸入西蒙，尚须尊重蒙系军官的职权，迁就宝贵廷的意见，不能以顾问资格直接指挥士兵，他手下虽有几个亲信随从，也不能把拥有几十个卫队的吴鹤龄扣捕，遂即作罢。吴鹤龄却得在化德安全渡过一宵，翌晨乘车到达我旗。我当即安排他住下。

吴鹤龄到我旗第二天，我把接到尼冠洲被杀的电报转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特来见我说：“我在南京已给蒙政会要下十万元的建设费，本想领到后再来，但是接到你的电报，嘱我不要候领十万元，务要从速前来，这次又这样地保护我，你把我看得比十万元还重要。”他这样来表达他对我感谢的心情。我当即安慰他说：“这是我很需要你帮助的，所以希望你从速前来。这次对你略尽保护之责也是应当的，何必感谢，今后希望你安心居住，不要顾虑。”

尼冠洲被杀事件经过

尼冠洲是明安旗的佐领，为卓特巴札普的得力助手，时常代表察哈尔盟到外边进行联络。尼为人擅长辞令，善于交际，好作政治活动，因此名望逐渐提高，成了察盟人士中头角峥嵘的知名人士，在国民党政治场合中，都视他为蒙旗地方上有力人物，吴鹤龄一向同他过从甚密，引为知交，他当选国民党中委后，吴鹤龄当然更和他拉近，以资互相支援。吴鹤龄衔蒋介石使命，前来蒙地活动之事，可能是与他共同商量后所作的，所以，他们二人一同离京北上。到达北平时，尼冠洲遂以新当选国民党中委资格，对来访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来蒙，是为了宣抚蒙旗归向中央，因此，就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当他来到张北后，卓力巴特普倚为自己的唯一臂助，当委以“察盟公署”总务厅长之职。日本方面也知尼冠洲是察盟的有名人物，拉他下水参加察盟工作，在政治上可能引起一定的作用，也同意他任此职。尼冠洲因新当选国民党中委，当然倾向国民党中央，表示推托不就，却劝说卓力巴特普勿受日本人愚弄，要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参加察盟会议上，提出很多为日本方面所不愿接受的问题，当更引起日本人的嫉恨。

据吴鹤龄对我说：在参加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时，尼冠洲指着成吉思汗造像前所供的九只羊说：“我们蒙古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这九只羊供品，其他一切都是日本人所做的，都受日本人操纵把持，我看你跟我回到张家口过年去吧。在此地能够干什么。”假如这话为日本方面侦知，当更对尼冠洲嫉

恨在怀、定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我从陶克陶的报告中，仅知日本特务机关要处置吴鹤龄的消息，不知有杀害尼冠洲的阴谋。同时我更认为，尼冠洲有卓特巴札普的保护，不致发生意外，所以只顾保护吴鹤龄的生命，没有注意尼冠洲的安全。在我返旗后不几日中，白云梯借故要去张家口，尼冠洲也要返回张家口渡春节。白云梯之走，虽未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尼冠洲返张，却招致日本方面的怀疑。认为他从中破坏“日蒙合作”，会泄露机密。日本特务机关遂决心暗下毒手杀害他，预先派出警兵，换穿便衣，冒充土匪，在万全坝上埋伏等候。当白云梯和尼冠洲分乘汽车先后到达万全坝上时，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持枪拦住走在前面白云梯所乘的汽车，打开车门，略加询问，即行放过。接着又持枪拦住尼冠洲和梁芝祥所乘的汽车问道：“那位是尼委员？”尼说：“我是尼委员。”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又说：“请尼委员下车，我们有话说。”尼遂下车，当被一枪打中要害身死。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遂弃尸道旁，扬长而去。对梁芝祥却未加追问，仅受一场虚惊，后来梁芝祥对我谈述这个惨案经过时，犹有余悸。

尼冠洲被杀后，外界曾有这种谣传，说尼冠洲当选国民党中委后，蒋介石曾召见他，告知对日进行妥协计划，叫他北来和日本方面暗中接洽进行，嗣又怀疑这个人不可靠，深恐泄露机密，遂又派蓝衣社人员将尼冠洲刺杀，以资灭口。据我推测，这个谣传是日本特务机关故意散布的烟幕，掩盖他们暗杀尼冠洲的阴谋。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不但用阴谋毒辣手段，把尼冠洲置之于死地，而且散布阴险欺诈的烟幕，以欺骗、愚弄蒙古人。

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不能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为了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我从张北返旗后，就从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中坚干部超克巴图尔（陈绍武）、赛吉尔胡（丁我愚）、玛哈希力（赵文儒）、乌勒吉图（张秉智）、札拉嘎木吉（白景畲）和原在我旗的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斋、补英达赖、郭尔卓尔札布等，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工作。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经查对《王公表传》，这年正是成吉思汗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象征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了中国的辖属，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实则是走上背叛国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经过积极筹备就绪后，即定于一九三六年旧历正月十八日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典礼是在我的王府大蒙古包中举行的，一切都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在大蒙古包中正面悬挂起成吉思汗遗像，遗像上面挂着很长的哈达，遗像下面供桌上摆着九只整羊及其他供品等物，蒙古包门上交叉竖起两面蒙古旗。典礼开始时，规定一律实行叩拜礼。我率领蒙古职员向成吉思汗遗像行了叩拜礼后，参与典礼的日本人穴浦、前川也跟着行了叩拜礼。我看到这种情形，真是得意忘形欣然自得，便向坐在我旁边的郭尔卓尔札布说：“你看日本人都向我们祖先磕头了！”行礼后，我就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资格宣读誓辞，誓辞的主要内容是：“我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我宣读誓辞后，本来预定由关东军西尾参谋

长代表日本方面，致祝词，只因这天降雪甚大，天气不佳，他没有及时赶到，暂行宣布散会后，西尾才乘飞机来到我旗，乃再召集职员开会，西尾遂当众宣读祝词。祝辞大意无非是“日蒙携手，亲密合作”等语。但他祝词中所提到的是祝贺成立“蒙古军政府”，不是祝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这又说明在名称上还没有统一起来，仍然各行其是。西尾致祝辞后，就摆上全羊席招待他，宴会后，他就乘飞机走了。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我就责成陈绍武等制定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和安排主要人事。因甚感人手不足，特从伪满约来仓都仍（包海明）、璦门达赉（高庆春）、图木勒巴特尔（刘定一）、恩和阿木尔（包崇新）等，由北平约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莎彦毕勒格图（陈靖寰）、那苏图（王庆三）、忽克金（陈化新）等。在组织大纲中，规定“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首领为总司令，大家推举我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下设军务、政务两部和一个秘书处，另外还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负指导军事、政治之责。军务部长派李守信兼任，其下设一、二、三课。第一课课长敖云章（未到任），第二课课长王宗洛，第三课课长于兰斋，分管军政、军令、军法、军械、军需、参谋、作战等事项。政务部长由我自兼，其下设内务、财政、文教三处。内务处长金永和，财政处长包悦卿，文教处长郭尔卓尔札布，分管民政、礼俗、宗教、文化、教育、财政、交通、实业等事项。秘书处处长补英达赖，下设一个秘书室和文书、人事、会计、经理四科。机要秘书陶克陶，秘书陈绍武、丁我愚，文书科长赵文儒，人事科长张秉智，会计科长旺尔克札布，经理科长孟昭义。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文教顾问堀井德五郎。这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概况和主要

人事阵容。这时吴鹤龄因日本方面还不谅解，没有派他担任重要职务。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首要的工作是招募士兵，扩编军队，除派宝贵廷、乌云飞赴卓、昭两盟继续招兵外，并派包悦卿赴哲盟招兵。其次，因是年锡盟大雪成灾，成立了雪灾救济委员会，以郭尔卓尔札布为主任，发出通电呼吁救灾，募集灾款。这年冬末春初之际，降雪甚大，天气奇寒，平地积雪尺余，草原多被覆盖，水井为之冻结，牲畜遭受冻饿而致死者甚多，牧民生活受了很大影响。因此，一面派员赴伪满募集赈款，一面通过“善邻协会”在日本国内募捐，并用“雪灾救济委员会”名义，向国内各界呼吁救济。结果从日本和伪满方面募到赈款二十余万元，从国内募到赈款四万多元，由赈济委员会华北方面负责人何绍南，亲自送到百灵庙蒙政会者一余万元。关于这项赈款的使用，我采纳了吴鹤龄的建议，决定集中使用，不可分散救济。所以这项救济款并未用在救灾上，以后由吴鹤龄把持，用来作为毫利希亚（蒙语，其意为合作社）的资金，不仅吴鹤龄借此大发其财，就是他的手下人罗厉甫、戴宗元也成富翁。罗厉甫在北京广置房产，大开商店，成了有名的罗二爷。

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换成了浅海少佐，这个人飞扬跋扈，粗暴蛮横，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充分暴露出来，居然以征服者神气出现，对我指挥命令，毫无礼貌，对蒙古职员更是采取高压手段，见面非打即骂。大家初则避之，不敢

挫其锋，继因浅海的蛮横态度，有加无已，均表不满。有一次在冰天雪地中，浅海召集全体职员讲话很久，冻得大家手颤腿战不能支持，接着他又进行考试，就地出题，限时答卷，看见有的人站立姿态不稳，就掴耳光，或用拳头猛捶其胸，简直把蒙古职员当牛马看待。由于浅海对人的态度蛮横，引起大家的极度愤慨，纷来向我表示不能忍受浅海的侮辱。有人提出：这是复兴蒙古，还是出卖蒙古？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还是裕仁的奴仆！要求离职回家，不愿在此地工作，以免时遭侮辱。有的主张与浅海抗争，不要示弱，我与陈绍武等研究对付浅海的对策，认为浅海的态度蛮横，定有接近他的蒙古人之为出谋划策。而当时通晓日语接近浅海的蒙古人中只有金永昌和陶克陶二人，并认为陶克陶还在青年，不无一点血性，不致出此下策；而金永昌一向对浅海低声下气，表示恭顺服从，并常为浅海当蒙语翻译，宣扬浅海的好处，他可能对浅海献策：在日蒙合作开始时，应当用高压手段，和严厉态度，对待王公和青年，以树立威严，便于今后压服、控制。陈绍武向我建议，为了对付浅海的蛮横，安定大家的情绪，一方面在金、陶二人之中，必须拉一个、打一个，陶克陶虽是关东军的“嘱托”（日语原意也为委托办事，但在此是一个职称，指专为日本特务机关搞特工），毕竟还是青年，易供你的驱使，而金永昌老奸巨猾，不易受你的驾驭。为今之计，应当拉陶排金，并向陶克陶说明我们团结起来是反对浅海，不是反对日本，叫他向关东军反映浅海的粗暴蛮横，影响“蒙、日合作”甚大，应当从速调离其职务。另方面，并应召集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加强团结，努力民族事业”。我很以陈绍武的意见为是，表示同

意这样做。同时我对浅海的作法和金永昌的行为，也是不满的。因为我原来是妄想利用日本的势力，实现我的统一蒙古、掌握大权的野心，还以为自己不是日本的傀儡呢。金永昌在浅海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我很看不起他，对于陶克陶却有好感，因他曾向我透露日本特务机关谋杀吴鹤龄的消息。对于浅海的做法和态度我更是不满意的。他任我旗特务机关长后，曾去乌珠穆沁右旗面见索王说：“今后蒙古的事情完全由德王负责去作，希你不要从中阻挡。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对索王的恫吓，对我的支持，但我认为他这种说法很不妥当，因为索王一向对日本没有好感，不愿与日本“合作”。经我采用很多办法，才说动他同意“蒙、日合作”。我认为对他应当迁就和尊重，以资号召，不意浅海竟出以威胁恫吓之意，这会使索王怀疑浅海对他的恫吓是出于我的教唆，会离间我和索王之间的感情。同时我也感到浅海的态度非常蛮横，对我毫无礼貌，动辄指挥、命令。因此，我就同意了陈绍武拉陶排金、反对浅海的建议，由陈绍武拟具一个以“加强团结，拥护领袖（指我），内除奸细（指金永昌），外抗强权（指浅海）”的誓辞，在我王府的西跨院房内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张挂成吉思汗像，备有奶酒。计被邀签名参加者有陶克陶、陈绍武、丁我愚、赵文儒、孟昭义、刘定一、包崇新、白景畲、王庆三、张秉智、包海明、高庆春、吾力吉卜林、陶克托胡（陶布新）等。首先由我发言，大意是“忠心为蒙”，不威强权等语。继而宣读誓辞，由参加者签名划押后，面对成吉思汗像，举手宣誓，痛饮奶酒，大有歃血为盟之势。会后我切嘱大家，必须严守秘密。

经过这次会议，果然得到了效果，一般干部便由动摇中

安定下来，对浅海的蛮横态度，多置之不理，有时也起而抗衡，浅海对人的态度也较为缓和。迁至化德时，日本关东军即将浅海调走，另派田中玖为特务机关长。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大错误，并有罪恶。我投靠日本，浅海就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当即招致蒙古青年的不满。我搞的所谓“独立局面”，大有“树倒猢猻散”之势。这本来已经值得我深思和觉醒，但我为政治野心所驱使，正在陶醉于“蒙日合作”之中，认为浅海既然态度蛮横，换一个态度温和的特务机关长或可好一点。结果赶走了态度蛮横、作法强硬的浅海，换来了一个貌似温和、手段毒辣的田中玖，还是照样执行侵略蒙古的政策。我运用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宣读誓词的方式，麻醉了蒙古青年，使大家从动荡中安定下来，跟我一同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既误了很多蒙族青年，又断送了西部蒙旗，真是罪莫大焉。

(二)

在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后，由于僻处牧区，交通不便，指挥失灵，非常影响工作的进展。并因人口稀少，物资缺乏，房屋不多，在供应和居住上多感困难。而且我曾听到田中隆吉说过：西尾参谋长参加典礼后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成立“蒙古军政府”。这时吴鹤龄也向我建议：“既然日本关东军喜欢‘蒙古军政府’这个名称，我们就成立‘蒙古军政府’吧，何必强调非叫‘蒙古军总司令部’不可，弄得在名称上不一致！”

同时我感到，关于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之情形、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均有向各盟旗报告和讨论之必要，于是就责成吴鹤龄拟具成立“蒙古军政府”和建立“蒙古国”草案。在建立“蒙古国”草案中，特别强调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要以原有盟旗（包括东、西盟旗）为领域，以葫芦岛为海口。恰好这时田中隆吉又来我旗，我就将建立“蒙古国”草案交给他，请他转向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当时他把这个草案随手放在衣兜里，可能未向关东军反映，后来到了化德，他又把这个草案原封未动的交给我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绥远，只要把绥远拿下来，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我和吴鹤龄等研究，为了讨论“蒙、日合作”及今后如何开展工作问题，急需召开一次有西盟全部盟旗参加的蒙古大会，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决定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这样决定之后，就以“蒙古军总司令部”名义，下令锡、察两盟各旗扎萨克和总管，务要亲自参加；以蒙政会名义，通知乌、伊两盟各旗及阿拉善、额济纳、土默特等旗，派主要人员参加。届时到会参加者，计锡盟有我和索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林沁旺都特、巴拉贡苏隆、索特那木道尔吉、多布敦、道尔吉、桑都克道尔吉、贡桑等。察盟除东西四旗未派员参加外，察哈尔东部八旗都参加了，计有卓特巴扎普、特穆尔博罗特、哈斯瓦齐尔、色楞那木济勒、穆克登宝、补彦、阿由尔札那、萨穆丕勒诺尔布等。乌盟参加者有沙拉巴多尔济、葛什克达赖等。并把在蒙政会秘书厅任科长的伊盟达拉特旗人那逊德勒格尔约为伊盟代表，把在蒙政

会实业处任科长兼参议的额济纳旗人苏宝丰约为额济纳旗代表，还把阿拉善旗前来蒙政会议洽领枪械的陈那逊巴图约为阿拉善旗代表。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于兰斋、陶克陶等以“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军政首脑资格参加。这时吴鹤龄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特利用他的岳父于华亭（是卓盟喀喇沁右旗闲散王公，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与索王的旧关系，尽力说劝索王同意和日本“合并”，亲自参加大会。索王非常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但这时看到“蒙日合作”已成事实，就听从了吴鹤龄的劝说，同意了我的做法。我听说索王曾向他旗的协理图桑阿表示说：“现在已做成这个样子了，德副盟长这样做自有他的见地和他的道理吧，今后我们不必干涉他了，任凭他放手去做吧。”

吴鹤龄在大会筹备工作上，出谋划策，审查提案，表现得特别积极活跃。在部分代表到达之时，他曾和我说：“代表已经到了大部分，不能叫他们闲着，闲着就要出问题，应当召集他们开会，招待他们宴会。开会宴会，宴会开会，这是我在南京跟国民党学到的一套办法。”因此，他就和到会的代表们整天开会，讨论问题。迨到代表们到齐举行预备会议时，推选我和索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沙拉巴多尔济为主席团后，吴鹤龄在大家推举下，担任大会秘书长。他在掌握会场，进行讨论，通过议案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预备会议上，先酝酿协商主要议案，次又有人提出如何筹措军政各费。吴鹤龄主张，可向日本人借款一千万元，作为军政各费。这样协商和安排后，就在索王大蒙古包中举行正式大会，首由索王作简单的发言，说明召开此次大会的意义。继由我报告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

令部”成立及改元易帜的情形。接着就讨论议案，最主要的有下列各案：（一）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二）关于实行征兵，扩编军队，组织“蒙古军”案。（三）关于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案。（四）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组织救济新村案。因在会前已经酝酿成熟，都顺利通过。嗣由吴鹤龄宣读察盟代表中提出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由察盟划出归由“蒙古军政府”直辖案。卓特巴札普当提出异议说：“化德是察盟统辖的一个县，是谁未经我这个盟长同意，竟敢‘张松献地图’，提出这个议案来！我是不同意的。”吴鹤龄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把原文又念了一遍说：“这个议案没有人正式签名盖章，应当另议。”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这个议案就暂时搁下了。

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乘飞机赶来参加，我向田中隆吉作了个别谈话说：“索王等最不愿意的是怕你们派来顾问，过问蒙旗行政，希你以来宾资格在大会上讲话时，说明现在派来的日本顾问是帮助蒙古筹备建国，以俟工作就绪，就将派来的日本顾问一律撤回，决不干涉旗政。”田中隆吉果然照我的嘱咐，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将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只，分赠各盟旗有实力的代表，以资拉拢。接着我们又向田中隆吉提出，向日本借款一千万元问题，他答复说：“你们蒙古有石油矿吗？如有石油等矿源时，借款一千万元那是容易办到的。”从他这几句话里，充分透露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蒙古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投资赚钱的殖民地的阴谋。

田中隆吉在大会中看到吴鹤龄的活跃情形和所发挥的作

用，对他非常重视，很想拉他为日本作些工作，曾向吴鹤龄说：“我们日本人中，曾经有人主持杀了尼冠洲，我认为这件事作错了，希望你不要因此有所顾虑，今后应当放手进行‘日、蒙亲善’工作，我想请关东军给你一个‘嘱托’，你的意向如何？”吴鹤龄推托说：“这是你对我的关照，但我对此没有什么意思。”田中隆吉当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在面部上表现出不甚愉快的神色。

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端旺楚克（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莎克都尔札布）为副主席，参与大会的代表都在“选任状”上签名盖章，表示郑重，当晚即以全羊席招待田中隆吉、横山顺和参与大会的全体人员。会后由我率领一部分代表到百灵庙把“选任状”送交云王，并请他今后主持指导工作。云王表示：“我是年老力衰，德薄能鲜，深蒙大家推戴，无任感奋，希望大家共同去作，特别希望德秘书长（指我，我是蒙政会秘书长）多负责任。”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准云王辞去“蒙政会”委员长职务，调任伪国民政府委员，“蒙政会”由副委员长索王执行委员长职务，实际上由我负责。

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第一次的蒙古大会召开后，我即派王宗洛率同职员数人前往嘉卜寺接收化德县房屋，进行筹备伪蒙古军政府工作。不意化德县小林顾问拒绝腾房，发生了波折，嗣经与化德县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交涉，才把小林顾问的气焰压下去，开始腾房，进行修理。经筹备就绪后，就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

举行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典礼，参加典礼者除各盟旗代表和前“蒙古军总司令部”职员外，日本方面参加者有日本关东军今村参谋副长，田中隆吉参谋，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举行升旗典礼时，首先由我讲话，说明依据“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的意义。继由今村致祝辞，祝贺“蒙古军政府”的迁移，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礼成后，即大排宴筵，招待日本来宾及各盟旗代表。

伪蒙古军政府人事安排，依照“蒙古军政府”组织法规定，由云王、索王、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我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总裁下设一个办公厅，参议、参谋两个部，军事、财政、内务、实业、教育、交通、司法、外交八个署，一个顾问部。办公厅主任补英达赖，军事署长王宗洛，财政署长德古来，实业署长王辑唐，内务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交通署长于兰斋，司法署特穆尔博罗特（特大海），外交署长陶克陶，教育署长金永昌，后将金永昌调任驻伪满代表，由郭尔卓尔札布继任教育署长，参谋部长李守信兼，参议部长吴鹤龄，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外交顾问山本倍亲，教育顾问堀井德五郎等。嗣因总裁工作繁剧，又设四个帮办，由李守信、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等担任，帮同我处理军政事务。并派陈绍武为内务署帮办，吉致祥为教育署帮办，帮同署长处理署务。后又增设一个侍从处，由丁我愚为少将侍从处长。乌古廷由伪满来蒙后，暂派为参谋部主任参谋。这是伪蒙古军政府的主要人事安排。

组织伪蒙古军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首要的是搞军事工作，就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由我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由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两个军，八个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伪第一军军长李守信，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计第一师师长刘继广，第二师师长尹宝山，第三师师长王振华，第四师师长宝贵廷，直属炮兵队长丁其昌。伪第二军军长由我自兼，统率五、六、七、八各师，计第五师师长依恒额（依绍先），第六师师长宝彦图，后由乌云飞（突布格尔勒）继任，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第八师师长包悦卿，后由札青札布继任，警卫师师长雄诺敦都布，后改为九师由包海明继任师长，炮兵团团长王云五，宪兵队队长刘建华（那木尔），预定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一万余人。并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我旗东营盘成立伪蒙古军官学校，由我自兼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训练成果，特于是年九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计参加被检阅的军队，除伪第一军派来部分部队外，伪第二军所属各师大部参加。由我亲自检阅部队分列式。日本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来参加检阅，表示满意。坂垣旋即乘坐飞机分赴伊盟札莎克旗和阿拉善旗定远营，说是去见沙王和达王（达理札雅），做拉拢工作。我检阅部队后，赏给士兵每人银洋一元，以资鼓励。并事先派兵打来黄

羊多只，就地野餐，表示慰劳。我参加阅兵典礼后，回想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只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这时凭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虽不敢妄想恢复成吉思汗伟业，也妄想把“蒙古民族复兴起来”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我自己也作一个“民族英雄”。幻想及此，真是自鸣得意，喜形于色，有些飘飘然了。

但在得意之中，不如意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以伪第一军经费不足为借口来威胁我。有一次他带着伪第一军的参谋长刘星寒前来见我，说是军费不足，叫我设法筹措。我知他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就赌气把伪第一军的经费都批准了，并增批了一些军费，反责成他也设法筹措。他看我面有愠色，也带着不耐烦的神气，一声不响地走了。又因伪蒙古军政府成立了公路局，任命张绍庭为局长，负责办理化德至张家口及各旗县之间的运输。一般商人都愿搭乘公路局的汽车，不愿搭乘日本满铁的汽车，以致满铁汽车公司生意冷淡。田中玖为了使日本人经营的满铁汽车公司垄断交通运输，赚取高额利润，曾向我提出不供给公路局汽油，由公路局自行购买，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公路局停办歇业，我当时认为在张家口还能买到汽油，因而置之未理。不久田中玖走了，田中隆吉来了，才又供应汽油。更因我这时比较信任陶克陶，不信任金永昌，金永昌便和田中玖拉得很近，说我和陶克陶的坏话。

记得陶克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田中隆吉有一次把我叫去，正言厉色地向我说：‘田中玖说金永昌曾向他反映过，说你曾向蒙人表示，蒙古为了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合作，

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合作。现在你说这话可不行。’我当时答复田中隆吉说：‘这话是前在多伦多时，和金永昌等研究蒙古问题时说的，是在蒙、日未合作以前的话，不是在蒙、日合作之后说的。’田中隆吉反嗔作喜说：‘那时说的没关系。希你不要顾虑，我是信任你的。’”

陶克陶述说这话之后，又感慨地说：“我们的金永昌先生真厉害，如不是田中隆吉谅解我，我可能就遭田中玖的毒手了。”这又说明，田中玖是想用打击陶克陶的手法，去掉我的助手，给我颜色看，幸亏得到田中隆吉的谅解，才归无事，但这不是田中隆吉比田中玖好，而是因陶克陶这时确实成为田中隆吉忠实的走狗，绝无另走外蒙路线的意图，所以田中隆吉故意把这套话告知他，叫他感恩图报，进一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其次，令我不如意的事还有：一、因为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多是土匪、地痞、流氓、游手好闲之徒，纪律不好，在举行阅兵典礼时，竟在化德街上发生了抢案。士兵打人骂人之事，更是层出不穷，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印象。二、在编制和配备上，各方意见很多，争要军马，争要装备，例如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是察盟人，利用地方上的关系，先购足了军马，五、六两师的人就表示不满说：“我们师是先编制的，反而军马不足，有的部队仍在徒步。而第七师是后来编成的，却配备了足够的军马，很不公平。”意见纷纭，烦言啧啧，叫我很难处理，至感烦恼。三、宝贵廷曾一度暂代伪第二军军长，迨发表他为第四师师长后，就解除了他暂代军长职务，因而对我也有怨言，向人发牢骚，我听到后也很恼火，想把他调到伪蒙古军官学校工作。并叫王宗洛暗地调查

他有无煽动军心事情。王宗洛接受我的指示后，一方面告知王云五（王宗洛的胞兄）炮兵团长预作准备，以防不测；一方面调查宝贵廷的言谈行动。嗣向我报告说，宝贵廷并无煽动军心、图谋不轨事情，仅在饭馆酒醉时发过牢骚，我才未调动宝贵廷的职务。四、在征兵上，锡盟各旗都按照“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应把征兵名额按期送来入伍，只有乌珠穆沁右旗，因为保安队官佐都青阿、敖恒等反对征兵，在该旗蒙民中散布怨言说：“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是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通德王、吴鹤龄等投靠日本，扩编军队之所致，我们应当反对。”号召被征旗民杀害托克托胡，因托克托胡事先得讯逃避他处，始得倖免。继而都青阿、敖恒等又率领被征旗民到索王府请愿，要求免除兵役。这时索王正病重，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劝说，才将这事平息，不久索王也就病故。五、乌珠穆沁右旗官员们，为了应付差事，于是年冬特在林西一带雇佣些兵痞，代替该旗应征旗民入伍。李守信见着我说：“我的林西旧部属都来了。”我对该旗这种应付差事的做法，很不满意，严令该旗务要依照“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士兵送来。该旗官员们迫于我的命令，又设法说服了都青阿、敖恒等，率领应征士兵，前来我旗西营盘入伍。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后，在征兵问题上遭到乌珠穆沁右旗反对的一段经过。当时我很不满，现在回想起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征兵要马，招致蒙古人民的反对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和伪满及“冀东”缔结协定

在“外交”工作上，主要是和伪满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田中隆吉就向我建议，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我即偕同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陶克陶、卓特巴扎普、雄诺敦都布、索特那木道尔吉等，分乘飞机二架赴长春。

到达后，先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宫内府大臣熙洽、军政部大臣于深澂、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等，无非是周旋与宴会。继而就和伪满外交部谈判缔结协定问题，计日本关东军方面参加者有田中隆吉，专田参谋；伪满方面参加者有外交部大臣张燕卿，次长大桥忠一；伪蒙古军政府方面参加者有我和陶克陶。谈判开始时，首先由我和张燕卿分别致辞，张燕卿在致辞中，强调应以日本为中心，达成满蒙合作。我在致辞中，着重从过去历史和当前局势，说明“蒙满合作”之必要。接着就进行讨论，在政治、经济等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仅在军事问题上有点争论。我提出“蒙古军政府”甫经成立，实力未充，如果受到威胁的时候，请“满洲国”出兵援助，当威胁解除的时候，“满洲国”即应撤兵。大桥忠一争辩说：“从外交惯例上说，‘满洲国’为了援助蒙古，实行出兵或撤兵，应当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不能你们叫我们出兵就出兵，叫我们撤兵就撤兵。”田中隆吉插言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吧，本着‘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按照德王的意见办理也无不可，我看就这样办吧。”

因为田中隆吉知道，伪满蒙缔结协定，不过是走形式，出兵或撤兵，还得由关东军作最后的决定。谈至此就告结束了。

又经分别酝酿协商，结果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协定”，由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签字，由张燕卿代表伪满洲国签字。这个协定的内容，大致如上所述。因协定原件，在化德退却时丢失，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嗣即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伪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在伪蒙古军政府行政力量所及的地区，流通使用，由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这次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外交部，还派员陪同我们到奉天参观兵工厂，在东陵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旋又到大连游览，到王爷庙访问。缔结协定后，我独自一人去见了伪满皇帝溥仪。关于我和溥仪的关系，下面再谈。

我同伪满签定协定后，返回化德不久，田中隆吉又向我建议，应派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好向他们交涉支援经费。于是我又派陶克陶代表伪蒙古军政府赴“冀东”与汉奸殷汝耕谈商，结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田中隆吉即根据这个协定，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弄到一百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我与溥仪的关系

在这里，需要补述我和溥仪的深切关系。

在我年轻时期，因受封建社会遗毒很深，忠君思想至为浓厚。但我承袭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之后，已入民国时代，无君可忠，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的身上，非常盼望溥仪复辟。记得我十六岁时，我的姐夫穆特賚阿任察哈尔十二旗群^①的巡防马队统领，掌握数百蒙古骑兵，参加了张勋复辟活动。有一次他和我说：“我不久就到北京保护皇上登基，你有什么奏摺或对皇上有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奏。”我当时因为年轻，没有做出什么表示，后来张勋复辟失败了，穆特賚阿逃到外蒙避难，株连他的兄弟六人被杀，我还深以在张勋复辟事件中，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憾事。

迨至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溥仪迁到北京日本公使馆避难时，我曾偕同补英达赖去北京，通过外蒙驻京王公那彦图的介绍，去见溥仪。因溥仪正准备转赴天津，仅得一面，未得多谈，聊表慰问之意就辞出了。我和补英达赖就急忙返回张家口，向商家筹款一万元又到北京，前往日本公使馆，见到了溥傑，表示愿到天津面见溥仪。恰巧这时溥仪从天津来电话，向溥傑询问他母亲的疾病，溥傑趁便在电话中转达我的意思，溥仪答称：“可以前来相见。”我遂和补英达赖把一万元纸币用布袋缠在腰中，外穿宽大衣服，密赴天津，住在华石斧家。经过接洽联络，在日租界张园见到溥仪，当将所带一万元进献，并致慰问之忱。所得到的只是数句奖勉之语和赏喝牛奶一杯。但我毫无不满之心，还以为在皇上蒙难之时，得尽献款之诚，是为臣属应尽的义务，感觉无上的欣

^①群——清末民初年间，蒙古地方的一种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旗或县。

慰。在溥仪当上伪满皇帝后，我特穿上清时的蟒袍和马褂，戴上朝珠与顶戴，拍照叩拜的跪像，派我旗协理仲昆赴伪满送给溥仪，表示尊君的忠心。我于一九三五年冬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时，先和溥仪的侍从武官张海鹏见面，谈到张勋复辟失败，不胜感慨，谈到皇上又复登极，无任欢欣。接着又见了溥仪，行了叩拜礼，于心甚慰。

当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到长春来缔结协定，本有“两国相交”的意味，应当尊重自己的“身份”。但顾念过去的关系，对溥仪个人仍愿以君上事之，以臣属之礼相见。因此，当我单独见到溥仪时，还是行了叩拜礼，溥仪也挥手让座，温语相加，我们二人面对面地谈了很多的话，内容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了。嗣我看见侍从人员均已退出，只有我们二人在座，又向他说：“日本人对皇帝怎样？在我们那边，日本人气焰嚣张，仅是一个化德县顾问小林，竟敢拒绝腾房，阻挠军政府的筹备，对于往来化德的蒙人，也横加干涉，不予便利，使我非常气愤，曾向田中隆吉提出不要小林顾问。田中隆吉答复我说：‘小林顾问不好，改就行了，何必不要他。’我又反驳说：‘你们日本人不好，改了就行，为什么我们蒙古人凌辱有错就杀了呢？’”溥仪说：“你这话太硬了。”谈至此我即辞出归寓。

接着田中隆吉来和金永昌等商量，说溥仪要封我为亲王，征询叫什么亲王好。金永昌说：“封为武德亲王最适宜，因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圣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把武德二字结合起来，是表示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伟业的意思，一定适合德王的口味。”于是田中隆吉就采纳了金永昌的建议，转知宫内府办理，溥仪又召见我，亲自授与武德

亲王《钦任状》，我即拜领接受，表示谢恩。我返寓后，仔细看看这个《钦任状》，上面还有溥仪的署名，我很奇怪，怎么皇帝封号还自己署名呢？认为不合前清封王只盖大印，皇帝不署名的惯例，足见这个不伦不类的《钦任状》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不是溥仪近臣的主意。这时吴鹤龄也知此事，带有不满的神气对我说：“这时封你为‘武德亲王’有什么用处？还不如赠给你一枚勋章，表示‘蒙满亲善’，符合国际间的礼节。”我当时对吴鹤龄虽没说什么，而脑子里却在这样想，这个“武德亲王”，必要时也有用处，如对守旧的老年王公杨桑等宣扬一下，很可利用溥仪的“钦封”，提高我的身价，把向以前辈自居的老年王公杨桑等的气焰压下去。我虽有这个想法，但这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伪蒙古军政府的军政大权，杨桑等对我也比以前尊重，不再遇事阻挠，我也就没向他们宣扬此事，遂把这个《钦任状》束之高阁了。后来我又去伪满访问，拜见溥仪时，对他作了交代说：“现在皇帝在日本帮助之下，已经登极，再也用不着我效力了，我今后把忠于皇帝之心，忠于蒙古事业。”溥仪也以贵宾之礼待我，宴会时，口称我为“贵主席”了。

关于凌陞之死

上面我谈了一些我和溥仪的关系。顺便谈谈关于凌陞之死的问题。一九三六年旧历正月十八日，在我旗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后不久，田中隆吉又来我旗，商洽扩编军队之事。提到所需经费时，他说：“蒙古统一指挥机构已经成立了，亟须筹措经费，现在兴安北省省长凌陞因通苏案被

捕，听说他的财产很多，可以没收他的财产，做为军政府的军费。”我当即拒绝说：“凌陞被捕，对于蒙古人心和西进工作都有影响，最好不要严究，应当从宽发落。”至于我们所需经费，满可设法另行筹措，绝不愿把没收凌陞的财产充作我们的经费。”田中隆吉见我不但不愿接受这样来路的筹措经费，反有营救凌陞之意，立刻转了话锋，向我解释说：“凌陞虽然被捕，我想康德皇帝口头一说，也就没事了，希你放心。”谈至此，他即告辞而去。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伪蒙古大会，准备正式改元易帜，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当时我和索王，卓特巴扎普、吴鹤龄等提出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要求释放凌陞，预定关东军代表到达后，即提出这一问题。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赶来参加。刚下飞机后，吴鹤龄就将大会准备给关东军打电报，要求释放凌陞情形，向田中隆吉等报告，田中隆吉答复说：“时间来不及了，大概今天就把凌陞处决了。”接着他到屋里又继续解释说：“对处决凌陞，本来我是不同意的，在关东军参谋会议时，曾讨论处理凌陞问题，我这主管蒙事的参谋主张不杀，把前次你和我说的‘应当从宽处理凌陞，以免影响西进工作和蒙古人心’之言都说了。但是主管关于苏联事情的参谋都主张杀，最后实行表决，我是少数，只有服从多数，结果就决定把凌陞处以死刑。这是我们内部处理凌陞的经过情形，我都明白地告诉你们。”我们听他说明以后，认为既已把凌陞处决，没有再向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仅在会外时间告知了大家。索王、卓特巴扎普等，都和凌陞有交情，闻听之后，不胜叹息。嗣后陶克陶向我说：“田中隆吉和横

山顺闲谈时说，杀凌陞的事，对西蒙人的印象很不好。”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我偕同李守信、吴鹤龄等赴长春，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与伪满缔结了一个所谓“满蒙协定”之后，即到大连参观，曾和业喜海顺（业王）见面，招待我们参观的日本军官小野寺问业王说：“业王爷对蒙古事情有什么意见？”业王说：“蒙古事情我不知道，我只知有满洲国。”当时使我甚感诧异，一向好谈蒙事的业王，现在也守口如瓶，表示冷淡。这充分说明凌陞被杀后，东蒙王公明哲保身，惧怕日本，应付场面的心理。

改化德县为“德化市”

在“内政”上，首先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关于化德县设置问题，我从前就曾表示过不满，因为化德县所在地原叫嘉卜寺，正和我旗接壤，而我的名字汉语译音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人又称我为德王，头一个字都是德字，如果仍称化德，就意味着我为这块地方所化；如果改称德化，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为我所化。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包悦卿曾将我不满化德二字的意思，向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亲信肖振瀛提过，肖振瀛当向包悦卿解释说，化德县这个名称是从崇礼、尚义等县次第排列下来的，绝无化及德王、侮蔑德王的意思。既然德王对“化德”这个县名有意见，我马上建议宋哲元主席更改，希你转向德王解释，不要误会。果然为时不久，我就接到国民党内政部的通知，说将“化德县”改为“新民县”。但内政部虽有明令更改，因察东事件已经发生，没有来得及更改化德县的牌子，当地人仍称化德县。因此，

我于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决心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并因卓特巴扎普对此有意见，特派吴鹤龄前往明安旗卓特巴扎普家中，婉言劝说疏解，卓特巴扎普始答应将化德县从察盟划出，改称“德化市”，归由伪蒙古军政府直辖。我遂任命李守信兼任市长，张子荣（卜琳弼里格图）为副市长，听从伪军政府直接指挥，管理“德化”市政。

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和伪蒙古学院

其次是正式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发表吴鹤龄兼任会长，并把募得雪灾救济款悉数拨作该会基金，由吴鹤龄负责主持设置“德化商店”，收购灾民的牲畜皮张，转售部队制做军装，筹划集结灾民组成救济新村和重点植树造林等事。不意因此却引起陶克陶、金永昌的不满。他们向人发牢骚说：“这笔资金，是我们到‘满洲国’募得的救济雪灾款，曾向‘满洲国’各界呼吁救灾奔走募集，并向国务总理大臣鞠躬致谢，尽了很大的努力，受了很多辛苦，费了很多唇舌，为什么现在归由吴鹤龄掌握？究竟如何花用，应当问个明白。”并带有不满的神气前来质问我，我当时不由得也就无名火起，顺手把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摔碎，很生气地说：“仅仅这一点灾款的处理，你们都不信任我，居然提出质问，今后怎样共图大事！”金、陶二人碰了我的硬钉子，也就神色黯然而退。由于我对吴鹤龄的支持，虽把金、陶的气焰压下去，但因此却引起金、陶和吴鹤龄之间的勾心斗角，争夺权利的矛盾与冲突。

其三是设立伪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陈

绍武兼教导主任，分设师资、电报、补习各班，招收蒙古青年施行短期训练，培养急需的干部。同时在张北设立伪察哈尔青年学校，聘任日本人为教官，侧重用日语教学，进行奴化教育。并由伪教育署主持，选送留日学生。计有胡尔钦毕力格，博和温都苏、卓里克图、都固仍仓、赛春阿、都格尔扎布、德勒格仍贵等十名，被送往日本东京，先在“善邻协会”补习日本语文，继即分送日本大专学院深造，培养通晓日语的各项“人才”，促进“日蒙亲善”。还在“德化”设立蒙日语文讲习所，鼓励职员学习蒙日语文。

汉奸王道一的下场、日寇以杀人为儿戏

在治安上，“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进行招募当地土匪头子王道一，企图用以扰乱绥东治安，作进犯绥远的前哨。不意王道一率领匪众投归日本后，在扰乱绥东方面未起多大作用，反在尚义一带为非作歹，影响后方治安甚大。田中玖为了收拢当地人心，使对日本有好感起见，特将王道一诱捕枪决。这是王道一做汉奸的下场，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汉奸如不为其所用，便置之死地。又据伪军法处长关荫南说：“在未挑起绥东战争以前，唯恐在押的军事犯扰乱后方，日本关东军密令指示伪蒙古军的大桥雄熊参谋，亲来通知关荫南，将寄押在张北监狱的九十一名军事犯，开具名单，宣布“罪行”，一律执行枪决。关荫南认为其中有的军事犯系属轻微犯罪，仅判六个月徒刑，已经在押三个月，再有三个月就可释放出狱，恢复自由。对这类罪犯如也执行枪决，未免冤屈，引起官兵不服，

而致动摇军心，反为不美。大桥强调这是关东军的命令，必须执行，不能变更或拖延。又经商讨一严。仍由大桥提出意见说：“为了执行关东军命令，只有将九十一名军事犯绑赴人烟稀少的张北山下行刑，在行刑前一律松绑，任其散漫乱跑，后边用机枪扫射，跑了的就算跑了，打上的活该命死。这样处理既可使一部分罪犯获得活命，也算执行了关东军的命令，你我严守秘密，不可对外言说。”关荫南认为再强调原来意见，也是无用，只好同意这个办法。这样执行结果，仍然打死了十九名，其余七十二名四散逃逸。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随便草菅人命。而日、伪执行人员也就视人命为儿戏，任意屠杀。

设俱乐部、公开烟赌

日本帝国主义者虽以确立后方治安为名，任意屠杀，但另一方面却在各县城镇设立俱乐部，公开放赌，抽取头钱，名义上是作特殊用途的开支，实际多饱充了经办者的私囊。并公开卖鸦片，毒害人民。由于烟赌的公开，聚集很多游民，不分昼夜，呼么喝六，吞云吐雾，一塌糊涂，弄得鸡犬不宁，秩序紊乱。而无辜人民因而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上吊者有之，卖妻鬻子者有之。身体羸弱者更不知凡几，贻害人民，莫此为甚。当时有人出面反对公开聚赌，主张取缔俱乐部，而主管其事的日本人反说中国人天性好赌，设立俱乐部，正是投其所好，满足需要，并可从中抽取头钱，增加税收，作特殊用途的开支，拒绝取缔俱乐部。实际上，日寇是想用烟赌毒害中国人民，使之意志消沉，身体衰弱，不思反

抗日寇，不战而亡我中华民族，其用心十分狠毒。

进犯绥远的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德化”特务机关长换成田中隆吉。他指使王英组织的所谓“大汉义军”已经初步编成，而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便主张并要亲自主持进犯绥远。他和我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可速责成陶克陶组成接收委员会，准备接收吧。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我当时认为他的看法也有可能性，并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蒙古国”的妄想，也就赞同田中隆吉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绥西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承当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便确定下来。接着，田中隆吉就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由我命令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第一军进驻南壕堑，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把伪蒙古军五、六、八、九各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守护后方。这时把百灵庙视为后方军事基地，除其他军需器材不计外，仅面粉一项，就运去二万多袋。在派遣驻守百灵庙部队问题上，我曾很费踌躇。先想派战斗力较强，由东北各旗招来的士兵编成的师前去，深恐纪律不好，在乌盟蒙民中造成不良印象。经反复考虑，认为百灵庙虽是后方军事基地，而名义上仍是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蒙政会所在地，傅作义不

会派兵来打，于是就把甫经编成的伪蒙古军第七师派去。因为这个师的士兵，都是从察盟各旗征来的蒙民，虽训练较差，战斗力较低，而纪律好。结果把第七师派去后，并把原派的包俊山所带的一连调回。

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

这样部署之后，我就以我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卓特巴扎普为副司令的名义，于十一月五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这个通电是由吴鹤龄起草的，其全文如次：

绥远省政府傅主席勋鉴：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县以来，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乃于前年要求自治，当承中央之援助，准予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颁布自治原则八项，蒙众欣慰，举国同情，而独贵省始终猜忌，另眼相加，屡次企图破坏自治，其最显著者列举如次：

(一) 贵省各项税收，关于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部份，依中央颁布之蒙古自治原则，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当时蒙政会为谋地方之和洽，谅解贵省之困难，仅要求在百灵庙蒙政会统辖地方劈分特别税。中央对这项特别税，曾有分配命令，贵省竟擅自变更划线，夺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等五县税收，借口多端，曲解明令，经议年余，分文未给。当时中央对贵省已分配特别税，举办各种事业，而蒙政会因未得税收，以致经济困难，原定各项事业，不能举办。贵省对蒙古地方自治，如此暗中破坏，早已引起蒙古民众之不满。

(二) 前年所发生之西公旗事件，纯粹是蒙古内政问题，蒙政会责成主管盟长和平解决，乃义属当然，而贵省独越权干涉，操纵石王，扩大事态，纠纷不已，企图分化蒙旗，推翻自治之唇

心，不问可知。今春蒙政会奉中央明令，撤回驻在西公旗之保安队，以免发生冲突，并请中央转令保护麦力更召活佛尼达克丹大喇嘛。不意数月后，大喇嘛及其家属从众，被贵省派兵袭击，竟致杀害。如此破坏蒙古自治荼毒蒙人惨剧，凡属蒙族，莫不痛心。

(三)蒙政会保安队系呈请中央编成，专负保卫地方之责，何等重要！而贵省今春竟利诱该队中不良分子起而叛乱，收归贵省，更于前月装备叛乱官兵，诡称反正，进攻百灵庙，企图毁我自治发祥地，为各旗驻在百灵庙之保安队击退。当由贵省派兵掩护，酿成叛兵互相仇杀，死伤数百名之多，贵省利用无知蒙人，客留贵省，仇视蒙人，为何如此之甚！

(四)百灵庙蒙政会系全蒙自治机关，深受中央扶植蒙古之至意，全体蒙人视为第二生命，凡属人类，对之莫不寄与同情，不忍加以危害。独贵省阴谋破坏，居心推翻，甚至捏造是非，耸动中央，擅用乌、伊两盟名义，淆惑中央视听，从而产生绥境蒙政会，以致我蒙经营多年之百灵庙蒙政会，归于毁灭，引起蒙民丧失对中央之好感，似此误国殃民之举，令人太息痛恨！

(五)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我蒙对贵省并未究明是非，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主谋系出贵省，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意志，终于在锡盟盟长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会，清理百灵庙蒙政会之债务，隐忍退让，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而贵省对我蒙反倒愈加压迫，在察哈尔西部一带，百灵庙以南地方，挖掘战壕，修筑炮台，作种种军事上之设施，给锡、察两盟及百灵庙一带无辜蒙民生活上以严重压迫，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

总之，蒙古愈退让，贵省欲压迫，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争取最后生存，本会同仁始终以和平地方为重，只有一线和解之可能，绝不能轻启战端，累及

民众，特提出下列要求，希贵省谅解，迅作答复。

(一) 察哈尔右翼四旗，原由察哈尔部管辖，现在该部依中央颁行之蒙古自治原则改盟。为该盟土地之完整及锡、察两盟民众到绥东五县（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地方，买卖粮食、煤炭、牛马、皮毛等便利计，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哈尔盟，归本会管辖，以资名符其实。

(二) 百灵庙蒙政会结束工作，尚未完竣，留有职员及保安队数百人，为安定所留员兵和附近居民之人心，免除其生活上压迫起见，请将百灵庙以南一带地方军事设备，经济封锁，即日取消，恢复原来和平状态。

(三) 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原有之步枪、轻机关枪及弹药，均属中央发给。今春贵省煽动该队叛乱时，将武器押收归绥、武川等处保管，应即如数退还百灵庙蒙政会。

(四) 现在百灵庙蒙政会整理债务之结果，所欠员兵俸给及商民债款计达二十万元，是项巨款蒙地无所从出，中央拨给也有困难，贵省年应劈给蒙古之特税二十万元，应速发给。

(五) 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各员，蒙政会已发有逮捕令。现在该员等均在贵省任职，证明当时兵变确属贵省唆使，希将各叛徒一律遣返百灵庙，以便处分。贵省袭击麦力更召及惨杀大喇嘛之官兵，均属杀人凶犯，应一律撤职查办，以明法纪。对以上两案前后受害之数百蒙人及其家属，一律发给抚恤金，以慰冤魂。

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之要求，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克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争。如演成事变，责任完全应由贵省负担。特此电达。

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

副委员长卓特巴札普歌

(十一月五日)“印”

傅作义的复电

这个电报发出后，旋即接到傅作义的复电如次，
嘉卜寺察境蒙政委员会德委员长勋鉴：敬电阅悉，自来辩论事
理，有强辩夺理者，亦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
案之是非尚未明瞭，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幸详查焉。

(一) 绥特税系代中央征发军费之税收，自治八项原则劈
分地方税之规定，该税本在不应劈分之列。北平军分会特示
优待，派员调查，规定五项办法，贵会迄未实行，是贵会不肯按
中央规定而劈分，并非绥方不予劈给。至商驼改道，系因贵
会拦路苛征，自断商运，具有事实可指。

(二) 西公旗事件，第一阶段由于贵会派兵帮助叛逆曼
头图攻王府，并有来历不明之飞机助战，致该旗横受糜烂，
中央命令撤兵，贵会均未置理。第二阶段本章大喇嘛等返庙，
与石王等已订约相安，不知何故，当王道一扰犯绥东之时，该
喇嘛忽勾结非本国国籍人，在梅力更召招兵运械，建筑机场，
意图与绥东王匪相呼应，大喇嘛于八月八日攻击王府，而石
王十三日始行反攻，当战争结束，确有非本国籍人在内，此
事谁违中央，谁肇乱源，社会周知，勿烦曲解。

(三) 百灵庙保安队哗变，系在察北改元易帜之后，时
闻事实，昭昭于社会，该青年等为执事平日所培植，其思想
行为度为执事所深晓，中途脱离，当自有故，云等通电对执
事在察北行动表示惋惜，而誓不合作，执事更应自省，不尤
他人。

(四) 绥蒙易制，也在察北变乱之际，尔时乌伊官民既畏
丧失国土，贻蒙古之害，又不愿与地域不同者共此多事岁月，
中央靡顺多数蒙人之情，始行分治，口下旗众相安，边防无恙，

与察蒙相统，自有真正得失。

(五) 分治命令既颁，贵会既不遵令迁锡，复在六县易帜改元，组织军政府，接引伪蒙军入察，近又向庙会大批增兵，乃来电云“本其服从中央之素志，以地方和平为重”，且责绥方自卫之不当，似言行不无矛盾。以上就见质敷陈其要，至对来电要求及期棧于左右者，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察北今日成何局面？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相安无事。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该四旗官民始惶然呈请中央，颁定改隶之令。执事对义既有期勉，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倘执事以国家为重，使察北六县仍归察省管理，恢复旧规，则虽中央明令在前，悬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义服务国家，只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隶属之下，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幡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立解职，以明心志。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作爱国之事。刻所警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执事有负于国。时迫事急，祈执事熟思而为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庚（八日）。

如意算盘没有打对

这时蒋介石也来电报指责我，电文内容大意是：“披阅歌电，不胜诧异，台端在电报中所述各节，多属绥境蒙政会之事，应由该会与绥省商洽解决。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这

时前方军事已接触，意在拿下绥远再说，对蒋、傅来电再未置复。田中隆吉还从伪满航空株式会社调来几架飞机，盘旋空中，侦察助威。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指挥者，我和王英是这次战争的仆从和附合者，特别是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心理对待这次战役的。认为上有飞机盘旋，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伪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地一威吓，傅作义军队就可以撤退，大则可以垂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小则也可以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绥省方面既有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国民党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是新经编成的，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队，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差。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一万五千来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导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相助。从数量上看，是众寡悬殊；从质量上看，是优劣分明。因此，由雷中田率领进攻红格尔图的王英部队，围攻数日，未能得逞，迨至绥方援军到后，进行反攻，王英的部队便败退下来，集结在商都休整，李守信立刻派尹宝山率领伪蒙古军部队进驻商都，和傅作义军对抗。

百灵庙战役

这时我得到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的报告，说是傅军孙兰峰旅，正在百灵庙以南集结，等候炮兵部队一到，就可能进攻百灵庙，伪蒙古军第二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

百灵庙。我接到报告后，认为烟草谷让死守百灵庙，命令不妥。因为新经编成的伪蒙古骑兵，不能死守百灵庙。应乘绥远军不备之际，进行奇袭截击。我很想乘坐飞机前往百灵庙布置，只以有紧急事务待办，未能及时前往。到了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孙兰峰旅就进攻百灵庙。蒙政会汽车司机张岱自报奋勇，带着一架机关枪在南山头上配合部队射击，松秀带着伪蒙古军游击队（系迪克丹大喇嘛死后逃来的士兵编成的）在康熙营盘一带山上守护，其他团队亦准备迎击。不意驻在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首先逃跑，遇见松秀下山领取子弹，误认为有变，竟开枪打死，这时四面枪声顿起，百灵庙遂入混乱状态。伪蒙古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和第七师师长首先退却，所属官兵也随之溃退，第七师野崎顾问说他是最后撤退的，并说用刀劈了一人，究竟所劈何人，没有说明。第七师官兵退却后，集结在锡拉木伦庙和希拉图庙两地休整，百灵庙遂为傅军占领。

石玉山金宪章等反正

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又令集结在商都的伪军王英部队，再攻百灵庙。而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自告奋勇”，情愿率队前往，不意这时伪军石玉山、金宪章旅长等，已和傅作义有了联络，待机而动。他们到达锡拉木伦庙时借故未往。雷中田仅率一千多人，再度进犯百灵庙。雷中田虽然“立功”心切，还给我来信，自称“卑职”，以明心迹，但其士兵看到送他们的汽车均已开走，是不管他们的死活，因此都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果然一经接触，即行败退，

雷中田当被击毙。败退官兵也到锡拉木伦庙集结。这时我不愿意第七师和王英部队混合驻扎一处，除派伪军事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该庙，慰问部队并查清情形联络部署外，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该师驻在锡拉木伦庙的所部官兵，调到布拉图庙集结，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坚不许可。穆克登宝陈说，这是奉“德总司令”的命令，正在指挥部队开拔之际，第七师野崎顾问竟抽出军刀进行威吓说：“驻守此地的部队，都归小滨大佐统一指挥，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命令，否则就以军刀相见。”穆克登宝在野崎威吓之下，马上软化了，不敢再力争，只有俯首听命，把我给他的命令抛在脑后。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服从，而小滨大佐对穆克登宝却不信任，当将第七师在山上和要路所布置的岗哨，一律换成王英部队的士兵担任。这时王英部队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等，既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屡吃败仗，前途渺茫，又受傅作义的策动，遂乘步哨更换之际，发动所属官兵暴动起义，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二十余人全部枪决，并袭击驻在该庙的第七师官兵，连长李春林、若格尔札布等和数百士兵，均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阵亡，石玉山、金宪章遂率领部队投归傅作义。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偷偷地溜走，不但得了活命，还发了一笔横财。他谎报军饷在战乱中丢失，后来用此款买了一辆全新的别克牌汽车。第七师在这次变乱中死亡数百官兵，蒙受很大损失，我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他们编出歌谣来咒骂我们。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绥东战役得的结果。

锡拉木伦庙事件发生后，前方战事既然失利，后方军心

也多不稳，田中隆吉正拟弃守“德化”，反来欺骗我说：“我们日本军快来了。”我问：“这是真的吗？”田中隆吉说：“真的！真的！日本军快来了。”田中隆吉不但欺骗我，也用欺骗的手法拉拢李守信。有一次，他对李守信说：“你叫李守信，我叫李守义吧，我们是情同骨肉的亲兄弟呀”。这充分说明，田中隆吉为了拉拢人欺骗人，什么卑劣的伎俩都能使出来，我却甘受田中隆吉的欺骗而不觉醒，反认为田中隆吉比别的日本人强，对蒙古甚为热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不可及。

西安事变后缩编伪蒙军

正在田中隆吉仓皇失措，对我们欺骗拉拢之际，不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抗日。田中隆吉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在一天黎明的时候，他仅穿裤衩，披着大衣，到伪军事署向王宗洛说：“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中国从此要发生内乱，对我们作战前途有利”。旋又到了我的住室，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征询我对西安事变的意见。我即将吴鹤龄请来共同商量，田中隆吉极力主张给张学良打电报，杀了蒋介石。我和吴鹤龄一致主张说：“现在前方战事失败到这个样子，后方军心也有动摇，与其劝张杀蒋，莫如趁此机会呼吁停战言和，作为缓兵之计。”田中隆吉见我俩不同意他的意见，也就转了话锋说：“这样也好”。于是就由吴鹤龄拟具电报稿，记得内容大意是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容共抗日，劫持最高领袖，紊乱国家纪纲，因此，特呼吁全国一致声讨，营救“领

袖”。并呼吁在“领袖蒙难”之际，停止蒙绥地方之争。

“西安事变”解决后，傅军即停止进攻，伪蒙古军也退守原地，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这时日本关东军把田中隆吉调走，派来第二科科长武藤章主持“德化”特务机关，就和我研究整顿部队问题。他主张把伪蒙古军九个师缩编为六个师，每师配备一个山炮连，以便集中兵力，发扬骑炮兵联合作战的效能，并答应每师拨给四门山炮。当时我也认为武藤章的主张有道理，合乎军事原则，而且蒙古军还可能多得几门炮，用以加强部队的编制装备。但我总想扩编伪蒙古军，不愿缩编，并感缩编各师之后，人事上不好安排，因而同意每师配备炮兵连，不同意缩编为六个师。武藤章见我坚不同意，再未强调缩编，也未配给山炮就回去了。关东军另派森岗大佐继任“德化”特务机关长，为时不久，“德化”特务机关长又换成河崎大佐，这时因为部队中既有金宪章及石玉山等反正，其他部队也有不稳状态。我向人表示：“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谁对蒙古有利，就跟谁合作。”这话也许到了河崎耳朵里，因此，河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蒙古只能和日本合作，不能和别人合作，假如有人认为蒙古既可跟日本合作，也可和别人合作，甚至与苏联亦可合作，那可不行。”从河崎这几句话里，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把蒙古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特别注意防止苏联的影响。这是对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实际上我当时认为，苏联是可怕的，像我这样封建王公出身的人，当时是决不会走苏联这条道路的。我感觉河崎有点神经过敏，很想上台讲话驳他，但是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河崎大佐到任后，对于配发伪蒙古军山炮问题，未曾提

及，我也再未追问。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机构问题，特在伪蒙古军政府之下，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由我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任命乌古廷为参谋长，刘星寒为参谋副长，其下设副官、参谋、军需、军械、军法、军医等六处，副官处长张启祥，参谋处长崔守堃，军需处长崔景岚，军械处长纪树勋，军法处长关荫南，军医处长李××。并为了简化层次，便于指挥起见，将伪第一、二两军编制取消，由伪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并将部份师长作了调整，因第六师长宝彦图和李明远意见不和，都调任参议，另派乌云飞继任师长；把警卫师改称第九师，第七师因在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伦庙变乱中损失甚大，师长穆克登宝撤职，另行补充训练。对其他各师也进行调整，准备待机而动。

七七事变以后一度撤出“德化”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进攻平、津、华北，对蒙古方面还未派来大批日军，绥远方面傅作义军趁此时期却展开进攻。由董其武率领部队进攻商都，商都伪军尹宝山率队迎击，战斗甚为激烈，双方均有伤亡，终因傅军攻城甚急，尹宝山被迫撤退，商都遂为傅作义军占领。尹宝山在撤退途中，并得泉团长又率队反正投归傅作义，这对伪蒙军事方面，又增加了不利影响。这时反正的石玉山率部进攻“德化”，察省主席刘汝明也派部队进驻万全坝上，军事形势顿形紧张，关东军特把田中隆吉（这时任联队长）从朝鲜调回来，主持军事，急忙采取紧急对策，对刘汝明方面，听说田中隆吉秘密进行联络，允给四门大炮，

才缓和了刘汝明派队进攻。但石玉山部队却迫近“德化”而驻守“德化”的伪蒙古军，仅有包海明率领的第九师少数部队，我当命令王宗洛武装军政府职员，帮助第九师防守“德化”。只因日本特务机关首先焚烧文件，纸灰飞扬，汽车发动隆隆作响，显是作退却准备，因而谣言百出，秩序大乱，无法维持，于是我又下令叫王宗洛带同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向察盟镶黄旗撤退。吴鹤龄掌握着伪蒙古生计会汽车，于兰斋掌握着伪交通署的汽车，纷装物品，争先撤退，各机关职员更为动摇，有的领了枪只争抢汽车撤退，有的顾不上领枪也随着撤退。先于八月十四日晚，向察盟镶黄旗拉白庙撤退，继即撤到多伦。我于大家撤退的翌日上午，曾由包海明陪同视察山上工事，下午我才偕同徐荣候（时任滂江电报局局长）返回我旗。徐荣候说：“没有什么动静么，怎么都撤退了呢？还没到最紧急时期，这个也撤退，那个也撤退，成什么样子！”

在大家撤退之后，包海明仍率第九师少数部队防守“德化”，嗣因石玉山部队愈益迫近，已听见枪声，也就率队撤退，“德化”遂为傅作义军占领。这次“德化”撤退是非常仓促的，枪枝既未全部带出，弹药亦未焚毁，重要文件更未焚毁或带出。甚至把苦心孤诣训练多日的军乐队，也未令其撤退。后来傅军进占“德化”时，该乐队却装备整齐，奏军乐欢迎。

我返旗后，听说马占山率领军队进至土木尔台，深恐进攻我旗，特派赵文儒前往联络，并让徐荣候、王石青（专聘教我子侄的汉文教师）主持，在我旗挂上察境蒙政会的牌子，权作应付之计。我这样安排后，即往补英达赖家。途中

遇见陶克陶乘坐汽车找我，我遂偕同他一同到补英达赖家中。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达多伦，一下飞机就问河崎大佐：“德王现在何处？”河崎一时答复不出，东条对他痛加斥责，并追问失守“德化”的责任。河崎为了卸责，很可能把失守“德化”之责，推到伪军事署长王宗洛身上。东条旋即派出飞机各处寻我。我乘坐汽车赴多伦，到达哈丹布图庙时，见有飞机盘旋空中，大概就是寻我。但这并不是日本关东军对我特别关心，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初经伸入西蒙之时，极需我这块招牌。作为他们统治蒙古的工具，一时还不能弃掉。

我到达多伦后，心情是非常恶劣的。认为初和日本“合作”，就遭受惨痛的失败，对日本关东军所谓对蒙古的帮助，有些失望。这时我忽然想起迪力瓦在“德化”和我说过的话：“你如跟日本人合作不来，不如趁早出走，周游世界各国，宣传蒙古问题，把蒙古问题提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依靠世界各国解决蒙古问题，比靠日本一个国家解决蒙古问题好。”我回味迪力瓦这套话，觉得颇有道理，就转和吴鹤龄商量，表示不愿再和日本“合作”下去，想返我旗另作打算，没有把迪力瓦之言告知他。他认为我仍想和蒋介石拉拢，当即劝我说：“你的动作打算，无非是再想和蒋介石拉拢，据我看来，中国是打不了日本的，并且蒋介石并不想认真的打。在百灵庙蒙政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时，我曾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日妥协的意图，向你谈过，并且日本人决不会甘心失败，从此善罢干休。现在日军既已占领平津，预料不久就会派兵到蒙古来。与其等到日本打过来，再与日本合作，那就被动了，不如现在主动地和日本合作下去，看看局势演变，

再定行止。”经过吴鹤龄这样“痛陈利害”，婉言劝说，我遂将返旗想法打消。仍又收集“蒙古军政府”的旧部，重整旗鼓，借用多伦喇嘛庙恢复办公。

“德化”失守后，傅的部队又向前进攻康保，张北方面也有绥远晋军孙长胜骑兵旅对峙。田中隆吉面对这一情况，甚为焦急，特用客用飞机一架运兵，一次空运六名日本兵到达张北，计运了十余次，才运到六十多名。刘汝明听说日本军一到，便将布置在万全坝上的部队撤走，绥远军亦再未向前进攻，张北方面战局暂时又入稳定状态。田中隆吉听信河崎之言，认为弃守“德化”是王宗洛的责任，表示要加以惩治。嗣经王宗洛亲往张北面见田中隆吉，说明弃守“德化”是奉我之命，并非个人擅自主张，田中隆吉始予谅解。

在日寇指挥下进占绥远

到了这年十月间，大批日本军由多伦正向西开，听说阎锡山因重视山西老家，特把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调往雁门关内，原驻绥的傅、阎军队，即开始准备由察北和绥东撤退。伪蒙军便乘机反攻，我在多伦坐镇，用蒙文编成的密电指挥各师前进，先行集中伪蒙古军的炮兵，把在康保一带的绥军打退，继即占领了“德化”和商都，迫近了陶林。当时率队进攻陶林的刘建华（刘系汉人，蒙名阿木尔，当时任炮兵队长）曾向我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很准，在进攻陶林时，一炮打中门炳岳（伪中央骑兵第七师师长）的司令部，门炳岳着慌即率队撤退，陶林遂为我们占领。”这时李守信率领一部分伪蒙古军进到集宁，我和吴鹤龄、陶克陶亦由多伦率领伪

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张北。据陶克陶向我报告说：“据田中隆吉表示，他也掌握了绥军撤退的动态，因为他们的译电员能够译出绥军各部队之间的密电，就是你们德王的蒙文密电译不出来，不知是怎么编的。”由此可见，日本关东军不但常听绥军的军事秘密，就是我和蒙古军各师之间的密电也在暗查之列。这充分说明对我仍不放心。后来我为了免除日本方面对我的怀疑，特将蒙文译电本送给了他们，表示坦白。

我到达张北后，将伪蒙古军政府主要人事做了调整，尽量起用少壮人员，任命陶克陶为办公厅主任，陈绍武为内务署署长，张秉智为交通署署长。并由陶克陶率领职员随军前进，做慰问部队和接收工作。我率领数名职员，前往锡盟和百灵庙一带，会同雄诺栋都布等，发动各旗保安队，进行组织“蒙古各盟旗联合军”，计划从草原南下进占绥远。很快与伪第九师包海明会合，逼近武川。李守信率领的伪蒙古军，也因傅作义移防山西，地方上仅有“国民兵”等少数部队，乘机向西进攻，仅在集宁、丰镇、旗下营等地发生过一些小的战斗，很快就逼近绥远省城，把日本军抛在后边。这时沿平绥路进犯的日本军，除命令李守信绥向西进外，桑原中佐（驻绥特务机关长）特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见我，叫我通知第九师和盟旗联合军绥攻武川，等候日本军从凉城开到，再一致行动。他们的表面理由是，不要孤军深入，以防不虞。实际上是怕伪蒙古军抢先占了绥远城，丢了日本军的面子。因此我只有等候日本军到达，才于是年十月十四日占领绥远省城，十月十七日占领包头。同时武川亦为日蒙军占领，我即发表徐荣侯为武川县县长，其他各县由随军工作的政治接收

班临时委派县长。我由百灵庙到达绥远省城时，吴鹤龄、陶克陶、王宗洛、德古来等，已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先期到达，遂和日本方面共同商谈，组织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时派遣和马占山取联络的赵文儒，也由包头返抵绥远，向我报告说：“马占山表示，决不向苏尼特右旗进兵，并用白缎写了一封信郑重表示此意。随着我军事的进展，马占山率队西撤，我跟他到了包头。由此可见，马占山颇有拉拢我之意。否则，他若当时进兵，占领我的王府是易如反掌的。

总之，我在这一时期中，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建立伪蒙政权，挑起绥东战役。战事失败后，又在“双十二”西安事变时通电拥蒋，指责张、杨两将军容共抗日，“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日，卖国求荣，复在绥远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成为千古罪人，俯今思之，愧恨万分。

（陶布新记录整理）

（一九六五年八月）

本文编后的话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幼年时期，受封建思想遗毒很深，承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王位后，就挖空心思，精心策划如何加强和巩固这个小封建统治王位，并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势力范围，甚而异想天开地妄想统治整个蒙古民族和地区，建立一个“蒙古帝国”。

他先后拥护张勋复辟，投靠蒋介石反动政府。生前他一面佯示服从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领导，一面加紧和日寇勾结，首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我察哈尔及绥远东部之后，即公开投靠日寇，先后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及伪蒙疆政府，妄图以出卖国家民族，换取梦寐以求的“蒙古帝国”。

抗战胜利，日寇无条件投降，他的多年美梦，全成泡影。但仍不甘心失败，又复倒向蒋介石反动政府，继续反共。直到蒋家王朝彻底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仍不归向人民。又在阿拉善旗搞什么“西蒙自治运动”，企图负隅顽抗。最后走投无路，又出走蒙古人民共和国，期求苟延残喘。后被引渡回来，投入人民监狱。这个反动透顶、顽固到底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到此才被迫停止其反动活动。

解放以后，经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改造，他终于在

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罪恶，向人民作出交代，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给以特赦。

他所写的稿件，将在《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发表。本辑选登的这篇《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一文，是他的第一篇稿。稿中所述各节，不少提法，仍在吹捧、抬高自己。但为维持其本来面目，未加修删，原稿刊登。希读者用批判的观点阅读，并供研究史料者取舍参考。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七八·十一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改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占领平津后，侵华日军就派坂垣师团进攻南口。打开南口后，继续向张家口进兵。日本关东军又派出酒井机械化部队，通过多伦、张北等地进攻张家口。这时，我和李守信也纠合伪蒙古军的主力，先占领了化德，接着即配合日寇向西进犯。在两路日军分进合击及伪蒙古军的配合下，于八月二十九日占领了张家口。先由于品卿、杜运宇等组成“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特来张家口与坂垣征四郎会见，接着又集中两路日军向西进犯，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先由夏恭、马永魁等组织“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

坂垣师团占领大同后，即南向进攻山西太原，酒井部队则进攻绥远。这时伪蒙古军集中主力在平绥路配合日寇作战，并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陶林、武川。伪蒙古军全系骑兵，往往走在日寇前面，作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前驱。在日、蒙军配合进攻下，十月十四日占领了绥远省城归绥，十月十

七日占领了包头。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德古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等，也由张北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旧绥远城。

这时，我正在百灵庙组织伪盟旗联合军进占武川，企图为进占归绥卖力。旋接到吴鹤龄和陶克陶等来电，催我赴绥，商洽“建国”大计等重要问题，并说：“万勿因小而失大”，即派飞机来接。我即以“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委派随从人员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并发布安民布告后，即乘飞机到绥。

经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讨论建立伪政权问题。确定通知参加的人员是：①各市、旗、县，民众代表一名，②各旗札萨克或总管；③各伪市、县长；④经许可之地方代表和团体代表；⑤各盟长、副盟长；⑥伪蒙古军总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副长、各师长、各处长；⑦驻外代表；⑧伪蒙古军政府主席、副主席、总裁、主任、部长及各署长。把召集开会通知以伪蒙古军政府名义发出后，一面组织第二次蒙古大会筹备会，由特克希卜彦负责进行筹备。一面我和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等与日本方面商洽成立伪政权问题。迨至锡、察两盟代表到达后，我们就提出“蒙古独立建国问题”，请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和伪蒙古军政府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朗，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村谷答复说：

“蒙古独立建国问题，关系重大，牵涉到国际上《九国公约》问题，需要关东军和日本国内慎重研究，一时不能确定。”我和各盟旗代表们又提出：“‘蒙古建国问题’既经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田中隆吉参谋也早有帮助的诺言，这次

田中隆吉到达张北，也曾为此问题，向驻大同的东条参谋长请示，据说俟攻占绥远后，就帮助建立‘蒙古自治联盟国’。现在已经攻占绥远省城，而蒙古建国反倒成了问题，我们身为盟旗的代表，还在此地做什么，各自回旗就算了。”村谷急切地答复说：“你们这样说，不是连关东军的话都不听了吗？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回去。”

当时我认为村谷彦治朗和桑原特务机关长职位不高，对于“蒙古建国”这样大问题，自然不敢提出什么主张，因而我曾和日本驻在归绥的部队长酒井隆商量，希望他居中帮助。我向他说：“蒙古建国是田中隆吉的诺言，为什么现在又不算数呢？”酒井隆答复我说：“田中隆吉这个人非常冒失，他主持进攻绥东时，我正在天津，曾去信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不听，一意孤行，结果遭受失败。至于‘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御前会议，不能做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嗣后，我又和吴鹤龄等研究，认为“蒙古独立建国”既然一时不能实现，即可以“蒙古军政府”做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的政权。理由是：蒙古原有领土还未完全恢复，（伊盟尚未沦陷），现在仍是军事时期，所以提出仍以“蒙古军政府”为政权机构比较合适。经和日本方面商量，仍然不同意，授意我们成立与察南、晋北相同的伪政权。

我又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应该成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吴鹤龄说：“我们就组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吧，因为我们现有几个盟，是联合各盟实行自治的意思。我总觉

得，田中隆吉说的‘蒙古自治联盟’很蹩扭，不如反转过来叫‘蒙古联盟自治’较为通顺。”我同意了吴鹤龄的说法，就责成他拟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院，管理政务；蒙古军总司令，管理军事。交由桑原和村谷等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

嗣即接到日本关东军的电报通知，表示同意，但仅列有主席，没有副主席，并指定我为伪政务院长，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吴鹤龄看过之后向我说：“日本关东军这种做法，是居心挑拨。人事安排，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决定，可是他们却越俎代庖，先为指定了。并且在‘蒙古军政府’时期，你是总司令，李守信是副司令，这次日本关东军却指定李守信为总司令，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但也不好再变动。假如不照关东军指示行事，必然招致李守信的不满。”接着他又说：“主席一职本应由你担任，但必须云王（云端楚克）表示不就，才为妥当。要不我去面见云王，劝他自动让出主席一职，推崇他为元老，你看怎样？”我当答复说：“云王年高望重，仍宜推为主席，我当政务院长就行了。”我说这话不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仍以云王任伪主席为宜。因这样既便于号召各盟旗王公，又符合日本关东军的意旨，但实权仍归我掌握，云王不过徒拥虚名。对我个人来说，是有利无害的事情。并为了避免内部发生矛盾，也就依照日本关东军的意见，内定李守信为总司令。

这样商定之后，各地代表均已到齐。计锡盟参加者：伪副盟长林沁旺都特、扎萨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布达巴拉、巴拉贡苏隆、多不丹等。察盟参加者有：伪盟长卓特

巴札普、总管达密林苏龙、色楞那木济勒、诺尔布札那等。乌盟参加者有：伪副盟长巴宝多尔济、沙拉巴多尔济、德瓦根敦、拉希色楞、额尔克道尔吉等。土默特旗代表有：亢仁（默尔根巴图尔）、森额等。伪蒙古军政府参加者有：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特克希卜彦、吉尔嘎朗、乌勒吉图（张秉智）、超克拔都尔（陈绍武）等。伪蒙古军参加者有：李守信、乌古廷、刘星寒、刘继广、尹宝山、王振华、宝贵廷、依恒额（伊给先）、萨音巴雅尔（包悦卿）、仓都固仍（包海明）、札青札布（戴选青）、阿尔弼吉呼（张启祥）、崔宇堃、崔景岚、纪树勋、卓里克图（关荫南）等。地方团体代表参加者计有：贺秉温、李春秀、贺云章等。各伪市、县长参加者计有：刘连升、徐荣侯、亢锦荣等。蒙古旅平同乡会则有赵那苏图（赵汇川）、李丹山、桑宝（包维翰）组织代表团前来，祝贺第二次蒙古大会的召开并慰问军政人员。外宾参加者有：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伪满驻蒙代表玉春、伪察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田汝弼等。遂即召开预备会议，推选我和云王、沙王（沙克都尔札布）、李守信、补英达赖、卓特巴札普、林沁旺都特、巴宝多尔济、吴鹤龄等为主席团主席，特克希卜彦为大会秘书长。

当提出沙王为主席团主席时，卓特巴札普还提出异议说：“沙王没有来，为什么还选他为主席团主席呢？”吴鹤龄当即答复说：“已经派飞机接去了，很快就会到来。”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迨飞机返回后，沙王仅派一个什么事也主不了的代表来了，吴鹤龄带着抱怨口气说：“沙王怎么没来呢？这里正等待着他。”尽管沙王没有躬亲参加，仍

然选他为主席团主席。意在利用他的名义，拉拢伊盟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主席团虽已选出，大会急待开幕，但伪主席一职还未作最后确定，是否设置副主席一职，也未得到解决。经和桑原中佐及村谷彦治朗商量，他们则以官小职微，不敢决定，允向关东军请示。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开会的那天上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才乘飞机赶来参加。下机后与欢迎人员略作寒暄，桑原、村谷、吴鹤龄、陶克陶等，即迫不及待地向东条征询关于内定谁为主席及是否设置副主席的意见。东条当答复说：“内定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就行了吧。”于是酝酿多日颇费踌躇的谁当伪主席、副主席问题，经过东条英机淡淡地一语就解决了。这充分说明，云王的主席和我的副主席是日本关东军一个参谋长加封的，通过大会选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我们把东条英机让至大会堂休息室略事休息后，即举行开幕式，先由我致开幕词，说明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的意义，继由“贵宾”东条英机、于品卿、田汝弼、玉春等致祝词。所有祝词，无非是“日蒙亲善”、“满蒙合作”、“民族协和”、“共存共荣”等语。接着讨论的议题是：通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成立宣言。经用蒙、日、汉语宣读后，无异议通过。下午的议事主要日程是，推选主席和副主席。由李守信提议，推选云王为主席，我为副主席。用一刹那征询大家的意见，与会代表默不作声，也就宣布无异议通过了。接着通过对日本和伪满发出感谢电，并对来宾和文官科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人员，授予纪念章。因王云有病未参加，我即当众宣誓就职，大会就告结束。当日

在大观园设宴演戏，表示庆祝。兹将大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录后：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

- 第一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主席及副主席，主席及副主席由蒙古大会就蒙古德高望重、有大勋劳于蒙古复兴运动者选任之。主席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之主权者，主席遇有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行之。
- 第二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浩特”市及包头市为统治区域。
- 第三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防止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
- 第四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仍旧使用前蒙古军政府之旗章。
- 第五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应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但使用阳历。
- 第六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于：“厚和浩特”。
- 第七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地方之权限，依均权之原则，另以法律定之。
- 第八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另定之。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蒙古是有土地、有人民、有组织之民族，有创立元朝伟大光荣之历史。迨至明代，虽然退居朔漠，尚且保持均衡之地位。清初更援兵诸部，兄弟封藩，其固有之土地、人民、主权，毫未损失。及至民国成立，标榜五族共和，我蒙民秉性纯厚，相信待

遇平等，竭诚拥护，矢志弗渝。但二十余年以来，竟视我蒙为外藩，设置省县，土地瓜分净尽，党政专横，主权侵蚀无余，以致蒙民之生计日趋贫穷，盟旗之权限日趋凋零。生存几至无望，尚何平等之有！因而群情激愤，不避水火，一致奋起要求高度自治，延续一线仅存之命脉。几经呼吁奔走，获得百灵庙蒙政会之自治。明虽允准，暗实切恨，阳藉扶助之名，阴运摧残之机，军阀之暴敛如故，疆吏之挑拨日甚，或则大军压境，张出席卷之威，或则经济封锁，迫近灭亡之路，类此荼毒事实，实属罄竹难书。二十余年之竭诚拥护，只得到歧视与压迫，设如依此推移，蒙古将何以生存！且自中国革命以来，军阀割据，内乱频仍，人民涂炭，百业凋蔽。近更外交失策，国事日非，启衅邻邦，仍复分据疆土，骨肉相残，何暇顾及边疆。我等念祖宗之伟业，为民族之生存，不能垂手旁观，自贻伊戚。因于去春在西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并编练蒙古军，外防共产，内安生民，一戡以还，规模渐具。今秋中日失和，疆吏乘机谋我，当为防卫计，不得不整军经武，幸赖全体将士之用命，庆得友邦义军之援助，仅及数月，得以收回长城以北之故土，此实天予苏生之良机，言念及此，不胜欢欣。从而奋然兴起，勇往迈进，力图更生，特召集各盟、旗、市、县长官及军民代表，在绥远城举行第二次蒙古大会。经大会决议：本太祖成吉思汗民族融洽，一致合作之精神，即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疆土为领域，以严防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本互惠互助、共存共荣之精神，敦睦友邦，以期确立东亚和平，实现伟大理想。推选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负责组织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特此宣言，以昭大义。凡我全体官兵及将士，希一致拥护，体现我蒙为国家为民族之至情，贡献人类之和平，不仅蒙古之荣幸，抑亦全世界之光辉，天人共鉴，誓志勿渝。

第二次蒙古大会结束后，即派员修葺绥远省政府旧址，作为政府厅舍。但因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未经关东军确定，迁延达一月之久，还未组织起来。我曾去找桑原特务机关长，请他催促关东军速为确定，桑原说：“我已催促了，迄今尚未答复。”并把给关东军的电报给我看，证明他已经催促过。我虽然非常着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候，并嘱桑原再行催促。结果还是等候了多日，日本关东军才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核定下来。规定是：政务院长负责制，下设总务、财政、保安三部。与伪政务院平行机构有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谘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会。于是我就按照这个组织法着手安排主要人事，除依照日本关东军意旨以主席名义任命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外，并任命吴鹤龄为伪参议会议长，发表陶克陶为伪总务部部长，下设总务、内务、教育、外交各处，总务处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内务处长李丹山，教育处长陶克托胡（陶布新），外交处长赵那苏图。发表吉尔嘎朗为伪财政部部长，下设会计、税务两处，会计处长乌勒吉图（张秉智），税务处长巴雅尔（吴相文）。发表特克希卜彦为伪保安部部长，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长昌都冷，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关荫南）。专为主席办事的有秘书处，由赛吉尔胡（丁我愚）任处长。并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金井章二，因在张家口搞“蒙疆联合委员会”，始终未到任，由次席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负实际责任。总务顾问是中岛万藏，财政顾问是栞部正晖，保安顾问是大园长喜。另外还设有一个伪司法局，任刘永誉为局长。这是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安排。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云王因病逝世，搞了一个遗

囑如次：

“余幼时即以民族复兴为职志，虽年老体衰，努力民族自强，不敢稍懈。不幸为病魔所缠，竟至不起。我政府副主席以下文武百官切切铭记，协同全体民众，向敦睦邦交，民族复兴迈进，切望完成建国大业，特此遗嘱。”

这个遗嘱原文是蒙文，我特为云王举行奉安典礼，发动各机关团体备花圈、挽幛，前来祭奠。我亲为执绋，并以“吾将何之”四字为挽，率领文武官员公祭。伪满皇帝溥仪特别题赐“世笃忠诚”四字，青年职员们很不满意，认为这仍是以臣属之礼对待“云故主席”。我为了敦睦蒙满邦交，还是主张悬挂起来，表示尊重。

为选举继任伪主席，特于是年七月一日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推选我为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我特发表就职宣言如次：“本副主席受大会之推选，继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自知德薄能鲜，深恐不堪胜任，惟有继承太祖成吉思汗之伟大精神，遵奉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依据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基本方针与生、聚、教、兴、养、卫六大施政纲领，不辞艰苦，努力以赴。冀望友邦各国及各政府，以互惠互让、共存共荣之精神，赐于指导协助。全体官民将士，须一致团结，同心协力，完成复兴大业，实现东亚和平。海枯石烂，宿志不移，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我继任伪主席后，深感伪政务院的三部组织较小，认为应当扩大和加强，形成具有国家组织形态。日本帝国主义则为了适应战时体制，搜刮战略物资，加强控制各项工作，认为更有进行机构改革的必要。因此即于是年八月一日实行机构改革，改革的原则和办法是：①废除政务院的总务、财政、保安三

部制，实行一厅四部制，即总务厅，民政、财政、保安、畜产四部制。总务厅主管总务、企划、主计、人事、外交等工作，为一切行政机构的中枢，就是采取总务中心主义，以期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纵的统治和横的联系。②网罗对“蒙古运动有功劳者”及汉族有代表性的人士，组织政务委员会，做为伪主席的谘询机关，以资调整蒙汉关系，沟通各方意见。③废除盟公署的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四厅制，改设一个官房和民政、畜产、保安三厅制，以明确施政重点，密切政府与盟、盟与盟之间的联络。④将“巴彦县”（即过去归绥县）合并于“厚和”市，并将“厚和”市升格为特别市，以便逐渐发展为国际都市的新兴首都，作为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⑤各县配备以纯蒙古人编成的保安队，负确保治安的责任，确定军、警责任的区分。根据以上原则，改革后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要人事阵容如次：我任伪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任伪副主席兼伪总司令；秘书处处长仍为赛吉尔胡。伪政务院下的总务厅长为陶克陶，下设五个处，总务处长仍为图木勒巴塔尔，人事处处长乌勒吉图，主计处处长霍克济胡（霍翰甫），企划处处长金谷勒模（金养浩），外交处处长仍为赵那苏图。伪民政部部长特克希卜彦，下设内务、教育、建设三个处，内务处处长札拉嘎穆济（白景睿），教育处处长仍为陶克托胡，建设处处长恩和阿木尔（张绍庭）。伪财政部部长仍为吉尔嘎朗，下设两处，理财处处长李丹山，税务处处长仍为巴雅尔。伪保安部部长换了雄诺敦都布，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处长仍为昌都冷，司法处处长仍为卓里克图。伪畜产部部长郭尔卓尔札布（郭王），下设牧业、畜产两处，牧业处处长哈斯瓦齐尔

(肖佩玉)，畜产处处长米济道尔吉(黄葆庆)。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还有地政局，没有发表局长，由顾问黑泽隆世代行职务。伪司法局长仍为刘永誉。驻满代表金永昌，因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继任代表为恩和布林(吴恩和)。参议会会议长仍为吴鹤龄，派往日本留学。

(二)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反动统治与设施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为了巩固我的统治权，在内政上、军事上、文教上也有些变革和设施。我总觉得取得盟旗王公的拥护和伪蒙古军的支持，是我的政治资本。因此，特别侧重盟旗行政的加强。至于汉人居多的各县，日本人把持得很紧，我想管也管不了，干脆就任凭日本人摆布。我在盟旗内政上的设施，首先是设置伪巴彦塔拉盟(巴彦塔拉是富饶平原的意思)，管辖的区域计有土默特、正红、正黄、厢红、厢蓝五旗及“巴彦”(即归绥县)，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凉城等县，包括旧绥远省政府所统辖的大部地区，是五盟中人口和收入最多的一盟。补英达赖自被解除伪蒙古军政府办公厅主任后，本是满腹牢骚，伪巴彦塔拉盟公署成立后，我任命他为盟长，才心满意足，不发牢骚了。伪巴盟的主任顾问开始时是安宅，后为泽井铁马。盟署下设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发表超克拨都尔(陈绍武)为总务厅长、贺云章为民政厅长、李树声为财政厅长、李春秀为教育厅长。嗣于一九三八年秋实行机构改革，又改设官房和民政、保安、劝业三厅，调任贺云章为官房主任，超克拨都尔为民政厅长，默尔根巴图尔为保安厅长，李树声为劝业厅长，调李春秀为伪蒙古联盟自

治政府参议会参议。

对于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方，我曾想采用蒙汉分开的办法来统治。具体说就是：以铁道为界，居住在铁道以南的蒙民，移至铁道以北，居住在铁道以北的汉民，移至铁道以南。经和补英达赖、默尔根巴图尔等商量，他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办理，是叫蒙汉民众大搬家，牵涉面广，困难甚多，不易办到，甚至还可能引起蒙汉人民的反感。因此我才没有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结果还是沿用属人主义的蒙汉分治政策。例如土默特旗和“巴彦”等县所统辖的区域，是蒙汉杂居，其中的蒙民归旗管理，汉民归县管理。对于察西四旗和集宁、丰镇等县，也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来统治蒙汉人民。至于各县、市伪县、市长，大多数是任用汉人，除了蒙人韩绍祖当过萨县县长外，其他各县均由汉人中的绅士之流充任。如“巴彦县”县长亢锦荣，集宁县县长张书常就是一例。这是为了拉拢汉族上层人物，调整民族关系，起到巩固伪蒙政权的作用。至于各旗总管，当然都是任用蒙人，例如土默特旗总管先是亢仁，后为森额，察西四旗总管都是留用旧人，为的是驾轻就熟，便于统治。

其次是设立伪厚和、包头两市，由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辖。自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府后，就把归化和绥远这两个名称取消，改为“厚和豪特”，并建立为市，作为伪蒙政府所在地，发表贺秉温为伪市长，是酬劳他在日蒙军占领绥远时出而维持治安的“功劳”，也是想通过他笼络商民，拥护伪蒙政权。奈因他发财心切，仍愿继续做鸦片买卖，把他调任为“土药公司”理事，由李春秀继任伪市长，也是想通过李春秀这个老官僚，拉拢满汉人士，拥护伪蒙政权。嗣因“厚

和市”是伪蒙政府所在地，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将其升格为特别市，并把“巴彦县”撤消，将其所属地方归“厚和市”管辖，扩大伪“厚和市”的统治区域。至于包头设市的原因，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上的需要，不过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也与设市有关。因为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黄河水运的渡口，为皮毛百货的集散地，并且是军事上的前哨，日蒙军集中驻地，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搜刮战略物质，掌握经济命脉，供应军队所需，更愿加强包头的行政组织，因此，特设包头市，任命刘继广为伪市长。

第三是加强各盟行政机构。盟在清朝时期，本是各旗会盟的地方，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在国民党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虽制定过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也迄未施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除伪察盟公署早已设立确定为行政组织外，对于锡、乌两盟也确定为行政单位，在贝子庙（现锡林浩特）设立伪锡盟公署，我仍兼盟长，任命林沁旺都特为副盟长，中村浅吉为主任顾问，下设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蒙汉兼通的玛哈希力（赵文儒）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仍为原来十旗。在百灵庙设立伪乌盟公署，任命巴宝多尔济为盟长，沙拉巴多尔济为副盟长，山本信亲为主任顾问，下亦设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墨尔根巴图尔（宝道新）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除原有六旗外，又增加了一个固阳县。至于伊盟地区虽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为统治领域，但未被日寇占领，伪蒙政权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的河东局部地区。在伪蒙联

盟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伊盟副盟长兼杭锦旗札萨克郡王阿拉坦鄂齐尔（阿王）派员前来和我联络，探询他是否可以来，我答复说：“请阿王自己考虑吧，这时如来我当然欢迎，如果脱身不便，暂时不来也可以，反正迟早是要收复伊盟的。”当时我固然愿意早日占领伊盟，日寇为了向西扩张侵略势力，进犯伊盟更是心切，因此特派伪蒙古军的潘井指导官和团长图们巴雅尔率领一团骑兵，前往杭锦旗迎接阿王。阿王是做官心切的人，为了急于得到伊盟伪盟长的地位，就于一九三八年春初前来，我当发表他为伊盟副盟长代行盟长职务，黑泽隆世为主任顾问，暂在包头成立伪伊盟公署，下设总务、民政、保安各厅，除总务保安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为厅长外，特派我的得力干部吉尔格朗（吉致祥）为民政厅长，发表奇子祥为准格尔旗西协理代行札萨克职务，章巴多尔吉（章景文）为达拉特旗的札萨克。日本方面拉拢妥达拉特旗的保商团长森盖林庆，发表其为伪鄂尔多斯挺进军司令，企图通过阿王等人，策动伊盟其他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第四，在内政设施上，我到达绥远城建立伪蒙政府后，曾经幻想，日方既然表示“帮助”蒙古，必然帮助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因此很想把绥远旧毛织厂接收过来，预备叫贺云章为经理，把原有工科学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也恢复起来，用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不意占领绥远不久，日本军就把旧绥远毛织厂拨归“满铁”会社经营，并将旧工科学学校的机器也都拆卸给了毛织厂，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本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我曾提出交涉，日本方面总是支吾其辞，不作明确答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具体到内蒙古，更是要把内蒙古作为供应原料，

销纳商品的殖民地。因而绝不允许恢复工科学校，培养工业人材，至于产业、金融、交通事业，都归“蒙疆联合委员会”直接掌握，分别交由日本企业机构经营。例如平绥铁路就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直接经营。

在文化教育上，我是侧重蒙人教育，为了培养急需“人材”，特就大台什村旧有的农科学校原址，设立“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郭调任畜产部长后，由金永昌继任院长，由那苏图（王庆三）任教导主任，吾勒吉卜林任事务主任。在专业设置上计有旗务、师资、师范、电报、补习各班，我特亲笔书写“勤敬忠诚”四字为院训，有时还到该院亲临“训话”，希望在院的青年学生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毕业后供我驱使。并在市内大会堂后边设立“蒙古文化馆”，任命伊德钦为馆长，吸收地方绅士郭象伋等为馆员，分设总务研究、图书、印刷各组，进行编纂小学教科书、课外读物、发行文化专刊等工作。我为了训练王公子弟，又特设一个蒙族学校，由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兼校长，调任超克曼度夫（汪文林）为教导主任。由保安部筹设中央警察学校一所，任萨彦毕勒格图（陈靖寰）为主事，训练警官和警务人员。为了培养通晓日文的各项“人材”，选送蒙古留日生十名，下令锡、乌两盟各设蒙古青年学校一所，责令各旗一律设立小学一所，卫生所一处，一律设置无线电台，加强通讯联络。

第五，在军事上，我也知道充实武装力量，是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对于各旗保安队发给新枪，充实装备，并派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充任教官，从事训练工作，

居中掌握官兵，希望对我能起拥护的作用。对于伪蒙古军方面，我虽然放弃了总司令，改由李守信继任，但我认为伪蒙古军还是我的政治资本，故不惜增加蒙民负担，为之征兵买马，总是力图扩充，不愿缩小编制。记得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末期，日本方面主张将蒙古军各师一律蒙古化，把蒙古军由汉人编成的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驻在各县的警察队，我很不以为然，认为第一、二、三师虽然多数是由汉人编成的，各师军官均与李守信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绥东战役和占领绥远各县的行动上，曾出过很大的力气，多数都效忠于我，其中背叛我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我提出反对。但因日方持之甚坚，争执无效，也就只好如此。日方把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靖安警备队，设两个集团。第一集团长为郭光举，第二集团长为门树槐。集团之下，设大队、中队、分队。完全部署在后方汉民居多的各县，用以镇压汉族人民，而把由蒙古人编成的第四、五、六、七、八、九各师，则改称为某某部队，多部署在包头、百灵庙及锡、乌两盟的边境地带。配合日军防止国民党的反攻，并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

一九三八年春，傅作义率部突然打到一间房一带，距离“厚和”市很近。这时驻在凉城的伪蒙古军第三师团长慕兴亚背叛我归降傅作仪，以致谣言纷起，人心恐慌。我为安定社会秩序，收买人心起见，亲在小教场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强调在此春夏之交，农作物正在生长时期，傅作义军竟不惜踏毁庄稼，遭害青苗，突来进行扰乱。我是想用这样挑拨性的言辞，引起当地人民对傅作义的反感，转而拥护伪蒙政权。我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话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把飘

扬在讲台前的蒙古旗撕成两半，我当时迷信地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蒙古政权要垮台。幸而为时不久，傅作义军就撤退了，这才又转危为安。

第六，对于汉民居多的各县，日本人虽然抓得很紧，不叫我管，但是对于能够买好人心的事情，还是想过问。例如日本人在各县城镇地方设立的赌博性质的俱乐部，为地方公正人士所反对，因此，我曾下令取缔俱乐部，但是各县日本顾问总是不理会，当然我的命令也不发生作用。不过我却因此博得了一些人的奉承。在一九三八年夏天的时候，久旱不雨，我特到“厚和豪特”舍力图召焚香祈雨，表示关心民瘼，用以收买人心。

(三) 旧阴谋，新花样 ——我向日本要权未遂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内，我向日本要权，也有过几次“冲突”，原因是我已经当了傀儡，还想掌握伪蒙政府的军政大权，实现我统治蒙古的野心。日本方面自然是把我这个傀儡当做他们侵略蒙古的招牌，要我俯首贴耳地听从他们的指挥。因此，我便和驻在蒙古的日本军部和当权的日本政客，发生过几次“冲突”。首先是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问题上，引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固然是日本军起了主要作用，但配合日本军作战的我的伪蒙古军，因全系骑兵，行动迅速，往往走在日本军机械化部队的前面，假如不是日本军部阻止前进，等候日本部队，很可能先行到达。例如我在百灵庙组织“各盟旗联合军”

攻打武川，和当地守军井得泉（原系伪蒙古军的团长，在七七事变后投归傅作义军）部队接触时，由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生道毅德尼玛等率队冲锋，当时被击毙，因而后退。我又命令伪蒙古军第九师从陶林进兵，准备再次攻打武川。迨至仓都固仍（包海明）率队到达后，听说井得泉已准备撤退，武川业已垂手可得。我计划拿下武川，即进攻绥远。不意这时桑原特务机关长特乘机到达百灵庙，让驻在百灵庙的军事顾问山内转告我说：“现在占领凉城的日本军，正向绥远开拔，俟日本军到达后，再行攻打绥远，较为稳妥。务要阻止第九师前进，以免孤军深入，而冒危险”。并且说“蒙古军已经作战很累，应当休息。”桑原这些话，虽然说得很好听，似对伪蒙古军关心，不叫受到损失，实际上这时绥远各地，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业已调往山西，其它正规部队，多已撤离绥远，仅留国民兵等地方团队维持局面，这种情况当为日本军部所侦知。因为绥远城很易拿下，因此日本方面计划叫日本军率先入城，不愿叫伪蒙古军先行到达，所以特来阻止伪蒙古军进攻。当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主力到达平地泉，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和第九师师长仓都仍率领伪蒙古军到达陶林时，日本军部也是严令停止前进，让等候日本军到达再行进攻。根据以上情况，我和包海明等，曾向人夸说伪蒙古军的“勇敢”，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立功很大。不意这话竟引起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的不满，说我有意抹杀日本“皇军”的“战绩”。记得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大桥忠一到北平，嗾使吴佩孚出山，便窜到“厚和市”视察情况，前来见我时说：“我这次到北平，是专为做吴佩孚的工作，便中前来看看你这老朋友。”

我问他：“你工作的怎样？”他答说：“不行！吴佩孚比你还硬，要的条件太高，如果他要出来主持华北局面，要求日本军全部撤退。这个条件怎能接受。”接着他又向我买好说：

“我在军部听说，你在占领绥远城等地时，称赞蒙古军的‘功劳’，军部却认为你有意抹杀‘皇军’的‘战绩’，对你很不满意。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劝你，不要和军部起摩擦，因为你和军部摩擦，是对你不利的。你如对军部不满意时，可到日本国内呆一个时期。”由此可见，我指挥伪蒙古军进攻陶林、武川、绥远城等地，固然为的是实现我的政治野心，其实本来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力气，做日本帝国主义西犯的马前卒，不想因为夸说伪蒙古军的“功劳”，竟惹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和猜忌，这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时也说明，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蒙政府主席，只有看日本军部的颜色行事才行。

其他几次“冲突”是：

一、当日、蒙军联合西犯时，由伪察盟安宅顾问组织政治接收班，随军前进，委派伪县长，恢复地方秩序，出安民布告等。例如集宁、丰镇、归绥、包头等伪县、市长，都是由安宅率领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的。伪蒙古军政府虽然也组织两个随军工作班，一个是由陶克陶等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到达张家口，沿着平绥路随军前进，做“宣抚”工作。一个是由郭尔卓尔札布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经化德、苏尼特右旗、锡拉木伦庙等地到百灵庙，接收武川，做“宣抚”工作。不想我以伪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却引起安宅顾问的不满。他说这是他所率领的政治接收班的职权，我委派县长

不应当。好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没有把徐荣侯更换。

二、在伪蒙古联盟政府成立后，日本宪兵队竟把设在“政府”后院的直属电台的报务员葛孟库、陈寿山二人逮捕。我听到后很恼火，认为既未取得我的同意，又未说明原因，竟将“政府”直属电台报务员逮捕，是对我的藐视，是侵犯“政府”职权。我当时就把总务顾问中岛万藏和最高顾问的秘书和佐良之助请来，叫他们立刻去和日本宪兵队江草队长交涉，把葛、陈二人放回。中岛与和佐应付我说：“现在时间已晚，城门业已上锁，恐怕叫不开城门。”我驳他们说：“你们别瞎说了，你们还叫不开城门？显见这是托辩，你们如果不愿去，我就亲身去办交涉。你们如去，我就在办公室这里等着，等把葛、陈二人放回，我才离开这里去休息。”中岛与和佐二人见我持之甚坚，又怕我亲身出马去交涉，惹出更大的麻烦，于是他们二人就答应着去了。两个小时工夫，就把葛、陈二人用汽车送回来，中岛与和佐也坐汽车回来向我复命。我没再问是怎么交涉放回的，为什么把葛、陈二人逮捕，反正放出来就算完事。

三、有一次，因为预算问题和宇山兵士发生了“冲突”。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日本人一律是顾问和辅佐官，不充任正式官吏。我还妄想不叫日本人掌握实权，特别不叫掌握人事权和财政权。人事处长乌勒吉图曾和我说：“人事顾问（忘其名）要求看公文，并说他是人事顾问，连关于人事的公文都看着不着，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最高顾问要问他，他如何答复呢？”我说：“还是不叫他看好，他看了就要盖章，无形中便成为制度了，不能开此先例。”我对人事权虽然抓得很紧，但自宇山兵士来任最高顾问后，在一个

时期内，虽对人事不加过问，却极力抓财政权。日本顾问部先作出了预算指标，强令各部接受，民政部经费要多，而预算指标列的少，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极力争要，我也坚持非多给不可。宇山兵士却斥责民政顾问岸川兼辅无能，不能掌握民政部事务，责成他非按着预算指标通过不可，因此闹成僵局。我听到后也很生气，就把宇山兵士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谈判，我质问他：“蒙古联盟政府的事情，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要是我当家，我就有最后决定权，要是你当家，我就回旗去。”宇山兵士说：“你是主席兼政务院长，我是你的顾问，当然是你当家。”我又说：“那么，为什么我主张列入的教育经费就不算数呢？”宇山兵士说：“这件事好办，容我和有关顾问们商量商量。”结果重新列入蒙人教育复兴费十万元，我也再未说什么，这场争执就这样作了结束。从此宇山兵士改变了做法，对我极力敷衍，并要深入各盟视察，表示愿意辅佐我好好地干一场。我也给各盟打电报，说宇山兵士是很好的顾问，叫各盟旗准备欢迎他。有一次，我和他及其他顾问在蒙古会馆聚餐，我表示不同意“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和该会的做法。宇山兵士说：“‘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做法我们可以不管它，不是还有联盟政府吗？我们只要把联盟政府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并表示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把旧绥远省立工科学校的机器拆走，做了兵营等等做法是不妥当的，说这对于收揽人心有影响。不意宇山兵士说过这些话之后，没几天就被调走，由畜产部顾问泉名英（系日本退役少将）升任最高顾问。据我推测，宇山被调走的原因，是他对我有迁就的倾向，这就不符合日本军部的高压政策；他表示不应把学

校做为兵营或旅馆，显系对日本军部的批评。这些事被日本军部知道了当然对他不满意，所以很快地就把他调走了。

四、在扣捕色林保问题上，我和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冲突”。色林保原系西公旗的协理兼保商团长，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因为西公旗争夺札萨克职位问题，他和石拉布多尔济（石王）结成一党，以绥远当局为靠山，与蒙政会对立。迨至日蒙军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权后，色林保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对我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日本特务机关则因他在西公旗掌握一部分武力，可供利用，对他极力拉拢袒护。色林保每到“厚和”就住在特务机关，简直把我不放在眼里，使我甚为恼火。为此我就命令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到日本特务机关去要色林保，想加以制裁。卓里克图前去交涉，不想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岩崎竟为色林保保镖，抗不交出。嗣又经中岛万藏出面，向特务机关说明色林保在西公旗事件中的情况，特务机关方面才了解色林保过去与蒙政会搞过对立，并考虑到：为了袒护一个色林保，惹起我这个“主席”的不满，很不适当，于是卓里克图又去交涉时，便提出条件说：“可以将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但要顾全特务机关的面子，不要到特务机关扣捕，要在别的地方设法诱捕。”有一天，色林保为了拉拢日蒙军政人员，企图展开政治活动，在凤林阁饭庄请客，中岛万藏和卓里克图均在被邀之列。卓里克图得到这个机会，便预先布置下军警，待到宴会开始后，把岩崎悄悄请出来，说明要进行扣捕色林保的布置，要求岩崎最好把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否则就指挥军警进行扣捕。岩崎初则不肯，只管摇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卓里克图的要求，亲乘汽车把色林保送来，我即交由卓里克图送

到监狱，管押约近二个月。然后由我旗（西苏尼特旗）派来保安人员，将色林保带至我旗监管，后因病身死在我旗。

（四）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到 伪联合自治政府

我和日本方面最大的“冲突”是关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设立问题。在蒙古（即伪蒙古联盟政府）、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相继成立后，行政上虽不相隶属，但都在平绥铁路线上，交通、金融、产业都有密切的关联。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控制这三个伪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搜刮战略物资，就在日本军部操纵下，指示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特由伪满调来金井章二主持筹备成立事宜。并通知三个伪政权，各派代表缔结协定。由“察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于品卿、杜运宇二人，由“晋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夏恭、马永魁二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代表，日本方面内定为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等三人。

这次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指使下，通过三个伪“自治政府”代表协商的形式，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缔结伪协定如次：

- 一、本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关于各政权有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及其它重大事项。
- 二、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与必要之职员构成之。
- 三、总务委员长总理并代表联合委员会。
- 四、联合委员会置日本顾问一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
- 五、联合委员会之决议，须经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员

同之同意，始为有效。

六、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命令，须以联合委员会名义行之。各政权为了援助易于执行，得分担义务。

七、联合委员会得管理各政权委让之公有财产。

八、非经各政权之同意，委员不得脱会。

九、本协定用日文、蒙文、汉文作条文，如有疑义，依据日文解释之。

缔结协定后，即正式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本军部派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任命村谷彦治郎为参议，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杜运宇、马永魁等为委员，分管总务、产业、金融、交通等事项。

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在金井章二的操纵下，通过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决定实行机构改革，把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由卓特巴札普任总务部长、派野田武为总务顾问；由金永昌任产业部长，派高津彦次、森田清为产业顾问；由马永魁任财政部长，派寺崎英雄、久间猛为财政顾问；由陶克陶任保安部长，派伊藤祐为保安顾问；由杜运宇任交通部长兼民生部长，派满尾君祐、赤板亮一分任交通和民生顾问。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其强化的程度，是由协商性质的结构，变成行政组织；其扩大组织的范围，是由代管产业、金融、交通，扩大到管理民政和保安，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

我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

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边。记得陶克陶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返回“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我们几个人闲谈时，竟洋洋得意地说：“我是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是管你们的。”我都毫未介意，还认为他不敢藐视我，因为他虽是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但在伪蒙古联盟政府中，他是总务厅长，我是主席兼政务院长，仍是管他的。他说这话不过是对在坐的其他人员表示得意而已。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

一九三八年秋，日本军部决定，令金井章二陪同我和于品卿、夏恭、李守信等访日，日程业已作了安排。我这时正在锡盟巡视，没有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到达张家口，日本军部的政治参谋大桥雄熊很着急，就责陶克陶催我火速前来。陶克陶竟发牢骚说：“在这紧急的时候，德王却回到锡盟巡视不来，把他杀了算啦。”（这话是李守信告诉我的）。这说明陶克陶已经不为我用，完全站在日本军部方面去了。

我到了张家口便起程，经北京、山海关、奉天（即辽宁）、朝鲜等地，渡海到达日本下关车站。我对日本国内欢迎人员致辞时，总是说“蒙古”，不说“蒙疆”。我讲完话后，我的随身翻译吉尔嘎朗译成日语。金井章二在旁边，马上向新闻记者和欢迎人员解释说，方才德王所说的“蒙古”，就是“蒙疆”，使我很感不快。当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磨招待我等一行宴会时，宴前，我和近卫周旋闲谈说：“现在蒙古民众都不愿意‘蒙疆’这个名称，仍愿意用蒙古代表新的政权。”正在说这话时，招待人员给近卫送来“挨拶子辞”（系应酬致辞之意），近卫看过之后，见上面所有“蒙古”

二字都换成了“蒙疆”，因我方才说过反对“蒙疆”之言，近卫似有觉察地躊躇了一下。但近卫致辞，仍是把原稿宣读一遍，可能金井章二又预先做了工作。

这时坂垣征四郎任日本内阁陆军省大臣，东条英机任陆军省次官。当他们约定和我见面时，虽然都是旧相识，因为金井在座，只说些应酬之言，未谈重要问题。见面后，坂垣的亲信人员（忘其名）和正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吴鹤龄说：

“德王和坂垣大臣过去就曾相识，为什么见面时没说心里话，未谈重要问题呢？其中不无原因。”吴鹤龄答复说：“会见时因有他人在座（指金井章二）不便谈吧。”这个日本人顿然领悟说：“啊！原来如此！那么，我向坂垣大臣说，再约德王单独见面。”吴鹤龄将此情况具以告我，于是我就和吴鹤龄商讨扩大蒙古政权和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当经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向外长城纯蒙旗地带发展，放弃内长城以南汉人居多的察南、晋北地区，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第二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伪蒙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起初我是主张第一案，吴鹤龄极力主张第二案。并强调说：“察南、晋北过去都是蒙古地方，为什么不要呢？我们蒙古现在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的话，连北京、河北都想要呢！”接着他又告诉我说：“我来到东京后，为了实现蒙古建国，曾和日本朝野有名人士作过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曾向他们建议，对中国实行‘分块统治’的政策。象‘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这样的政权，无妨多来几个。有的日本人非常赞成我的说法。”当时我感觉到，吴鹤龄的野心比我还大。

但又意识到，吴鹤龄向来主张“拣到筐里就是菜”，他是特别注意现实利益的人。他所说“连河北、北京都想要”之言，不过是强调不要放弃察南、晋北的陪衬语而已。经吴鹤龄反复陈述理由，我也觉得目前吸收察南、晋北，扩大伪蒙古政权，比较接近实际，易于实现，也就再未说什么。吴鹤龄便将第二案定为甲案，第一案定为乙案。当坂垣再次约我见面时，即将这两个方案亲手交给坂垣，并说明这两个方案的内容。坂垣答复说：“俟经详密研究，再行答复。”过了几日，坂垣又在陆军大臣官邸召集我们，答复关于蒙古建国问题。他说：“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俟将外蒙‘收复’，实现内外蒙的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对蒙古的国策，希望大家相信。”这话虽然是坂垣支吾其词，用以安慰我妄想蒙古建国和实现大蒙古主义的迷梦，但也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野心。等我访日返蒙后，曾接到吴鹤龄的来信，说是坂垣同意甲案，并由陆军省通知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实行。

金井章二见我到处仍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当然非常不满。他认为“蒙疆”这个名称，是日本军部和他金井章二主张应用的，非在日本国内展开宣传，使人周知不可。当我访日行将结束，东京放送局约我向日本全国广播时，金井章二认为这是强制我把“蒙古”改说成“蒙疆”的好机会。他虽未对我直接警告，却派人对吉尔嘎朗恫吓说：“德王在日本，不许再说‘蒙古’，不许再说‘建国’。他如果再这样说，你也不许给他译成日语，要把‘蒙古’二字一律改称‘蒙疆’。如果你不这样办，要小心你的脑袋！”这时正在

东京留学的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前来看我，听到金井所派人员恫吓吉尔嘎朗之言，也很气忿地说：“日本人真厉害，连‘蒙古’二字都不叫说，还能谈到其它吗！”但我在广播中还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我在访日期间，也曾见过日本天皇，我说的是感谢日本的援助，他说的是希望协力维护东亚和平事业。都是应酬之语，没有谈到实际问题。

我访日回蒙途中，想到金井章二在日本东京控制我只许说“蒙疆”，不许说“蒙古”，不许说“建国”的种种做法，有很大的反感，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总觉得，“蒙古”与“蒙疆”二字，不是微不足道的字义问题，而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因为“蒙古”二字不仅代表民族，并代表土地、人民。而且一提起“蒙古”二字，世界上是无人不知的。这是历史上早就确定的名称。如果改称“蒙疆”，就意味着仍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是隶属中国的地方政权。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时期，我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做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块金字招牌。迨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又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建国”，做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个幌子。用这“蒙古”二字，笼络不少的青年为我所用，可以说是我的“得意杰作”，是我在政治舞台上有用的幌子。而在访日时期，却连“蒙古”二字都不能说了，今后将何以号召蒙人，言念及此，不胜烦恼。

我等一行回到张家口后，适逢举行“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约我前往参加。我开始托故不去，金井章二很着急，因为这时日本北支（华北）派遣军的参谋长

（忘其名）、伪满代表等很多来宾都来参加祝贺，我如不参加，显见其中有了裂痕，对日本方面所宣传的“日蒙亲善、密切合作”是个讽刺。金井特又连次派人前来劝我参加，我在大家一再相劝之下，才勉强地迟迟前往参加。我到典礼会场时，所有参加人员和来宾均已先行在座等候，我到后才开始举行典礼。我并没有讲话。

我由张家口回到“厚和豪特”后，前来参加“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的各盟盟长各旗札萨克、总管等，因为等我回来听取访日的情形，尚未返任。我就召集他们开会，提出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大家均表同意，并经决定由各盟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六份，备我使用。各盟旗首脑返回后，即陆续送来，就是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由阿王设法弄到盖有印鉴的空白公文。唯有察盟盟长明安旗总管卓特巴札普送来的印文，没有署他自己的名字，仅有总管代理人署名。听说他向人表示说：“我们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反不动嘛！何苦来此一举。”我收到各盟旗送来的印文之后，就责成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起草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的理由是：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盟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这个公文拟就后，又译成蒙、日两种文字，并把蒙文的一份，写在盖有各盟旗印鉴的公文纸上，作为主件，把日文的一份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我计划寄给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参谋本部、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各一份，自留一份。准备将付邮时，旋又考虑到直接向日本国内首相等寄

送，不大妥当，结果仅寄给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一份，嘱他相机办理。适在此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向陶克陶的秘书张锦堂密探此事，并表示愿出重资购买该项公文稿件。陶克陶忙来和我说：“你联合各盟旗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之事，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曾向张锦堂询问并要出资购买公文稿件，怎么办呢？”我答复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正要把这反对的公文送给日本军部；他们既要出资购买底稿，告诉张锦堂可以卖给他们，赚他们一笔钱。”张锦堂得到我的许可后，就将公文底稿抄了一份交出去，听说仅给报酬五十元。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掌握我们内部情况，什么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待我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送交日本军部后，为时不久，日本军部便通知我到张家口去商量事情。我到张家口后，大桥雄熊前来看我，我便谈到不同意用“蒙疆”二字作为机关名称问题，并反对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措施。大桥雄熊说：“现在预定请你当总务委员长，所有一切事情，你都交给我们吧。”翌日，莲沼兵团司令官又约我相见说：“关于‘蒙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解决，你何必发动各盟旗联合反对呢？”我把反对“蒙疆”公文的内容，又向他作了说明，并强调这是各盟旗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莲沼也表示请我当总务委员长。我和莲沼会谈后，大桥雄熊又约我到另一会客室里，向我解释：“‘蒙疆’二字，有今昔之不同。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时期，应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压迫你们，今日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日本帮助你们建立新的政权。”我仍是坚持我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和莲沼、大桥会谈后，经反复思考，认为日本军部是想用让我当总务委员长的方法，封住我的口，不再反对“蒙疆”。我为了不在各盟旗中留下只顾个人升官的口实，于是又调动人马，通知各盟选派代表，到张家口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田中信一参谋长，反对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伪蒙古政权的名称，并说明我不就总务委员长的理由，嘱陶克陶作他们的翻译，务要把盟旗代表的意见表达出来。谁想陶克陶自任“蒙疆联合委员”委员后，早已倒向日本军部方面。并因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的态度蛮横，说话强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表人物，陶克陶只有顺从其意，不敢作丝毫的折冲，不但对于盟旗代表们所说的话，没有完全翻译出来，还有可能从中捣鬼。金井章二也对“蒙疆”二字任意曲解，说：“‘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因而各盟旗代表林泌旺都特等，到张家口进行反对“蒙疆”问题的活动，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目的。

我虽因为策动各盟旗反对“蒙疆”，招致日本军部的不满，但这时他们还须利用我这块招牌，统治蒙古地区，因而又授意陶克陶劝我就任总务委员长。陶克陶深恐自己劝不动，特把李守信搬出来，一同前来劝我说：“现在金井已表示愿意辞去代理总务委员长一职，请你前往就任，如果仍然表示不就，恐怕影响不大好。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吗？现在日本军部方面已经说好了，还是到张家口去就任吧。”这时我也考虑到，胳膊怎么也扭不过大腿，既然日本军部已经这样决

定，各盟旗代表反对也不行，也只好就任了。因而就向李、陶二人表示说：“就任就就任吧。”但我以为，就任仪式可能要通过推选形式，不意我到张家口后，陶克陶早和日本方面作成圈套来捉弄我。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晨，陶克陶特来请我到日本军部，“商量要事”。我到后，大桥雄熊就迎出来和我说：“现在就举行任命式。”金井章二等先已在座，莲沼兵团司令官在几个人当中严肃地站立着，田中信一参谋长陪侍一旁，大桥雄熊就宣布任命式开始。首由金井章二表示，辞卸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继由莲沼宣布，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当时我虽知道受了欺骗和玩弄，心中充满了苦恼，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只好接受任命，没有表示不就。这就显露了我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奴隶性。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后，莲沼又以司令官名义，给我赏金一万元，我也就接过来。我返寓后，认为今天举行任命式，事先既不和我商量，临时又不叫我知道，诳我到了日本军部后，就突然来了一个任命式。把我玩弄到了这个地步，越想越难过，就拿起威士忌酒来喝，一气喝了几碗，喝得东倒西歪，醺醺大醉。这时陶克陶前来见我，我一看见他，不由得无名火起，把怒气完全泄在他的身上，猛然打了他一拳，并严辞责斥地说：“今日举行任命式，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说，反和日本军部作成圈套，来欺骗玩弄我！”陶克陶推说事先不知道，就抓个空隙溜走了。

嗣后，我把被任命为总务委员长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吴鹤龄，嘱他向日本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反映。不久，接到吴鹤龄复信，说坂垣表示，日本军部这个做法不对，不应采取

任命的方式，惹得德王不愿意。我认为坂垣还“同情”我，因而胆子又壮起来。有一次，在张家口又和大桥雄熊见面，我根据访日时给坂垣的甲、乙两案的内容，谈到扩大和强化伪蒙政权及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大桥面带狞笑而用嘲弄的口吻说：“你们蒙古独立得啦”。我猛然听到他的话还很惊讶，怎么他也说出允许“蒙古独立”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干脆你们蒙古独立，我们日本军撤退好了。”结果又是弄得不欢而散。

我返寓后，回味大桥所说的话，是给我软中有硬的钉子碰，是对我的藐视和嘲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可恶，再不能“合作”下去，便打算出走。那么究竟向何处走呢？经过左右思维，既不愿走向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共产党，而是仍想投靠蒋介石。因而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发生了一段关系。因为这是后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准备在写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一文中，再作详细的叙述。

我既然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过问了，更不争执了，日本方面说啥就是啥。“被休的媳妇，不管牛犊隔奶”这句蒙古谚语，很能表达我当时消极的心情。例如，这时日本方面提出，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统一的“蒙疆政权”，并主张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原有的旗号，另制新的政权旗号。这本来是我不同意的。我的主张一直是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撤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厚和豪

特”成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并主张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原有旗号，不另制定新的政权旗号。这两个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应当争执，只因这时我一心想要出走，不惟没有力争，反顺从日本军部的意旨，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和于品卿、夏恭等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我们三个“自治政府”愿意合流，成立统一的新政权。结果就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操纵下，于是年九月一日实行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把“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虽然降为地方政权，仍保持原来机构。仅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裁撤，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直接统辖锡、察、巴、乌、伊五盟，并将“厚和”市划归巴盟管辖，把包头市划归伊盟管辖。至此，不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寿终正寝，连我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帝国”的迷梦，眼看也将破灭了。

（陶布新记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所谓“凌陞通苏”事件的真相

正珠尔札布

所谓“凌陞通苏事件”发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伪“满洲国”康德三年),日寇宪兵队在海拉尔等地逮捕了凌陞等许多人。一个月后移送伪新京(长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经伪军法会审判死刑者四人,十三年以上徒刑者二人。

这件事是在汉奸、蒙奸之中轰动一时的大案件。当时驻海拉尔的日本骑兵军集团长笠井中将,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中佐、伪满兴安军顾问田利光中佐和日本海拉尔宪兵队长北川宪兵中佐等四人,是制造这个事件的主角。

“九一八”事变以前,凌陞是呼伦贝尔盟的副都统,他的封建思想很浓厚,对满清皇朝复辟抱着幻想。“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把废帝溥仪拉出来,做伪满的傀儡皇帝,引起了蒙古封建阶级“攀龙附凤”的兴趣。溥仪到了旅顺,凌陞就积极活动起来,他跑到旅顺见了溥仪和关东军要人,参加了伪满建国阴谋活动。

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凌陞被任命为伪兴安北省的省长,凌陞的父亲贵福被任为伪参议府的参议。凌陞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同时又看到日寇专横,满系官吏有职无权状况,心怀不平。他对日系同僚也态度傲慢,对日寇统治

伪满洲国政策措施更是多所抵触，形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状态，在走狗群中成为“硬汉”，这时，自取死亡之机已经伏下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伪满政府蒙政部，召开兴安省长会议，当时我在会议上当翻译。凌陞公开发言，反对日寇对伪满一些重大政策，如土地国有、日寇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所谓日系官吏）、用日语作为“满洲国”国语，并用日文行文，把蒙古地方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四个兴安分省等等。他说：“在‘满洲国’的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语，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能搞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什么叫分省，日本人的文书，咱们不懂，怎能实施呢？”这些话，弄得主持会议的日系蒙政部次长，瞠目不知所对。他提出的意见还很多，都是日寇难以接受的。这样，凌陞与日寇的鸿沟就加深，参加会议的满系人（汉奸）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表示意见。

一九三二年十月，伪满兴安总署长官齐默特色木丕勒（郭尔罗斯前旗亲王）、伪兴安东省省长额勒春、伪兴安北省省长凌陞等赴日参观，随员有辅导员伪兴安总署总务处处长白滨晴澄，翻译正珠尔札布等，在日本各地参观了一个多月。在参观当中，凌陞也对白滨提出很多难题，最严重的是，他反对到日本各地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他说：“我们参观的目的，是为了逛逛名胜古迹，欣赏风景，不是为参拜天照大神而来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在参观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凌陞赞美日本的话，日本人认为很得意的地方，他都表示不满。在大阪，

田中车辆会社的财阀田中太介，为了向伪满推销车辆，特请参观团的人宴会，席间醇酒艺妓，盛筵相待。宴会开始，凌陞指着一个碟子里的菜，问我是什么？我回答是蝾螈肉（田鸡），凌陞当时投箸而起，连说：“这不是糟践人吗？”不欢而散。参观动物园时，园长亲自接待，特引我们看他们豢养的猩猩，猩猩表演了各种技艺后，同参观的客人一一握手。凌升十分生气，认为兽与人齿，岂有此理。虽然白滨排解也没有用。

一九三四年，凌陞被派为伪满首席代表，在满洲里参加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的“满”、蒙国境会议，此时适值出席伦敦缩军会议的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路过满洲里，驻满洲里的日本领事和凌陞联名在满洲里车站食堂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陞看见日本领事的座位是中间主人的位置，而他自己则列为次席，因此，他就不肯参加宴会。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代表，日本领事应该坐在主席的位置。”凌升说：“请的是日本代表，但是这个地面（指满洲里）是属于兴安北省管辖的范围，我是这省的省长，客人到了我的管辖地方，应该省长我坐在主人的席位。”两人争执了一番，日本领事无奈把主人的座位让给凌陞。

凌陞和苏炳文有往来。凌的妹夫春德也同情苏炳文，而且，因为苏炳文的事，他还给蒋介石打过密电。这些情况都在日本人手里掌握着。这都成了日本人除掉凌陞的把柄。

根据上述情况，凌陞在日寇的心目中，已成为他们统治呼伦贝尔的一大障碍。

伪满成立以来，在“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上，由于日寇的挑衅，不断发生纠纷，特别是一九三五年以

来，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哈河一带，发生了彼此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每次战役日寇出动军队若干人，蒙古人民共和国总是用加倍的兵力来对付。日寇老是打败仗，伤亡很大。

驻扎在海拉尔的笠井骑兵团长，认为“皇军”惨败的事实对他本身和所谓“皇军”的面目来说是难堪的。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责任，因此扬言有人通苏，窃取了日军行动情报，致使日军惨败。于是首先在国境附近，逮捕了所谓嫌疑分子：伪满上尉团附沙德勒图（通尚）和伪警察倭信太等。逮捕以后，日寇宪兵严刑拷打，硬逼他们说出背后关系。终于捏造出凌陞等有间谍活动和反满抗日、通苏的口供。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日寇突然宣布海拉尔市戒严，出动了许多宪兵、军队戒备巡逻，一切旅客上下火车、电讯、电话的使用，文件来往，均行禁止，形势非常严重，人心惶惶不安。当天逮捕了伪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并搜查他的私宅，结果一无所得。过了一个星期，凌陞自伪满“新京”回到海拉尔，下车后就被日本宪兵队长逮捕。凌陞胞弟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偕同日本顾问田中佐到笠井骑兵团长那里抗议，要求释放凌陞。笠井支吾应付了一会儿，日本宪兵队就在笠井司令部把福龄也逮捕了。

凌陞被捕后，数十名日本宪兵包围了凌陞的住宅，进行大搜查，但在凌陞私人住宅里，除了金银货币以外，并没有搜出什么“通苏”的“证据”。只是在旧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发现了两挺机关枪，以及四五十支步枪和子弹数万发。这些枪械子弹是马占山、苏炳文出走时，无法带去，给凌陞留下的，凌陞尚未正式移交给警务厅。这样，就算是日寇得

了一个唯一的可以作为凌陞通苏证据的东西。

此外，日寇还逮捕了葆定（伪省公署科长）等许多人，又到伪兴安北省总务厅长荣安和海拉尔伪市长德春家里去劝诱，硬软兼施，叫他们说出有关凌陞等反满通苏的事实，但是仍然什么证据材料也没有得着。

凌陞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里，经过严刑拷问后，转解“新京”的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以后把这个案件移交给伪满军法会审，日本宣布的所谓《凌陞等通苏事件公报》，一点也搞不出事实，只不过是空空洞洞二三百个字的“罪状”。

“凌陞等通苏事件”宣布后，日寇对蒙古人加强了压力。在一次集会上，伪满军事部高级顾问花谷正少将宣称，今后无论任何人，要是说蒙古独立的话，就拿反满抗日的罪名来治罪。

所谓“凌陞等通苏事件”发生后，有一天堀内一雄（中国名叫满良，伪满第一军管区少校参谋长，我早在日本时与他相识）由“新国都旅馆”来电话找我。会见后他问凌陞事件是怎么回事，我答以不知。他说这次为了裁判凌陞，要组织军法会审，特地调他来充当裁判长的。他也不知道这事的底细，问我有什么意见，给说一说。我说：“我想凌陞不可能有这个事，他还要跟皇帝结亲呢，在‘新京’也盖了大楼，他父亲是参议，他自己是省长，还能有别的想法吗？”堀内默然。

裁判结果，把沙德勒图判了十五年徒刑，倭信太判了十三年徒刑（他们都在狱中死去，不知是怎样死的）。凌陞、福龄、春德、华霖太都处死刑。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新京”南岭刑场执行枪决，当天在太子堂（日本庙）把尸体由各家属领

回。

这个案件的处理是接着日寇关东军的意旨行事的。既没有辩护律师，而裁判长及裁判官又都是日本人，只是扮演了一出傀儡戏罢了。当时目睹行刑情况的伪满治安部官房长入江三一上校，后来对我谈过凌陞被枪决的情况。他说：凌陞这人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含着冷笑，叫他带上覆目带时，坚决不带，挺着腰板，毫不在意。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说：“没有，快打吧。”事后听说，凌陞在被拷问中，始终没有供出任何通苏事实。只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连别人。”

凌陞事件结束，关东军宣布这件事不再扩大，不再检举逮捕。拿这话来安定人心。又说，这样大的事件，本来应该诛灭九族，但是大日本帝国不忍那么做，他们的亲属都免罪。于是把凌升的儿子色布精太送到日本留学。

究竟所谓“凌陞等通苏事件”有无事实呢？综合我对这件事的见闻，我认为是“莫须有”而已。凌陞是封建余孽，叛国求荣，决不会有通苏反满抗日的爱国行动。他致死的主要原因是：自以为对伪满傀儡皇帝溥仪拥戴有功，没有得到他梦想的更高的卖国求荣的地位，难免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且既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还要在主子面前充当硬汉，为自己争权，这就必然触犯主子的尊严，遭到杀身的大祸，结果不待发挥尽走狗的作用，主子就把他“烹”了。凌升的被杀，这是当汉奸的应有下场！

（政协海拉尔市委员会供稿）

（一九六四年十月）

尼冠洲之死

哈斯瓦齐尔

尼玛鄂特索尔，汉字冠洲，前察哈尔牛羊牧群^①属黄牛群人，父名伊达木阿布拉克齐，当过牧群护军校^②。尼冠洲弟兄四人，他为长，二弟名札木苏荣，当过牧群委协理。三弟出家当喇嘛，早年病故。四弟汉名席振铎，在北京辅仁大学念过书，日伪时期，随其岳父乐景涛在南京。日伪投降后，以国民党察哈尔省特派员身份到张家口活动过，现在可能在台湾。尼冠洲汉语流利，粗通汉、蒙、满文。少时家贫，以贩运青盐为生，北洋政府时代，经人介绍到张家口察哈尔都统署充当翻译多年，即由此起家。

一九二七年八月，我到察哈尔省政府接替尼冠洲当翻译员，那时他是国有明安牧场场长，兼代察哈尔牛羊牧群总管事务。我从此认识了他，以兄事之。

尼冠洲在都统署时期，曾结识过外蒙古某亲王，这个

①群——清末民初，蒙古地方的一种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旗县。

②牧群护军校——清朝的一种官职名称，世袭制，为管理牧群的首领。

亲王到北京任过北洋政府参议院议员，后来走了，留下图章，委托尼冠洲代领薪金。不久外蒙革命了，这个亲王再没有来。尼冠洲坐享这个亲王的薪金，在张家口、北京等处置买房产，在口外老家也置买田产、牲畜，由他二弟在家经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官老爷了（尼冠洲坐领外蒙某亲王薪金事，是他的汽车司机索那木仁庆讲的）。

当时就察哈尔四群来说，尼冠洲是民国以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察哈尔八旗四群总管和前锡林郭勒盟的王公札萨克，到张家口会见都统，办理政事，都要经过他的门路。所以逢迎他的人也多起来了。

尼冠洲当时在蒙汉上层人士中交游颇广。各派军阀更替地占领张家口，任察哈尔都统的有北洋军的张锡元、田中玉、何宗连；奉军的张景惠、高维岳；西北军的张之江、鹿钟麟；晋军的赵戴文和建省后的省主席杨爱源。当这些人任职期间，尼冠洲都是工作过的。因为那时翻译人才缺乏，虽更换职员，却换不了他。这样一来，他的朋友在各派军阀中都不少，他的声誉地位因此也就日益提高了。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设建了察哈尔省，杨爱源任省主席调任尼冠洲为国有明安牧场场长时，改用了两个中学毕业的蒙古青年为译员。不久，由于牛羊牧群总管卓特巴札普担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就派尼冠洲代理他的职务。因此，人们都称他为尼总管。尼冠洲是卓特巴札普的得力帮手，对外办理联络事务，对内协助群政，代行总管职务。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卓特巴札普先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副处长，住在北平，后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住

在张家口。都是由尼冠洲代理卓特巴札普的总管职务，看守印信、管理旗政。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尼冠洲参加过曾任北洋政府议员的杭锦寿为首组成的三人代表团，代表察哈尔十二旗群，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在南京住了三个多月。我那时由察哈尔特别区第一职业学校毕业了，从北京去南京升学，得到杭锦寿的协助，得了一张优待票，和他们同车到达南京。

一九三一年五月，尼冠洲被选为国民党的所谓国民会议的代表，会同列席代表湘蓝旗总管额包力克们德、肫白旗总管图鲁巴达尔胡，前往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从此他就和国民党发生了密切关系。此时，他又结识了所谓蒙古驻京代表办事处处长吴鹤龄，成为莫逆之交。在南京，吴鹤龄是尼冠洲的代理人；在察哈尔蒙旗里，尼冠洲是吴鹤龄的代理人。如在一九三四年，尼冠洲代表察哈尔十二旗群办公处向国民党南京政府交涉，购买过一千支步枪，以军马一匹换步枪一支，子弹三百发。按每旗能出多少马，就买多少枪来分配。枪是通过内政部买的，内政部还派员来各旗进行调查，然后才批准的。当时的买枪理由是加强各旗保安队，以防土匪，保护地方。对于此事的交涉，吴鹤龄在南京联系有关方面出了不少力，而尼冠洲回来后，也大肆宣扬吴鹤龄的活动能力。这时日本的特务机关“善邻协会”已在多伦县、西苏尼特旗等地建立起来。日本特务分布在各旗活动，所以就在尼冠洲买枪问题上大作文章。后来，日本人谋杀尼冠洲和吴鹤龄的事件，与此事有很大关系。

一九三三年夏，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尼冠洲因贪污嫌疑案，被孟克吉尔嘎拉喇嘛控告。冯玉祥把尼冠

洲逮捕起来，押在张家口监狱里。不久，冯玉祥上了泰山，尼冠洲才脱险。宋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卓特巴札普任委员，才将尼案交牛羊牧群总管调解结束。

一九三三年九月，前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推举前乌兰察布盟盟长达尔汗旗扎萨克亲王云端旺楚克（云王）为领导人，发起蒙古自治运动，召集西部蒙古各旗王公、总管及南京、北平等地的蒙古知名人士，在百灵庙开了蒙古自治会议，电请国民党中央政府准许成立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派了内政部长黄绍竑和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等组织了蒙古慰劳团，到百灵庙会见云王、德王，企图阻止自治，会谈无结果，黄、赵返京。接着吴鹤龄策动各旗派代表组织各盟、旗请愿代表团到南京，请求批准成立自治政府。察哈尔部十二旗盟方面，推派了尼冠洲、贡楚拉什二位总管为全权代表，哈斯瓦齐尔为随员。到南京后，在所谓蒙古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的带领下，进行了请愿活动。经三个多月的奔走，最后南京政府公布了蒙古自治八项原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组织法和蒙古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同时发表何应钦为指导长官，阎锡山为副指导长官，云端旺楚克为蒙政会委员长，索那木拉布丹（索王）、沙克都尔扎布（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为秘书长，吴鹤龄为参事长。尼冠洲、贡楚克拉什二人也被任命为蒙政会委员。一九三四年四月份，尼冠洲由南京回到百灵庙，参加了四月二十三日蒙政会成立典礼和蒙政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在百灵庙蒙政会任参议时期，尼冠洲忽然有一天来到了百灵庙，住在我的宿舍，说是有要事

会见德王。恰巧德王回了苏尼特右旗，他等了两天未回，也就走了。他和我同住的时候，谈了有关成立察哈尔盟政府和保安长官公署的问题。他说：有人主张不申请“中央”批准，由蒙政会直接下令成立察哈尔盟政府，这是不合理的，是脱离“中央”的行动。并问我，你以为如何？我说：“我也同意你的意见。”他又说：“马上成立盟政府，一没有人，二没有钱，‘中央’没有批准当然不管，蒙政会更没有办法。所以我主张由卓特巴札普总管（他是要任盟长、保安长官的人），先拿出一部分钱来，召集像你们这些在外作事的本地青年，组织一个研究班，准备将来作为盟政府的骨干。但是卓总管只拿个生活费，这样你愿意去吗？”我表示为了本盟的事，钱少也愿意去。后来这种主张也没有实现。

当年十月间，尼冠洲出席了蒙政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和吴鹤龄等多数委员反对了两件事：一、反对日本特务中岛刁藏和陶克陶等，怂恿德王以蒙政会名义，直接任命卓特巴札普为察哈尔盟盟长；二、反对不通过南京政府批准，由蒙政会委员会议决议，成立察哈尔盟政府的提案。尼冠洲、吴鹤龄力主由委员会议通过决议，申请南京政府批准。因此日本特务的企图未能得逞，便对尼、吴二人怀恨在心。后来谋杀他们的事件和这个问题也有很大关系。

会议结束后，以尼冠洲和穆克登宝总管为代表，去南京作申请成立察哈尔盟政府的活动。但要求成立察哈尔盟政府一事，未成。南京政府说：察哈尔八旗和四牧群地面，历来归属察哈尔都统管辖，国民政府成立后，八旗地面划归察、绥两省建制，察哈尔西四旗划归了绥远省；东四旗划归了察

‘哈尔省，政府有令在先，现要成立察哈尔盟政府，碍难照准。因此尼冠洲和穆克登宝二人，不得要领而回。吴鹤龄因张北事件后，日伪李守信部进占了察北各县旗，¹⁶情况有了变化，也随着尼冠洲一同到了张家口，准备参加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在此期间，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边墙（长城）外划为非军事区，张家口坝上守军宋哲元部改称保安队，改穿蓝色军装。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怂恿德王勾结李守信组织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并调动李守信部从多伦进攻察北各县，占领了张北县城。早与日寇有勾结的卓特巴扎普，调动察哈尔左翼蒙兵游击队，响应李守信，在日本顾问指导官指挥下，占据了察北六县。德王以蒙政会名义任命卓特巴扎普为察哈尔盟长，正黄旗总管达密林苏龙（外号长胡子）为副盟长，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张北宣告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德王由西苏尼特旗乘飞机到张北参加成立典礼。卓特巴扎普宣誓就职，由日本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监督授印，德王讲了话，宣告礼成。那时尼冠洲、吴鹤龄等也到了张北，但日本人怀疑他们负有南京方面的任务，拒绝他们参加这个成立典礼，并且唆使德王，借口尼、吴二人“破坏日蒙提携”，把尼、吴二人公开枪毙。德王没有答应，急设法将吴鹤龄密载王府汽车上，从张北带回西苏尼特旗衙门“软禁”起来。留下尼冠洲，认为他是卓特巴扎普的心腹，卓会庇护他。那天我也参加了所谓察盟公署成立典礼。在会上未见尼、吴二人，会后回到住所，才知道此种情况。当晚跑到尼的住处，告诉他，日本人要谋害他的消息，提醒他注意。他说：“日本人说我从南京购买枪枝有问题，这是各旗拿马换

来的，我不过是跑腿而已。好！你不必替我担心。”这是我俩最后的一次见面。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正是农历乙亥年除夕，尼冠洲搭票车（长途汽车）回家到张家口过年。汽车行至张北南坡猴山沟口时，有六名穿蓝色军装的士兵，已经在当路垒起石头，命令停车，进行检查。当时把车上的人各个检查，搜了腰包，接着检查尼冠洲随身带的手枪和他的护兵带的盒子枪。尼冠洲认为这是宋哲元的保安队，并未生疑，便交出己身上的手枪，并叫护兵巴图也交出所带的盒子枪，同时拿出枪照和证明文件让他们看。检查的特务故意说：“这是伪满洲国的护照。”尼冠洲认为他们不识字，就给他们讲明这是南京中央的护照。这样完全暴露了身份，特务们认准了人，出其不意地开枪杀死尼冠洲，扬长而去。车上的人们重行坐车返回张北告变。卓特巴扎普闻讯，哭哭啼啼找日本顾问田古理，派了伪蒙古保安队前去搜查，始终没有抓着凶手。尼冠洲就这样被刺身死，年仅四十二岁。他死后，吴鹤龄很惋惜地说：“我最知己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的奇子俊，一个是尼冠洲。但二人都遭横死，实在可惜。”以上遇刺经过，是尼冠洲的护兵巴图事后对我讲述的。

尼冠洲的尸体由卓特巴扎普派人运到张北盛殓起来，不久送回张家口家里，重行入殓，正式开吊发丧。南京国民党政府表扬为“为国捐躯”从优抚恤。

尼冠洲的被刺，震动了蒙奸们。特别是聚在德王府的蒙奸头子们，都很恐惧，不知所措。德王心中明白，不敢质问日本人。听说后来日本关东军派来了一个高级参谋，同德王等蒙奸头子们见面，会商成立蒙古军政府事宜，有百灵庙蒙

政会代理秘书长敖云章，提出对尼冠洲的被刺，大家有疑虑的问题。该参谋当场承认，是误听了下级报告，错杀了尼冠洲。并对吴鹤龄作了解释，解除了他的顾虑和“软禁”状态。并且商定，召开乌珠穆沁会议时，允许吴鹤龄参加，并推定他为大会秘书长，着手准备开会事宜。从此尼冠洲的事件，日伪头目们也就心照不宣了。

数年后，有个在日本东京当过蒙语教员的贡布扎普（即陈秉如）谈：那时日本的张北特务机关，接到日本关东军的密令，指使李守信派人伪装宋哲元的保安队，以检查为名，途中刺杀尼冠洲。蓝军装是由张家口日本领事馆备办送去的。贡布扎普的话可能有些来历，姑记于此，以供参考。

百灵庙抗日战役前后

新 书 科

这篇资料主要是根据亲身参予其事的孙兰峰、曾厚载、李英夫、苑乃安、刘春芳等先生和徐爱锦女士所谈，由笔者综合记述的。此外还向一些有关方面的人士，进行了了解和核对。不过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其中如有遗漏、错误之处，尚请读者指正。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包括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紧接着就唆使殷汝耕组成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又以所谓“蒙古保安队”侵占了察北六县，进而扶植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企图进犯绥远，以百灵庙为据点，积极进行准备。自一九三六年六月起，即不断由平、津运送大批煤炭、面粉、武器弹药到张家口、归绥（呼和浩特市）两地，然后再用汽车转运到百灵庙。先后运至百灵庙煤炭五百余吨，面粉二万余袋，汽油一千余桶，大炮十余门，轻机枪百余挺，步枪二千余支，无线电台数部，各种弹药及其他军用品不计其

数。日寇并唆使德王在嘉卜寺（今内蒙古自治区化德县）组成“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王、李守信分任总、副司令，编成伪蒙古军两个军，李守信任伪第一军军长，德王自兼伪第二军军长。又使王英、张万庆、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厚、安华亭、王子修等组成伪“大汉义军”，任王英为总司令，张万庆、雷中田为副总司令，并发给王英无线电台两部，由日人充任台长和译电员，用密码与长春、张北、商都、承德、百灵庙、张家口、太原、归绥、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处进行联系。另外在张北设立伪军事学校，派遣日本军后备军官担任教官；在伪蒙古军、伪“大汉义军”部队中，派遣日本军官担任教官和指挥。令德王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抽调热河伪满驻兵五千名，由北票开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日本侵略者还打算必要时指挥伪满热河骑兵部队，配合德、李、王伪军力量，吃掉傅作义的部队，占领绥远。

根据《何梅协定》有关绥远条款，日本先向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提出取消“九一八纪念堂”（即现在工人文化宫旧址）、长城抗日阵亡将士烈士公墓的题署。傅作义即将其分别改为“公共会堂”、“烈士公园”。继又派羽山喜郎为绥远特务机关长，于一九三五年夏，在归绥挂出了“羽山公馆”的牌子（当时日本人在华北各地均称特务机关，唯归绥称“公馆”），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傅作义派三十五军参谋处长李英夫（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夜招待。同时在“羽山公馆”周围密派宪警监视。有一次羽山喜郎要求“参观”傅作义部队，傅未拒绝，但通知驻在小校场的部队，以

官兵全副武装予以“欢迎”。羽山喜郎走至营门，看见全体官兵怒目而视，未敢冒入，只在营门外窥视而去。羽山又派遣大批日、韩浪人（流氓），分往萨县、包头、集宁、丰镇等地，借机寻衅闹事，进行破坏捣乱。傅也随机应变，通知各地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使其无机可乘。

羽山喜郎因在绥远各地几次寻衅未逞，又在包头利用日本浪人和王靖国的部队冲突，故意扩大事态，借此驱逐王靖国和他的部队，挑拨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关系，其目的是借机驱王以削弱绥远的防守力量，为驱使德王和王英进攻绥远创造有利条件。傅作义识破羽山阴谋后，一面派李英夫转告羽山不要闹事；一面又派人赴包头通知王靖国严加防备，羽山的诡计又告破产。

一九三六年，日本不顾绥远当局抗议，经常派飞机来往绥包两地。九月间，羽山又托词归绥、包头两地的飞机场均非日建，日方飞机来往停留不便，要求在包头南门外飞机场内建筑日本飞机库。傅作义当以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容破坏为理由，拒不接受。羽山竟由天津运来大批钢板，日本技术人员和天津工人等，强行动工修建。对此僵局，傅一面派人劝阻，一面令包头县政府派警宪、保安队数百人，开往飞机场搭起帐篷，携带炊具作长期露营演习，制止其动工。羽山则令日人在警宪演习队形中间，强行施工。傅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几经交涉，最后达成用日本材料建筑，由绥远省出修建费，机库归绥远所有，暂借日方使用，一场风波才算了结。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乘飞机访问归绥。傅接通知后，在省府礼堂接待（当时板垣说他是从天津飞来归绥的。后来从百灵庙俘获的日文文件中查知，

板垣那次来绥，是在化德和德王密谈后，由化德绕道东方而来的。傅和板垣会晤时，板垣说：“中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互相亲善，不应该互相仇视，影响邦交”。傅说：“中日亲善必须双方都以诚相见，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才可能谈到真正的两国亲善。如果以‘亲善’作幌子，迫使一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根本就谈不上互相亲善。”板垣说：“傅将军是中国伟大的人物，是华北名将，在华北的威望最高，应挺身而出给华北人民作出一番事业，带头改善日、中关系（其含义是让傅摆脱蒋、阎统治，自成一个独立局面），我们大日本帝国将全力来支持你。”又说：“宋哲元虽和日本签了协定（当时即把协定副本递给傅看），但我们认为宋哲元在华北的声望不够，领导不起华北来”（暗含属意于傅）。傅说：“华北是中国政府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出来自搞一个独立局面，那样作将自绝于全国人民。”板垣又提出蒙绥问题来和傅交换意见。傅说：“内蒙是中国的领土，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绥远是中国的版图，也不允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真正不顾国家人民，背叛祖国，进攻绥远，我们一定与之周旋到底，决不丝毫退让，因为我是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绝不让叛离祖国的人进行侵犯，使国家领土受到损失。”板垣遭到傅的拒绝，临行前赠傅军刀一把，傅赠板垣端砚一方，四书一部。傅、板垣的会晤，就这样结束。

（二）

百灵庙蒙政会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成立，名义上

以年高德劭的云端旺楚克(云王)为委员长，实际上则由德王以秘书长身份独揽大权。蒙古习惯，极重资望，德王以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的地位，难能号召各王公。百灵庙蒙政会名义上管辖地区虽广，实际上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四盟中的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均为日寇侵占，西二盟(乌兰察布、伊克昭)的十三旗王公也参加的不够积极。德王多方设法与傅作义为敌，一心想把势力伸入绥远，双方关系日趋恶化。同时德王的蒙旗保安队队长云继先等，因反对德王投靠日寇，出卖民族，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率全队官兵九百多人，携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二十余挺，在百灵庙暴动，将部队拉出。二十七日晨，由傅作义派汽车十余辆，将保安队官兵先接到二分子，后又开驻萨拉齐县一带，整编为蒙旗保安总队，因此德、傅双方更结下不解之仇。

德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嘉卜寺组织伪“蒙古军政府”，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后，同王英的“大汉义军”狼狈为奸，进行背叛国家，出卖民族的勾当。在军事上，由于日本侵略者供给他们装备，公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积极准备进攻绥远；在政治上，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以察境蒙政会名义发出宣战性通电，向傅作义兴师问罪，以为进攻绥远的先声，即所谓“歌电”。傅作义也以“庚电”答复(详见本辑《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一文)。互相攻击，各不稍让。

德王向傅作义发出通电，南京蒋介石虽曾来电劝阻，但德王置之不理，遂在日寇指挥下，加紧调动军队，向绥远发起全面进攻。傅作义鉴于此种形势，一面将军政人员的家属

遣送北平及太原等地，一面积极备战，遂造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三)

傅作义自一九三一年秋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之后，不论政治、军事，均唯阎锡山之命是从，但阎对傅总持怀疑态度，特派其嫡系部队赵承绶的骑兵驻扎集宁、丰镇一带，王靖国的步兵驻包头、五原一带，从东西两方面监视傅作义。在军事、政治上，赵、王二人经常借口一些小问题和傅闹别扭。这样，傅虽然是绥远省主席，但他的政令实际上只能在包头至集宁之间地区行使。傅在内心中虽有说不出的痛苦，但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深知阎锡山老奸巨滑，难以对付。傅作义主绥远之后，蒋介石便乘机大耍阴谋。他一方面认为傅既为阎锡山的部属，就难以挑拨拉拢；另外，知阎、傅有隙，就想拆阎锡山的台。因此，他巧施连环，或派要员不断离间傅、阎关系，或借巡视机会（如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来归绥），亲自来绥拉傅。而傅对此既难推脱，又不好接受，更感处境艰难。

一九三六年秋，傅作义得知德王在日寇操纵下，扩军备战，准备倾巢犯绥，同时日寇在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的特务活动更加猖狂。每天日机当空，汽车络绎不绝，汉奸蠢动，人心惶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蒋介石正主持所谓“西北围剿”的反共阴谋。他进驻洛阳，分批召见华北和西北高级将领。傅作义经太原去洛阳，向阎、蒋汇报了绥远的

紧张情况。蒋认为绥远乃偏僻之区，得失与南京关系不大，而仍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因此指示傅对日本之侵略不亢不卑，相机应付。对德王须以忍让为重，必要时给点地方也可。阎虽知绥远一旦失去，自会加重日寇对山西的威胁，但又怕战而不胜，更会加速山西老窠的倾覆，不如苟且偷安，再看风使舵。傅则惟恐绥远沦丧，失掉地盘，乃坚决主战。最后得到蒋、阎允许。蒋答应，必要时派汤恩伯的十三军驰往支援；阎也答应，在绥远的赵承绶部和王靖国部，必要时归傅指挥。傅返绥后，即作积极准备，以防日寇驱使德王进犯。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日寇和德王在嘉卜寺召开伪军事会议，决定以伪军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王部由商都进犯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兵站及后援部队设在商都和嘉卜寺；李部由张北以西的南壕堖、大青沟，直取兴和，兵站及后援部队设在张北。进犯计划，共分三路：以李守信伪蒙古第一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伪第二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今察哈尔右翼后旗）以北地带，并以穆克登宝伪第七师，驻百灵庙为右翼。另以王英的“大汉义军”为主力，进驻红格尔图（在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境内）东北之土城子一带。计划先攻占红格尔图，然后由百灵庙与兴和同时出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绥西包头及河套。日寇为了整饬内部，将王英部伪师长王大中、马龙及其他主要军官八人拘捕；还决定由十月份起至战争结束期间，部队一律发给双薪，并宣布在战争期间，一切武器、弹药，装备补充，完全由日方负责供应。

会议结束后，日寇即令伪满三千骑兵，由北票经赤峰开至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令沽源匪军李振铭部，开

抵商都以西的羊群；令驻围场的伪满军，抽拨六千名开往多伦；驻归化之匪军四千余名西开宝昌、康保；令驻宝昌之吕存义部，开驻商都附近；令伪蒙古第二军宝音德勒额部骑兵八百余，由公会西进，归李守信直接指挥；令李守信部王振华师，限十一月八日开抵商都；另派日机四架，坦克数辆，协助王英作战。将皮军装六车，汽油七车，步枪五车，急运张北供李守信部使用。并由多伦运张北毒瓦斯弹七汽车，毒瓦斯放射器两具。另给李守信载重汽车八十辆，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日本关东军派出飞机三架，在绥东及武川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日寇并向民间征集小麦二十万斤，民夫四百名，大车二百辆。这次日寇指挥的伪军兵力，计约两万余人。

傅作义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向德王发出“庚电”的当晚，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人员有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参谋长陈柄谦、骑兵师长彭毓斌、骑兵师长孙长胜、步兵旅长孙兰峰、董其武等。会议决定：绥东一带防务，由彭毓斌、董其武负责；绥北一带防务，由孙长胜、孙兰峰负责；绥西一带防务，由王靖国负责。并分别任命彭毓斌、董其武为绥东防守总、副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各部队长返防后，一面鼓励士气，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准备作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羽山喜郎予知日本关东军指示德王及王英犯绥整个计划，示意李英夫转告傅作义说：“德王和王英的部队，将要来打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傅告以“决心抵抗”。嗣又示意李英夫转告傅说：“德王和王英如果出兵来打你们，你们就狠狠地打他们一下。我们日本绝不过问”（因那时指挥德王、王英的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

吉，归日本关东军直接领导，羽山喜郎归天津驻屯军领导）

当时敌伪军大部集中于商都一带。商都在当时的察哈尔省西部，接近绥境陶林县属的红格尔图。红格尔图为商都通往百灵庙的重要据点，是绥远东北的门户，是敌伪军由商都进攻绥远省会必经之地，为战略上的军事要点。敌军先进攻红格尔图，经过一天的战斗，即惨败撤退。

日寇指挥伪军进犯红格尔图未逞，田中隆吉和德王深恐傅军乘胜捣其巢穴，遂即抽调兵力增强商都和化德的防务。一面令伪蒙军胡玉山、李振铭两部暂时担任商都守卫之责；一面令“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率领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厚、赵奎阁等部，开往大庙（百灵庙北二百华里）一带集结，张万庆率安华亭、王子修等部开往尚义、南壕堽一带，积极准备，以图再举。

百灵庙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有名的召庙，位于绥远省会归绥城西北约三百四十余华里，在当时是内蒙西部交通要地。从地形看，四周有山环绕，两旁各有小河一条（即女儿河和百灵河），由公路南通归绥、包头，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西北沿草地可抵新疆，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邻。庙内有喇嘛五、六百人，庙的东面有一条街，是商业中心。自从德王投靠日寇之后，百灵庙即成为日寇侵华犯绥的策源地。红格尔图战役后，日寇和德王除派“大汉义军”金宪章、石玉山等部开往大庙增强百灵庙之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沿百灵庙的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另外为了提高匪伪军战斗情绪，日寇向各伪军头目宣称：“大日本皇军将以全力支持

德王攻击绥远，赶走傅作义的军队，只要大家不泄气，胜利必属你们，希望争取胜利。”并派日本军官二百余人，担任伪军各级指挥官。

十一月二十二日，傅作义侦悉：日寇连日调运伪军向百灵庙等地集结。二十三日将由察北用汽车百余辆运送武器、弹药及伪军千余人至百灵庙；二十四日午后，将继续用二百辆汽车运输伪军五千余人到百灵庙。傅作义针对上述情况，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复百灵庙，当场口授命令：令骑兵师长孙长胜为前敌总指挥，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指挥步兵第二一一旅（欠四二二团）张成义、刘景新两个团，第七十师刘效曾一个团，骑兵刘应凯团，并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一队，汽车和装甲车各一队。各部队在攻击实施前，先集结于百灵庙东南一百五十余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地区，依照总、副总指挥的命令，向敌前进。傅又指示孙兰峰：“军队行动，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严行封锁消息，务要在二十四日上午七时前攻克百灵庙。否则即将遇到更大的困难。”

在攻击百灵庙之前，为了绝对保密，不让日寇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侦知傅军行动。傅作义指挥部队演习调动，以“声东击西”的手段，令驻小校场的部队，每天早上到归绥东郊三十余里的白塔一带实行演习，天黑后又返回驻地，如此一连演习数日，迷惑日本特务机关。

在此以前，傅曾派第二一一旅参谋长袁庆荣，化装商贩，亲至百灵庙作战地侦察，将其周围地形及敌之工事构筑、兵力配备等绘制要图呈傅研究。临战前，傅又令孙兰峰亲率团长以上干部化装商人，秘密于距百灵庙二十余里的高

沙梁一带作战前侦察，并将各部队的行军路线、集结地点、攻击准备位置、攻击方向以及其他有关事项等，均于现地作了详细侦察和部署。为使夜间行军不迷失方向，又在各部队之行军路上设置道标。

孙长胜、孙兰峰奉命后，当即到武川北二分子地区集结，由参谋长袁庆荣提出作战计划，和各部队长进行研究。当经决定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部队于夜间接照指示的集结地点，集中完毕待命出动。并下达作战命令概要如下：（一）步兵第二一一旅（欠四二二团）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一队、汽车队和装甲车队为主攻部队。以四一九团张成义部为左梯队，从百灵庙之南面攻击，直取百灵庙。以四二一团刘景新部（欠一营）为右梯队，从百灵庙东面攻击，并抽派一部先期至百灵庙东北通滂江的大道上，选占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断敌归路。（二）刘效曾团为佯攻部队，由百灵庙以西地区，以炽盛火力先行向敌攻击，将敌之注意力吸引于该团方面，以使主攻部队易于攻占该庙，并与左梯队切取联系。

（三）骑兵刘应凯团，绕至百灵庙东北地区，与步兵右梯队协同由庙之北面攻击，占领北山，控制敌飞机场，并追击败退之敌。（四）步兵第四二一团第一营（韩天春营）、山炮营、苏鲁通小炮队、装甲车队为预备队，位置于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小高地附近。其他小部队随总指挥部，在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小高地附近。各部队出发后，限当夜十二时前到达攻击的准备位置，构成通讯网，听候总指挥部电话命令，并以信号弹三发为号，开始攻击。各部队均用掷弹筒发射绿色信号弹三发，表示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及攻击开始时间，并互相切取联系。

十一月二十三日，傅军各部于当夜十一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第四一九团张成义部秘密接近距百灵庙约二、三华里时，敌人尚未发觉。此时忽见正西方向，刘效曾团发射绿色信号弹三发，接着即听到阵阵不断的枪声，刘团已开始向敌人发起攻击。半小时后，孙兰峰得知刘效曾团方面战斗非常激烈，已将敌人注意力吸引到该团方面，遂即通过电话命令张成义团向敌人发起总攻，并发射红泄光弹三发。激战三、四小时，在女儿山下部队受到顿挫。这时离天明只有两小时的时间，如果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恐敌人援军到来，再加飞机轰炸，收复百灵庙的任务即难完成。孙长胜、孙兰峰认为如不全力以赴，必将遭到挫败，于是即下达战地命令：（一）我军决心在拂晓前全歼百灵庙之敌，一举收复百灵庙。（二）山炮营及苏鲁通小炮队归参谋长袁庆荣指挥，山炮营即推进到百灵庙南山口内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阵地，作好一切射击准备，于拂晓前集中炮火向女儿山的敌人进行摧毁性射击，掩护装甲车队及步兵攻击前进。而后延伸射程，向百灵庙固守之敌猛烈射击，支援步兵向庙内攻击。苏鲁通小炮队即推进到女儿山八百公尺处洼地附近，占领阵地，作好射击准备，于拂晓前集中火力向女儿山敌阵地的轻重机枪掩体进行毁灭性射击，支援张团攻击。然后推进到女儿山附近地区，向固守百灵庙的敌人射击，支援步兵攻击。（三）预备队韩天春营及装甲车队，归副官长孟昭第指挥，并命该营第三连（张振基连）乘六辆汽车，协同装甲车队，沿着百灵庙东南山口的公路，向敌人猛烈冲击。（四）其他各部队，仍按照原命令执行。命令下达后，山炮及小炮队均推进到指定地区，并作好射击准备，候命发射。韩天春营

长亲自率领装甲车队及该营第三连，乘六辆汽车到达东南山口公路上。这时东方微亮，天将拂晓，孙兰峰亲到第一线指挥，在步、炮、战（装甲车）各兵种密切协同下，向敌人发起拂晓总攻。经过激战，终将敌人阵地突破。敌军不支，纷纷向庙内败退，企图凭借庙院顽抗。张连跟踪向庙内突击，这时刘效曾团也由西面突破敌人阵地，正向庙内进攻。左、右梯队也在强烈的炮火支援下，向各方守敌发起冲锋，并向庙内敌人实行包围聚歼。最后张成义团长又选拔该团奋勇队杨天柱连，突破庙前缺口，涌入庙内，将敌人的前院、后院分割为数段。同时骑兵刘团也攻占北山，并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将敌军后路切断。敌人惊慌失措，无点可守，丧失斗志。同时，伪蒙古军一排官兵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和伪蒙古军师长穆克登宝，见庙已被攻占，援军又一时不能到来，大势已去，乃急乘汽车数辆，从东北方向夺路而走，狼狈逃窜。

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孙兰峰突然接骑兵刘团长的报告：从庙内冲出数辆汽车，开足马力，东驰而去。孙当即判定，敌人即将全线崩溃。遂一面将情况告知各部队长，令各部队加紧攻击，一面命令骑兵协同步兵第四二一团鲁乐山连，带山炮两门，立即向逃敌跟踪追击。但因道路不熟，汽车又开得过快，致使前边的汽车陷进山涧沟渠里，摔伤十数名士兵，后边四辆汽车被阻不能前进，未能追上溃敌。胜岛角芳及穆克登宝等狼狈逃窜之后，伪军随即全线崩溃，纷纷四处逃窜，激战至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全歼敌伪军，收复了百灵庙。

孙长胜、孙兰峰总副指挥到了百灵庙里，一面命令部

队清扫战场；一面布置战役结束工作。首先电傅作义报捷，接着派右梯队第四二一团刘景新部景彦清营附山炮一连，重机枪一连驻庙防守。其余部队，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均撤至二分子、公胡同原集结地休整。部队布置完毕时，已经是二十四日上午十时了。这时有日机五架飞百灵庙上空投弹扫射，因傅军事先撤出庙外，并对庙内防空预作适当处理，军民无大伤亡，而河东西僧俗房舍焚毁甚多。是役共毙敌三百余名。内有日人尸体二十余具，伤敌六百余人，俘敌四百余名；缴获步兵炮三门，迫击炮六门，日制三八式野炮四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六百余支，无线电三台，汽油五百余桶，弹药一库房，面粉二万余袋，其他军用器材及日伪重要文件、军用地图及战马等无数。傅军亦伤亡三百余名。对于俘虏，经电请傅作义每人发给面粉一袋，银洋五元，令其各回原籍。

当日，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及伪师长穆克登宝发现我军向百灵庙围攻时，急电大庙及商都等地之匪伪军求援，企图守住这一苦心经营的军事要地，但他们没有想到，伪军的电台早在二十三日晚间，即被傅军暗中破坏，各方联系中断，以致束手无策。二十四日天亮，日机一架在百灵庙上空侦察，发现傅军占领该庙，日伪军四散溃逃。日军得到飞机报告后，即派援军四千余名分乘汽车前来援救，继闻该庙已为傅军占领，中途返回。

(四)

百灵庙为傅军收复后，日寇死不甘心，除连日用飞机向集

宁及百灵庙一带轰炸、侦察外，并积极准备反攻百灵庙，其反攻基地设于锡拉木楞庙（即大庙）。反攻指挥官，仍由日方百灵庙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负责。他一面收容伪蒙古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一面由察北运来李守信伪蒙古军一部，连同王英的伪“大汉义军”步骑兵三千余名，共计约五千人，由日方军官三十余人分任各级指挥官，于十二月二日晚由大庙出发，以装甲车十余辆为前导，载重汽车一百五十辆为运输队，分布于百灵庙东南、西南及正西三个方面，拟于十二月三日晨六时向百灵庙进行拂晓攻击。

防守百灵庙的孙兰峰部景彦清营自接防后，即派出会蒙语的便衣化装为小商贩，对敌方进行侦察。在得悉上述情况后，自感兵力薄弱，难以据守，遂急电傅、孙，力陈百灵庙不可久守，建议将庙焚毁，把部队撤回原防。傅接电后，即刻打电话给孙兰峰，严斥景彦清畏缩怯懦。并命孙兰峰即率全旅前往据守，防敌反攻。孙接电话后，一面斥令景彦清即刻增强防御工事，竭力据守；一面即亲率该部，连夜增防百灵庙。十二月二日到达后，即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下达防御命令，布置防守区域。

孙兰峰将部队配备完毕之后，亲到各团视察阵地，并特别通知警戒部队，务要派战斗小组，加强戒备，防敌夜袭。警戒哨在距庙二千公尺的西山坡附近，发现有一大羊群向东南蠕动。孙认为大雪遍野，寸草不见，地冻天寒，天刚蒙蒙，那能放牧。断定是敌人伪装，马上命令各部队即刻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正在这时，前方又电话报告说，大羊群已到康熙佛谷山头，像敌人伪装，已与我哨兵发生接触。孙立即命令警戒部队阻敌前进，并指派预备队韩天春营的奋勇队张

振基连，配以重机枪一连，将皮衣翻穿，也扮成羊群，绕到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山地，居高临下，夹击敌人。并命令山炮营集中火力，射击伪装羊群的敌人，掩护张连攻击。这时庙东南及西南之敌，也以炽盛火力向守军阵地猛烈发起攻击，三方面均发生战斗。从敌人的攻击情况，判定敌人主力仍在正西方面。孙遂即命令各部队分头迎击来犯之敌，并令预备队韩天春营强袭敌人侧后。战斗从黎明到上午九时，激战三小时，敌方虽有日人直接充任各级指挥官，督战非常严厉，企同守军强行决战，但由于伪军下级官兵均为中国同胞，不愿为日寇卖命，几次冲击均未得逞。傅军乘敌攻击顿挫之时，全线出击，伪军不支纷纷败退，终被击溃。是役打伤打死日、伪军五百余名，俘敌伪二百余人，并将匪敌“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当场击毙（在死尸中发现雷尸）。战斗暂告结束后，孙兰峰恐敌人继续反攻，遂一面电傅作义告捷，一面命令各部队加强防务，严加戒备，特别着重敌人盘踞的大庙方向。并派出便衣侦察敌情，以防日伪再次进犯。

傅军收复百灵庙的军事行动，因为严守秘密，事前很少有人知道。及至二十四日中午收复百灵庙的捷报传到绥远省会，报馆发出号外，市民争相传告，日本关东军来电质问羽山喜郎时，他才得知这一情况，懊悔异常，骂自己是“巴嘎牙路”（日语：混蛋）。并气愤地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我将怎么交代？我将怎么办呀？”最后不得已，只好用电话请李英夫，共同商谈办法。羽山狼狈地向李英夫说：“傅主席太不拼面子，太无人情了。我诚心诚意地帮助他，想让他摆脱阎锡山的压迫，独创一个局面。我这样实心实意地帮助傅主席，而这次他攻打百灵庙，事前连个信息都不告

我，使我栽了这样一个大筋斗，无法向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交代。傅主席太不够朋友了。连你这个李“サム”（日语：先生）也太不够朋友了吧！”李英夫答复他说：“这事连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傅主席作事一向是不说硬话，不作软事。他向来是作了才说，甚而有时作了也不说，这次是傅主席亲自指挥孙兰峰旅和其他部队打的，连正式作战命令都没有下达，……尤以我经常和你往来，傅怕我向你泄露了消息，怎么会让我事前知道呢？”羽山听后，又自打嘴巴说：“我马鹿！我马鹿！”

（五）

自日寇指挥匪首王英的“大汉义军”进犯红格尔图惨败后，伪军官兵都认为跟着王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除了牺牲性命挨骂受气外，升官发财的希望已成泡影，都想早日脱离日伪组织，回到祖国怀抱。因此，王英的一些伪军高级人员，就各自找寻出路，派人向傅作义接洽反正。匪首王英也曾派其参谋长寇子严为代表，来绥接洽投诚。因王所提条件太苛，且无诚意，傅严加拒绝。金宪章（伪“大汉义军”步兵第一旅旅长）派代表来绥，直接向傅作义接洽投诚。石玉山因系彭毓斌过去的连长，先通过彭的关系而后再派代表来绥，向傅作义联系。他们的条件是：保障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改编为正式“国军”，归傅指挥。傅指示他们：反正要把握适当时机，最主要的是要多搞到一些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装备；其次是能将日伪的作战计划，事前告傅，在未反正以前，作战时不给日伪出力，并在暗中给予牵制，反正时能杀敌立功，

反正后即可按日伪军的原编制，改编为正式“国军”，个人生命财产均给以保证。傅指定蒙旗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和情报参谋刘春芳同他们洽谈，即行相机反正。

在金、石等派代表同傅接洽后不久，傅即发动百灵庙抗日战役，当战斗激烈时，金、石等曾接到日伪增援命令，却故意迟援，按兵未动。日伪反攻百灵庙时，金、石等虽也佯向傅军攻击，但一经反击，即行全军败退。因而日寇大为震怒，拟派伪蒙古军将该两部解决。金、石见时机已迫，遂于十二月八、九两日，先将派在该两部的日本指导官小滨大佐等二十余人全部处死，后将驻大庙的穆克登宝部全部解决，率部开往指定地点集结，并于十日通电反正。

在日寇指挥伪军反攻百灵庙被傅军击溃后，傅作义即决意收复大庙，彻底肃清伪军残部。因而一面收容反正伪军，一面派孙长胜的骑兵旅，沿乌兰花（今四子王旗）至大庙附近作肃清伪军准备。至十二月九日夜，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穆克登宝残部被缴械，敌士气丧尽。傅即下令围攻大庙残余伪军，稍一接触，残部即向草地败退，遂于十二月十日上午十时，收复了大庙。首次开入大庙的是傅部李思温团。由于伪军仓惶溃退，庙中的辎重弹药及一切军用品，全被缴获。

傅军收复大庙后，日寇为交代小滨等的家属，又指示羽山喜郎带了驻蒙古和绥远各地的特务机关人员到绥远省政府，气势汹汹地问傅作义索还小滨大佐等二十多名日本人的死骨。傅作义答说：“此事本人虽有所闻，但金、石等不是我们组织训练出来的部队，与我无关。这是你们日本人亲自组织和训练出来的，由你们日本人指挥部队干的事情。这是

金、石等反正归来以前之事，你们应该去找你们日本的指挥者要人，与我无干。”羽山词穷，赧颜而去。

事隔多日，日本关东军屡电羽山喜郎，要求尽量设法将死者的尸骨索回。羽山喜郎无奈，最后只好找傅作义的日文秘书苑乃安，请苑向傅作义说合：“我们要求寻找死者的尸骨，主要是为了交代死者家属，并无别的问题，更不会藉这些尸骨来给你们找麻烦，请你们放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尸骨，就是找一些牛、马骨头给我们，只要能让我交代下去就行”等语。经傅同意，给羽山喜郎找了一些死者骨头交给了他，装了二十几个小匣子运回日本，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随后王英部旅长安华亭、王子修等又行反正。安华亭原为伪“西北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子修为第二旅团长，后日寇将安、王两部改编为“大汉义军”，隶属于王英。在红格尔图战役之前，安、王即派人密向傅作义接洽投诚。百灵庙战役后，金宪章等通电反正，他们遂乘张万庆赴嘉卜寺开会之际，于十二月十七日夜、十八日晨率部先后通电反正，开赴预定地点——兴和县榆树乡集结候编。计三个团约二千三百余人，枪械二千二百余枝。

(六)

傅军在取得这次战役胜利之后，立即获得北平、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各大城市的大中学校学生、海外侨胞和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捐款，前来战地进行慰问。祝捷贺电，纷纷传来。傅作义为使前线部队热烈欢迎前来慰问的团体和各界

人士，特于事前亲偕骑兵司令赵承绶等，前往百灵庙战地对部队进行慰问和视察。

但据四二一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鲁乐山说：“进攻百灵庙的部队，官兵在作战时英勇战斗，令人钦佩。唯在战斗胜利结束之后，庙内守军，因旧部队的恶习未除，他们一是挖地数尺，找白洋、寻元宝，急欲发横财。如三营九连（连长程满泉），在庙内挖地洞、炕洞，得到不少白洋和元宝。排与排之间，因分赃不均，几乎演成“武剧”。最后以第三排（赵排）和连部分得最多，才算了事。二是争扭掉佛像的头，开佛像的胸膛，掏小金佛爷，企图发财。因此，召庙内多数佛像无头或被挖开胸膛。他们抢掠的金质佛爷，在归绥市变卖白洋近千元。三是赌风盛行。打麻将、推牌九、掏宝、丢猴（掷骰子），应有尽有。白天晚上，兵与兵、官与官、官和兵大肆赌博。把反动军队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

傅作义到庙巡视，看见这些破坏情形，很恼火。当即召集守庙部队排长以上军官，严加斥责。首先对发电报向他建议烧毁百灵庙一事表示不满说：“百灵庙是我们部队经过流血牺牲收复的，怎么能轻易将它烧毁呢？这是畏敌怕死的表现！”继又气愤地说：“你们的军纪废弛到什么程度？你们到庙内好好看看，这叫什么部队？佛爷犯了什么罪？又是开膛，又是扭头。不知你们有脸没有脸，我实在觉得害臊！这样，还能让人来参观？……”。孙兰峰听后着了急，除对各部队长又痛斥外，即刻命令部队，星夜清扫庙院佛殿，给佛爷按头的按头，补腹的补腹，修臂的修臂，好生忙乱了一阵，庙内外的秩序和气氛才勉强恢复正常。接待了有上海电影明星陈波儿在内的各大城市、各族各界和华侨等慰问观光

人员。

(七)

日本帝国主义在“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捕）发生后的第三天，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要傅军撤出绥远。详情是：在事变后的第三天，羽山喜郎打电话给傅作义的秘书苑乃安说，有急事要见傅。会见时，羽山呈出日本关东军致傅的日文电报一份，当由苑乃安翻成中文，内容大意是：西安发生事变，蒋介石被扣，中原鼎沸，中国内战即将发生，限你部于三日内撤出绥远，开回山西，否则，日军即向绥远发动进攻。并限于二十四小时内正式答复。傅阅电后答复说：“此事现在即可答复：我是绥远省主席，也是边防将领，守土有责，绝不能轻易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即使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请你答复关东军吧。”羽山听后，当时脸色铁青，闭口无言，悻悻而去。日本关东军接到羽山报告后，即拟命驻热河的日军第七师团配合德王的伪蒙古军向绥远发动进攻，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寇以无机可乘，才算罢休。

在红格尔图、百灵庙战役胜利后，蒋介石、阎锡山看到傅作义两战两捷，并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全国人心振奋，纷纷捐款赠物，慰问绥远抗日战士，抗日情绪高涨，恐难抑制。同时傅又将功劳完全归于他们领导有方，这样就促使他们再不能认为绥远省这一边防地区，得失关系不大，才重视起来。这时蒋介石决定派他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十三军、

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开驻绥远东集宁一带，并归傅指挥。表面上是支持傅作义作战，实际上是扩大其反动势力，暗中监视傅部，在必要时迫傅就范。其后又派陈诚借慰问之名，向傅指示：真正抗日尚非其时，我们要先安内后攘外。然后才能谈到真正的对日作战。打到一定程度，即需适可而止，不要过分触怒日本，致使事态扩大，不堪收拾。

(八)

蒙汉军民在红格尔图、百灵庙两次抗日战役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特略述如下。

张子清，兴和县二区庆余乡人。在红格尔图战役中，当伪军进扰庆余乡时，他参加地方保安队抵抗，极为奋勇。嗣因外出，路遇一个担任重要任务的敌人迷路，嘱为导往商都，以千金相酬。张佯允，将该敌诱送县政府处治。该敌系伪军重要分子，来兴和侦察军事地形。张子清深明大义，不为金钱所动。当时纵之不可，擒之无力，又恐其侦察军情于战争不利，乃发挥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机智，诱敌落入法网。

匪伪进犯红格尔图时，该地爱国的天主教堂司铎易世芳，大臃包教堂司铎刘成宪，新安乡自卫队长张志元，副队长韩得功、张万贵，队员李万福、刘得才等，均不避艰险，奋勇抗战。当地爱国教士抱定死守教堂的决心，与守军合作，人心安定，一个人也没有外逃，还将八十多名教民组成民团，协助守军作战。

另有一名叫齐心宽的爱国同胞，他自己用火药制成一种土炮。在敌人攻城时亲自装炮发射，给敌人不少打击，对守

城将士鼓舞很大。

在百灵庙战役中，傅军出击时，蒙旗军民给部队引路带道，在激烈地战斗中，协助前线部队歼敌，捣破逆巢。在敌人败退时，沿途截击敌人。二十四日下午，伪蒙古军向百灵庙增援至四子王旗，知百灵庙已被傅军收复，当其回兵东撤时，四子王旗的蒙古部队在什拉卯利召堵截敌人。二十四日由百灵庙溃退的伪军，路经该旗，又遭蒙民惨重打击，打死、打伤及俘虏敌人甚多。

（九）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但蒋介石反动政府，却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使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北四省之后，又收买民族败类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王英等匪伪军，进攻绥远。傅作义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感召下，对日本帝国主义指挥向红格尔图进攻的匪伪军，又奋起抵抗。自红格尔图战役，到百灵庙、大庙的收复，傅作义部队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号召，和绥远省军民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回顾红格尔图战役，当时仅有二百名守军和当地百余名自卫团队，坚守阵地，打退了四面包围和敌机、大炮交互袭击下的十倍于我的敌伪军。收复百灵庙的部队，仅带隔夜之粮。他们抱定进庙要粮于敌的决心和抗日必胜的精神，一举收复了日伪盘踞的百灵庙，一时震撼于世，大大鼓舞了各界爱国同胞的抗

日信心。

百灵庙等战役抗击日寇的胜利，是绥远爱国蒙汉军民以高尚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的牺牲精神，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他们用鲜血涤荡了近百年来反动统治者对外战争史上几乎无不以屈辱失败而告终的污点。因此，迫使敌人暂不敢再犯绥境。于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大公报》的社论，在评论此次绥远抗日战役时，写道：“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中华民族史上光荣地位，且已作成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迹昭垂，万世不磨。”

百灵庙抗日战役胜利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阴谋计划，大受顿挫。“双十二”事变发生后，虽又欲蠢动，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双十二”事变迅速和平解决，敌人的阴谋，又未得逞。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早已失尽全国民心。当时傅作义先生处于国民党反动集团控制之下，肩负绥远省主席重任，保卫边防，尽其应尽之责。但在绥境内外均甚艰困的情况下，能够激于爱国热诚，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积极发动绥远爱国军民，进行百灵庙抗日战役，并取得胜利。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战绩。而这次抗日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压抑人民要求抗日的沉闷空气，而且激励了人民奋起抗日的斗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推动下，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普遍高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国民党军队之间也开始发生了政治上的分化。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时，就首先主张武装抗日，并且领导和积极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其后，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更系统、更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政治路线、策略。这些抗日的主张、行动和路线，越来越深入人心，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全国人民在这面抗日的光辉旗帜的引导下，导致了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面的伟大的胜利。直到整个中华民族获得彻底解放，使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象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亚洲的东方。

（一九七八年九月）

抗战时傅作义部队从绥远 撤退及在太原的溃败

韩伯琴

前 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傅作义部从绥远撤退及在太原溃败，时间虽仅两个多月，但经过情况很是曲折复杂。我当时在绥远省会担任警察局督察长，到太原守城，担任城垣关厢指挥部副官主任。我同袁庆曾有师生关系，比较接近，因而从绥远到太原这一期间的内部情况，知道得比较多些，这篇稿子是向多方面进行一些访问，结合个人的回忆而写成的。但只是片面见闻，难免缺漏偏颇，希望身临其境，了解详情的同志，多予补遗纠正，以求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绥远撤退前概况

一九三七年秋，绥远省主席兼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由南口援汤（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在南口抗战，傅作义奉令支援）撤退归来，驻扎柴沟堡。因应察哈尔省主

席刘汝明要求，共同在张家口与沿平绥线西进的日寇决战，当经先派所部二一一旅孙兰峰部开赴张北，截击由察北窜来的日军，继又令四二一团刘景新部在孔家庄、郭磊庄（在张家口西）一带打了一仗。谁知刘汝明不是真心要打，而是争取时间，向蔚县赶运察哈尔省政府的物资，结果傅作义给刘汝明当了掩护队，而自己的部队却受到相当损失。刘汝明逃往蔚县之后，傅的三十五军也退回罗文皂车站一带，准备阻击敌人的西侵，接着日寇在天镇县盘山豆瓦窑口之线，又击溃了晋军李服膺的六十一军。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保卫山西老巢，即下令平绥线上的晋绥军，全线撤退到雁门关山线的“国防工事，从事固守”。傅作义和他的三十五军亦随着撤到朔县、山阴一带，总部驻扎雁门关外的广武镇。这时绥远省在大军撤离平绥线之下，就失掉了屏障，敞开了大门，裸露在敌人面前，形成岌岌可危的局面。

当傅率军东进抗日时，绥远省政府日常工作，由建设厅长冯曦划行，有关军事和重要事务，则由民政厅长兼绥远省国民兵司令袁庆曾负责处理。袁和傅系保定军官学校同期同学，随傅多年，历任军政要职，系傅的可靠助手。在这时，也就是傅在绥远的忠实代理人。当时绥远的兵力，有三十五军留下的二一八旅四三五团（团长许书亭），驻防绥东集宁县（现在的集宁市），有在孔家庄作战受了损失的四二一团，开回到绥远旗下营以东铁路沿线整补；还有炮兵二十九团张潜部也驻在集宁。这是绥远省当时仅有的一点正规军。再就是傅训练起来的国民兵，已经成立了六个团：第一团团团长马逢辰，第二团团团长王赞臣，第三团团团长曹子谦，第四团

团长范步高，第五团团长李吉祥，第六团团长王某（忘其名）。这些团，分驻各县。都是就地征集轮训壮丁，其中一、二、三、四团成立较早，已经接受了一些基本训练，五、六两团刚刚编组就绪，六团兵员，还没有征齐。

在三十五军东进后，平绥线战事日益吃紧，袁庆曾为了调动迅速和保护交通线的运输安全，除武川李吉祥团原地未动外，其余五个团，都令集中到铁路沿线。分布情况是：马逢辰团驻丰镇县，王赞臣团驻集宁县，曹子谦团驻卓资山，范步高团驻绥远省会，王某团驻包头。另外还有晋绥宪兵第七队（队长化致祥）、第八队（队长齐执矩）、第九队（队长梁新盛）、第十队（队长刘汝励）共四个队。除部分驻包头和随军东进服务外，大部都集中在省会，也算一部分武装力量。

（二）绥东抗战和撤退准备

在山西雁北天镇县盘山阵地被日寇突破后，晋绥军全线南移，放弃了横贯塞外的动脉——平绥铁路线。遂使以打通平绥线为目的，而西进的日寇，于九月中旬长驱直入，侵占了大同后，即继续向西推进，直扑绥远。

这时绥东驻守的我军，在丰镇设有绥东区防司令部，司令张成义，指挥国民兵马逢辰一个团。在集宁设有守备司令部，司令曾延毅，指挥有三十五军的四三五团许书亭部、国民兵第二团王赞臣部、炮兵二十九团张潜部。这两处可说是当时绥远的军事重镇。

不期在当大同失守，绥远处于风雨飘摇的当儿，赵承绶

（晋军骑兵司令）忽然来到绥远省会，自称“奉阎长官命令，前来代理绥远省主席”（绥远省政府始终没有接到正式文件）。据阎早在一九三〇年，阎、冯联合反蒋时，阎锡山就曾内定王靖国（山西五台人，阎的亲信，当时任晋军七十师师长）接替李培基的绥远省主席。等到阎、冯失败，阎锡山在下野离晋之前，还有这个打算，但由于傅作义又在国内有声望，又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有较好的关系，才不得不改变初衷，把绥远主席给了傅作义。但阎对傅任主席总是心有未甘。现在日寇侵犯，他一方面想借口傅指挥部队，难以兼顾绥远，顺手把傅的主席拿下来；另一方面又错误估计日寇未必大举深入，绥远有可能幸免；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仍企图派他的另一亲信——赵承绶来抓取绥远政权，继续压榨绥远人民。傅在军中听到赵承绶代理主席的消息，也无可奈何。袁庆曾认为赵既来绥远主政，只好腾出身来，专心注意军事，应付当前局势。赵承绶来绥远后，就住在省政府里边，故作镇静，还慰勉省府职员，勿须惊惶，说什么“阎长官自有办法，日军不会很快到来。”

九月二十日左右，日寇侵入绥境，首先侵占了丰镇县属的隆盛庄（在县城东北六十华里，正当大同通往集宁的大道上）。这股日军，既可以掩护攻击丰镇的主力军的右翼，又可以进而威胁集宁。集宁守备司令曾延毅，听到日寇占领隆盛庄的消息，惊惶失措，连夜带着参谋人员乘马出城，逃往集宁西南三十华里的石槽村，翌日天明，又跑到马盖图车站，正值政府保安处副处长苗玉田奉袁庆曾、赵承绶之命，沿站打电话寻找曾司令。见到他，传达了原话，责问：“谁让遁出集宁的？这是军事问题，不能讲同学情面。”迫令曾立即

返回集宁驻防，作守城抗敌准备，曾只得返回。但集宁守军在得悉曾延毅夜间出走后，群龙无首，各自为谋，也都冒着大雨，仓皇向集宁西三岔口车站撤退。部队刚刚赶到三岔口恰好碰上曾延毅，乘着火车从马盖图被苗雨田逼回来，遂又命令部队重返集宁，在这一番折腾中，时间虽仅一昼夜，但对于军民的恶劣影响和物资损失，却无法估计。县政府等行政机关，因当时情况混乱，急于随军逃难，卷宗文件，统付之一炬，部队里的笨重物品，也都全部遗弃，等到重返集宁驻地，已经一无所有了。

九月下旬（约在二十二、三日），日寇向丰镇县城大举进攻，城防司令张成义、团长马逢辰，指挥着仅有的一团国民兵，依据城防工事，顽强抗敌，同时发动全城青壮年协同军队一起参加战斗。这时傅作义指挥的部队，已经撤往山西境内，投入平型关战役，回援已不可能；而负责绥远军事的袁庆曾，因其防线广，兵力单薄，无法增援，丰镇守军遂成孤军奋战。经坚持一昼夜，敌人突破城垣，发生激烈巷战，官兵居民伤亡惨重，司令张成义当时阵亡，团长马逢辰率残部突围，全团官兵仅余三百多人。丰镇遂陷入敌手。

日寇既陷丰镇，即继续循着铁路北犯集宁。日军指挥官认为在丰镇战役中，守军仅有国民兵一个团，还能顽抗死拚，使日本“皇军”受到相当损失，而集宁系绥东门户，又有早已构筑的国防工事，当然要布置重兵。因而在进攻集宁以前，敌机连日出动，反复侦察，并以汉奸便衣队不断在阵地前面扰乱射击，窥察虚实；敌炮兵也作威力侦察，探索我军部署情况和炮兵位置。敌人侦察非常细密，行动比较审慎。其实我集宁守军，充其量不过是两团步兵，一团炮兵。其分

配任务为：正规军许书亭团，据守铁军山、霸王河阵地，国民兵王赞臣团，据守老虎山、黄家梁阵地；炮兵团有山炮三十六门、野炮四门，分布于全城各个炮兵阵地。后来，又开来了王子修旅的一个营，担任西城防务。

九月二十六日前后，敌人开始进攻集宁，以炮兵掩护步兵，逐渐向我阵地推进，但只以炽盛火力到处敲打，没有向阵地猛扑。当时向我进攻的都是一些伪军，没有发现真正的日寇。经打到黄昏以后，敌人停止了射击，守兵也得到喘息机会。不料一夜之间，日寇全部接近了我老虎山、黄家梁、铁军山等阵地。并于第二天拂晓，以步炮联合、空军助战，向我阵地全面猛烈攻击。主攻点选在我薄弱环节的黄家梁阵地（这段阵地山势低缓，国防工事还有一段外壕尚未连接，守兵又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国民兵）。激战至上午七时许，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守军反复争夺，并和敌人进入混战状态。正当万分紧急关头，不料守备司令曾延毅竟托词督战，弃城潜逃。曾不只对正在激战中的部队没给任何命令，连他的参谋长都没有通知，就慌慌张张地从西城墙铁道路口逃出城外，奔往土城子（门炳岳的骑七师驻地，但事前他们互不联系，门也不知道有这支部队），曾后来又辗转逃回归绥市。

曾逃出后，战斗中的部队因和司令部的电话中断联系，当时还以为线路发生故障，即派通信兵查线，经查到司令部，才发现电话总机已经拆走，司令部已空无一人。部队听到后，军心大乱，部队长各自寻机脱离战斗。四三五团和炮兵团都是老部队，有作战经验，乘着烟尘弥漫之际，边打边退，部队始终没有溃散，略有损失。但国民兵就不同了，他们和敌

人搅在一起，不易摆脱敌人；又都是新兵，初次参加战斗，缺乏经验，因而损失极大。团长王赞臣突围退到凉城时，全团仅余八十余人（这个团后来跟着袁庆曾退往河曲了）。就集宁战役来说，守军数量虽不多，总还能留可以守，退可以走的。只因曾延毅贪生怕死，弃职潜逃，造成了集宁军民无可弥补的损失，真可谓民族之败类，无耻到极点了。

当日寇的侵略战火将要烧到绥远的前夕，傅作义为了保存他留在绥远的全部家底，曾将阎锡山放弃绥远保卫山西的战略意图电告袁庆曾，并指示：对犯绥日军要量力抵抗，以尽守土抗战职责。必要时可相机撤守，军政人员撤往山西省河曲县集结待命等等。袁庆曾立即按照这个指示，同省政府有关人员商讨，暗作撤退准备。预定将省政府职员分三批撤走。第一批，由视察员仇曾武等率山西、河北籍的职员五十余人，由托县渡河，走旱路退往河曲，到达目的地后，征求自愿，资遣回原籍；第二批，由秘书长曾厚载带一批职员，随骆驼队驮载省府物品，仍循旱路继续撤退；第三批，是全部职员，由包头上船，从黄河航运，顺流而下河曲。军队的后方人员和营底，也从水路航运下去。

绥远省会的警察九百多人也分别编组，作撤退准备。其中年老体弱，不能长途跋涉和累于家室不能远离的警官、警士百余人，准备留在原地，归第二分局长蒋朝贵（蒋已六十六岁，在绥远警界三十多年，决定撤退后让他代理警察局长）指挥，暂时维持地方秩序。其余精壮官警，分编为四个保安中队，由赵灵址、孟金鉴、左谨斋、韩霁堂等分任中队长，准备将来随袁庆曾一同撤退。

绥远平市官钱局，是当时绥远省府的金库。所存基金，

有现洋百万元和部分烟土（鸦片）。在这紧急关头，为了预防意外，经理王子才和省府研究决定，将全部基金送雁门关总部，听从傅作义定夺处理。当时派财政厅张丕烈、平市官钱局陈雨生用两部汽车押送前往。当走到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时，与傅的总部取得联系。傅即令阻止汽车前进，表示不收这笔款，并让运返绥远，交还地方。理由是：“平市基金系绥远地方的款，应该留在绥远。我傅作义当了几年绥远主席，没给绥远老百姓做下什么好事，绝不乘这变乱的机会，把地方的钱拿走，落个永世骂名。”因此，这批巨款，又原封运回绥远，交给了由地方士绅组成的保管委员会。结果是拱手送给了日寇。

（三）袁李分裂全局混乱

随着绥东战事步步逼紧，绥垣人心日益惊惶。袁庆曾一方面应付当前局势，一方面按照预定撤退计划逐步实施。首先令第一批预定人员先行出发。这时省政府的高级官僚都沉不住气了，都想提前离开绥远这个危险地带，于是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是平市官钱局经理王子才要走。赵承绶透出风来，如王要走，马上扣他。后经财政厅长李居义说情，把赵日前要提的十万元款送上，才算了事放走。接着建设厅长冯曦借口查修公路，溜到了黄河沿岸，就一帆风顺流向河曲。垦务局长石华岩，也假说有公事前往伊盟，一去不返，成了冯曦的长途旅伴。秘书长曾厚载眼看着一个个纷纷离开，心中越加着急，但是无术脱身，只好紧紧拉住李居义请其设法。经李向赵承绶请求，许可曾和李离开。于是这二

人也从托县上船，顺流南下了。随后丰镇陷落，风声越紧，又把第二批省府职员打发上路。准备由航运南下的第三批，早已在包头南海子装好船只，不久也就接到命令，陆续开航而行。

正当集宁失守，军队撤退，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时候，国民兵司令部副司令李大超，突然单独行动，跑到包头，造成了全局混乱。

李大超辽宁人，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早在一九三〇年，同他的同乡，士官学校同学李英夫（任三十五军参谋处长）、苏开元（任第七集团军参谋处长）相偕投入傅部，和后来的孟文仲（东北人）等，号称傅部“东北系四大金刚”。李大超秉性桀傲，目空一切，不愿寄人篱下，后来借庐山受训机会，秘密加入军统，当了戴笠的军统特务。当绥远危急，军政人员全面撤退时，有野心的李大超自然首先考虑个人。他认为：他的“绥远国民兵副司令”的宝座，如果退到山西，必然保持不住。而自己从事多年的幕僚生活，好容易爬到这个“副司令”地位，一旦丢掉，心有不甘。不如把持住国民兵的摊子，留在绥远，打上守土抗战的旗号，另起炉灶。只要实力在手，向蒋家王朝讨一个封号，还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而他认为这正是混水摸鱼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处心积虑，暗中活动，拉拢司令部的参谋长李敬（后来也加入了军统），副官长黄星五等和他的东北同乡，树立党羽，又贿赂国民兵的团长们（据闻给每个团长赠送了五百元），等候时机一到，就要爆发举事。这时候袁庆曾只顾日夜应付军务、政务、杂务，忙得废寝忘食，一塌糊涂，对于李大超的活动，始终蒙在鼓里，毫无所知。

九月二十八日夜九时许，李大超在国民兵司令部内召开秘密会议，密令车站备妥列车，准备当夜潜赴包头，并派亲信把住电话断绝对外联系。在会上勒令军需处长张惠民立筹现款十万元，作为开拔费，如办不妥则“以军法从事”相威胁。张说，金柜里从来不存多少现金，银行夜间又不办公，无法支取。如属急用，可找平市官钱局负责人连夜提取。李恐走漏消息，不准张离开会场一步，僵持两个小时，款项仍无着落。李慌了，怕夜长梦多，影响出走计划，就在十一时许，席卷了军需处的仅有现金，匆促地带着参谋处、副官处和特务营的第一中队（中队长王润生系军士教育班李大超的学生），悄悄由后营门奔赴车站，乘上早已备妥的列车，仓皇向包头驰去。

特务营长吴学禄夜回宿舍，不在营内住；营附王玉田，因为前方军事吃紧，想找参谋处长了解情况，因不见参谋处长，他在宿舍内坐等，忽然听到李副司令带着司令部人员出后营门上了车站，第一中队也给拉走了。他知道发生了事变，马上电话报告袁庆曾，并派人通知吴营长。袁闻报后，大吃一惊，担心特务营再生枝节，即令吴营长将特务营的二、三中队开回旧城，分驻大北旅社、泰安栈等处，并分头警戒。由于李大超的突然行动，惊醒了袁庆曾的浑噩大梦，顿然感到国民兵团有被拉走的危险，需要进行争取工作。于是就将这一联系、争取的任务，交由省会警察局督察长韩伯琴火速进行。韩伯琴以袁司令名义连夜将驻西茶坊的国民兵第四团团团长范步高用电话召到袁的住所，利用同学关系，先探询去留志趣并加劝导说服，同时告他李大超已经叛傅出走。范系傅的老部下，也感到留下来和李共事，前途渺茫，愿意随袁撤

退。意见一致后，由袁出面安慰，拨给开拔费并口头命令明早出发，开赴托县待命。袁的急令开拔，是为了扯断他和李大超藕断丝连的关系，另外还预防驻在省会发生其他问题。

午夜一时，袁又接到车站通讯班转来包头紧急电话说：“包头车站已备好列车，李大超要带挺进军（马占山的挺进军已进驻包头），连夜返回省会缴国民兵的械。”袁得报告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时判断这个电话，意在恫吓，虚张声势的可能性大，但不能不预防万一。经决定将移防旧城的特务营，马上开进新城布防，作防守准备。宪兵、警察、省府卫队，都全副武装，实行宵禁，严密警戒；同时急电驻旗下营的刘景新团连夜开回归绥，并电令国民兵驻武川的李吉祥团，驻卓资的曹子谦团，都连夜向省垣开拔，这样整整折腾一夜，李大超也没敢回来。

小校场的国民兵司令部，一夜之间，溜的溜，走的走，只剩一座空营房，司令部的库房里，还堆有不少给养物品，原封未动。但到了第二天早晨，就都被附近居民拿去了。部队里军心惶惶，也没人过问。等到情况稍为稳定，派人前去查看国民兵司令部时，早已锁落门扉，“空空如也”了。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以前，国民兵的李吉祥团和曹子谦团，先后开回绥垣，他们也知道了李大超逃走消息。经韩伯琴分别和两位团长联系，都同意随袁回晋，当即发给开拔费并命令即日继范之后开往托县。

经李大超分裂行动的震动，绥垣人心越感不安。这时守集宁的炮兵团业已撤回绥垣。刘景新的四二一团也集结在绥垣外围。袁庆曾感到事已不可为，即决定当日下午全部撤退，并将事变实况及撤退决定，电报了傅作义。自命代理主

席的赵承绶，只好随着一同撤退。下午五时，绥远国民兵司令袁庆曾、代理主席赵承绶、绥远宪兵副司令马秉仁、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省会警察局长张公量等分乘几部汽车由四辆装甲汽车随行掩护，又将省会警察编成的保安第一、二、三队，宪兵第七、八、十队，炮兵第二十九团，步兵四二一团，编成行军序列，黯然无神地离开了绥远省会，直向托县狼狈逃去。我当时随着撤走，面对着市民们惊惶悲愤的面孔，真是欲留无术，欲告无语，惭痛万分。

李大超跑到包头以后，首先缴了宪兵第九队（队长是傅部老军官梁新胜）的械，接着将没有退走的国民兵第一团马逢辰残部，第六团及其他残留的武装人员，大加扩充。这时兴和县长孟文仲，带回来二百多名骑兵，也到了包头。三十五军参谋处长李英夫，原是随傅作义到了雁门关，因害怕战争，骗了总部一辆小汽车，逃回绥远，又在平市官钱局讹诈一笔款项后，溜到包头。于是“金刚”们又在包头聚首了。李大超自封为司令，将部队编成三个旅，以马逢辰、李英夫、孟文仲等为第一、二、三旅旅长，大搞起东北人的集团来。

九月三十日李大超闻知袁庆曾等已经退走，便卷土重来，返回绥垣，配合在卓资山、旗下营一带门炳岳的骑兵，挺进军马占山部，在绥远虚张声势地支持了七八天。等到日寇长驱进犯绥垣，李等一听大黑河枪响，就仓皇退往包头，辗转逃进河套。后来李大超就利用这个摊子，攫取了一个绥远游击军番号，当上了游击军司令，满足了他那别树旗帜的野心。

袁庆曾从绥远省会撤出的一行人马，在托县集中以后，

于十月一日开始，陆续从蒲滩拐渡口过河，经准格尔旗，向山西省河曲县行进。由集宁退下来的四三五团，国民兵第一团，也于中途赶上了大队，加入了行军序列。总计国民兵跟来了四个团，但因完全是绥远省的壮丁，思家心切，沿路有不少人潜逃了。十月七日，先头部队到达了目的地——河曲县城。提前出发的第一、二批职员，早已到了河曲；从黄河航运的军政人员，也陆续赶来河曲。河曲县长王庆轩（晋南河津人，后来当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副官处长）对傅的僚属、军队，大献殷勤，军需供应十分周到，于是由绥远撤出的军政人员，都暂时在河曲县安顿下来。

（四）参加太原守城战役

当时日寇以钳形攻势夹击山西，东路攻打娘子关，北路攻忻口阵地，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忻口阵地，由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傅作义任后方援军总司令。当忻口战事达到最激烈阶段，傅即将三十五军的两个旅，增援第一线，投入战斗。

十月二十三日，袁庆曾在河曲接到傅的电报，令驻河曲部队开赴太原。袁接电后，一面对绥远省政府文职人员，作了适当安置，除少数志愿离职的，资遣不计外，部分留在后方，随船看守营底，其余随军进驻太原（后来参加了太原的守城战役，有死的也有伤的，绥远省的行政人员，跑到外省参加作战，这也算抗日战争中突出的事例）。一面命令驻河曲的两个步兵团，四个民兵团，一个炮兵团，还有绥远宪兵三个队，绥远警察保安三个队，由袁庆曾率领，于十月二十五日由河曲出发，十一月一日到达了太原市。这时候，第二战区

司令长官部已经退驻孝义县的大麦郊。留下的太原市是满目凄凉，一片混乱。

忻口的攻防战整整鏖战了二十一天，由于晋东的娘子关被敌突破，战况急转直下，因而忻口战役到了十月底已成尾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的作战计划，是以太原为中心“依城野战”。傅作义指挥直属的三十五军配合晋军守城。卫立煌指挥在忻口作战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配属晋军陈长捷部占据太原的东山，野战部队占据西山。并决定忻口的防守部队于十一月二日晚九时全线退却，转往太原线的新位置。退却命令下达后，傅作义指挥的守城部队于十一月四日以前，按照预定计划，全部撤回太原市区，即按照城防部署进行防守工作。不料卫立煌和陈长捷部，撤退时胡乱窜逃，溃不成军。卫部一直跑到汾阳一带；陈部乱窜到韩侯岭以南地区，野战部队一去无踪，只剩下守城部队孤城困守，把一个“依城野战”的作战计划，自己就打了个粉碎。因此这一战役，尚没有开始，就有人预料到最后的结束了。这时忻口的日寇，乘着守军的混乱撤退，空中飞机轮番轰炸，地上的步兵跟踪追击，于十一月五日即全部迫近太原市区。

阎锡山留给傅作义的守城部队，计有步兵：三十五军的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共六个团；六十一军李服膺部的二一三旅（旅长杨维垣）两个团，正太护路军孙楚部的孙魁旅两个团，六十六师杨效欧部的一九七旅（旅长王恩田）两个团，新编旅（忘其番号）陈庆华部三个团，姚骊祥的新编第三团。炮兵：炮二十一团李柏庆部，炮二十四团郝庆隆部，另外还有炮叠大队（这些炮只有炮架没有炮车，不能移动）和高射炮两个连。从部队番号看

来不少，但实际全部兵员不过一万五六千人，对周围四十里的太原城防，着实不敷分配。又兼以上这些守军，大部是新编部队，及拨补的新兵，而三十五军，又因一连经过商都、平绥线、平型关、忻口几个战役，损失很大（据四三六团的统计，四个战役，仅营、连、排长就伤亡一百员），元气已伤，当时每团兵力平均约六百人，经将绥远归来的四个国民兵团全部补充进去，才算又增加了一点新力量。同时傅作义对杨效欧、孙楚、李服膺等部，在使用上既不顺手，又多所顾虑。在这些无法克服的困难面前，傅只有孤注一掷，把自己的基本队伍——三十五军，全部摆在敌人必攻的东北两城上，硬着头皮打这一仗。

当时守城的布署是：北城从西北城角起，姚骊祥的新三团，二一八旅的匹三三团（团长许书亭），四二零团（欠两营，团长李思温），四三六团（团长李作栋），二一一旅的四一九团（欠一营，团长袁庆荣）。东城从东北城角起，二一一旅的四二二团（团长王雷震），四二一团（欠一营，团长刘景新），孙樾旅的一个团。南城全面由杨维垣的二一三旅布防。西城全面由陈庆华旅布防。炮兵分布在全城的各个炮兵阵地。关厢前进阵地：北关兵工厂，由四二零团团长李思温带两个营防守；东北城外黄国梁阵地由袁庆荣团的张惠源营防守；东南城外郝塔寺阵地，由刘景新团的韩春富营防守。南城、西城外由担任城防的杨、陈两旅，分别在太原火车站和汾河东岸派出警戒部队。三十五军的骑兵连，放在汾河西岸，担任游动巡逻。其余部队，分别编为预备队和总预备队。

城里也作了必要布置：先委派曾延毅为太原戒严司令，

马秉仁为戒严副司令，指挥孙樾旅的一个团，和绥远宪兵第七、八两队，担任城内的岗哨、巡查，负责维持城内秩序。后又委派袁庆曾为城垣关厢防守指挥官，指挥部由绥远撤退的行政人员（如绥远省会警察局长张公量、督察长韩伯琴、民政厅科长高赓虞等）组成，负指挥督战任务。傅的总部设在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内，总部院内控制着三十五军特务连、宪兵第十队、保安警察第三队，负责总部的警戒。

部署既已就绪，准备在四日黄昏即行封闭城门。封城以前，傅作义曾集合部队作动员讲话，说到：“今天就要封城，我们守城，就比方人已经死了，躺在棺材里，光差盖盖啦。”这种说法当然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但却起了反作用。不仅士兵和初级军官有越城潜逃的，就连总部里傅的亲信，中校副官尹绍伊、三十五军上校处长李荣骅等，也都乘着黄昏封城的空子，相偕出走，逃之夭夭了。

四日下午卫立煌由忻口撤退下来，进太原城和傅会面，卫不主张空守孤城，认为现在依城野战，已不可能，只剩太原孤军守城，徒耗兵力，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如改变计划，因此他坚决主张要走。但傅却表示：“守土抗战，军人有责，野战军在，太原当然要守，野战军走了，太原还是要守，至于后果，现在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最后，傅在封城之前，将卫送出城外。

从月初，我军从忻口退却开始，日寇空军对后方侦察日益频繁，太原上空来往盘旋的飞机，几乎轮番不断。十一月五日，日军步兵已迫近太原，作攻城准备。空军对太原市也开始了有计划地轰炸，太原城内在五日以前，每逢敌机空袭，空防系统，即发出空袭警报。从五日下午起，警报也变成哑

巴了。这并不是警报器被炸失灵，而是警报系统自行瓦解，负责警报的人早已不辞而别，找安全地带躲飞机去了。

十一月六日拂晓，日寇步兵开始向太原北关兵工厂，东北城外黄国梁坟的前进阵地进攻。日军炮兵在飞机指示目标下，以十五榴弹野炮等数十门，集中火力向东北城角猛烈轰击。城墙上部，在硝烟弥漫，地动山摇的震撼中，逐渐地被打成缺口，崩落的碎砖、土块，在城下摊成斜坡。城防部队也命令炮兵还击，形成了整天炮战。到天黑停战时，便连夜将城墙缺口修复。

兵工厂前进阵地的李思温团长，以两个营的兵力，依据早已构筑的坚固工事，对优势敌军的进攻，顽强抵抗，曾经多次击退敌人的疯狂冲击。黄昏以后，奉令撤入城内。守黄国梁坟阵地的张惠源营，事前准备不够，受敌压迫，提前退回城墙阵地，至此北城和东北城角，就赤裸裸地摆在敌人面前。

十一月七日拂晓，北城外的日寇利用关厢建筑物，东门外北段的日寇利用丘陵地带，分别接近了城墙，开始了全面进攻。同时还分兵绕过东城，向城南的火车站迂回，另一支日军由汾河上游渡河，进出于城西的汾河西岸，企图对太原合围。其主力以步炮空联合作战，又向我东北城角猛烈进攻。守军连夜修复的城墙缺口，很快又被敌炮、敌机轰炸摧毁，战况极为激烈。城坡上敌尸成堆，大片黄土，已经变成殷红色。我守军也伤亡惨重，四一九团团团长袁庆荣受伤，三个营长，一个阵亡，一个受伤，连长伤亡了八员。排长以下的兵员，损失的已达三分之二以上。邻接它的四二二团，中校团附傅如霖也在东北城角受伤。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面对这种激烈战况，曾经几次派队增援，将地区预备队，使用净尽。日寇因整

天猛攻东北城角，牺牲很大，未得成功，很不甘心，又在黄昏时调集精锐，加大兵力，再次发动强攻。我城墙缺口守军，全力阻击，终于在兵员伤亡殆尽，援军未至的时刻，被一股敌军（约一个营）突入城内，占领了小校场（东北城角以内地区）的炮兵营盘。这时我缺口两侧守军，急以密集火力，封锁缺口通路，阻止住敌人的后续部队。我赶来的援军，占据了原北方军校校址，和原国民师范旧址，对这股敌军作了包围，阻止敌人扩张战果。黄昏以后，孙兰峰旅长又抽调兵力，对这股日军，连夜进行攻击，消灭了敌人一部份，曾得到总部奖金三万元。但其余日军仍依据炮兵营盘，进行顽抗，坚持了一夜。这个孤立在北城墙下面的炮兵营盘，东西南三面都是平坦开阔的操场。白天，我军不易接近，日寇也很难向外扩张，又双方炮兵都不能发挥作用，因而在八日上午形成了对峙局面。同时日寇因后援部队一时不能进城，为了保持这股部队在城内扎根，曾用飞机空投接济。

太原城内自从戒严司令部成立的那天起，就发现城内潜伏着不少汉奸、特务，小北门里的意大利天主教堂，就是掩护他们的一个渊藪。在城内，大街小巷，经常听到枪声。戒严司令部的巡查兵，有的在执勤期间，就被特务黑枪打死了。司令部也常扣捕一些鸡零狗碎，但始终也审问不出一点头绪来。主要原因是太原的宪兵早已随着二战区长官部撤走，太原的警察机构已经残缺瘫痪，失掉作用。新组织的戒严司令部及其所指挥的警宪部队，完全是来自绥远，不了解基本情况，只有黑天暗地里瞎摸索，偌大一个太原市，一时之间，那能想出有效办法来。十一月五日以后，敌机滥炸市区，房倒屋塌，交通阻塞，电杆倾斜折断，电灯早已失明，

电话线路，时常发生障阻，曾随时修理，也修不胜修，显得一片凌乱。到了十一月七日，街头巷尾到处是散兵游勇，胡走乱窜。不少饮食品商店，都被打开了门窗，随便出入，乱拿东西。满街都是空酒瓶，罐头，桶子，城内秩序更是乱得不成样子了。尤其在敌人打进城来的消息，一经传播后，未经接仗的部队，越法是军心惶惶，不可终日。

十一月八日早晨，傅总司令召戒严司令、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到防空洞里谈话，谈话的内容外人闹不清楚。曾由傅的防空洞出来，没有再回戒严司令部，就一直向总部走去，同时派卫士去叫戒严司令部参谋长鄧莘田。等鄧由司令部出来，曾已走出总部大门，鄧紧紧地跟上，曾见了鄧也未说话，直奔他的马号。这时马已备好，曾立即上马向南门驰去。戒严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勤杂人员等，也都闻风赶来，跑到大南门跟前，发现早经封闭的城门内，石碾砂袋，层层堆积，原封未动。曾命令跟来的卫士随从们搬移砂袋。守城官兵知道他是三十五军副军长，不敢拦阻。卫士们费了好大力气，城门仅仅打开了寸把小缝，不要说人，连一只大猫也钻不出去。好在两扇城门稍稍向后移动了一些，门头上却甩出一个较大的三角空隙，曾延毅心急智生，舍掉了坐骑，爬上砂袋，让气力大的几个卫士把他举上门顶，打算从三角空隙里漏到城门外边，但是身上披着青山羊斗篷，臃肿漏不下去。他发了狠，把斗篷脱下来摔到门洞里，只穿着一件便衣小棉袄溜下套圈，钻出城去（这时候大约九点多钟）。出城以后，狼狈的向南赶路，恰巧遇上四三五团受重伤的张霁浦连长。张连长骑着一匹瘦马也正在赶路，曾向张连长要

过马来骑上，往正南而去。曾的参谋长邰莘田也在他的后面跟来。邰参谋长一方面因足有残疾，行走困难；一方面他看到城门上不易出去，便按转马头从旱西门旁早已挖好的交通路走出城去。不久，他又和曾副军长会见。他俩一同过了汾河，绕过太原县和清源县，又经交城、汾阳，跑到隰县去了。

曾是三十五军副军长。他一走，看见他的人都说：“副（副与傅同音）军长出城走了。”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靠近南城的部队。戒严副司令马秉仁不甘落后，也立刻登上“李牧号”的装甲车，赶到大南门，见城门仍然封闭，遂即抛弃装甲车，从炮兵掩体钻出城门，也逃命走了。于是“副（副与傅同音）司令出城走了”的消息，又传进了守城官兵的耳朵。由此辗转相传，以讹传讹，把“副军长”当成了“傅军长”，“副司令”当成了“傅司令”，因而军心动摇，顿时大乱。有些部队，官不管兵，兵不顾官，撩下武器，越城逃走的不计其数。南城以外，遍野都是惊惶南窜的溃兵。十二时以后，除去北城、东城部队和敌人对峙拚杀外，其他城上的守军逐渐稀少，并且有一段一段地早已看不到部队的踪影了。

傅的总部内，从七日黄昏日军突入城垣以后，空气异常紧张，有些人惊惶失措，彻夜不敢睡眠。八日晨，经一夜战斗，没有把敌人赶出城去，越发感到沉重。这时候虽然听到满街人马乱跑，声音嘈杂，但对曾、马两司令的逃跑和城防部队发生动摇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约十时许，汉奸特务突然对着总部大门，打了几枪，总部院内哗然大乱。副官长黄土桐当下慌了，他不想办法如何应变，就跑进防空洞，大

喊大叫地向傅作义报告：“敌人在总部门外打枪，快打进总部来了！”傅作义又因为想挽回危局，消灭窜入城内的敌人，在整整一夜里，把两只眼睛都急红了，用尽了办法，也没有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时候，突然听到黄叫喊，看见黄的神色，勃然大怒，对黄斥骂：“谁说的，你简直是汉奸，造谣，惑乱军心，砍你的脑袋。”黄还在那里楞楞地立正着，参谋长陈炳谦暗中推他一把，悄声告他：“还不赶快出去。”黄碰了一鼻子灰，退出防空洞，靠在墙上，愤怨地自言自语：“几千里跑来帮你抗战，还骂人家汉奸，要砍人家的头，咱是不能干了。”当特务在门口放枪，院内发生骚乱的时候，原绥远省政府的林亚萍等三位秘书，和特务连的三十多名官兵，跑到总部西便门慌乱地挪动砂袋，打算开门，逃出城外。经韩伯琴发觉劝阻后，林亚萍才带头喊着：“走，回去保卫总司令去！”又回到总部楼下。韩又寻到宪兵队长刘汝砺，偕同去找黄副官长，劝他先不要计较碰钉子的事，并建议赶快分头整顿部队；抓住部队，才有办法应付突然事变。于是黄找特务连长集合特务连，刘集合宪兵十队，韩集合保安三队。集合后，分别安置在防空洞口附近的楼底空房间里，让连队长们站在门口，以防士兵随便离开。就这样，掌握住队伍，院内也平静下来了。总部里除过一部分职员乘乱逃离总部，混出城外，秩序又重新安定下来。

（五）太原退却部队溃散

十月八日，日寇继续向北、东两城全面进攻，守防的各团，经过连日激战，兵员损失很大，营长以下军官的伤亡也

不少。东北城角的突破口，守军已无法控制，日寇从这里又窜入约两个营的力量，会同昨天突入的敌人，企图扩大战果。但由于地形的局限性很大，于敌作战不利。经过整个上午巷战，虽然攻占了几个院落，发展仍然有限。我守军已精疲力竭，既不能歼灭入城的敌人，也无力将敌人赶出城去。十二时以后，发现敌人以坦克掩护汽车，不断由汾河以西的太（太原）晋（晋祠）公路上，向南输送部队。这时判断敌人是要“放长线钓大鱼”，以攻城部队牵制守军不会撤退，一俟包围布署完成后，全部歼灭守军。在这种外援没有指望，反攻又没有力量的颓势下，时间拖得越长，对守军越不利。

傅作义在防空洞里，心中焦烧，坐立不安，肝气旺盛，已达极点，只是鼓着气说“打”，总不露半个“走”字。这时候没人敢去和他说话，谁去谁碰钉子。但是稍俱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局势已恶化到山穷水尽之时。守是坐以待毙，走已成定局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每个人，都作好了“走”的精神准备。参谋处在处长苏开元的暗示下，悄悄地拟好了退却命令；军需，也把大批的现金分给总部人员分别携带。好容易挨到下午五点多钟，幕僚们暗中怂恿参谋长陈炳谦、防守指挥官袁庆曾，一同向傅婉转地陈述以下意见：

“对敌人一定要打，对窜入的日军一定要消灭，但需要筹划一种有利的打法。现在局势已恶化到与我军极端不利的情况，我们最好先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转进到西山里，反转来再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当前万全之策。”傅满面怒容的说：“你俩也说退。好，走！”二句话没说，扭身抓起大氅，就走出防空洞。苏开元赶快将早已预备好的“退却命令”（部队集合地点为晋祠北边某山村——已忘村名，其实

晋祠已被敌人占领)让陈参谋长签了字,马上发给各守城部队。这时夜幕已渐降临,傅在前面走,总部的各处人员都陆续跟上。接着就是三十五军特务连、宪兵第十队、保安第三队,拉成了长长的一个行列。走出总部正门,直向大南门走出。参谋处的退却命令,拟得及时,下达得快,但忘记了城门早已封死,退却路上应采取措施。当接近大南门时,只见城门封闭。门洞里外,城墙上,都是争着要出城的溃散官兵。你挤我拥,喧嚷之声,震耳欲聋。这时敌人也断断续续地打起炮来,向城内盲目射击,这样就更增加了人们的惊惶情绪。城门跟前,有一部分人正在搬移砂袋,预备开门。但是满门洞的人越挤越紧,妨碍着工作。停在门洞外边的,有装甲车、载重车、马匹、驮骡、骆驼……,门洞里边,满地是石礮、砂袋、踏烂的自行车、挤死的骆驼、死人的尸体等等。当时哭喊叫骂胡乱开枪,乱成一锅粥。被踏死踏伤的很多,四三五团少校团附解致信也被踏死了。经这一乱,总部的行列只有宪兵十队队长刘汝砺,紧紧地掌握了自己的队伍,其余的都五零四散,自寻出城门路。有从城门缝挤出去的,有从炮兵掩体钻出来的,有从重机枪射击孔爬出去的,还有用绳缒出城外的。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傅作义出城以后,只有特务连排长薛文一人跟随。参谋长陈炳谦,不仅只身奔波了一夜,过汾河时还丢掉一只鞋。袁庆曾同行二十四人,总算还有十几支盒子枪保驾,但绕走了一夜,天亮时才走到西山麓的一个山村,一打听,距离太原市仅有十二华里。

守城部队先后接到退却命令(也有少数没有接到的),由于撤退仓皇,形成混乱,又系夜间行动,前后互不相顾,不少带兵官,都脱离了部队,因而部队大部溃散。二一八旅

旅长董其武，新三团团团长姚骊祥，只剩两个单人相随出城，在一夜之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曾看到敌人的一个胶皮人，就惊得他俩半夜没敢行动。天亮以后，到处都被敌人阻隔，通不过去，因而越走越偏东南，一直走到了沁县，经过一个多月，才在石楼找到自己的部队。守郝塔寺的四二一团营长韩春富，在退却时脱离部队，带着旅部配属的一排骑兵，跑到晋北五台县，被反正的伪军金宪章部缴了械。

十一月九日晨，傅作义停止在西山里边一个小村（忘了村名），总部的重要人员也都陆续赶来。接着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带着特务连，相随有一九七旅旅长王思田带着一个特务排，也找到这里。见傅后，即令布置人员，分头收容部队，并于当日下午从这里出发，先奔中阳，后转石楼县。以后即转入整军阶段。

太原退却，夜渡汾河，河水虽不宽不深，但泥淖很多，由于官兵不了解河道的情况，陷入泥淖，死在汾河里的人数很多。总部中校参谋许挹和，就是这样死的。还有些部队，由于敌情不明，而扑到太原县、清源县、晋祠、小店镇等处敌人窝里，遭到痛击。在太原以南汾河以东的乡村，因曾普遍受过溃兵的洗劫，到处都是柜倒箱翻，盆砸锅碎，农民对军队恨之入骨。而这次傅部出城，有些官兵，又跑到老百姓家里，作威作福进行抢劫，却被积忿的农民打死或打伤的也不乏其人。总部的少校参谋张寿彭，就是在吃饭中间被老乡用碗砸伤头部，几乎把命送掉。

（一九六三年六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六辑

作者 =

页数 = 292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